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代大学论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美英德大学研究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著

徐辉 陈晓菲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代大学论
UNIVERSITIES

ISBN 7-5338-4196-4



9 787533 841966 >

ISBN 7-5338-4196-4/G · 4166

定价：15.30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代大学论

——美英德大学研究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著
徐辉 陈晓菲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美)弗莱克斯纳著;
徐辉,陈晓菲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
(2002.7重印)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4196-4

I. 现... II. ①弗...②徐...③陈... III. ①高等
学校-研究-美国②高等学校-研究-英国③高等学
校-研究-德国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213 号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代大学论

——美英德大学研究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

徐辉 陈晓菲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310006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28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 7-5338-4196-4/G·4166

定 价:15.3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萍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1986 年底的某一天,当我与导师王承绪教授讨论我的博士论文内容时,他列出了几本书,建议我重点读一读它们。其中一本即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著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是,尽管这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但它的确是一本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作者关于大学职能与大学教育许多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尽管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一些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译校完这本书后,我发现我的这一看法没有改变:我深信研究高等教育的同行读完这本书后,一定会有各自的收益。

对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据德耶诺兹卡(Edward L. Dejnozka)和卡佩尔(David E. Kapel)主编的《美国教育家大全》(*American Educators' Encyclopedia*, 美国绿林出版社 1982 年版)介绍,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生于 1866 年,卒于 1959 年。他被认为是美国医学教育改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1910 年,他曾受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委托,对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培训状况进行调查,并发表了题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科教育》(*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有关医科教育改革的若干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将医学院的数量从 155 所减少到 31 所。他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从而促使美国医学培训机构的层次有了显著的提高,并确立了医科训练的严格标准。据介绍,弗莱克斯纳的教育成就相当广泛,他甚至办过中学,担任过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主任以及美国通识教育委员会秘书等职务。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发表过大量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著作和文章,《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只是其中一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现代大学的理念;在第二、三、四部分,作者分别谈了对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特点——尤其是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展示了他对大学的性质与大学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这些重要问题包括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大学的基本职能、大学工作的性质、大学的组织管理、大学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大学的专业教育等等。作者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观点,是作者研究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者对美英德大学的分析,正是在其现代大学理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理解和研究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现代大学理念,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作者对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的看法,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二、三、四部分,作者在其现代大学理念的指导下,以充分的材料与事实为依据,本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和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当时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特点与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对这些相当有趣的分析的看法,我想最好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比较好。在此我只想简单概括一下作者关于大学的一些基本理念。

首先,作者认为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作用来自大学的独特职能。作者同意英国学者霍尔丹勋爵的看法,即“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作者在书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他对大学作用的认识:“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要么是明智的行动,要么是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轻妄的行动。大学以其实力和声望必须对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或愿意接受这一挑战?今天的世界充满着传统、善与恶、种族混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斗争、商业利益、追求正义或邪恶的巨大物质力量、解放了的工农、不安的东方人、喧闹的城市、冲突的哲学——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任务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

作者认为,大学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职能。这种职能甚至是跨越国界的。他说:“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但不管留有多大的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

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

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作者对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作了大量的批判性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批评主要涉及“两点”，即“大学现在尚未触及的事”和“大学不应涉足的事”。所谓“大学现在尚未触及的事”，作者的看法很明确，指的就是真正属于大学层次的研究和教育。作者认为美英德——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所谓“大学不应涉足的事”，作者的看法更为明确，指的就是不属于大学而应该由其他教育或培训机构去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在当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主要大学里到处可见的大量的低层次“服务性”工作。作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是：大学仅是众多教育事业中的一项。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大学应该履行其特定的职能而不能包揽过多；其他教育与训练工作应由其他教育机构去履行。在全书中，作者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似乎远远多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作者主要是通过阐述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来表明他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

其次，作者对大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性质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关于作者对大学研究的看法，正如许多高等教育研究者指出的，弗莱克斯纳是“纯研究”或“基础研究”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事实的确如此。例如，作者在对充斥当时美国著名大学的他所认为的假研究或伪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剖析之后，明确指出：“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的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报告不是

研究；检查不是研究；女售货员、速记员、女招待、院长、破产者和诉讼当事人富有同情心的叙述，学校制度，教育系学生的喜怒哀乐，招生中怀疑学生是更爱父亲还是更爱母亲，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也都不会被称为研究。那么，什么是研究？虽然学术合作也是一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不能被排斥在外，但研究不是通过雇佣他人而是个人独自作出的静悄悄的和艰苦的努力。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有多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

类似的例子，书中俯拾即是。可以说，这本著作实际上就是作者对自己有关大学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不能够做什么这些看法的比较全面的总结。简单地说，“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这是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普及教育”的任务则明显不属于大学。作者认为尽管这些教育工作都很重要，但它们不属于大学工作的范畴。为避免出现这些工作使大学精力分散的情况，应将它们从大学任务中剥离出去，由社会为它们建立适当的工作机构。

再来看看专业教育的问题。这也是作者在全书中花费笔墨较多的一个问题。专业教育是否属于大学教育的范畴，弗莱克斯纳的看法是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法律和医学有明确的理由列入其中；但有教派的宗教不能列入，因为它含有偏见。此外，他认为由于教育、商业、新闻、家政“学”或图书馆

“学”都达不到严格的专业教育标准,都不应列入大学教育范畴。他甚至认为:一所毫无学术成果的法学院或医学院既没有必要也无权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社会为这些培训工作设立独立的职业学校,对社会和学生都更有益。

那么,应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教育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培训?弗莱克斯纳认为标准不难确定。首先,从历史上看,专业是指“学问高深的专业”。因此,“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本身自相矛盾——只能是种种职业”。其次,专业的本质源于理智。尽管外科医生用手开刀,内科医生用听诊器工作,律师使用文书和会计,但这些只是活动的偶然方面。作者认为,这几个专业的实质是运用自由灵活的智力去理解问题——“理解历史遗留给我们并因为进化而复杂化的种种疾病的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问题”。如果法学院和医学院只满足于看看病或打官司,不能够或不愿意以学术性研究工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它们就根本算不上大学的学院”。再次,作者认为,还可以通过分析对待工作结果的态度对专业和非专业进一步加以区分。“以医生或律师身份出现的科学家或学者有要实现的目的。实现这些目的附带也能谋生,但至少在理论上(许多世纪以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生计是次要的、附带的,即使它对个人而言极其重要。专业首先具有客观的、理智的和利他的目的。因此,一个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理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它有一种荣誉准则,就像历史上人们印象深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

弗莱克斯纳对大学教育的“稀释”深恶痛绝。他认为,在

当时美国的主要大学里,真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比校方统计的学生人数要少得多。他曾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进行了十分有趣的分析。他指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报告说,1928—1929 学年该校共有学生48722人。如果排除学习暑期课程、大学推广课程和自学课程的学生——他认为这些学生不应该包括在内,因为他认为不管他们学习是否认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不能算是大学生——这一庞大的数字将减为16123。在这剩下的16123名学生中,3730人是本科生,弗莱克斯纳认为其中一半以上学习的是中学水平的课程或在某些特别系科注册学习;在另外12393名研究生或专业学院的学生中,有8000人注册学习商业、牙科、口腔卫生、新闻、视力测定、药学、教育、图书馆服务和实用艺术;剩下的4000余人中,约3000人在研究生院学习。根据弗莱克斯纳引用该研究生院伍德布里奇院长(Dean Woodbridge)的看法,其中只有1/4的研究生值得认真的考虑。因此,弗莱克斯纳认为,从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或掌握学术专业——的大学的观点看,哥伦比亚大学当年拥有的学生不是校方统计的48722人,而可能是4000人,并且认为这一估计已经相当宽松。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弗莱克斯纳对大学与外部世界及现实问题的关系的看法。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也比较容易引起争议。作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与对研究结果采取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正如他所指出的:“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与训练学生。星球的构成,原子的构造,俄克拉何马、但泽和肯尼亚的宪法,在星球中、原子里和俄克拉何马发生的事情,在决定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政治家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企业家和理想主义者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事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所有这一切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对上述这一切采取什么行动,则不是大学的事。大学不能控制火星上的天气,不能经商,不能对威斯敏斯特或华盛顿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但大学也不能远离社会。”

最后这句话具有重要的含义。大学“不能远离社会”,那么应该与社会保持何种关系?作者一面鼓励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一面要求大学不承担行动责任。这两种态度之间是否有矛盾?作者认为没有。他认为,大学必须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象采取一种“客观立场”。大学必须在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然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同时,避免参与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的实际事务。真正的大学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涉及一个大学的理想和组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因此,“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要对有关大学滞后的批评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可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大学紧跟时代甚至有所超前。这两个特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大学是复杂的有机组织:它们的胳膊可能是健全的,而双腿却可能折了。它们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能满足时尚,骨子里却是滞后的。它们在骨子里滞后的同时,也能像报纸和政客那样对时髦话题侃侃而谈。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

为了说明问题,作者列举了法国著名学者巴斯德的例子。

他认为巴斯德对待实践的态度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他说,巴斯德是一位化学教授,在他的专业生涯中,法国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受到了许多问题的威胁,包括“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为了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巴斯德放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但做完这些实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后,他发表了研究结果,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作者认为,巴斯德的方法是学术性的,不管他的课题是研究家禽、酿酒还是化学。“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农户当顾问;他没有开设养蚕、酿酒或养鸡方面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在作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工作者。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是部典型的批判性著作。尽管作者多次强调美、英、德三国大学里都有不少真正从事学术工作的科学家和学者,他们为学术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这不是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作者自己也承认,他“所描绘的图画过于灰暗”。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多次强调美国存在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其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他们在努力进行享有国际声望的工作。我也一直在强调我们对现代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教育学——所作出的贡献的创造性和重要性。但我用了更多的篇幅讨论错误的、受误导的和短视的方面。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除去坏的事物,才能有效地发展好的事物。一个四分之三美丽芬芳、四分之一杂草丛生的花园,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花园。人们会羞于展示它,

因为花园里面应该没有杂草。杂草不仅不雅观,而且会占领并摧毁花园。大学里也不应该有任何杂草;它们也不仅难看和不和谐,而且带来危害。我很直率地批判了荒谬的事情,因为它们应该被根除。如果我不提供大量的例证,读者就不会理解我到底在说些什么,或不会理解事情到底有多荒谬。对美国的学术进步,或美国大学中的学术进步,我毫无异议。学术在不断前进——按我们的意志发展:兴趣和忠诚既不会被贫困所吓倒,也不会为混乱所阻碍。但我们有理由尽量创造有利的条件——有利于个性发展,有利于建设性的交往,有利于进行合作,有利于维护学术标准。在这些方面我们远未竭尽所能,因此真相必须尽人皆知。”

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仅仅是他的许多观点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该书也许算不上是一部完善的著作,但肯定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批判也是深刻的,对我们理解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关于大学的作用、职能、使命的看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作者关于大学的“服务性”职能的看法,关于新闻、商科、教育等专业的观点,关于大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认识等,仍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应像弗莱克斯纳在本书中所提倡的那样,保持一种严肃的和科学的批判性态度。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与陈晓菲共同完成的。欢迎对译文中存在的不当之处提出批评意见。

徐 辉

2000年9月

第一版序

1928年5月,本人应罗得斯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之邀在牛津就大学问题作了三次演讲,本书即在这三次演讲的基础上扩展而成。那次邀请规定,演讲者在作演讲的整个学期都必须住在牛津——这一规定很值得称赞。首先,它使演讲者因此能体会到牛津的某些魅力;其次,它使演讲者在无意中中学到的东西要远远超过他所能够传授的,至少对一位罗得斯演讲者来说,事实的确如此。

从1928年秋天至1929年夏天,我访问了德国和英国的大学,以了解这些大学的现状、问题和工作方面的最新情况。此后整整一年我都把精力花在收集资料和修改文章上。1930年5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书的校样后,我分送给约三十位欧美国家的教授和大学行政官员,他们在认真阅读之后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意见。1930年夏天,我再次对书稿作了修改。我说这些是想让读者知道,虽然我对此书负最后责任,但我已做到不遗余力充实材料,并事先就我的观点征求过各种高见。我相信本书不可能使人感到完全满意,但如果我能引起大家对大学在现代生活中的职能等一些基本问题开展讨论,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读者会注意到,我对现代大学的讨论是有所偏重的。我不想将大学归为一种模式,不想用单一的观点审视它们,也不想对所有的大学问同样的问题。相反,为了探讨“现代大学的理念”,我从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各自特点去分析它们。我扪心自问:面对我们的理想,大学现在能满足什么?不能满足什么?至于大学的历史,我只涉及那些显然是我们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所必需的部分。我用于回答上述第二个问题的篇幅比较多,因为我相信,错误和弊病一旦得到纠正,大学的理想就会显示其内在的巨大力量——虽然不同的国家表现方式不同,但都奔向相同的最终目的。乍一看,我用于分析美国的篇幅过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大学需要占用更多的篇幅,是因为它们承担的工作更多;如果不援引大量具体的事例并加以讨论,我就不能指望国内外读者能够理解美国的大学。

我受人之恩太多,在此难以一一细述。要说还得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因为现在这本书不只是过去几年工作的结果,而且是自1884年长兄送我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之时起,我在国内外大学学习和工作经历的总结。从1884年到今天,我很幸运能以各种方式与大学生生活保持不断的联系。显然,这样一本书不会有什么独创之处;而同样显然的是,作者本人不知应向谁致谢,或者说,如果出错的话,除了自己之外还可以指责谁。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以下诸位表示感谢:罗得斯基金会各位托管人,洛锡安侯爵,罗得斯基金会秘书菲力普·克尔(Philip Kerr)先生,牛津大学基金会秘书弗朗西斯·J·威里(Francis J. Wylie)爵士,以及万灵学院院长和各位院士。我对

住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期间所受款待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同样要感谢我的秘书埃丝特·S·贝利(Esther S. Bailey)女士,是她帮助我收集解说性资料,核对事实并出版此书。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1930年10月1日于纽约

第二版序

第二版使我得以纠正几处小小的印刷错误及差错。本书印刷后,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先生出版了令人敬佩的《艾利奥特校长的生平》(*Life of President Eliot*)一书。詹姆士先生表示,我对吉尔曼(Gilman)校长在巴尔的摩所做工作的胆略和创新不是夸大而是低估了;如果不是吉尔曼先生领导有方,哈佛的研究生教育就不会得到发展。假如我现在撰写此书,我就会省略第86页上的一句话——“主要由于艾利奥特先生明智的忠告”。这两位了不起的人互助有加,但在大学工作的领域,吉尔曼先生是勇敢的先驱。

艾尔伯特·格兰特(Albert Guerard)教授提出了法国大学被省略的问题。他是对的。在一本论述现代大学的书中,法国大学不应被省略。我之所以这么做,取决于两点考虑:①本书的篇幅应有一定的限制;②仅通过一次讨论不可能达到我的目的。我从一开始就希望有机会单独就法国大学写本专著,以进一步阐述本书中提出的观点。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1930年12月1日于纽约

目 录

译者前言	徐 辉
第一版序	1
第二版序	4
第一章 现代大学的理念	1
第二章 美国的大学	30
第三章 英国的大学	193
第四章 德国的大学	266

第一章 现代大学的理念

—

75年前,一位杰出的牛津人牛曼主教(Cardinal Newman)出版了一本题为《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书。我略加修改采用那本书的书名作为章名。在本章中我讨论的是现代大学的理念。我之所以插入“现代”一词,是力图以最为直截了当的方式表明,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我将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并在阐述的过程中弄清楚: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现代世界融为一体,在哪些方面脱离社会,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害的让步,又在哪些方面是理性社会形成过程中有益而积极的影响力量。

我认为,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命运的主人。现代世

界在理性难以驾驭的压力下不断发展。要抵制这些压力,也许我们一时还显得软弱无力。但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确实存在——或许还为数不少——过去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值得为之坚持的东西;并且也确实存在——无人知道多少——我们用以塑造自身向往的未来文明的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其作用有多大。人,正如伍德布里奇教授所说,“是不会满足于被动地面对自然的。他坚持要改造她”^①。现代世界无论有多新,总是扎根于过去。过去是我们赖以生长的土壤。正是在过去,诗人、科学家、思想家和各民族积累了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真、美、知识与经验的宝藏。只有蠢人才会忽视过去。另一方面,稳步增长的科学的、民主的和其他方面的力量正在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对此大学必须加以考虑。

二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如果正如霍尔丹勋爵所说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②,那么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此外,从历史上看,大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是社会进化的组成部分。1900年的巴黎与1700年的巴

^① 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 E. Woodbridge):《教育中的比较》,纽约,1929年版,第17页。

^② 霍尔丹勋爵(Viscount Haldane):《大学和国民生活》,伦敦,1912年版,第29页。

黎完全不同;20世纪的牛津尽管从外部看变化不大,但与18世纪的牛津相比已大相径庭;尽管相距不到一百年,阿尔特霍夫(Althoff)时代的柏林已经有异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时代的柏林;1869年艾利奥特任校长时的哈佛与1909年他退休时的哈佛也的确很不一样。历史学家已详细探讨过这一演变的某些方面。在他们的叙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进程中,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经常被看做是反动堡垒的那些机构所作出的调整,这些调整有时是缓慢且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和剧烈的。因此,我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大学已经产生了变化。但是大学后来的变化是否达到了足够的深刻程度,或者说当社会本身被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和暴力不知推向何处时,它们是否明智地作出调整以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有效的形成性(formative)机构?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曾发明了“社会滞后”(social lag)一词。很显然,社会机构往往落后于它们所表现和推动的生活。那么,在何种程度上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为“社会滞后”所碍?

三

事物还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危险。我已说到大学的明智的变化——根据需求、事实和理想所作的变化。但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

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要对大学滞后的批评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可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大学紧跟时代甚至有所超前。这两个特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大学是复杂的有机组织:它们的胳膊可能是健全的,而双腿却可能折了;它们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能满足时尚,骨子里却是滞后的;它们在骨子里滞后的同时,也能像报纸和政客那样对时髦话题侃侃而谈。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

四

关于这一切后面再详谈。在本章中我要讨论的不是大学,而仅仅是大学的理念。我打算通过假设出现一种不可能发生、实际上也不希望其发生的情况,建立起一片自由思辨的领地。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但不管留有多大的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我重复一句,我指的是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的事”。当然,教育还关心其他重要的事。我想一开始就说明,大学仅是众多教育事业中的一项。在总的教育计划中,大学有某些特定的职能,其

他机构履行或应该履行其他职能。我们将会看到大学现在是否明确其特定职能并履行之,是否在瞎忙那些并不属于其特定职能的任务。

保存知识和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大学的任务,有时甚至被视为其唯一的任务,现在偶尔也被看做是最重要的任务。无论如何,大学总是将其当做自己的一项职能;不管大学如何变化,任何重建工作都不会剥夺大学的这一职能。但要补充一句,保存和解释的工作在那些将其作为惟一或主要工作的机构是一回事,在鲜活的思想之流不停冲击人类知识宝藏的大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创见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并不是大学教授的唯一类型。他们向来是杰出人物,其影响通常也是最深远的。但即使是大学,是现代大学,也需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有的教师对学问的贡献作用有限,但善于激励学生,或善于将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虽然不是一名杰出的、有创见的思想家,却是一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他以难以言表的敏锐性创办了杰出的剑桥大学生理学学院。保尔森(Paulsen)虽然也不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他同样是一名出色的大学教授,一位判断力强、心地善良并且学问渊博的学者,帮助过许多在生活 and 思想的困境中挣扎的人寻回自身。要注意,他们两人面对的是成熟的大学生而不是少年,所处的环境要求他们作出努力,取得成就。这就是大学最重要的标准。大学教授承担完全客观的责任——一种对待学问的责任,对待其学科的责任,而不是对待学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或家长式的责任。不必担心他会因此而丧失人性。有什么比19世纪黄金时期杰出的大陆学者与其弟子的那种关系

更迷人、更亲密、更有个性和更富有合作性？

摆脱实际责任压力的创造性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在现代大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保存知识的工作仍将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对教育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其他教育机构工作的改进，随着我们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大，我认为比起发展知识、高层次训练和批判性地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保存知识的工作注定是从属性的。

研究和解决问题或增进知识——这两个短语是相互通用的——的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在任何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先看看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我先考虑这一领域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学很少插足的领域，是一个研究难度和险度极大的领域，因此也是一个有待把握的极为重要的领域。比起那些轻信的民主斗士所致力于解决的相对简单的问题来，民主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复杂得多。社会不能退却。不管意大利或西班牙偶尔或暂时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为成功地推行民主制所需的适应和发明条件得以满足，我们最终就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是怎样适应呢？政治家们必须有所创新——不是指在黑暗里摸索或靠耍嘴皮子过日子的政客，而是指得到社会上那些心底无私且具备治世之才的大学精英辅佐的政治家。曾将现代社会引上新路的种种假设、观念和术语，部分由于自身的完善，部分由于科学和工业革命引起的变革，已显得有点过时。诚然，人的行动总是盲目无知的；但至少眼下看来，行动与知识之间的裂隙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实践的步子不能放慢或停顿，理智的步子则必须加快。

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都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论

点。美国发生了什么？1776—1790年间发生过一场以一种简单的哲学为基础的革命。时间，即使仅仅一个世纪，也带来了变化；但同时哲学观却已定型。以前傍海生活的稀少的农村人口后来却遍布一个帝国，人数超过一个亿；蒸汽和电力使工业的重要性超过了农业；庞大的城市拔地而起；巨大的财富差异业已出现。但是政府和社会的文献基础却依然如故。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现在处于一种术语与事实不符的困境。术语往往将事物固定；然而修整又必须进行。因此，国际法专家和法理学家被迫要使从前人那里接受的准则具有某种它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含义。对理论和观念进行轻松有效的重新构建因此变得困难重重。在远离现实责任和行动的喧闹的同时，与这种不一致有关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揭示。“伟大的社会”想要并且必须理解自身——部分出于纯粹的好奇之心，部分是因为人类现在处于一种困境，非获得更多知识不能自拔。就基本认识而言，报纸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活动家即从政者与商人能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他们本身学识不高，对新发现、新事物抱有偏见；他们通常另有所谋。惟一能担此重任的机构就是大学了。大学必须保护和培养思想家、实验家、发明家、教师和学生，让他们在不承担行动的责任的情况下，对社会生活的现象进行探究从而努力理解这些现象。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新奇。各国的伟大学者就已利用从日常工作中抽取的零星时间，对政治和经济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日常工作中抽取的零星时间”是从繁重的行政工作、中学教育工作以及各种旨在谋生而使人分心的工作中抽出来的。虽然个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任何国家的任何大学

也都没有为之提供过真正充足的机会和鼓励。我所想的并不是对实际工作者的培训,他们在承担工作责任时也会全力以赴。那不是大学的任务。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与记者、企业家、商人、总督和议员或国会议员之间,存在着一条大学所不能填补的鸿沟,社会必须以其他方式去填补。也许不应指望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去填补这道鸿沟,但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得到允许去做他想做的事,尽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中世纪宪章、拿破仑战争的财政情况、普鲁士的崛起、美国殖民地地方政府的起源,以及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霍布斯(Hobbes)的思想。这些题目,虽然有些陈腐,一般却被认为是合适的学术工作,因为可在图书馆里加以研究。但从学术角度说,研究凯恩斯(Keynes)先生而不是里卡多(Ricardo),研究历届委员会努力解决的战争债务而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历史意义的被拒付的国债,研究工业革命在今天的后果而不是其早期的演进,是否也同样合适呢?去现场发掘亚述王宫不可否认是大学教授的一项合适的工作,但煤矿罢工、印度动乱、橡胶、石油以及美国的私刑这些问题暂且是否就应主要留给记者、旅行家和政治家去考虑呢?是否要等到这些问题接近过时阶段才成为合适的学术性课题呢?恰恰相反,面临同时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以研究当前社会现象为己任的科学家的任务,可能要比企图重构历史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或中世纪文化研究者的任务轻一些。“想想当古希腊共和国或古罗马殖民地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时一个学者的兴奋程度吧——假定他得以从其某些精心构筑的幻想被毁的打击中恢

复过来的话!”^①

我已说过,要获得这样或那样的资料并不难,但要作出概括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科学家可能对前人所作的不成熟的概括不满。但除非他自己也尝试进行概括,换句话说,除非他既掌握资料又有思想,否则他也不会做得更好。文章或调查材料可以堆得山样高,但它们本身不构成某门科学或某种有关经济学、心理学或社会的哲学。确定假说与收集资料这两个过程必须齐头并进,互相作用。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对精细的和现实的研究来说,概括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动力。各种概括不会经久不变,为什么它们要经久不变?在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它们都不是经久不变的。资料也是如此。社会科学或其他科学是一种结构:“一系列不断修正的判断构成无可争辩的科学进步。我们必须相信这种进步,但我们决不能过分相信这种进步所持续展现的种种外部形式。”^②

今天,由于社会变革加速以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步相对加快,寻找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为其提供方法论的任务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举个简单的例子,1914—1918年间发生的事件表明,以维护和平为己任的欧洲政治家、社会科学家、道学家和牧师是彻底地失败了;自然科学的领导人和发明家给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民族敌人,他们倒做得很出色。20年后同样的情况还会再现;除非所涉及的

① 萨尔瓦多尔·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西班牙学讲座的目标与方法》,克拉莱登出版社,牛津,1928年版,第12页。

② 杜克劳克斯(Duclaux):《巴斯德——精神的历史》,史密斯和赫奇斯翻译,费城和伦敦,1920年版,第111页。

两大学科同时能够达成理解,否则欧洲一半的人口和所积累的全部财富将遭受更为干净彻底的毁灭。”^①

人类在长达数世纪的缓慢进化过程中,只能依靠经验探索道路并作细微的调整。如今长期以来束缚人类调整自我的障碍已被除去。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要么是明智的行动,要么是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轻妄的行动。大学以其实力和声望必须对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或愿意接受这一挑战?今天的世界充满着传统、善与恶、种族混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斗争、商业利益、追求正义或邪恶的巨大物质力量、解放了的工农、不安的东方人、喧闹的城市、冲突的哲学——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任务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

正如我所指出的,需求的迫切性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比较容易操作的科学的历史,包含一种社会科学家最好加以注意的警告。当人们关心如何立即将贱金属转变成金时,化学只能停滞不前;但当它暂时忽视功用和实际时,它却前进了。今天,化学的理论和化学的实际不断相互促进。同样的,直到医学基础科学分化出来并能够不考虑实际功用而自由发展

^① 格雷厄姆·华莱士(Graham Wallas):《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伦敦,1930年版,第1页。引用时略加修改。

时,医学才摆脱了几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来临床医学的发展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当疾病被作为一种现象加以研究,病人和问题的选择是依据临床医生的研究兴趣时,疾病最有可能被认识——也最有可能最终被攻克。社会科学的发展还不足以使其获得确定的科学地位。有同情心的旁观者担心,脆弱的理论或科学结构正跟着它无法承受的实际压力走。诚然,社会科学家必须从繁杂的事件中寻找材料;但作为科学家,他必须免受政策的压力,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选择、研究和确定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就理解现象的科学工作而言,大学是不关心真理的效果和用处的。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社会科学的功用与理论会得以证明是相互促进的;也许包含应用性的社会实验也会被证明是惟一的实验室。但即使如此,承担决策的责任是一回事,为证实真理或检验理论而进行实验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大学既不必害怕社会,也不必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不需承担责任。这两种态度是否不相兼容?大学是否真能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象持客观态度?它们是否能够在研究现象的同时,不去考虑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就某些特定的事告诉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应做些什么?我认为大学必须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观念和组织的^①问题。大学可以在不牺牲理性、正直的同时,从实验的目的出发,提出建议,观察后果。但这不同于管理一个市政府或领

^① 英国现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学术机构,负责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探讨经济和政治问题。该委员会不作决策,决策留给政府去作。

导一个政党,不像做这些事那样涉及原则的妥协问题——对无畏的思想来说原则的妥协是致命的事。前面提到的临床医学的类比虽不全面,却颇有启发性。医学教授需要病人,如同社会科学家需要环境对象一样。医学教授应慈悲为怀,充分认识到他是在与人的生命打交道,应对人的生命负责。但医学教授主要负责研究问题和培训人员,他没有义务去尽可能多地照看病人。相反,一旦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照看病人,那么他将终止履行对大学的义务——研究问题,跟踪文献,作出自己的科学贡献,培养事业的“接班人”。美国最伟大和最多产的外科思想家是这样度过他的整个科学生涯的:医治病人时他很善良体贴;他培养了一批外科高手;但他的思想和活动一直集中在对问题的研究上;一个接一个问题的神秘面纱被他揭开;然而一旦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就不再热衷于它而让其他人去处理,他自己则继续研究新的、重要的未知事物。他曾经写道:“我们至今多少还在黑暗中摸索,而且我相信今后将永远如此;否则医学中就不再有冒险的乐趣。我们的身后不乏光明之处,前方却仍漆黑一团。”^①这位大学教授的观点既代表了外科教授、内科教授的观点,也代表了法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所有其他学科的教授的观点。

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

^① 摘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外科教授霍尔斯特德(William S. Halsted)博士(1889—1922)的一封信。

为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

五

在所谓的“精密科学”方面,情况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尽管比较强盛的西方国家的大学更乐于为其本身的理由发展这些学科。这些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取得的进步要比以前许多世纪大得多。即使如此,它们仍在襁褓之中。由于这些学科采取的是“纯”科学的发展模式——我指的是它们的发展与应用无关,现在它们的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十分稳定,无须我再强调它们的重要性。然而,纯科学或应用科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其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首先,从理论或哲学的角度说,我们越来越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完全无知。50年前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像当今所有一流科学家一样充分认识自己的无知。不久以前我们还相信牛顿已经探究到底了。令人不安的是,那种自负的思想已转变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或吉尔伯特·刘易斯(Gilbert Lewis)的态度,前者将自然规律描述为习惯或惯例,后者则问道:“我们不能像对待所有终极事物和绝对事物一样,将各种精确规律看做是寓言中所说的彩虹尽头埋藏着的金坛子吗?”^① 科学发

^① 吉尔伯特·刘易斯:《科学的解剖》,耶鲁大学出版社,1926年版,第154页。

现的理论后果因此令人困窘。一心追求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科学家,周期性和间断性地摧毁科学和社会刚刚适应的舒适状态的基础。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哥白尼在荒野中悲惨呼叫,他们的声音被放大后传播到整个社会和知识界。被视为仅仅是理性爱好的物理学和化学不会“静止不动”,它们有从调查研究者手中溜走的躲避方式。

前面我说的是科学进步的理论后果和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对这些后果进行冷静的哲学反思。现在要考虑科学进步带来的实际后果和由此产生的问题,以及为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机会的必要性。医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研究病症,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就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兴趣。结果呢?一个问题——这种传染病或那种传染病的问题解决了,完全意料不到的后果出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其他种种问题。生命延长了,因此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疾病。在婴儿死亡率很高或预期寿命限于三十几岁时,这些疾病几乎不被注意。因此,医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自己的负担。但事情还不限于此: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越来越安全;比起小村庄或乡村旷野来,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更健康,更满足。然而,卫生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的拥挤,马上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政府、法律、制度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这还不是全部。人口将增加——大量增加,他们必须吃饭穿衣。对原材料的需求剧增;必须有超量的产品可供销售。对原材料、殖民地和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战争不再是解决办法,反而产生更多的问题。因此,科学正是在解决问题时产生更多的问题。这就是西方世界一个小小角落里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这部分的进步所带来的后果。各门科学将在深度和广度上

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因此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问题,我们无法预知。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纯科学使人的思想发生变革,而应用科学则注定要使人的生活发生变革。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开端而不是末尾,因此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既有由于无知而产生的问题,也有知识本身带来的问题,并承受由这些问题产生的压力。勉强应付是不行的。要采取明智的行动,就必须先研究这些问题。谁会去研究这些问题?由谁并且在什么地方研究?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个孤独的孟德尔或达尔文,对人类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但如今研究者越来越需要合作者,越来越需要各种个人所不可能拥有的设备;他还需要用以耕作的土壤。不管天才的作用有多大,世界上大部分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仍得由大学来做——如果大学是其本来意义上的大学的话。

六

然而我们的世界并不只是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要实现某种文化平衡,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必然会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所谓人文学科,我不仅是指传统的人文学科,还包括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在科学突飞猛进之时,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却阴云笼罩。哲学和人文主义为自己辩护,认为它们也具有或能够具有科学性。诚然,它们的确具有或能够具有科学性;过一会儿我再阐述这一点。但是,除了追求一种科学精神外,世界没有失去——除

非它丧失自己的趣味——将来也决不会失去纯洁的、欣赏性的和人文的精神：对美的热爱，关注由勇于主宰命运而非消极服从的理想所确立的种种目标。科学虽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自身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许多或者说大多数热心的、清醒的、向前看的（也许只顾向前看的）以及高度专门化的年轻的科学信徒，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从文化角度说，他们过于浅薄生硬。他们受到的训练侧重于技术性的方面而不具备广博深奥的科学性。我已经强调过，作为科学之科学，是不关心功用和效果的。兴趣和理智不会阻碍科学家追求真理，但它们在评价社会如何使用科学家所释放的力量时的确是起作用的。我认为我国一些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常常表现出已丧失人性，一些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因此，在现代大学里，科研工作越有活力，就越迫切地需要社会担负起实现各种更为广泛的知识经验所致力于实现之目标的责任。由于科学促使生活更加复杂——某些方面是理性的，某些方面则是非理性的——哲学家和批评家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现代大学促进人文主义还有其他理由，因为人文主义不仅涉及价值观，它还像科学一样具有后果。乍看之下，还有什么比一种已死亡的语言复活更无害呢？但每次发掘出一种已死亡的语言，都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对东欧的巴尔干化和凯尔特人感情的复苏，不仅土耳其人或政治家或报纸要负责任，人文主义者也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和科学家一样，人文主义者既解决问题也产生问题。他们帮助塞尔维亚人和希

希腊人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获得自由；在英国他们既促使产生又帮助解决了地方自治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无需负责任；他们有力地刺激了印度、埃及和美国黑人的自我意识；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导致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化的原因之一。这种恶化的局面尚无人能够缓解或消除。我重复一遍，人文主义者无需对自己制造的麻烦负任何实际责任，他们的工作和义务就是要保持其独立性和无责任性。但他们必须继续思考，在这方面他们的责任是最重要的。在适当之时，在事先没有目的或预想的情况下，他们的思考会激发出种种发明创造或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解决办法，就像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

即使有篇幅，我也不想列举希望人文学科强劲复兴的所有理由。但我必须再指出一点，在19世纪，古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已表明，我们对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史及其意义是多么无知。一条鸿沟仍留待众人去填，他们包括：考古学家、语文学家 and 古文书学家，在图书馆工作及在实地考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者，在美吉多、尼罗河谷、杜拉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发掘工作的东方学专家。根据最近发现的一些由希腊碑文碎片拼合而成的文字，整个雅典帝国的故事都得重写；一旦古希腊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展露它的秘密，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赫梯语^①、苏美尔语和马来语在过去和现在都得到正常发展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文化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得出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无需再通过细述人文主义在中世纪

^① 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并存的一种语言，据信属于印欧语系。——译者注

和现代的发展来对上述观点作充分的阐述。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深入研究中世纪和现代的艺术、文学、音乐与历史，必将改变在有缺陷的资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观念。而迄今为止我们的思维一直受这种有缺陷的资料控制。

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要比对社会世界或美学世界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但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它们都很重要，都非常有价值，这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价值，有意义，有内涵，有用处。仅将知识堆积如山，大学并未充分履行它的职能。大学除了要尽力查明事实外，还要利用智力将事实拼串起来，要进行推理和思考。大学里需有卢瑟福(Rutherford)分解原子，怀特海(Whitehead)或爱丁顿(Eddington)来证实原子分解的全部意义；需有微耳和(Virchow)演示细胞生物学，班廷(Banting)从世界各地收集各种材料合成胰岛素。据说雅克·洛布(Jacques Loeb)在世时，有人曾问他是化学家还是生理学家，他回答说：“我是问题的研究者。”现在流行指责专门化，但事实上正是专门化使我们达到了今天的高度，而且只有更高程度的智力专门化才会使我们更进一步向前发展。当然，仅靠专门化是不够的，大学里必须引进既能专门化又善于综合的人才；必须有哲学思维能力，要在积累新材料的同时，尝试新模式，尝试认识事物的一般性，而不管这种尝试是否劳而无功。正因为大学是能动的调查研究和思考的中心，也因为大学里聚集了各类基础人才，因此在大学里进行这一工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有效。

七

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星球的构成,原子的构造,俄克拉何马、但泽和肯尼亚的宪法,在星球中、原子里和俄克拉何马发生的事情,在决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家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企业家和理想主义者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事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所有这一切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对上述这一切采取什么行动,则不是大学的事。大学不能控制火星上的天气,不能经商,不能对威斯敏斯特或华盛顿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但大学也不能远离社会。

大学现代化也会遇到我所说的种种危险。显然,这样的现代大学与致力于解释亚里士多德、神父和古典哲学家的中世纪大学相比,需要思考更多的东西。但正因为现代大学拥有多方面兴趣,它们必须对每一位要求进入者严格把关。现在有些人——尤其是庸者——往往分不清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一所追求现代特色、致力于发展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大学,很容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浪费人力财力,耽误主要工作。

还有第二种危险。真实之理念放任自流和技术得以发展之时,也即平庸之辈兴高采烈之日。学术从未免于迂腐或肤浅。现代世界一方面由于出版手段发达,一方面出于对“习得

的”学位的过分钟爱,在假象肆虐面前痛苦呻吟。为了扭转这种倾向,阻止机械性或技术性专门化趋势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大学靠的是思想,靠的是伟人。一个微耳和、巴斯德或吉布斯就可以改变其研究领域的整个知识秩序。伟人都是个人;个人与组织永远都处于冲突之中。大学是一个组织。一方面,它不能混乱不堪;另一方面,其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为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提供独特的、适宜的环境。这种环境可能既容易使人昏昏欲睡,也容易使人出成果。有些人睡着无关紧要,只要其他人醒着并全力以赴获得丰硕成果就行。重要的不是有些人昏昏欲睡、游手好闲或效率低下,而是像赫兹(Hertz)、麦克斯韦(Maxwell)、蒙森(Mommsen)和吉尔德斯利夫(Gildersleeve)这样的人能在大学里找到各自的合适环境——这种环境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发展,也有利于包括各种人在内的合作小组的发展。

八

我无意现在就提前表明我对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看法。但行文至此,想必已十分明显的是,我的批评将包括两点,即大学现在尚未触及的事和大学不应涉足的事。我所概述的计划涉及面广且困难重重。成功地执行这一计划需要拥有比现在任何大学都多的人才和资金。此外,这种大学所承担的工作要求有适当的条件:当然要有图书资料和实验室,但还需要安静,尊严,不受琐事干扰的自由,高层次的社交活动

和知识交流,充足多样、满足个性的生活。在以下各章我们还有机会提及现在的大学如何煞费苦心地反对这些要求。出于辩论的目的(也仅限于此目的),让我姑且承认大学所做的一切事情本身都是值得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学应该去做这些事?是否意味着大学能够做这些事?对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大学要承担我所列举的高尚职能,它们应努力做到有效地履行这些职能——努力集聚人才和资金,提供履行职能所必须的设施。我认为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能,它们承担了一些不相干也不值得的义务。如果我不赞成的这些职能确实值得履行,那么社会必须寻找其他途径去履行之。当然,传统的那三四种科类(Faculties)或学科(Subjects)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随着世界的变化,大学需要新的科类,新的学科也不断出现。但即使在最现代的大学里,扩展就意味着增加教授和学生这一事实也不能作为一个充分的理由:前者难以得到,后者规模的膨胀有可能摧毁大学的组织特性。我认为理由必须从新科类或新学科内在的理智价值方面寻找。实用方面的重要性不足以获得学术上的承认——如果这是所能找到的最佳理由的话,那么它就是排斥不适当学科的极好理由。大学不是垃圾场。忠于职守的大学就不适于做其他工作,因此就有必要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教育改造。没有一个国家会以与别国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教育改造。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也没有必要同时完成所有方面的教育改造。即便如此,为使大学最有效地履行其独特职能,大学的改造只有和教育系统的其他部分的改造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九

根据我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属于大学?毫无疑问,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普及教育也不属于大学。这些教育当然都很重要,社会当然必须为实施这些教育建立适当的机构,但不能让它们使大学分心。

仅就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或普及教育而言,我们不会遇到什么难题。但“中等教育”一词在现实使用中含义模糊、意义多变,因此我必须就它在本书中使用的含义作一解释。在我看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别是未成熟与成熟之间的区别。中等教育需要密切关心学生,关心他所学的教材,甚至关心他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他的礼貌、道德和思想。大学不关心如此复杂的事情。大学生必须对自己、对所学学科、对自己的学习方式负责。大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教授不关心学生,或学生一开始就应独立地承担一项研究工作。恰恰相反,虽然学生有自由,但他需经历一段艰难的学徒期后才能获得独立地位。同样,中等教育的性质也不必千篇一律。随着青少年的成长,他们的自由和责任也随之增加。接近大学时,中学的特征会以某种方式逐渐消失,结果总会出现一次突变、一次震动、一次危机,正如孩子长大离家时出现的突变一样。避免每一次突变、每一次震动、每一次危机并非教育的事情。相反,孩子长大成人,就要经受勇气的考

验。除非他能经受住考验并获得道德和智慧的力量,否则大学不会有位子留给他,因为大学哪怕部分是中学的情况也不存在^①。

说到专业科类,我认为法律和医学有明确的理由列入其中^②;有教派的宗教不能列入,因为它含有偏见;或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列入;商业、新闻、家政“学”或图书馆“学”则当然不能列入,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详细谈到。诚然,大多数医生和律师不过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所受的训练主要就是学会做事。我可以进一步指出:一所没有成效的法学院或医学院毫无必要隶属于一所大学,它无权进入大学。如果它是一所独立的职业学校,对社会和对学生都会更好。

我们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标准不难明确。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的确,外科医生用手做手术,内科医生用听诊器,律师则使用文书和会计,但这些只是活动的非本质的属性。这几个专业的实质是运用自由灵活的智力去理解问题——理解历史遗留给我们并因为进化而复杂化的种种疾病的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问题。除非法学院和医学院生活在理想

① 例如,很清楚,按照我所用的术语,美国的中学没有中等教育的范围宽泛;相反,在美国,中等教育不仅包括中学,还包括大部分的学院。

② 本书中我不讨论法学院或工学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从未研究过它们。这一省略不含任何看法。

和研究的氛围里,否则它们就根本算不上大学的学院。

专业还可以通过分析其对待结果的态度进一步加以区分。以医生或律师身份出现的科学家或学者有要实现的目的。实现这些目的附带也能谋生,但至少在理论上(许多世纪以来的实际情况也如此),生计是次要的、附带的,即使它对个人来说极其重要。专业首先具有客观的、理智的和利他的目的。因此一个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理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它有一种荣誉准则,有时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象。

随着我们讨论的继续深入将逐渐清楚的一点是:与目前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我所概述的大学的概念是严谨的。是否我没有看到“训练”的重要性——包括训练学院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或公务员候选人?我认为不是。我只是认为真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思维严密、知识丰富,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书呆子,因而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听任其自行其是。如果要我完全讲真话,我怀疑为了学会行政管理技能而牺牲广博精深的大学教育的那些人,最终会发现自己在学识和职业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实际需要的角度说,社会要求其领导者具备的,与其说是现时经过专门培训的能力,不如说是掌握经验、关心问题、灵活解决问题以及善于动员力量的能力。低层次或专门的学校或者特殊的经验本身也能提供技能,如果那是学生所希望的话。

十

我对思想和研究的强调,可能给人以实际上我是在讨论研究所而不是大学的印象。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所知道的研究所在某些方面与我设想的大学有所不同。首先,研究所的兴衰取决于其研究是否成功,而在设想现代大学时我一直关注的是把训练与研究联系起来。研究所的历史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区别。现代研究所最初是为了满足巴斯德(Pasteur)的需要而在巴黎创建的,因为在巴斯德的时代法国大学不能提供进行研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建立研究所的运动后来在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的影响下得以扩大。在1882—1907年间这位思想活跃、行动有力的官员是普鲁士文化部的精神领袖。作为一名律师和官员,阿尔特霍夫对医学尤其感兴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总纲受其医学教育和研究理想的支配。他不知疲倦、卓有成效地装备普鲁士各大学的所有系科,使它们能够在现代条件下实现和发展柏林大学诞生时所体现的训练和研究的思想。但阿尔特霍夫也认识到,即使是在理想的大学条件下,也有少数天才因为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而浪费了他们本应全部用在研究上的罕有才华。为此他着手规划建立一系列的研究所,使思想最活跃的人才可以致力于那些已取得根本性进展的领域的研究——在这些领域里,基础科学的地位已经明确、稳固,理论的和实质性的问题得以明确提出,从业人员训练有素、素质优良。因此

能否设立研究所是有严格限制的。不能因为在物理学、化学或医学领域设立研究所是可行的和适时的,就认为在某些不那么成熟的研究领域设立研究所也是可行的和适时的,无论这些设立研究所的需求有多迫切。

上述观点同时表明了研究所的优点与缺点。研究所是一种别动队,哪里能取得成果,哪里能找到有特殊才华的人,就向哪里发展。研究所的性质非常具体,它的特定活动取决于某个人或某个小组。不管研究所取什么名称,其能量总以某个人为核心。重要的不是学科,而是人;人一走,学科也跟着走。如果大学有一个讲座空缺,通常必须尽可能找一名既是多产的学者又担任教学工作的人去充实;如果找不到多产的学者,也必须找一名学者去充实。研究所的情况则不是这样。1911年,在达勒姆出现了一个为沃瑟曼(Wassermann)而设立的实验治疗学研究所。1920年沃瑟曼去世后,因无继承者,情况就变了。他的研究所被转给纽伯格(Neuberg)教授作生物化学研究所。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一个研究所取消了,另一个研究所建立起来,而是沃瑟曼去世了,结果纽伯格得以继续自己的工作。研究所不必拥有一个特定领域的所有学科,它很容易动员起来,也很容易遭到解散。大学可能不得不临时聘用人员作权宜之计,研究所决不会这样做。

从因势利导的角度说,这些都是突出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培根(Bacon)在《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一书中曾预想建立一个机构以获得关于“原因的知识”。该机构具备我们称之为研究的条件,包括研究人员和“保持连续性的新手与学徒”。大学身边拥有一批学生,教授可从他们中间吸收“新手和学徒”,并有机会辨明他们的优点。而研究所由于自身缺

少学生,就必须寻找既有才华又训练有素的青年人。如果研究所经费充足,它就能够承担风险。但它很难有机会直接了解“新手与学徒”,而大学里则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此外,因为现代科学十分复杂,很难预言神奇的事实或概念会来源于何处。大学的广博性极大地增加了其潜在的丰富性。研究所则可能为过于专、精所累。研究所如果太专门化,特别是又比较注重实用,则可能一事无成。阿尔特霍夫曾预言了这一危险。最近他的传记作者指出:“即使研究所脱离大学并直接向政府部门负责,这一观念也决不能狭隘地加以理解。所有这些研究所都为大学的目的即教学和研究服务。的确,普鲁士教育当局是如此坚信大学的全面性,以至最近建立的所有研究组织都以某种方式不同程度地与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① 这样,在现代大学中建立或与现代大学保持联系的研究所,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所所面临的局限性。

还有一点我必须涉及。尽管研究所具有我所指出的集中性和流动性的优点,但阿尔特霍夫反对狭隘的观念仍是正确的。一种观念或思想过于明确,就会丧失对教学和研究都很重要的惊奇性这一点。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都在从事解决问题的活动,都在训练人。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只是在追求知识吗?决不是。尽管他的学生水平较高,经过更严格的选拔,但正像大学教授一样,他身边也有一批年轻助手,需要他加以精选和培训。因此,可以把研究所看做专门化和高水平的大学实验室,它既具有某些显著的长处,也难免有某些不利的方

^① 阿诺德·萨克斯(Arnold Sachse):《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与他的事业》,柏林,1928年版,第294页。

面。成功的研究所决不能取代大学,除非大学为之提供训练有素的人才,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研究所只有为这些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大学教师——提供进一步的训练,它们才能回报大学的帮助。在我看来,更可行的不是现在去迅速发展研究所,而是使现有大学摆脱束缚,发展成为有能力充分履行其合适职能的机构。

十一

总论到此为止。本章一开始我就指出,我所分析的大学理念要回应现代社会的理智需求。我所指的是理念而不是组织。组织有可能被人过于重视,但有它无它也并非无关紧要。在以后各章里我们会看到,不同国家的组织不当是如何阻碍大学实现其理想的。在所有国家里,大学改革现在都是讨论的热点,所有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既得利益都阻碍着改造工作的进行。障碍并不总是坏事:丰富、美好的历史在阻碍改革的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供补偿。行动的机会出现时,需要根据明确的总原则审度现实。我们会发现所面临的形势和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容易消除的荒谬之事,需要谨慎渡过的难关,需要努力克服的先入之见,不能牺牲的历史价值观,以及只能逐渐移交给其他机构的实际义务。结果,改革工作结束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并不是标准化而是多样化的结果——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样的,甚至在一个国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容忍一些奇人怪

事,我们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可能性就更大,虽然还有些奇人怪事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划分界线不容易,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个人划分界线的基点也不相同。但只要现代化的大学所承担的主要职能十分突出,分界点定在哪里相对来说并不重要。

第二章 美国的大学

—

美国人生活的显著特征是争强好胜与喜好流动。传统——无论是优秀的还是落后的传统——总是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力量。美国不管怎么说,实际上不存在阻碍进步或维护文化思想的传统。在新世界的平原上,和风一吹千里,根本不存在阻挡它或减弱它的力量的防风林。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成千上万出身贫寒的人背井离乡,摆脱种种压迫,占据了这一富饶辽阔的大陆——仅这一事实,就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上述现象的存在。但如果考虑一下其他方面的事实——如在政治、社会和理智方面所表现出的幼稚的民主观念得以迅速传播,迅速产生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丰盛,伦理和宗教观念逐渐消失,现代科学的运用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以及最近由战争所导致的欧洲的部分瘫痪与贫穷——人们就会认识到美国正处在一种蒸蒸日上的、重实际胜于重理念的无序状态。预测美国的未来,即使是不太遥远

的未来,也是徒劳的。没有人能够预测美国是否会对文明作出与其资源和机会相当的贡献。毫无疑问,美国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他们原本没有的安逸与机会。但安逸、机会、人数与规模并不是文明的同义词——甚至其基本含义也无相同之处。如果它们同义,纽约和芝加哥就会比佛罗伦萨、巴黎、柏林、伦敦或牛津更加文明,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位敏锐的英国评论家写道:“规模是一种令人乏味的变因,即使精神实际上对它并非没有感觉,它也不会作出适当反应。”^①不少欧洲人访问美国时都未能抓住这一点。他们突然感受到的是陌生而普遍的希望与幸福。他们到处见到的是宏伟的建筑、无数的便利、各种研究所和美术馆,因此他们说美国“太棒了”,大多数美国人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也有少数人不那么情愿将文明等同于持续的喧闹、瞬间的繁荣和增长的人数,他们越来越畅言无忌,冷眼向世,对千变万化的世界保持警觉,在被无休无止、极其活跃和过于自信的力量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同时,越来越怀念欧洲社会稳固的文化基础。

因此,在美国,人们对有关美国的不同见解并非毫无认识。商业、教育和其他领域巨大的运作规模,以及广告“学”的迅速发展,有助于在相对较低的精神水平上实现标准化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令人欣慰的是,不存在阻碍人才向任何方向发展的社会障碍。而且,正是由于物质利益的组织比较密切,正是由于华尔街、通衢大街、市中心区、瓷浴缸、集中供暖、汽

^① 默里(J. Middleton Murry):《一个知识分子的演变》,伦敦,1927年版,第184页。他继续写道:“40英里的印花布并不真比半码印花布更能成为热情的对象,如果印花布碰巧印得很糟的话。重要的是质地的变化。”

车、效率和巴比特先生^①过于突出和令人厌倦,反抗之声才比较响亮,个性上也更无所畏惧和果断自信。然而,斗争目前仍在继续,善于思考的美国人越来越有力地坚持在决定美国的发展方向时,必须发挥理智的作用。他们的任务与其他国家的进步领袖相比既更为容易,也更为艰巨:说更为容易,容易得多,是因为历史传统、等级制度与资金匮乏没有结合在一起阻挠他们;说更为艰巨,艰巨得多,是因为在缺少领导有方的集权政府和充满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美国人必须在混乱中挣扎并最终走出困境。

善于思考的美国人有意或无意地认识到,知识和理智可能是决定我们发展方向的因素。在增进知识、发挥理智的作用、创建和维护真正的优势方面,大学是或应该是所有机构中最为重要的。因此,与美国的人口、战舰、大厦、飞机或生铁的年产量比较起来,美国大学的地位和性质是反映美国文明的地位和前景的更公正的标志。

二

我将从多方面对美国大学提出批评。因为这一原因,开始时我想谈点正面的看法。一直以来,我们所拥有的学者通常都受困于旧式的学院、宗教界或司法界。但是,大学,就我

^① 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典型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事业家。——译者注

所使用该术语的含义而言,是指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审慎评价成果和培养真正高层次人才的结构。而这个意义上的大学我们直到 1876 年霍普金斯大学谨慎地打开它的校门时才拥有。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因此,半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受高层次或严谨训练的机会是极为稀少和有限的。自那时以来,不过几代人时间,一个民族就征服了一个大陆,创立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创建了教育的、慈善的、卫生的和其他种种能够发挥作用的机构,使美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这一短短的时期里,在新老学科、各专业领域以及政府资助或民间自主的机构中,较高层次教育的机会逐渐丰富。虽然这种丰富的程度不及外表所示,但的确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巨额资金已聚集起来;学校获得了各种建筑设备和图书资料。美国当然不可能抛开欧洲自行发展,但在高等教育的某些领域,美国的发展已使欧洲再也无法等闲视之。详细问题后面再谈。我之所以一开始就作如此明确的表态,目的是要使读者了解,不管我对美国大学的所作所为提出多么严厉的指责,我对美国大学取得的实际成就仍会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但愿正直坦率的批评有助于美国大学重上正道。

三

对调整的重要性,我已作了充分的强调。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而具体的需求和目的。因此,适用于各

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统一的大学模式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活动和改造工作,每一个国家也一样。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毫无意义的变化之中。人类拥有判断质量优劣的理智标准。主题在变,问题在变,活动在变,但理念和质量继续存在。肤浅与深刻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永远存在差别。总之,正如我所指出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大学事实上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与压力。偶尔大学也会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社会只得加快步伐,以适应大学的发展。19世纪的德国就是这种情况的突出典型,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到。涉及一个特定时期中的一所特定大学时,人们一定会看到它既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既有领先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美国的大学面对的是一个实利主义的社会,热衷于轰动一时的人物和事件,因而处于一种独特的外部环境之中。总的来说,它一定要对压力和需求作出反应,即使某些要人的存在会阻碍大学在某些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危险并不在于从长远看美国大学最终会成为一种障碍或是不能作出反应,危险在于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或不能得以保持。我可以立即挑明这就是我的批评的要点所在:在美国大学中,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未能得以保持。为避免误解,我一开始就指出:美国的大学今天为最高层次的学术和科研工作提供设施和机会,这一点在这一代人以前即使最自信的人都预想不到。美国的大学对时代的召唤和压力作出了合理、正确的反应,但它们所做的并非仅限于此。它们对短暂的和眼前的需要不加思考地一味迎合;它们错误地认识事物和思想对文明的相对重要性;它们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按我的看法越来越不能——对涟漪和波浪进

行区分。“众神称赞的是灵魂的深沉而不是灵魂的喧闹。”而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我们的大学的确已增加了设施和机会；同时它们业已毫无必要地变得廉价、庸俗和机械。也许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是暂时的——仅仅是在走向未来更佳状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症状。即便如此，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些症状是严重的和令人不安的。我们是任其自然呢，还是尽我们所能确保美国文明的性质和质素呢？我们的能力也许很弱，但与力量强大的时事作斗争时，我愿为后者奉献一切，即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使美国文明的性质和质素变得符合我们的愿望。的确，大学之所以存在，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影响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方向。我不想贬低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但在美国的大学中，许多人所做的事正好相反——鼓励本应加以限制的势力、给珍视高雅文明理想的人设置难以逾越的工作障碍以及使最终结果变得更加含糊不定。“对此，”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我要温和地责备他们”。

四

“大学”一词在美国含义宽泛。我将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一名称在使用中出现的种种谬误。我建议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最发达、最杰出的院校，了解它们如何工作，如何组织，如何偏离我所阐明的那种理想的立场。至于其他院校，虽然数量多达几百所，本书中却无法加以考虑。这些院校中不时也能见

到各种有才华的人；许多这类院校，尤其是南部和西部（虽然东部也不是没有）的院校，都是政治界、企业界和宗教界的反抗力量的温床。它们虽有雄心勃勃的主张，却无显著的成绩。即使它们没有成为实际障碍，也很难说对民族文化作出了什么贡献。

我要讨论的美国大学由三部分组成：招收青少年的中学和学院；招收高层次学生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招收一般公众的“服务”站。这三部分并非截然不同：学院与“服务”站相混淆，与研究生院也部分重叠；研究生院部分是学院，部分是职业学校，部分是大学层次的机构。然而，为简单起见，我将分别考察这三部分，然后我们再来述评它们之间奇怪的混合方式以及这种混合所带来的后果。

五

当美国仿照英国的模式创办学院时，“英国正处在一个大学学院的地位远远高于大学本身的地位的时代”^①。学院过去是，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学水平的教学机构。但除非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学，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美国学院或大学所做的中学工作。要了解这一点不容易，因为美国的中学千差万别，小的只有三四个教师（大多数美国中学属于这一类），大的有上百位教师。令人惊讶的是，学校无论大小，所

^① 哈斯金(C. H. Haskins):《大学的兴起》，纽约，1923年版，第30页。

设的课程就内容和范围而言名义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美国的中学一度被看做是人民的学校,它所起的日益明显的作用是为日益增多的美国青年提供一点知识,内容几乎包括各种可以想像得到的科目,其中较多的是微不足道的实用科目,有时也有一些称得上文化类的科目。拉丁语、数学或历史一类的科目与打字或烹饪一类的技能根据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被巧妙地组合成各种名称的“学分”^①,只要通过简单计算累积了足够的“学分”并消费了足够的时数或年数,学生就受完了“四年中学教育”。用算术方法简单累计“学分”的做法,无意中起了极大地减少学生智力努力的作用。四年的课程先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掌握一小块知识比掌握知识整体要容易;学分则可一年年累积。“分而治之”,流行的教育哲学不相信艰苦的学习。个性必须得到尊重,这毫无疑问。必须允许儿童展现自己的创造性,那是当然。但是,当诸如此类的看法占上风时,刻苦训练就会被降至完全从属的地位。

中学过去往往是一种特定的筛子。但美国的民主反对各种筛子。根据勤奋与否和智能高低对学生进行分类和挑选,

^① “学分”是美国人的发明。它指的是一门学科在课堂里已经经过了一定周数或月数中的一些时数的学习。学习结束时要进行一次书面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就结束了该门学科的学习——常常是与该门学科永别。他们几乎再也不可能听到它,也享有彻底忘却它的自由。尽管已有不同看法,但绝大多数美国中学和学院以这种方式决定学习成绩或学位条件。

当一份学院简介说明入学标准为 15 个中学学时,一个学分,根据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的解释,指的是中学任何一门学科为期一年的学习,约占全年工作的 1/4 时间。四年制的中学课程总共为 16 个学分。绝大多数美国高等院校规定的入学标准为 15 个学分。在 15 个多少有些相互脱节的累积学分与“教育”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是否会不民主？肯定不会。但中学不能实现这一意义上的民主。相反，它像一种廉价品货柜，大方的公众和工作过度却报酬低微的教师在上面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商品——拉丁语、希腊语、自然科学、农学、商业、速记和家政等等，任凭学生根据他从教师、家长和大学入学要求那里得到的指导，自己拼凑一份学习计划，只要四年之后能得到足够的“学分”，能得到一张文凭或能符合所选学院的入学要求就行。在这种小事上，大学也会提供帮助；好像怎么也没有足够的事可做似的，像威斯康星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学也开设校外推广课程或函授课程，帮助学习者做好入学准备，尽管校方并没有为学习校外课程或函授课程的学生确立任何特殊标准^①。

毫无疑问，自由的美国中学有其优点。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爵士最近指出，中学是对现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一项贡献，它代表的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抱负——那种使儿童通过勤奋努力和节俭避免陷入死胡同的抱负。它是伟大的美国熔炉的一部分；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物质角度说，它都是有益的。美国青年的社会性发展是对教育哲学与实践的一项实在的贡献。因为如果美国青年能保持头脑清醒、身心健康，我们就可以避免困扰当今德国教育家的一大问题，即社会分裂。识别学校与社会的重要性在一代人以前就需要强

^① 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入学申请必须获得招生主任的书面批准。哥伦比亚大学函授部所做的广告是：“我校函授部提供相当于中学四年课程的全套中学和大学预备培训。”《纽约时报》1930年7月20日。芝加哥大学函授部的广告是(1929—1930年)：“函授课程的申请者不必参加考试，也不必提供以前的学习证明。”“通过函授学生可以获得(从中学进大学所需的)任何15个学分。”

调,一如杜威(Dewey)教授所认识到的^①,今天这一点不需要重复。马达里亚加(Madariaga)教授说过,“美国人都是孩子”,甚至包括成人^②。学校以前可能暂时将重点导向了另一方面。当然,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中学和中学教师重视智能和学问的培养;有一些学校设备优良,管理有方。而且,无论如何,像美国中学那样不分阶级为所有13—17岁的青少年敞开大门提供为期4年的教育,毕竟是一项闻所未闻的伟大成就。只是中学的水平太低,内容杂乱无章,绝大多数学生所获得的不过是初级教育。至于讲到所取得的成就的质量,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自欺欺人达到如此彻底的程度。现任美国教育署署长刚刚向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的各州教育厅长保证说,全世界都在仿效美国^③。我们不是将收音机和有声电影引入学校了吗?中学入学人数的百分比不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好几倍吗?但是,如果减去教职员素质低劣的学校(理应如此),如果初级程度的烹饪和打字不被看做与历史、文学或科学同样重要,这些统计数字又会变得怎样?教育税增加的幅度的确很大;校舍和设备也得到了普遍的改善。然而很少有哪个州——大城市更少,尽管幸运的是的确有少数州和大城市——在教育管理方面不受政治与偏好侵蚀。城市越大,状况越糟。

① 约翰·杜威(John Dewey):《学校与社会》,芝加哥,1900年版。

② 见一篇题为《美国人都是孩子》的出色的文章。《哈泼杂志》,1928年7月号。

③ 见1930年2月25日《纽约时报》。

纽约和芝加哥的学校正陷入困境^①。我很乐意承认确实有不少的教育官员和教师颇有教养、学识丰富。勤奋、才能、美德和学问偶尔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在平庸无能的海洋里显露出来。但哪怕将这些状况仅仅归咎于相当一部分变化迅速的教师,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颠倒黑白。普通民众对教育只有一种模糊的要求和信念,对教育的困难和艰巨却了解甚少。当一位有识别力的大学教授或雇主像迪奥吉恩斯(Diogenes)那样举灯寻找一名能拼写^②、熟练掌握数学或一门科学或一门现代语言的中学或大学毕业生时,教育产品的低劣性就表现出来了^③。对此没有必要感到惊讶。情况本来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物欲横生的国家里,一代人之内不可能出现训练有素的教师和鼎力相助的明智的家长。也许人们不应泄气;而如果人们看到主要的大学正在一致作出努力以捍卫教育过程的理性特征,那么人们就不会泄气。

有人正确地指出,美国中学不能模仿欧洲大陆的中学,不能只满足于让一个有限的群体去追求某些高尚明确的目的。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少年要求受中学教育,他们追求中学教育

① 芝加哥市正直无畏的教育厅长威廉·迈克安德鲁最近因为一场无耻的政治阴谋而被免职;几年前因表现了勇气和智慧而被降级的一名同样勇敢聪明的区教育局长约翰·L·蒂尔德斯利披露了纽约市学校令人震惊的低劣学业水平,按他的看法那主要是“政治”造成的。

② “我所见过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所写的一些英语就是在英国的小学里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埃德温·德勒(Edwin Deller)著:《美国大学研究》,伦敦,1927年版,第36页。

③ 所有的中学生学术测验都一致表明教育产品的低劣性。见布里格斯教授引用的例子。尽管他本人是乐观的。布里格斯(T. H. Briggs)著:《英格利斯演讲》(193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第124—136页。

的目的甚至更为广泛多样。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一要求不可能也决不可以被忽视。但我认为,我们的教师忽视了另一点。我们承认美国的中学必须做一些欧洲的学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涉及的事情。同样,欧洲学校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美国人也应加以重视。在我们努力满足许多人的变化多端的兴趣和要求的时侯,我们眼下在相当大程度上未能看到对英才进行扎实有序的——虽然谈不上灵活的——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努力将各种科目和活动都安排在中学课程中——后面我们会看到大学应受到同样的批评——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职业性的和技术性的。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或者说这样做将以牺牲真正的教育为代价。因此美国的中学教育既不是明智的、选择性的,也不是全面的。正是那些六月份毕业的中学生——他们大多缺乏训练,未经选拔,知识零碎,所学的科目有许多既无理性价值也无实用价值或职业价值——正是这些人,加上那些学了些推广课程或函授课程的人,成为秋季入学的大学学生。

六

想进学院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学院所能接纳的人数,因此学院尝试作出选择,但选择难以奏效。首先,学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智能?想要勤奋?想要性格?抑或想要“领导素质”?它们盲目无助地从一端摆向另一端。即使它们知道想要什么,它们也做不到心想事成。中学的科目和活动是

如此杂乱无章,中学教师是如此忙于教授那些大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甚了解的科目^①,分数和证书已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由于学院不能依靠中学的学业档案或学院入学考试,又缺少与广大中学的可靠联系,它们现在只得试验心理测试。人们认为这种实验充满希望,前途光明。也许如此,但美国的教育家经常过于乐观,我们或许还是拭目以待为好。

美国大学的学院功能与我刚才描述的群体有关。学生在学院中逗留四年,在这四年里他们得到的教育与中学大致相同,不过因为他们年长一些,懂得多一些,所学的内容也要深一些。在学院里他们将度过又一个廉价货物买卖时期。在货柜上,学生又一次发现各种东西应有尽有——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学、科学、商学、新闻学、家政、工程学、农学、军训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难以概括的科目和活动。尽管所受的限制多一些,学习的层次也高一些(并非都是如此),一些院校后来也变得比较严格,但学生仍又一次与杂乱无章的“课程”打交道:这门课学四个月,那门课学六个星期;这门课学多少时数,那门课学多少时数;这门课拿多少学分,那门课拿多少学分;虽然学分的增加令人愉快,但教育本身很少考虑到一年接一年教育目的的连贯性。就这样直到又一个四年快结束时,学生获得了足够的学分,就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文学士学位或所谓联合学位的获得是如此轻而易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教育(高等教育、自由教育,不管怎么称呼)的主要任务是使青少年的能力和智力得以开发、组织和引导,是培养情趣和教养

^① 菲茨帕特里克(E. A. Fitzpatrick)和赫德森(P. W. Hutson):《中学教师的学问》,纽约,1927年版。

——不幸,这一美好的字眼在美国专业教育家听来很刺耳。提出这种看法的理由是:受过训练的心智知识充实,即使处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也游刃有余;有许多东西根本不需要提供教学;有许多技术性的东西也许需要提供教学,但肯定不是在学院或大学里。

我必须指出这一事实,即一方面已经出现反对数量测评的做法,因为按照这种数量测评的方法,在军训上花费一小时与在微积分上花费一小时具有同样的教育价值;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院既保持了充分的活力和持续的进步,又没有忽视文化上的差别。但就绝大多数学院及其学生而言,我所作的简单描述仍是站得住脚的。

七

一旦进入学院,学生就要花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学本应在一所良好的中学里学习的课程——在中学师资充足、办学状况良好的国家里,这种教育就是由中学提供的。但在详细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即比如说,哥伦比亚学院一名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校找到许多机会学习科学、数学、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几乎每一种具有高度理智价值的学科,任课教师学识丰富且往往颇负盛名,实验室和图书馆也令人称羨。当然,学生学完四年获得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时,即使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也常常会暴露出低劣的预备教育或教育背景的影子。但无论如

何,哥伦比亚学院已经对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此它应停住。它会停住吗?根本不会!正如我已指出的,早在学生入学以前掺假稀释的过程就已开始:本科生可以通过函授部(Home Study Department)安排的推广课程或函授课程达到相当一部分的入学要求。无疑,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一名热爱学习的学生没有受过连续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也能胜任学院的学习。但如果认为可在不降低教育水平的情况下为那些在哥伦比亚学院注册学过推广课程或函授课程的学生提供进学院学习的机会,那就非常荒谬了;不管学院随后对他们使用了哪些入学考试或心理测试,教育水平的降低都是不可避免的。弊病还不止于此。我曾说过,一名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可以按一种严肃的方式学习严肃的学科,也可以通过学习“广告原理”、“广告文字说明写作”、“广告版面设计”▲、“广告研究”、“实用家禽饲养”▲、“秘书簿记”▲、“商业英语”、“初级速记”、“新闻实践”、“新闻报道与文字编辑”、“特写写作”、“书评写作”及“摔跤、角斗与自卫”▲等课程,^①达到取得学士学位的要求。“实用艺术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为获得哥伦比亚学院的学位,也可以学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哥伦比亚学院附属师范学院的课程,包括“烹调的基本方法”、“着装基本问题”、“布艺”、“家庭烹饪”、“烹调新发展”、“用餐礼仪”、“居家衣物洗烫原理”、“家庭社交生活”、“男士体操与舞蹈(包括木鞋舞练习)”、“学校管弦乐队教学(初级班和高级班)”。

这种状况难道不令人震惊吗?数以百计 18—20 岁的青年男女去哥伦比亚学院接受教育时虽满腔热忱,但却缺乏教

^① 有“▲”符号的课程必须先得到院长或主任的同意才算学位课程。

养。总的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认为他们想要什么；问题在于——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种坚实的、有教养的中等教育。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意义上的教育，如果他们在理智和精神上得不到启迪和引导，他们就根本不必进哥伦比亚学院。他们最好还是进某一行业工作或去学一门手艺。至于在哪里学或怎么学，与哥伦比亚学院无关。哥伦比亚学院不是职业学院。职业训练也许十分重要，但把各种各样的训练和教育——职业训练、家政训练、科学教育、文化教育、中学教育、学院教育——都混杂在一起，不仅各种各样的训练和教育都会受到损害，而且最高层次的教育受损害最大。反驳这种做法的理由我们已经论及，即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因各种社会原因而忽视差别。但美国并不忽视所有差别而仅仅忽视现实的差别。若在理智上将烹饪、摔跤和打字与音乐、科学、文学和经济学一视同仁，或认为将所有这些科目混杂在一起是一种正确的教育方法，那么美国的财富和命运就不可能不受到损害。

就学习商业或新闻而言，哥伦比亚只能浪费学生的时间和金钱。问题还不仅仅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学生虽经努力，却不但未学到有关商业和新闻的技巧，反而还失去了有效利用哥伦比亚学院能够提供的真正的教育机会。体现和保护理智与精神理想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否向学生讲明这一点了呢？根本没有！它收了他们的学费，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三四年之后授予他们一个既不代表实质性的中等教育，也不代表实质性的职业训练的学位。诚然，我再重复一遍，尽管有学分制造成的巨大困难，仍有一些学生在热心能干的教师指导下学习一些有价值的学科，从而避免误入歧途。但这无助于在

本身未受过真正教育的教师指导下学习没有价值的学科的那些学生,尽管他们最后也能获得学位。如果哥伦比亚大学承认烹饪和打字也是获取本科生学位的特有训练科目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由各种群体组成的、对相对价值和真正价值亟须加以阐明的国家里,它对更加清晰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又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人们可以猜想,哥伦比亚学院已对校内学习文科、商科或新闻的学生所带来的问题深感困惑,因为这些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甚至至今未被列入考虑解决的议程。但那又怎样呢?这所大学教学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计划不切实际、荒唐可笑,办学资金也严重不足。如何解决问题?扩张!为在纽约市取得有限的成功——我认为也是目前可能取得的惟一的成功,哥伦比亚向布鲁克林(Brooklyn)扩张,要求纽约莫宁赛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那些已经负担过重的教育官员去管理河对岸新建的塞思洛初级学院(Sath Low Jounior College)。由于该学院的课程设置范围广,学生读完两年后可进大学本部十多个学院中的任何一个学院继续学习,包括专业学院、技术学院或文理学院。即便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官员所具有的行政技能或该大学理想所蕴涵的教学效率也未得到充分利用。在离纽约市 95 英里的地方,一所名叫圣斯蒂芬斯(St. Stephen's College)的不起眼的小学院,正像遍布全国的数百所同类院校一样,处于喘不过气来的艰难状态。“教师和穿着牛津学生校服的学生上教堂,上课,参加其他正式活动”——顺便说一句,校服必须在学院商店购买,售价 8 美元——面对如此微妙的敬意,牛津冷漠的心也会为之激动!这所偏僻的小学院,以前曾长期孤零零地“立在山顶,俯瞰卡

特斯基尔群山”，现在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宽敞的腹地若隐若现。自1928年7月1日起，它“获得了与哥伦比亚学院和巴纳德学院平等的地位，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所本科生学院。所授的学士学位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学位”。但哥伦比亚大学明确规定，“对圣斯蒂芬斯学院的维持、资助、指导、管理及收入支出，本大学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授给了该大学明确否认所有“维持、指导或管理”责任的、关系疏远的那些学院的学生！这一学位“等同于”哥伦比亚大学眼下为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学院学生所授的学位！纽约一家报纸^①在评论哥伦比亚“帝国”时明智地指出：“哥伦比亚已变得如此混杂多样，一个学分很难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如果哥伦比亚学院制的理想可以在大学本身不承担财政或教育责任的情况下巧妙地渗透到遥远的学院，那么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所大学应毫无理由局限于只办一所法学院、医学院或工学院”^②。毫无理由！于是，“连锁商店”的概念通过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通过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入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

② 见《哥伦比亚大学简报》所载《校长报告》，1928年，第25页。

八

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名声不佳,但它却不是惟一的冒犯者。芝加哥大学各学院的入学标准为 15 个“学分”,其中 1/4 以上的学分可由速记、打字和簿记等科目构成——对明智地利用大学四年时间学习文化或专业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准备!中学里教的家政和农业科目成绩也被“接受”。坦率地说,把速记和簿记“计”入大学入学要求,不会比把修指甲、剪短发和跳足尖舞计入大学入学要求更有意义。因为这两类科目都需要有智力和趣味。由于这些科目都可“计分”,结果芝加哥大学各学院招收的学生就只需 11 个学分而不是 15 个“学分”——这对标准的统一或提高造成了严重破坏,实在是一种不幸。此外,像哥伦比亚大学一样,芝加哥大学出于招生目的也开设中学水平的函授课程,与该州的中学相互竞争。有关函授课程我后面再详谈。既然该州完全有能力提供中小学教育,为什么芝加哥大学还要承认通过簿记、初级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初等代数或其他科目的函授学习获得的、可以混充入学要求条件的那些“学分”,从而不但导致大学工作复杂化而且降低大学的尊严呢?理智领域的确存在尊严一类的问题。听听一个通过函授途径获得芝加哥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的外语发音,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的!当然,一旦进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也会像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一样,利用大学提供的良好环境,静心钻研学术,发展智力。

但该校开设和认可的学士学位课程也有属于技术学校或职业学校水平而不属于大学甚至不属于优秀中学水平的课程。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所不同,后者不将函授课程计入学位课程,“严格遵守大学课堂教学的标准”^①;前者则与该校的其他做法一致并更自由,获得学士学位所需的一半“学分”可以通过函授得到,其中有许多属于实用的、文化的或理论的课程。对这类课程,我将很快提及。

九

当受捐赠的那些院校陶醉于自己是大学教育领域的“领步者”(其实它们忘记了自己在青少年风华正茂之时抛弃了对他们的真正的教育)时,略有些令人惊奇的是,依靠政府的税收和“决议”招生办学的州立大学也起而仿效。威斯康星大学计入人文学士学位课程的有“新闻报道”、“编辑技巧”、“零售广告”和“社区新闻”等课程,计入理学士学位课程的有“护理术”、“药店实习”、“急救术”、“社区娱乐”、“运动学”、“初级服装设计”和“教练守则”等课程。诚然,本科生或许确实会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有实质性内容的学科,但也可能将一去不复返的宝贵年华用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如学习“商函写作”、“销售方法”、“销售管理”、“零售广告”、“全国推广活动”、“新

^① 《1927—1928年通告》,第12页。

闻原理”、“初级陶艺”、“雇员与领导培训问题”，等等^①。为使新生事先认识到妨碍他们充分利用上述教育机会的障碍所在，校方迎接新生时发给他们一本资料手册^②，警告学生不要混日子，不要作弊，不要有褻渎行为，不要赌博，不要酗酒，不要行为下流，因为“好色之徒为真正的男子汉所不齿”；最后指出，“现代的邪恶场所，旧时酒馆更加狡诈、更加邪恶的后继者是现代路边客栈”，它“为玩世不恭者(hippers)而开”^③。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来自哪一类人？他们上过什么样的中学？拥有什么样的家长和朋友？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和理想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的？

当那些有名的大学自甘堕落，根据上述条件授予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时，美国公众对什么是教育，大学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应当怎样区分雕虫小技、职业训练、实际经验和理智发展等等，完全茫然无知，这不令人感到奇怪吗？我现在所说的不是学院所负责的通识教育以上的技术教育或专业教育^④，而是与文理学院地位相等并替代文理学院的本科生教育。对美国学院混乱不堪的局面负有责任的那些人不仅缺乏理智的正直性，而且完全缺乏幽默感——后者甚至更具有灾

① 最近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建议将“家长培训”作为一个新的大学教育内容。见《纽约时报教育副刊》，1930年7月13日。

② 称为《灰皮书》。

③ “hippers”一词在牛津大词典中也找不到。为便于一些美国人和所有非美国人理解，我必须对该词解释一下：它指常在裤子后袋塞一瓶威士忌的那种人。鉴于这类语言在正式文件和学生出版物中的使用情况，人们对以下事实可能不会感到惊奇，即美国大学毕业生中很少有人能够流利、精确和庄严地说、写本国语。

④ 至于技术院系或专业院系，我后面再谈。

难性。我所列举的荒谬科目大多不需要任何教学设备；有些科目本可以教给朴实无华的技术学校那些身心条件平平的学生；这些科目没有一门值得一所学院认可，也没有一门值得在一所高等学府中拥有一席之地。

在我看来，那些一心希望走平坦之路的人不会有什么结果。追求知识的学生与可能转向攻读商科或新闻等缺少内涵的本科生课程的学生联系密切，难道真能得到最佳的教育？在追求文化和简单的职业培训之间，难道不存在不协调性或不兼容性？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若想同时两者兼得，难道不会遭受痛苦与损失？地道的懒汉倒也容易应付，他们无非不来上课而已，但把学习历史或希腊语的学生与幼稚的记者和股票交易者混在一道教，则实在难以容忍。一位英国作家在回忆伊顿公学的生活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候，在同一个社会群体的关照下，使大脑得到刺激，性格得到锤炼……如果你把他们分开来看，……你就会得出结论，他们的本性是各奔东西”^①。罗布克先生如果知道要求美国大学教师都能玩日本式杂耍同时得在空中抛玩十几个球而不是两个球，他就不会对伊顿毫无信心了。

^① 帕西·罗布克(Percy Lubbock):《伊顿的阴影》，伦敦，1920年版，第219页。

十

有些美国高等院校并未屈从于愚蠢之举,能够记录下这一事实还是令人满意的。哈佛(Harvard)——我现在要说的仅是将要提及的所有高等院校的学院教育那部分工作——耶鲁(Yale)、普林斯顿(Princeton)、斯沃索莫尔(Swarthmore)、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阿默斯特(Amherst)、威廉姆斯(Williams)、巴纳德(Barnard)、史密斯(Smith)、威尔斯利(Wellesly),仅仅随机举些例子——都不承认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荒谬课程的学分为其入学学分或毕业学分,都为愿意受教育的本科生开设了扎实多样的课程,能够在追求自由教育时决不混入任何不成熟的或不重要的职业性课程内容。但即使这些院校也不免有弱点,其中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也有些是避免不了的。有些中学和预备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根本不够格,但上述院校却被迫接受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对此它们无可奈何;总的来看,学生团体缺乏知识背景和思想,对此它们也无可奈何。它们的学生总体上对文化缺少兴趣,在大学四年里绝大部分人得不到什么发展。尽管这些院校对此日益感到不安至少是一种好的迹象,但很难说它们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按班级进行教学的院校,班级规模通常都太大;青年教师的时

间过多地用于批改作业,给作业打分,而大多数作业很糟糕^①。除了后面我将提及的少数例外情况,各院校都认为可恶的学分制危害学生作出长期、无私的理智努力,因此任何院校都可以废除它而不必事先通告。它们都迷恋于竞争性的校际体育运动,而羞于告诉各自的校友:迷恋校际体育运动是大学毕业生文化平庸的例证,是大学一届届班级风气不断败坏的根源。有不少学生被迫对校际体育比赛装出有兴趣。高等院校难以迅速地改善中学的状况,因为成为中学教师的那些毕业生通常都缺乏活力、学问浅薄、目光短浅;它们也难以迅速地改善教师的质量,因为这取决于教育质量、薪金水平和社会声望。但若高等院校智勇兼备,它们可以坦率地告诉世界,由于放纵体育活动以取悦于主要由自己的毕业生组成的平民大众,学校的问题变得极其复杂^②。在美国,没有一所学院或大学有勇气将体育运动放在大家心中都清楚的位置上。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高等院校花费在体育运动方面的资金要比用于任何合法活动的资金都多得多。橄榄球教练要比校长更为学生和公众所熟悉,而教授的平均工资也不见得怎么高。学院或大学是否要忍受这一切?当然!有些院校不仅能够忍受,而且做起了“广告”。在芝加哥最显眼的两个十字路口,两年以前曾竖起了15英尺高、50英尺宽的巨幅橄榄球比赛预告牌。

① 最近我问过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希腊语学者,他的希腊语学生有多少是“值得教的”。他回答说:“研究生中没有,本科生中不到10%。”

② 详细材料参见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编的《美国高校的体育运动》,第23号简报。

芝加哥大学

1928年橄榄球比赛时间安排预告

9月29日:南卡罗莱那·里布莱克,2场

10月6日:怀俄明·森林湖,2场

10月18日:衣阿华

10月20日:明尼苏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10月27日:帕度

11月3日:宾夕法尼亚

11月10日:威斯康星(在麦迪逊)

11月17日:伊利诺斯

月季票和单场票订购处:

爱丽丝大道 5625 号

橄榄球票委会

咨询电话:公平仙女 4405

这样的广告牌竖在那儿展览两个半月,大学为它每月付费 500 美元^①。芝加哥大学这是在容忍一种无法避免的灾难,还是在激发一种败坏风气的欲望?

十一

我刚才说过,有一些美国院校正在致力于学术工作并与依靠算术方法计算学位课程的荒谬做法分道扬镳。理论上开展“荣誉学位”工作的院校数目还真不少,但能落实资金或其他措施并能做好这方面工作的院校则相对少得多。在此我并不想列出所有这类院校,只想特别提一下斯沃索莫尔、哈佛、

^① 这笔开支由门票支付,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看法。

部分哥伦比亚大学的系科、巴纳德、布林莫尔、史密斯以及威斯康星的实验学院(the Experimental College)。在这些院校中,热爱学习或较有才华的学生通过各种办法可以摆脱极其僵化的课堂教学和学分制的桎梏,与才华横溢的教师保持密切的联系,集中精力在有限的领域做好学问。斯沃索莫尔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尽管每年考生过千,但其选拔极其严格,每年只招 175 名左右的学生。该学院学习的头两年主要用于补充调整和训导,从学生中选拔出少数英才,使他们有机会独立、专心地攻读“荣誉”学位,两年后由外校考官评判他们的成绩优劣。哈佛大学则聘任了许多学科导师,负责指导优秀学生的阅读。此外,哈佛大学采取的“综合考试”制度也使得学生的阅读范围远远超过前面批评过的那些“课程”。我并不认为这是惟一的救世之道。正如一所院校有理由设导师一样,一所院校也可安排讲座,让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向大班授课,肯定会有一些学生从此坚持学哲学,而如果没有这种激励,这些学生也许根本不会去学哲学。不存在独一无二的、高贵的求知之道、教育之道或文化之道。在任何阶段都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最佳教学方法。在我所提及的院校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院校,其中有一些虽不引人注目,但优秀学生受到的教育却在中等教育之上,甚至远在中等教育之上。但在整体上,美国大学生读完四年大学毕业时尽管朝气蓬勃、颇有魅力,但在智能方面却未经筛选、缺乏训练,大多数人甚至还谈不上受过扎实的中学教育,这么说并不过分^①。哥伦比亚

^① 伯格森(M. Henri Bergson)最近访问美国大学时说:“我认为法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学得更艰苦。”

学院院长肯定了解美国大学生。他最近指出：“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理智欠发展，一如他们道德不成熟、交际很粗野。”这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中学已宠坏了他们，而大学仍继续对他们溺爱有加。每一种磕磕绊绊都必须被消除；学生必须给予“导向”；他们必须被“告知”“拿”什么；他们必须得到职业引导。学生决不允许被烫着手指；无论是作为新生还是高年级学生，他们都能得到精心昂贵的住宿安排，以便进行适当的交际，建立适当的社会关系；保护学生免遭危险就像保护他们免遭瘟疫一样；尽管“他们走完全程”，他们却毫无理智发展所需的艰苦努力的概念——在这种种情况下，怎么有可能进行教育呢？

十二

我已指出学院教育质量低劣的一些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特别重要，它反映美国人生活的格调和精神。美国人希望不断前进，这就是他们的父辈、祖父辈移民美国的原因。在他们各自不同的祖国，他们的前进遇到了石壁般的巨大阻力，因此他们来到美国。他们的确前进了，并为子女留下了一些财富以及与他们一样强烈的动机。而后辈们不仅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还希望拥有其他东西，其中有些取决于是否拥有多余的财富。他们想要满足其前辈在旧世界无法满足的所有冲动和愿望；他们想要朋友、旅行、权力、娱乐、刺激、地位、教育和自我发展。如果人有头脑，取得理智上的进步则轻而易举。因此，美国高等院校中少数才华横溢且目的明确的人专心读

书,结果的确获得了真正的理智上的优势。但要在其他方面发展,就需要朋友、交往和在社交或者运动方面出人头地。学院尤其是交友和交际的重要场所——部分通过学习共同的科目,部分通过各种俱乐部、社团和联谊会,部分通过成为相互无法区分的学校成员,大家穿同样的服装,做同样的事情,组成一个拥有共同的“学院精神”的群体。

很明显,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动机已超越合理的界限,因此无疑会降低理智水平。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大学生把学院看做是美化生活的地方。在他们眼中,学院主要是一个社交和运动的场所。专心学习太费时间,会限制学生的社交。再说,在校园中是否专心学习也无关紧要。因此,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学院必定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我重复一遍,有少数人的确在学习——努力学习以获得教育、教养和鼓励。这样,学校还保留了少部分专心学习的人,尤其在攻读学院后两年课程的学生中,的确存在这一类人。头两年的学业淘汰率很高,在后两年则往往出现比较明显的分流情况。结果,我们应称之为“过线学生”的那些人继续蜻蜓点水般地学习并起劲地参加体育娱乐活动,而少数热爱学习的人则专心致志于真正的大学学业。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导致我们的院校学术水平低下。我们这个民族信奉首创精神,正如所有创业者必须有这种信念一样。强者在创业中必须时而干这种活,时而干另一种活。美国至今尚未失去首创精神。我们信奉——因为我们不得不信奉——天生的才能而不是通过后天训练获得的技能。一位天才的工人若干年后可以掌管一条大铁路;一名机灵的仆童 40 岁时可以领导一家大企业;一名乡下律师也可以

成为总统。在最高层次几乎没有人是特意被培训为国家领导人的。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成名成家——当银行家、经理、将军、外交家、科学家、编辑——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但奇怪的是,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相反的理论笼罩着中学以上的教育。我们称之为人事工作者和职业分析者的那些人,在弄清培养一个管子工或打字员所需的最短时间和最少步骤后,很快得出结论,认为职业分析的技巧使他们能够解开智力和个性的深层秘密,弄清分化程度最高的工作所需的精确条件要求^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文理学院不是在训练广博深刻的典型思维,如人文思维或科学思维,而是在创办一些系科,开设一些使某个人能够从事某项特定工作的“课程”。美国大学介绍中大量充斥着这类旨在传授各种技巧、发明的“特别”(ad-hoc)课程。很明显,在这类课程中机遇找不到位置,通识教育也无一席之地。每一种活动、行业、专业和职业都必须加以分析,以使课程构建时能实现训练的目的而不是教育的目的。高等院校迫于无奈而努力使课程设置达到分析人员的要求;后者则依靠问卷进行工作,行动变化很快。我们能否相信一个受了点训练的姑娘就能学会为一个婴儿洗澡、喂食和穿衣?当然不能!因为很明显,不存在一个有教养的人可以汲取的经验之源。这个姑娘的教育因此会被中断、取消或搞乱,以便她在人为的安排下跟一位老处女学习这类事情。我们能否相信一个受了点训练的年轻人就能具有售货、推销或做广告的本领呢?当然不能!因为教育过程会再一次被中断、取消或搞乱,以便他能从一个从未卖过任何一件货物的哲学博

^① 关于“人事工作”,后面我将论及。

士那里学会售货“原理”，或从一个从未推销过任何东西的哲学博士那里学会推销“原理”。

按我的极端的看法，如果允许我发明“特别性”(Adhocness)这个站不住脚的词汇，我认为它不仅适用于各种现存的或希望开设的课程，也适用于各种讲座。除在柏林或剑桥可以见到的讲座之外，坐落在所谓“发达的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其师范学院拥有研究课外活动的教授而自豪^①；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拥有图书科教授^②；芝加哥大学设有警察管理教授；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设有传记科教授。好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能依靠智力、主动性和关系自己找到图书馆、书店或运动场似的，或者说，好像适当地呈现科目不会引发好奇心一样。密执安大学设立了生物语言学；主要从事 18—22 岁本科生教育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建立了一个“研究生暑期优境学学院”。那么，什么是“优境学”？优境学是“高效率生活的科学”。“科学”已成为由精神卫生、儿童指导、营养、言语发展与矫正、家庭问题、财富消费、食品准备、家政和园艺知识等人为地拼凑而成的东西，保育学校和幼儿学校也包括在内。一位女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深刻的问题：“莎士比亚与带小孩有什么联系？”一份校方出版物^③引述了这一问题，以此证明设立这所学院的合理性，因为瓦萨优境学学院为跨越这一鸿沟架起了桥梁！

对这些特别课程我后面还有机会提及。我在此提及它们

① 名册上列为教育学教授。

② 对这一荒谬做法比较敏感的明尼阿波利斯杂志慎重建议“至少应有一讲用于归还图书的高尚艺术”。

③ 《瓦萨学院优境学的意义》，1929年，第7页。

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它们说明在我们的学院中教育与训练混淆不清；第二，因为它们大致说明了学院学术工作可能存在的低水平，而这是不合时宜的急功近利风气带来的必然结果。我说“可能”是因为同样一所学院在为甲生开设“运动学”或“童子军活动技能”课程的同时，也为乙生提供了在高质量指导下学习内容充实的学科的机会。让我们记住那些仍在沿着狭窄陡峭之路登攀的学院吧。

十三

我接下来要谈研究生院。迄今为止研究生院是美国大学里最值得称赞的部分，即使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当数量的研究生院所做的相当部分工作也是真正具有大学质量的工作。

最杰出的美国研究生院^① 始建于1876年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它主要是受德国大学的影响建立起来的。起初它只有一个哲学学院，后来很快又建立了一个专业学院，即医学院，两者都曾接受一个伟大的学者型校长的领导。无论在创建之初还是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都最接近于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并且实际上

^① 哈佛研究生院名义上建于1872年，但确切的发展始于1877—1878年。见哈斯金斯(C. H. Haskins)为莫里森(Morison)主编的《1869—1929年期间哈佛大学的发展》一书所写的文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第454页。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建于1847年。

除此之外美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①。大学中教师人数虽少,但很优秀;学生人数虽也不多,但很好学;整个群体满腔热情地追求学问。像在德国一样,一方面开设大班讲课,一方面组织研讨班(seminar);在研讨班中教授和少数学生进行高深的教学和研究。这种方法现在在美国所有的研究生院中已普遍采用。美国高等教育中公认的最重要的影响力就来自那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种影响与该大学的规模不成比例,并应当完全归功于少数志趣相同、坚定不移地追求卓越之人士的影响。该大学的哲学博士被全国各地竞相聘为教师。之后许多高等院校也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并且发展速度很快。随着巴尔的摩实验的成功,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其他大学也在原有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研究生院。于19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芝加哥大学,也设立了很强的研究生系科。从那时起,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无疑有所好转而不是恶化,教学水平也有所提高而不是降低。数学、物理学、英语、历史学、经济学甚至中世纪研究和古典研究的水平都达到了50年前难以想像的高度。而最好的证明则是涌现出了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威利亚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米切尔森(Michelson)、摩尔(Moore)、布雷斯特德(Breasted)、曼利(Manly)、米利肯(Millikan)、理查兹(Richards)、吉尔德斯利夫(Gildersleeve)、特纳(Turner)、沙普利(Shapley)、罗斯特泽夫(Rostovtzeff)、卡普斯(Capps)、琼斯(R. L. Jones)及其他数

^① 由于其他高等院校缺少对本科生的科学训练,霍普金斯大学还建立了一个不怎么起眼的本科生系科。然而,该系科超出了它的目的和功用,今天已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因为它有力地摧毁了大学的独特性质。如果该本科生学院被撤消,研究生院得到健康的发展,我所说的故事就会不同了。

十位名人。在其他一些领域,我们也迅速表现出正确性和独创性。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学、卫生学、生物学和实验医学。随便挑一些与这些领域相连的名人,陶西格(Taussig)、威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韦尔奇(Welch)、阿贝尔(Abel)、马尔(Mall)、摩尔根(Morgan)、范·斯莱克(Van Slyke)和吕勃就浮现在脑海。一位杰出的英国乔叟研究专家最近说过,当今乔叟研究最有成果的中心不在伦敦大学,也不在剑桥大学,而是在芝加哥大学。与奥尼恩斯(Onions)一道完成牛津词典编撰工作的杰出的苏格兰学者威廉·克雷吉(William Craigie)爵士,现在不是在阿伯丁或爱丁堡而是在芝加哥大学编撰苏格兰词典。诚然,这些学者主要是在国外受教育的,但美国热情地欢迎他们,为他们创办了条件适宜的教学和研究中心。在为科学家提供实验室和为学者提供图书方面,美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帕萨迪纳、密执安、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大学及其他的州立大学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拥有更加出色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或许会被批评为太完善、太宽敞、设备太好,而决不会相反。优秀的学者常常被淹没在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的设备中,并由于教学、指导和相关的管理工作负担过重而苦不堪言^①。

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些公认的科学领域,我们所走的路与其他国家相同。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些科学在各地都采取了现代的形式。人文学科也一样,虽然远离欧洲和亚洲也造成了我们的一些缺陷,但这些缺陷在很大程

^① “鸟儿是否会歌唱,并不取决于鸟笼。”(“Es kommt nicht auf den Käfig an ob ein Vogel singen kann.”)

度上已被克服。因为我们购买了手稿和旧版图书,获得了许多直接影印的复制品或其他复制品;在罗马、雅典、巴格达、耶路撒冷和卢克索开办了学校;派遣了考察队去意大利、希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哈佛、芝加哥、耶鲁、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和密执安等大学因此积极创建了考古学和中世纪研究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杰出工作甚至可以被看做是极为重要的创造性贡献:走出哲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儿童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及成人对环境的反应;摒弃了抽象空洞内容的经济学家正着手研究商业盛衰的周期性、失业和财政;抛弃了哲学和历史学方法的政治理论家在研究各个阶段的政府工作。在大学的现代化方面其他国家不会更有优势。我不是说社会科学的发展仅局限于美国,但它在美国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已经达到的程度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外国的专家也表示了肯定的看法。

因此,总的说来,比较 1876 年和半个多世纪后今天的状况,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无论在新的学科领域还是在早已普遍公认的学科领域,高层次教学和研究所需的机会和设施方面的改善是巨大的和难以测算的。

图书馆应专门用一段文字来谈一谈。卡莱尔(Carlyle)曾经说过,真正的大学是图书的集合。但集合的图书越多,就越需要馆室适宜、编排有序、方便易取。大致说来,半个世纪以前美国实际上没有图书馆。自吉尔曼(Daniel C. Gilman)——他后来注定很快就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辞去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当时他辞职的原因是无法得到一个助手,每天早晨得自己给炉子生火。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中央取暖设备——只有一个炉子放在一间

易燃的屋子里,这就是不久前大学图书馆的状况!今天,大学、都市和中小学竞相提供丰富的图书杂志,为读者和借阅者提供迅速、自由和舒适的服务条件。图书馆开发了非常实用的管理技术,图书馆建设也得到了稳步改进。大学图书馆与大学的生活和活动已变得如此密不可分,至少就物质条件而言,各个合理层次的工作都摆脱了乏味、不便与拖延。钢筋和石头中间也因此体现出崇高的教育理想。高层次研究者需要使用目录和书架,他能得到满足。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工作以免受干扰,他也能得到满足。普通的教室备有坐椅、讲台和黑板,教授既可以在那里教学生,也可以在一个大礼堂讲课;向高年级学生授课他需要一个研讨室,里面专题书架一排接一排,这样,图书随手可取。供教授和学生使用的、气氛和谐的工作室因此而形成。美国大学取得的这一成就优于任何其他地方的大学。没研究过美国人在解决大学图书馆问题方面作出的持续不断的贡献,任何大学都不应该着手建造图书馆,这样说并不过分。杰出的英国学者、已故教授陶特(T. F. Tout)曾评论道:“美国的图书馆极其出色,极为便利。在美国大陆逐渐积累了大量的欧洲史尤其是英国史手稿。我最羡慕美国学者的是这个新世界的大学图书馆组织得很好。我们这里或许有更多的孤本、善本,他们那边却比我们更懂得如何管理图书馆,以便为研究生提供最充分的研究条件。据我所知,在帮助研究方面,任何大学图书馆都比不上哈佛图书馆:在那里,每一个教授都有书房,研究生差一些,也有个小隔间;在那里,专心研究的人手边可拥有常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且大家都可利用编排有序的书架,书架上的图书按特定的学科编排,极其方便。在纽黑文,我有幸看到耶鲁大学正在规划一座

更加宏伟、更加便利的图书馆。我相信耶鲁大学现在正在迅速实施这项规划,它体现了所有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信念与热情。这些图书馆并非形单影只。在最新的西部和中西部大学,人们建造图书馆的热情很高,所花费的代价即使英国大学较新的图书馆也自惭形秽。在已印刷出版的图书方面,美国大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如果说还存在什么缺陷的话,还有藏书齐全的很好的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和庞大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以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可以弥补。在这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美国大学生一般都可以找到所需的图书资料。缺陷可能是手稿和珍本较少,因为各地都很难获得它们。但这些缺陷正迅速得到弥补,许多公共部门和百万富翁都在尽其所能帮助弥补这些缺陷。”^①

大学出版社也得到了发展,因此与以前相比,大学可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出版物。但在此应指出两点。美国大学出版社几乎全无捐赠来源,因此它必须办成一个商业性实体,结果为了获利它出版了许多废物。更不幸的是,重要的著作,尤其是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著作得不到出版,除非它们能得到外国出版机构的支持。

即使大学图书馆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它们也赶不上学生人数不断膨胀和多样化带来的需要。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有暑期班和寒期班,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览室很快就显得不足。此外,大学图书馆也难以根据需要提供足够的复本。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高级学者的研究工作往往再次得到

^① 1929年2月14日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美国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伦敦,1929年,第10—11页。

巧妙的照顾。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学者和他们的同伴引入了研讨班和个人研究(individual research)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个人的研究拥有一切他可利用的自由。随着学生人数增多带来的压力的不断增加——其原因我在下面再讨论,大学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保护真正的大学教授。有时这类教授也被称做研究型教授,并被置于乱糟糟的本科生学院和研究生院的工作之外。有时他的教学时数也被减少。芝加哥大学最近建造了专为现代语言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专心从事高层次教学和研究工作所用的大楼;密执安大学也为物理学研究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同样的条件。“孤岛”由此逐渐形成。

科学和学术以不同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和学术的繁荣程度可以从发表的著作、论文或出版的杂志、学报的数量,以及从学会和科学社团的数量与热情看出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再次走在前面,创办了《美国哲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美国数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现代语言文录》(*Modern Language Notes*)、《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和《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没有美国的成果发表和出版,也很少有哪个领域美国的学者和思想家没有聚在一起开过研讨会,以促进学术的发展。^①

但遗憾的是,还存在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首先,美国研

^① 陶特教授呼吁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800 名会员中有 100 余人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在 300 家签名交流的图书馆中,有 1/3 位于“大西洋彼岸”;《现代史文献目录》是“我们最雄心勃勃的事业”中的一项,其中费城“负责 16 世纪”,17 世纪卷在“芝加哥完成”。

研究生院也受到美国人生活中文化贫乏的不良影响。在美国,一个人可以跟从大师学习希腊语、哲学或医学,但仍缺少某种东西,某种复杂微妙但却至关重要的东西。在罗马的美国学校学习的一位优秀学生有一次告诉我,他“发现有必要每隔几年就去国外学习一年,否则他就会感到窒息”。而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学生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时间可以医治创伤,但如果我们承认现状并抵制美国人生活中的某些主流现象,我们也许能够加快医治创伤的进程。有教养的人移民到美国后其子女很快就蜕化变质,被正统的美国文化所同化。因此,熔炉既有优点,也使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的来说除了上述缺陷之外,研究生院还深受中学与学院的劣质教育之害。作为一名友善并富有同情心的批评家,陶特教授觉得自己有责任指出:“根据美国人的说法,与英国的比较优秀的学校相比,美国的学校教育比较肤浅,工作成果缺乏持久性。学校和学院缺少强制性要求,致使语言受到忽视;学历史的美国学生的缺陷之一,就是不如英国学生熟悉文献资料所使用的语言。说这话时,请不要认为我对许多想在历史上成名成家的英国学生的语言水平抱有幻想!但我必须坦率地说,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与缺乏广博的普通历史学知识基础相比——几乎任何英国大学的荣誉学位课程都为学生提供这种基础——外语,尤其是拉丁语,是更糟的挡路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会变得更加保守,但美国的情况使我明白,荣誉学位课程和语言必修学科比我当年还是热血青年时所想像的还要富有内涵。美国的情况还告诉我,学位论文虽是一位好仆人,却不是一位好主人;崇拜重复性论文是一个错误。如果美国拥有类似英国荣誉学位课程的文学硕士制度,

并保留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制度,那么两种制度的长处都会得到保留,短处都会被减少到最低程度。在全心全意地接受德国的论文制度时,一两代人以前的美国改革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青年进大学时,已经在文法中学受过旧式的高质量全面教育并通过了考试,其水平决不亚于英国和美国的普通本科学位。”^①

我曾间接地提到过研究生院和本科生学院的缠结现象。这是陶特教授所说的劣质训练的结果。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应该为研究生的学习做好准备。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在另一些情况下,依靠勤奋或好运他甚至在获得本科生学位之前就已为研究生的学习作好了准备。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生并不都适于从事高水平的学习与工作。因此,讲课和课程分为三类:一类主要面向本科生;一类主要面向研究生;还有一类同时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任何一所院校、一个系科、一名教授都无法同时令人满意地履行这三项不同的任务。

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承认,在有些大学里高水平“工作做得非常好”(对此我将进一步阐述)——“一所大学甲系很强,另一所大学则乙系见长——但如果完全脱离本科生教育,就没有一所大学,即使是最好的大学,能够使研究生教育达到可能的规模和质量。”^②

我们没有理解索比(Sorby)的格言:“让一台机器高质量地做自己特定的工作,不要试图让它低质量地做几项不同的

^① 1929年2月14日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美国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伦敦,1929年,第4—5页。

^② 莱恩(Gordon J. Laing):《研究生工作的水平》,见收录于《教育中的问题》一书中的演说,西雷塞夫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201页。

事情。”^①

最后,还有我后面还将提及的纯粹数量方面的问题。美国青少年出于社会的原因或深谋远虑的原因云集高等院校。同样出于深谋远虑的原因,他们继续进研究生院学习——文学硕士或哲学博士学位在教育市场上是有销路的财富,因为学位越高,薪金越高。纯粹的学位追求者云集研究生院。为了满足平庸者的需求,研究生院采取了一种与高等教育不甚相关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这类学生而言,研究生院仅仅是一种拥有各种课程、教学要求、教学方法和计分制度的高级师范学院,就如本科生学院有点像高级中学一样。莱恩院长写道:“当我指出大量的硕士每年毕业时根本不会欣赏高深文化,我想我并没有夸张。他们后来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中有许多人视学位为金边教师证书,一旦获得,就不再继续做学问。他们成功地达到目的。如果你们怀疑我的看法,研究一下本国中学教师发表的成果(大多数硕士学位获得者都去中学工作),并与英国、德国或法国的中学教师发表的成果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中学教师与他人相比多么可怜。只有在教学法领域他们才成果丰硕。我肯定在我自己的古典文学领域,情况的确如此。我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学科领域的情况不是这样。当然,著名的和杰出的例外情况是存在的,但它们数量甚少。”^②

当然,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甚至不能成为优秀的中学教

① 《对研究的捐赠》,伦敦,1876年版,第165页。

② 莱恩(Gordon J. Laing):《研究生工作的水平》,见收录于《教育中的问题》一书中的演说,西雷塞夫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199页。

师或学院教师。人们指责“专门化”和“缺乏中学与学院教学法的训练”是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的原因。我认为,这不公正。在研究生阶段专门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应基于广博的文化基础之上。在教材的掌握和个性特点起决定作用的阶段,“方法”不起什么作用。如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确立化学教育讲座的先例得到仿效的话,研究生院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学术生涯将进一步失去仅有的魅力。研究生院不应为教师培训操心。如果它使学生感到学习有困难,从而迫使他独立自主,事情反而会更好。研究生院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己的教师是一个学者和一个独立的人,这就足够了^①。

就人数问题而言,大学行政官员后来说得很明白。哈佛大学的洛厄尔(Lowell)校长曾经写道:“当然,研究生院拥有不少真正的学者,其中一些人学术造诣极高,但大多数属平庸之辈,他们最好还是离开那儿。”^② 同样,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教授也指出:“在学术研究方面,只有四分之一(的研究生)有必要给予认真的考虑。”^③

① 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所著的《思想的艺术》一书对这一主题是一个巨大贡献。对美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这样一些观点,即“勤奋”不一定是“思想”的同义语;“不受有意识思考特殊问题干扰”的孵化期,对思维而言至关重要。

② 经允许引自一封日期为1930年1月8日的私人通信。洛厄尔校长在其《年度报告》(1927—1928年,第16—18页)中讨论了人数问题并建议加以限制。

③ 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年度报告》,1927年,第14页。

十四

我不可能——再说我也没有资格——对美国大学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学院分门别类展开讨论。但我可以谈谈医学院和教育学院^①。医学院长期以来仅仅由地方开业者组成,并在名义上附属于大学。1869年埃利奥特(Eliot)先生的到来使哈佛先开进步之风。埃利奥特先生首先对现实需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他漫长辉煌的生涯里逐渐使哈佛医学院摆脱困境,达到现在的显赫地位。而在此之前,哈佛医学院仅会说教,连最低的入学要求都没有。在叙述初期改革努力的《哈佛回忆录》(*Harvard Memories*)^②中,埃利奥特讲到了他所遇到的阻力,认为书面考试脱离实际。当时“完全掌管医学院”的那位外科教授告诉这位年轻的校长,他“对哈佛医科学生的质量一无所知;一半多的学生几乎不能动笔,当然他们也无法通过书面考试……比奇洛博士(Dr. Bigelow)对当时医科学生质量的观察有些夸张,但还不算过分”。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集了一批医科学者,他们虽有不足,但都是清一色的杰出人才。在一个时期里汇聚如此众多的学术人

① 我之所以忽略工程学学院,既是因为并非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工程学学院,也是因为我不熟悉国内外的工程学学院。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忽略了法学院。

② 《哈佛回忆录》,哈佛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第28页。

才,为美国前所未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从此出现了一个美好而辉煌的开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埃利奥特的明智忠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训练出来的医学人才对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和全国各地大学医学院的创办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医学科研人员纷纷被吸引到美国。近些年来,其他大学,尤其是哈佛大学,也对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变革就已完成,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未出现过。

然而,即使在医学领域,我们也决不能欺骗自己。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开办后的20年时间里,医学基础科学的人力物力条件得到了迅速、普遍的改善;许多大学的医学基础科学不仅颇有成绩,而且地位显著。在临床医学领域,道路却远不那么平坦。在哈佛、耶鲁、芝加哥、罗彻斯特(Rochester)、康乃尔、范德比尔特、华盛顿(圣路易斯)和其他一些大学里,大学与临床教学医院之间的关系是健康实在的,即由大学选择人员。不管是医院实际上归属于大学,如罗彻斯特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还是医院与大学之间只有合同关系,如耶鲁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大学的理念和方法在选择医学教授时的影响一如在选择希腊语教授时那样彻底。人才可从世界各地聘请,如果选不到最好的——这种情况时而会发生——责任完全在大学自身。但是,对于美国五分之四由地方开业者组成的医学院而言,大学与医院之间的美好关系,即使有书面表述为凭,也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毫无疑问,与一代人以前的情况相比,临床医学教师用于教学的时间和精力普遍增多,责任心普遍增强。若干大学在重要的临床学科引

进了“专职”部门制度,将领薪人员分为专职的教学人员、科研人员 and 护理人员^①。有足够的部分时间制的合格人员协助教学和护理病人,有时也协助研究。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开创,后来为耶鲁、罗彻斯特、衣阿华、康乃尔及其他大学^②所采纳的“专职”计划,为每一个重要临床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当丰厚的薪金。该计划决不限制工作人员护理有教育意义或科研意义的病人的自由。如果病人富有,它规定他们可以为一般性的医学院基金交纳少量的费用;但教学人员有自由从事适当的大学工作,因此这方面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专职机构已经运行了15年,1928—1929年它的外科收入为4770美元;耶鲁医学院运行已近10年,收入为10241美元;罗彻斯特大学运行6年,收入6650美元;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运行13年,收入4680美元。

然而不幸的是,在美国,霍普金斯计划的“专职”一词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在我看来将破坏原计划的独特性质。在斯坦福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在斯坦福医院的私人病房里干私活,看多少病人自己做主。除了领取大学教授薪金外,他还干私活收费。因此,所谓的“专职”教授虽把全部时间给了医院,却只把部分时间交给医学院。一种防护措施是,如果出现滥用职权现象,大学有权解聘教授——这种措施已被采用过两三次。在哈佛大学,根本就谈不上存在什么“制度”,内科学、外科学和儿科学的某些教授很少给人看病,甚至根本

① 在《医学教育比较研究》(纽约,1925年,第55—58页、322—323页)一书中,我描述了“专职”计划并讨论了迄今为止的后果。

② 哥伦比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务室也是依据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专职”一词的含义组织起来的。

不给人看病；其他教授则在某家医院有少数病人。结果，有些人完全或几乎完全是我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专职人员，而另一些人则应归入其主要收入来自行医的一类。所幸的是，年轻人中有不少人将全部时间用于内科学和外科学的学术性研究。

芝加哥大学的医学教育情况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这一点只有了解它的发展史才能理解。1837年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College)成立时是一个独立的私立机构。它的历史与比较富有的美国私立学校大致相同，“教职人员”由当地许多名医组成。1875—1895年期间拉什医学院获得了一些实验室设备；1887年成为森林湖大学(Lake Forest University)的医学系，但由于它保留了自主性，它与所在学院只有名义上的联系。1898年芝加哥大学建成，同时，拉什医学院马上割断了与森林湖大学的联系，转而“附属于”当时已经开展医学基础科学教学的芝加哥大学。结果，芝加哥大学接受了一所分离的学院：由大学本部提供真正大学层次上的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病理学教学，而临床医学方面的内科学、外科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的教学则由地处城市边缘并以地方专业人员为主的拉什医学院承担。

这种安排从来就不是合理的。随着实验室和诊所工作相互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临床教学和研究资金需求的产生，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安排的缺陷。在过去30年里，有两件事变得越来越清楚：第一，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在地理上与临床部门相隔将对双方造成损害；第二，临床教学与研究需要捐赠。因此，以前分离的靠学费生存的医学院，努力将实验室和诊所迁至附近，从全国各地而不是本地专业人员中挑选临床医学从业人员，并为临床工作和实验室工

作争取适当的捐助。

芝加哥大学为达到这些目的,于1916年提议不再把拉什医学院作为学校的临床教学单位,而将拉什医学院转入一所研究生院,供有关医生经常进行专门训练所用。为完善大学本部的医学院,大学将建立一所真正的大学医院,使其与所有和医学有关的学科保持尽可能密切的联系。这样,与优秀的医学或非医学科学实验室保持密切联系的校本部医院,不仅能高水平地培训医生,而且能够开展非功利性的病理学研究。在这个重要的方面,除芝加哥大学外,美国没有一所大学处于如此佳境。在校本部医学院建设计划宣布后很短的时间里,大学就获得了启动资金。为购买计划中的设备所得的慷慨捐赠的其他资金也随后源源而至,其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像。当然,这些设备也还不够完善,因此,某些专业的教学仍只好作临时安排。但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美国任何一家医学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

最初捐赠给大学的资金用于上述目的。为执行计划,必须获得法院的同意,这也及时办到了^①。如果芝加哥大学坚持它向原始捐赠者宣明并得到州最高法院批准的目的,它在城市的另一边就会拥有一所可进行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设备良好的医院,在校本部也可拥有一些与所有学科联系方便的现代化诊所,承担培训医生的工作并开展科学研究。但恰恰相反,大学在实行原计划时采取了糟糕的妥协政策,结果大学在临床医学方面开办了两所水平完全不同的医学院并授予两种

^① 《拉什医学院的理事》,参见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报告,第312卷,第109页。

医学学位——一种是拉什医学院授予的学位,一种是奥格登理学研究生院(the Ogden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颁发的学位。如果拉什医学院及其附属于芝加哥大学的制度相当不错,有资格颁授芝加哥大学批准的医学博士学位,那么在校本部再创办一所有资格颁授医学博士学位的医学院的做法就很荒谬;如果拉什医学院水平不高——整个原始计划就是基于这种看法——那就应该放弃拉什医学院,让它按照原来达成的协议发挥作用。

但在校本部,专职计划甚至在取得经验之前就出乎意料地被修改了。组成大学临床教学点的那些医院,原来的目标是接收能够部分或全部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但住院部主任却被告知要与临床医生合作,拒收没有科学或教育价值的病人。另一方面,病人一旦根据上述条件入院,就由领薪的临床教学人员护理,费用则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和病人的付费能力收取。不过医院也为收取根本付不起治疗费却有科学或教学价值的病人作了充分的准备。根据这一制度,外科系一年之内就为医学院挣了八万多美元。所付的薪金不算过高,但在在我看来,这种安排很容易导致滥用职权或降低水平,它与巴尔的摩、纽黑文和其他地方采用的专职制度不可相提并论。我说过,实行专职制度的目的是帮助医生摆脱日常琐事,使他们对是否要照看这位或那位病人能够作出完全独立的判断,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大的教学和研究自由。因此我相信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除非医学系获得的捐赠足以使它的看病收入可忽略不计。出于涉及当地医科专业人员从业情况的慎重考虑,必须向有支付能力的病人收取名义上的费用,但如果收取的费用超出名义的界限,就会有学术观点受到危害的严重危

险。一旦一个医学系的科研预算完全依赖于临床人员的收入,后者很可能不得不努力挣得必需的经费——如果可能,通过承担它感兴趣的工作;如有必要,则通过承担其他工作。在我看来,学术性或科学性医学系不可能得到安全保障,除非它拥有足够的资金,专职人员可以独立于他们的赢利能力,如同梵文教授一样。毫无疑问,像美国这样希望促进科学医学的富裕国家,能够承担进行最高科学水平医学研究所需的资金而不必为相对易于进行医学研究作出妥协。

对专职制度所作的种种修正——坦率地说,我也许应称之为种种妥协——是对在巴尔的摩、罗彻斯特、纽黑文和圣路易斯建立起来的那类专职组织的重要性的最好证明。根据我的看法,如果没有更为正统的那类组织的刺激和榜样作用,上述种种修正都不会出现。同样,除非更为正统的那类组织坚持彻底完善,否则对专职制度所作的种种修正也都将继续恶化。我们不可能退回到20年前的状况,但临床医学学术领域里的战斗也尚未打赢。因此,对事物作出各种区分,使它们名副其实,永远是十分重要的。

我在此所说的医学院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院系。除非法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文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等职位都不必考虑为自身或为大学谋取附带性收入,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吸引最有天赋的人才,教授们也不会集中精力追求合理的大学目的。在讨论薪金问题时我将再回到这一观点上来。

在临床医学的设施和装备上,许多院校是很出色的。人员配备也经常与设备条件相适应。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精确地说,大约10至12个院校拥有真正大学性质的医科诊所;德国意义上的外科诊所和儿科诊所数量则要少得多;产科学、精

神病学和眼科学在两三所学校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神经病学和皮肤学还刚刚问世。美国最近于全面的医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还缺少耳鼻喉科、神经病科和皮肤科诊所，以及用于其他重要目的的资金。其他医学院中有许多虽然就其本身来说办得很出色，但存在的缺陷更多。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已经有了一个虽小但却很有前途的开端；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正在取得类似的进步；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图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情况也在改善。在整个南方，至多只有三所前景看好的院校，除此以外，虽然它拥有 13 个州和 2898 万人口，但却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医学院或医学机构。在密西西比河西部，若干州立大学也开始作出努力。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和衣阿华市(Iowa City)则建立了拥有先进设备的医学院，各种资助也在稳步增加。但对于一个拥有 20 个州和 2610 万人口的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来说，能与这些医学院相媲美的机构却寥寥无几。我们已经几乎全部消除了 20 年前还存在的种种丑闻，取得了积极而巨大的进步。对 1914 年的情况有所了解的外国人现在再次访问美国时，会为所见到的变化感到惊讶。但他们的良好印象和看法不应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一个国家，美国还仅仅处在医学教育重要时代的开端。我们尚未确信医学就其临床的一面而言真是一门科学^①。

^① 科恩(Alfred E. Cohn):《医学与科学》，载《哲学杂志》，第 25 卷，1928 年 7 月 19 日出版。同时参见鲁弗斯·科尔(Rufus Cole):《哈维学会演讲中体现的过去 25 年的医学进步》，载《科学》，第 71 卷。

此外——我现在所说的是美国处于最佳时期的医学——还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失误。由于无法理解的原因,有些院校虽受捐助颇多,但它们的一些重要职位却经常被一些能力低下、思想贫乏的人所占据。霍普金斯大学在设立若干专职诊所的同时,就默认了一家打算放弃专职组织管理模式的泌尿科诊所的存在。在我写作时,布鲁克林一家很弱的独立医学院通过将“医学院”与它以前有幸建立附属关系的医院相分离,同时合并一家卫理公会医院、一家犹太人医院和其他几家医院,迅速发展成一家“医疗中心”。该医学院现在筹集了少量资金,并希望待“条件改善”时筹集更多的资金——在美国这个主要的州里,这就是对过去20年医学教育家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报答!最后,对医学科学的精耕细作,使我们面临付出沉重代价的危险,即牺牲前辈们所具有的那种成熟的判断力和宽厚的教养。奥斯勒(Osler)、詹韦(Janeway)和霍尔斯特德(Halsted),无人可以取代。其实,无论医学科学家还是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的科学家,都应把自己看做是人,看做是传统和历史遗产的继承者,并信仰一切科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近成立医学史研究所一事,表明它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大学医学院主要培养开业者,并常常是职业型开业者,医学仍深深扎根于文化的土壤。它的理想在根本上属于人文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范畴。

十五

美国的教育学院毫无疑问不仅对美国人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而且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补充一句,它对现代教育也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一代人以前,小学和中学还是单调乏味的场所:课程毫无生气,训导方式愚蠢无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几乎与学校毫不相干。卢梭、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曾经梦想过灵感在教育中起巨大作用,但这在美国未曾产生广泛的影响。近来实践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尽管这一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课程,尤其是小学的课程,变得很有生气。虽然这种积极的变化不完全是通过教育学院实现的,但教育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许可以说它们是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机构。有许多问题属特殊的教育问题,虽说它们与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密切相关,但都不能完全纳入上述任何一门学科。这一点说明教育有理由成为一门具有大学性质的文化根源和崇高理想的专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师范学院,包括芝加哥、哈佛和其他州立大学的师范学院,则紧随其后。它们给中小学带来了活力,理应受到高度赞扬。

不幸的是,与它们所在的大学一样,教育学院也失去了头脑。首先,在摒弃过时的或脱离现实的教育内容的同时,它们又忽略了许多有生命力的和切合实际的东西。它们未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人的逐渐成熟,学校必须逐渐将重点

从个人转向任务本身。伍德布里奇教授写道：“旧教育忽视对人的尊重。如果新教育忽视对学习的尊重，就太遗憾了，不是吗？”

“过去”和“陈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①。哲学、学术成就和历史逐渐隐入背景，技巧、管理和“社会化”逐渐走向前台；通过“联合学位”（combined degrees）和其他手段，学习“教育”课程的需求逐渐妨碍了对教材的掌握。由于学科内容浅薄，排斥性强，因此决不能认为“容易”、“自发性”和“自我表现”等观念是正确的引导。文明是人造物，它与人们有目的地去奉行的理想不可分割，而这些理想又往往包含抵制潮流的努力。没有理想，没有努力，没有学术，没有哲学的连续性，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师范学院对这些观点越来越缺乏敏感性。它已淹没于各种过分、浅薄和眼前的事务之中，满足于急功近利。对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what）的人，它要告诉他们“怎么做”（how）。当然，的确存在推动个人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深刻的个体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必须得到尊重。但一旦作出选择，在中学、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个人就会要求他的教师使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愉快而顺利地引导自己掌握一门不属于学校而属于其他地方的学科。当然，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和启发方式会有差别。但我认为，在较高的教育阶段，只要教师是相关学科的大师，那么这种差别相对而言不会那么重要。责任应主要落在学生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项极其荒唐的做法，就是

^① 新运动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哲学家最近曾以轻蔑的口吻谈到“欧洲自负的文化”。很难再用更不明智的话来讲美国的教育学教授了。

设立了一个化学教育教授职位^①。雷姆森(Remsen)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他的影响遍及全美国。如果他有一位平庸之辈作为他的伙伴担任化学教育教授,他还有什么完成不了的呢?但请注意!如果一个大学化学教授需要一个化学教育教授做伴,那么物理学、数学、历史学、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讲座教授也都需要。这样,尽管美国的大学都资金不足,其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财政情况当属最差的一类,它们还必须设立与学科讲座教授平起平坐的教育学教授职位。的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又一次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即使是朝错误的方向!

人们因此要问,教育学院在大学里是否能够与法学和医学等专业进行合作。美国师范学院对此迄今未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总的来看,与一代人以前提出的建议相比,现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学院虽然没有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技巧性的、微不足道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事情上。在教育领域,有些事情需要行动,但这不是说大学要承担所有这些行动。美国最初一批师范学院的教职员本身都是学者,而现在这些学院中学者和科学家日见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才能平庸的教授和讲师,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狭隘的技巧和管理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职员名单长达26页,其中包括教师303人^②;学院概况手册中则列有各类“学生”19000余

① 正式的说法是:“这门课程将包括化学教学的理论、观察和实践。它是特别为那些准备在大学、学院和大型中学教化学的学生设计的。”

② 不包括数十名推广部和暑期学校的教师。

人。一些教师开设了教育哲学、外国教育或比较教育课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问题也没有被忽视。但为什么有这些重要而有趣的领域还不够呢？为什么一个受过教育、精通教育哲学并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人不能从这一起点独立前进呢？为什么在这个富有创造力的年龄阶段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在适当时候依靠常识都能解决的琐碎小事和实用技巧方面呢？满满 200 页的学院概况手册上，罗列的大多是一些不那么重要和突出的学科，它们本来完全可以留给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依靠常识或一般智慧去理解和掌握。原子论式的训练——即无休无止地开设特殊课程而不是提供少量广博精深的学习机会——是与理智发展背道而驰的。在一出很受欢迎的戏剧里一位黑人牧师宣称：“上帝希望我们自己解决一些事情。”但师范学院依据相反的原则进行组织。这样，在这个规模庞大的机构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得到了“特别”训练而没有获得有关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教育与鼓励。在所设的数百门课程中，我仅举以下课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手稿写作”、“教育社会学之教学”、“课程构建的管理程序”、“学校历史学教学史研究”、“文学与历史学教师音乐讲座”、“个别咨询方法论”、“学院管理研究”、“高等教育心理学”、“外国人英语教学法”、“个别教学法”以及“课外活动，包括学校俱乐部、远足、体育勋章、班会活动与集体舞蹈、课外活动经费和学生活动记录卡等事项”！

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稍有节制一些：它只拥有 33 名教职员^① 和 800 名左右学生，其课程表只有 40 页。我发现有一

^① 不包括暑期学校任职教师等。

门课程内容是“1400 年至今欧美教育的发展”。就其他课程而言,该学院尽量避免充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课程表的荒谬细节陈述,并相对更注意心理学问题。但仍显得有些荒唐和琐碎,例如,学院在八个独立的标题下设置了“教学人员的管理”、“学校官员的职责”、“情景意识与行为规划”、“反思教学法”和“教学督导”等各不相同的课程,此外又设置了“中学女生的学习与指导”等课程。不过该教育学院的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考试、测评、组织与管理——包括教学人员的管理和如何组织课程的规划方面!在测评方面,心理学家似乎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也许测评的用途有限,但芝加哥大学设计的一项公式表明它可以起多少作用。该公式表明“学术与各种测试的组合的关系”:

$$\frac{R_{s.12345678} \sqrt{1 - (1 - R^2 S_{.1})(1 - R^2 S_{2.1})(1 - R^2 S_{.4.123})(1 - R S_{.6.12345})}}{(1 - R^2 S_{7.123456})(1 - R^2 S_{8.1234567})}$$

这样,测试者就可以简单明了地揭示作为优秀教学的真正基础的全部个性因素!

与这一公式相比,斯波尔丁教授设计的公式确实显得相当简洁^①:

如果 A_r = 规定学科平均班级人数;

X = 联合班级教学时数;

T = 班级教学总时数;

G = 每个年级平均学生数;

^① 斯波尔丁(Francis T. Spaulding):《小型初级中学》,哈佛教育研究系列丛书,第9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31页。

$$\text{那么 } A_r = \frac{X_2 G + (T - X) \cdot G}{T} \text{ 以及 } X = \frac{T \cdot A_r - G}{G}$$

哈佛研究生教育学院拥有 37 名教师。其中有些人从事重大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但大多数人研究的是简单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通过经验、阅读、常识和良好的通识教育本来很容易得到解决。涉及后者的特别课程包括一些不同的学科,其中有面向游戏和娱乐专家以及面向负责游乐园、社交中心、夏令营、节日活动、露天表演、商业教育、社区娱乐、学校与社区演唱会等活动的管理员而设的课程。显然,哈佛研究生教育学院留给理智、个人的独创性、机会和非大学技术培训的时间也是最低限度的,对历史学和哲学的重要性的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

为这类事情所吸引的人,其水平之低及其后果可以从教育期刊琐碎平淡的特点以及高级学位论文涉及的主题清楚地表现出来。当前文献所涉及的主题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政治学家讨论的主题相比,显得如此缺乏意义,以致看起来其设计好像有意要吓跑理智一样。吓跑理智的努力虽是无意识的,却很成功,这一点从文科硕士或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可以得到证明。我随机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了一些这类论文的题目:“城市学区”、“经验的变量:有助于个性形成的经验变因之研究”、“管理与教学的有效性测评”、“城市学校入学服务”、“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研究”、“中学餐厅管理问题研究”、“美国科学家的人事研究”、“教育中的启发”、“师范学

院学生的社会背景与活动”^①、“与成功的教学有关的素质”、“学校设备成本的估算方法”、“公立学校设备的管道安装”、“小学门卫服务分析”^②、“学校剧场的设备”、“关心女生并倾听她们的诉说”、“有效购物教育的需求证明”、“5岁、6岁和7岁儿童的动机成绩”、“九年级男生前后姿态测量量表”、“读书姿势与课桌尺寸研究”、“作为教材基础的基督教青年会执行秘书的活动方法和品质分析”，以及“运用个人判断评价师资培训课程活动的统计方法”。哈佛大学也面临走同一条路的危险：它最近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有的题目就是“速记员/职员课程的职业活动与社会理解”、“学院女性指导”、“得克萨斯孤儿智力分析”（为什么是孤儿？为什么是得克萨斯？）。另一方面，只有少量的论文研究严肃的和有价值的课题。理智和学术与教育学院分道扬镳这一点我并没有看错，一所重要的教育学院的院长也同意我的看法，并且允许我从他的未发表的备忘录中引用以下一段话：

“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教育学院里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由一批才华横溢、声名卓著的教职员，根据一项范围广

①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所师范学院的妇女主任。论文想到了学生的家里是否有一架割草机、一套书桌、一张破地毯、一个内嵌书架、盆栽植物、组合餐具等。论文所调查的闲暇活动包括“购物”、“谈心”、“独坐”、“思考与梦想”、“野餐”、“随意交谈”（海阔天空交谈一番）、“与‘男士’约会”、“讲笑话”、“取笑人”、“做任何事，成群结伙”和“阅读”。

② 我曾停顿一会儿想一想“小学门卫服务分析”这篇论文。为什么是小学？理由是：很明显，这一题目表明还有其他论文——随着学生的增加也需要新的论文题目——如初中看门人的职责，高中看门人的职责，学院看门人的职责，等等。我曾经问一位学校管理学教授：“它们真是不同的课题吗？”他回答说：“是的。例如，小学生遇到的卫生间问题与中学生就很不同！”

博、旨在系统地培养专业领导人才的计划,全力以赴地对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研究生进行教育。”

与测试者密切相关的是,从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纷纷涌现出一批职业和人事分析专家。先后在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的一位教育学教授就是通过分析药剂师和秘书职业开始他的生涯的。他的分析目的是要通过培训消除这些职业人员的所有空耗动作,并设计一种通过精确计算生产所需产品的课程。查特教授对秘书职业的分析^①揭示了具有深刻和重要的社会、科学及职业意义的两点看法:第一,秘书有 871 项职责,包括做笔录(!)、上闹钟、锁抽屉、称信件、驱赶怪人和乞丐、接电话、除灰尘和拆信件;第二,秘书应具有 44 种品质,包括有魅力、想像力、礼貌、幽默感(惟一的情感)、谦虚(不自负)、沉着和自重。这 871 项职责是难还是容易?应在培训学校里还是“工作岗位”上获得这些品质?以下两个公式提供了回答:

$$\frac{H}{H+E}, \quad \frac{S}{S+J}。$$

这项长达 183 页的研究得出以下相当含蓄的结论:

“从进一步使用 $\frac{H}{H+E}$ 这一公式中可以得到什么尚不清楚,但调查者认为进一步使用 $\frac{S}{S+J}$ 公式具有很大的价值。”

^① 见查特(W. W. Charter)和惠特利(I. B. Whitley)合著的《秘书职责和品质分析》。该书花 2.5 美元就可从出版商巴尔的摩市威廉姆斯和威尔金斯图书公司那里买到。

基于这一研究所包含的认识,调查者认为更精确地确定秘书课程的内容是可能的。”

在由耶鲁大学校长、布法罗大学校长、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和芝加哥大学教育系主任等人组成的总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国许多教师的合作下,查特教授耗时3年、耗资42000美元,将同样的方法运用于师资培训研究中。尽管在该项研究成果的序言和导言中罗列了许多人物,“却没有委员会对文件的终审意见或修改意见。”导言作者本人没有通读过全卷研究成果——没有人能够通读——并坦言该研究成果“像一项委托工作”,“受委托代表不知道该删除什么”。因此,这项不加鉴别、包罗万象的问卷“研究”的结果,是令人钦佩地出版了长达666页的巨著。它所揭示的重要事实为:教师需要进行1001件纳入各种类别的活动,他们应具有83种品质。幸运的是这些品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分配,如高中教师只需要具备其中的26项品质,初中教师为26项,中间年级教师为26项,小学教师为24项。而在1001项活动中^①,研究表明教师必须学会“帮助学生发现错误”(第319页)、“提问”(第324页)、“提供新问题”(第330页)、“适当时通过幽默的评论创造合适的气氛”(第334页)、制止学生在“教室里使用化妆品”(第355页)、注意使学生静悄悄地“去饮水,上厕所和去其他房间”(第358页)。所需的“品质”包括讲究精确、风度迷人、尊重惯例、小心谨慎、说话流畅、有吸引力和冷静节制(第56—61页)。这项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的教师既没有天生的官能也没有良好的教养,因此研究者希望这项全面

^① 我并不认为教师没有1001件事情要做!

彻底的分析“能够为系统地确定教师的培训内容提供必要的基础。”^①

几乎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长达 194 页的四开本著作，正由耶鲁大学出版。在一项以“学生意见调查”为基础的有关“学习动机”的“研究”中，人事研究系系主任克劳福德（A. B. Crawford）先生为了“收集与未来大学教育和行政决策至关重要的资料”（见序），发现了“高年级学生的主观意见和判断可能要高于平均水准的可信度”。一页接一页的表格、百分比、图表、文献目录和问卷导出了十个事实上不过是普通常识的结论，尽管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一位有教养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在表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一般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

“某些次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地位，倾向的确定性等等）往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术动机。与学术性向测试评分等能力测试方法相结合，这些指数适用于作为入学选择的补充性标准。”

还有：

“这些不同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归因于有目的的动机，而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有目的的动机的表现，有目的的动机则强调这些因素是基本的动机激发力量。”^②（第 125 页）

除此之外，有关学习动机还有什么可说的？公正地说，应

① 书名为《全州师资培训研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售价 4 美元。

② 我以前的领导，在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位置上任职二十余年、现已作古的华莱士·巴特里克（Wallace Buttrick）博士习惯于将这种英语称做“教师行话”。

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目光敏锐的文件的作者得到了三名心理学教授、一名教育系教师、所在大学校长、若干名潜水员、一名四年级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四年级学生主要帮助计算数量虽大但却不那么需要动脑子的所谓“对应率”(correspondence ratios)。^①

在这一点上,教育学院系和社会学院系正在逐渐融合,偶尔它们也以自身为中心吸纳一两名心理学家参加工作。例如,芝加哥大学有两名教授正在开展“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心理差异研究”这一课题的工作,另一名教授正在从事“经理能力研究”这一课题的工作。政治科学系的一位教授出版了一本颇有见解的书,书名为《芝加哥公共职业的声望价值》(*Prestige Value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Chicago*),其中附有80个精细的表格和16个图表。该书作者所使用的方法相当复杂,能够区分市政厅(the City Hall)的电梯工与里格利大厦(Wrigley Building)的电梯工的职业声望差别。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一位教授认为“需要最为迫切的研究方向”是:

① 本人在此引述以下一段材料,作为问卷形式与内容的一个样例:

“根据您在耶鲁大学学习的课程,您认为一名成功的教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专业声望	学术与研究	教材呈现方式
学科知识	热情	教学经验
为教学自身理由	个性	教学技巧
献身教学		
1. _____	2. _____	3. _____

您认为什么课外活动对个人的发展最有价值?您认为什么对大学生生活最有价值?为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对领导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研究,研究一直追溯到婴儿期的传记资料,以便发现基本的品质与动力。与这一纵向研究相结合,我们还需要改进横向的重要品质的评分与测试方法。但只有当我们发现并阐明那些基本品质时,这些测评才会有用。主要的需求处在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即设计一种方法去发现和阐明各种品质一起发挥作用的方式,去发现和阐明表现个性整体特征的某种定性象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在各种社会和职业关系中观察一个人。正是由于生活情景的多变性,我们才能辨别出表现个性整体的共同特征。”

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热心研究企业界领袖个性特征的教授曾建议设计一种面谈,以“说明导致一个人变得尖刻、另一个人变得好斗,这个人变得很善交际、那个人变得十分坦率而善于合作的情感状况或经验类型”。

当然,既然事情已到这一地步,对经理的思想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就不可避免。实际上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经理,还包括护士长、管理员、部门主任和整个机构的领导。这位满怀希望的人写道:

“我猜测这里所蕴含的一项有用的原则可以通

过适当的研究加以提取,并运用到企业关系领域之中。”^①

很显然,测试者、问卷迷和技术人员对个性和灵感的微妙性、偶然性和细微差别毫无耐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送给他们以下一段他们明显未注意到的简短对话:

“哈姆:你愿意吹吹这笛子吗?”

吉尔:殿下,我不会吹。

哈姆:请你吹一吹。

吉尔:我真的不会吹。

哈姆:请你不要客气。

吉尔:我真的一点不会,殿下。

哈姆:那是跟说谎一样容易的。你只要用你的手指按着这些笛孔,把你的嘴放在上面一吹,它就会发出最好听的音乐来。瞧,这些是音栓。

吉尔:可我不会从它里面吹出和谐的曲调来。

① 顺便提一句,失去对斯特朗(Strong)与乌尔布鲁克(Uhrbrook)合著的《工作分析与课程》这类著作的了解机会,将是一件憾事。这本著作告诉人们该怎样培养“年轻人担任经理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也许以下三部著作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部出版的:

1. 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和斯特朗(Strong)著:《中学女生部主任的人事研究》;

2. 巴克顿(Buckton)著:《学院与大学的乐队,其组织与管理》;

3. 古德温·沃森(Goodwin Watson)著:《教育学科成人学生的快乐》。

如果未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教育学和社会学文献中充斥着大量的无用的东西——数量之多已经危及科学精神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那么,要人们注意我前面提到的荒唐著述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他领域——即使所谓的“精确科学”领域也如此——也发表毫无价值的东西,但它们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其作者通常也不可能在主要大学担任教授。

我不懂那技巧。

哈姆：哼！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东西！你在玩弄我。你自以为摸得到我的心窍；你想要探出我内心的秘密；你会从我的最低音试到我的最高音。可是在这支小小的乐器之内，藏着绝妙的音乐，你却不能使它发出声音来。哼，你以为玩弄我比玩弄一支笛子容易吗？无论你把我叫做什么乐器，你也只能撩拨我，不能玩弄我。”^①

十六

好像机器还不够复杂——部分原因是它已变得很复杂。近些年来一项新的运动（让我补充一句：它不一定是坏事）导致大学创办了一些“研究所”（Institutes）。什么是“研究所”？该词是从德文术语中引进的，在德国它是指一个或一组实验室。在美国，它可能具有某种含义或不具有任何含义。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是指与有关东方的学科打交道的教师群体。研究所在其他意义上并不存在——它不是独立于院系的团体，也无自主权，它只是一些人或一些系科，与其他一些人或系科完全一样，资助部分来自一般性经费，部分来自大学

^① 这段对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其中“哈姆”即哈姆莱特，“吉尔”即吉尔登斯吞。此处译文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81—82页）的译文。——译者注

拨给的专项经费。哈佛大学在法学院中设了刑法研究所,后者只不过是刑法讲座教授研究活动的代名词——这种做法甚为可疑,因为它意味着在一个大学讲座教授职责范围里教学与研究有可能分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设了医学史研究所——首先,其名称令人愉快,因为它意味着与苏德霍夫(Sudhoff)教授在莱比锡大学创办的著名研究所目标相同。其次,根据威尔奇(Welch)博士的设想,该学科的范围大于医学院的一个系。

在研究所方面,哥伦比亚大学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仅在师范学院就设有“教育研究所”、“学校实验研究所”、“国际研究所”、“儿童福利研究所”和“实地活动研究室”。国际研究所由一群行政人员组成;至于儿童福利研究所,我们还是少说为妙^①;实地活动研究室由一群“服务”人员组成,面向全国提供付费服务。结果有关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事与他们并不相干的奇怪的工作,而本来他们应该在学生走向各自岗位后再训练他们做这些工作的。除了其他繁重工作外还要管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那位碑铭学家,在他的近期报告中建议建立一个“分配研究所”,而这只不过是商学院或经济系内部又一次恶性膨胀的表现。分配研究所将全面研究“消费者需求变化的性质、各种分配方法的相对效率、外贸形势、分配的经

^① 其成果样本参见代理院长主编的《2—5岁儿童习惯编目》,师范学院出版部1928年出版。它表明儿童最多可具有2325项习惯(包括情感、思想、动机、社会和道德等各种习惯)。儿童在每一类习惯中得到的分数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frac{T}{S-3X} \times 100$,其中T,S和X代表什么并不重要。与人事专家发表的东西一样,这项研究具有严肃的目的。与有人可能推想的不一样,它不是统计方法的粗俗表演。

济成本、外贸与债务形势、国家关税政策与外贸、广告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以及分期付款及其对信誉的影响”。

研究所方面最近的——我认为也是最不可理解的——发展出现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医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弱。近些年来,在现任院长温特尼茨(Winternitz)教授充满智慧、热情和活力的领导下,该医学院迅速改善了它的设施、人员和资源条件。但它的发展还远非完美,它的资源条件也仍然极为不足。因此,尽管它属于美国少数得到很高评价的医学院,但还未达到一种稳定或平衡的状态。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里,它需要拥有过去十年那样的领导者。耶鲁大学早就拥有一所法学院,近来它已发展成为一所学术性的机构,而不仅仅是过去那种职业性的学院。它还拥有通常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讲座教授席位。现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建议组建一个“人类福利集团”(Human Welfare Group),该集团将包括耶鲁医学院、耶鲁法学院、企业工程学研究室,从智力、体力和社会等方面研究人的生命以及对其他生物有机体进行比较研究的部分系科,最后加上人际关系研究所。整个集团被正式看做是“一个深入研究智力、体力和社会福利问题的中心”。据有关人士郑重宣称,通过协调包括儿童发展、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心理学、社会科学(主要是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活动,“现有的教育程序”将被简化,许多问题将得到阐明,包括身体健康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智力稳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犯罪与娱乐设施之间的关系、儿童训练与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离婚之间的关系以及立法程序与尊重法律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对个人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使他变得更加幸福——由

于这项工作实际已超出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因此它应与大学无关。就像前面提到的教育领域的“实地”调查一样,它应属于受过大学培训的人所关心的事,而不是大学本身所关心的事。

人际关系研究所不但获得了一座相当美观的新大楼,还得到了相当多的经费。但新楼里面有什么?有用于“儿童发展”、精神卫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相当充足的设施,少量的供人类学研究和教学使用的场所和社会科学系统统计室。大楼的名称与内容不相符。

旨在解释理念和争取资金的文献不断涌现,它们强调破除“分科制”(“Departmentalization”)的重要性。由于篇幅有限,我在此无法对这类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混乱作详细的分析。知识的进步首先依靠人为的简化;系科之所以建立,不是因为生活或物质世界是简单的,而是因为不限定研究领域,就根本不能通过观察或实验取得进步。一旦得到观察或实验结果,就必须进行谨慎的整合。因此,如果在今天提出将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分门别类是不适当的,那将十分荒谬,不管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个别医生的医疗事故会导致什么后果。在现代医院里,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影响,关系密切,效果甚佳。另一方面,除非措施严格的简化方法仍然盛行,并且在任何要解决问题之时都有可能实施这种尝试性的简化,否则诊断法和治疗学领域就不可能取得什么进步。鲁弗斯·科尔(Rufus Cole)博士最近在一次关于医学进步的演讲中,无意识地从医学角度彻底打击了人类福利集团赖以成立的理论。他说,“微耳和十分明智地认识到,‘每一个医学系科都必须拥有自己的领域,必须自己开展研究工

作……病理学不能由生理学家来构建,治疗学不能由病理解剖学家来构建,医学不能由唯理论者来构建’”——科尔自己补充道:也不能由“化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来构建。这样,在确立了医学领域秩序的重要性之后,这一可敬的演说剩下的篇幅主要用于运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临床医学在进步过程中如何吸收和利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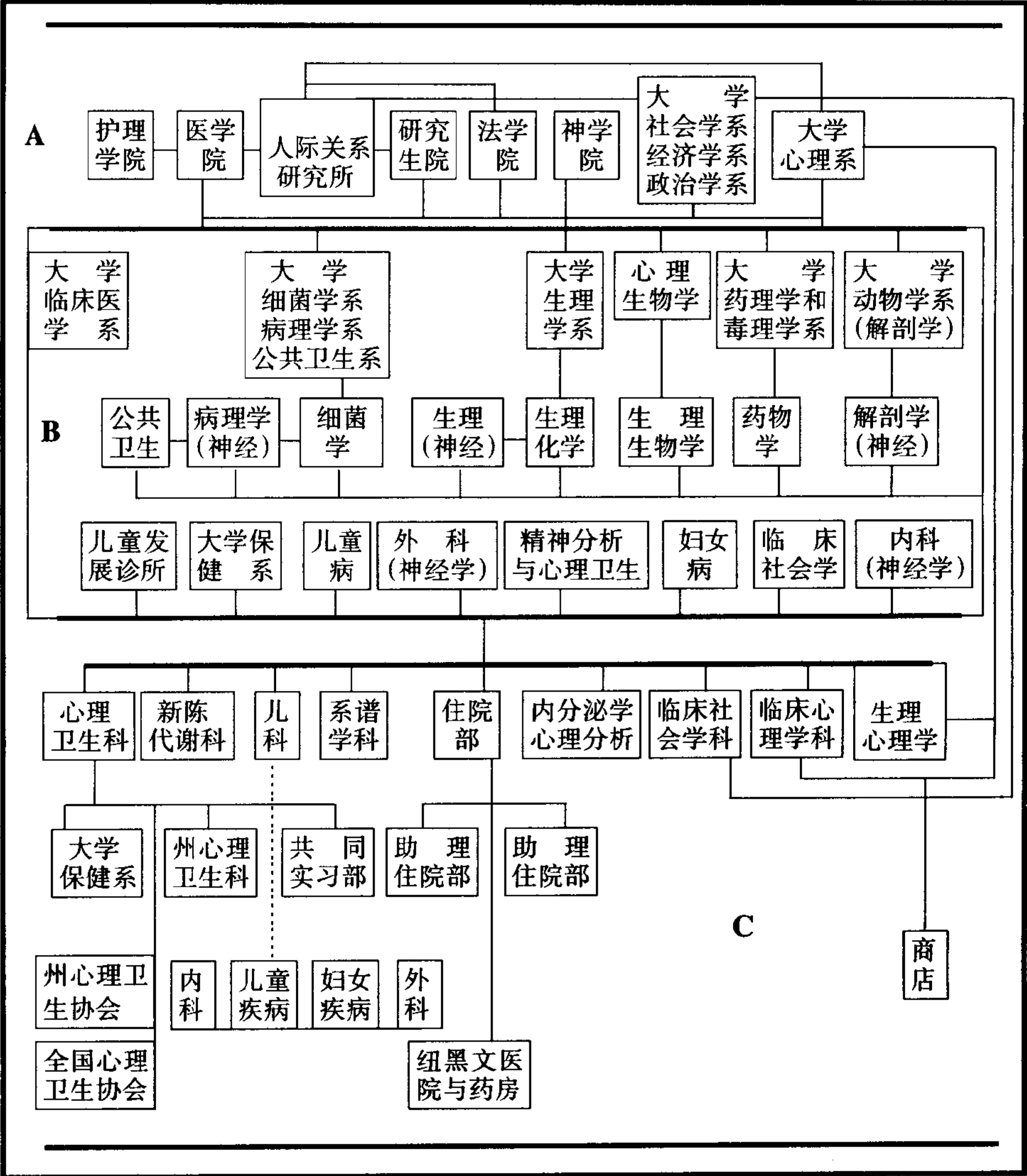
我并不认为法学教育或法学培训与医学做得一样好,但解决办法不在于切实地或强制性地废除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也不在于确立几个分支学科或图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于根据目的发展理智和灵活性。当需求和机会出现时,研究者既可以在广阔的领地自由漫游,也可以愉快地回到他们的狭小的探索区域。

事实上,有关设立耶鲁研究所的提议毫无新意——甚至算不上“整合”。每一所优秀的现代医院都既把自己的病人看做是社会问题,也把他们看做是个别的病例。如果一所医院或医学院的成员不关心社会和经济因素,解决办法不应是设立“信息交流中心”(clearing house),由它去考虑应受到重视却被忽视的种种因素,而是要拥有一批具有现代观点的新成员。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法学。霍姆斯(Holmes)法官和布兰代斯(Brandeis)法官对法学、经济学和哲学进行了“整合”。他们从什么地方获得他们的观点?不是在一个特别的人际关系研究所里。他们受过教育,接触广泛,并不断阅读、观察和探索。他们的观点通过法庭、法学专业和法学院不断扩散开来。他们的观点之所以最终得以确立,不是因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所,而在于法学院的教职员是由一些思想开通的人组

成。我们的困惑无法由制图员来消解(见下页图表)。因为如果人类福利集团要把法学包括在内,那么法学是否要把历史学拉进来?如果人类福利集团要把神学包括在内,神学难道不需要哲学?如果该集团需要生理化学,那么物理学、化学和数学会怎样呢?能否想像一个人类福利集团会省略教育学?如果所有这些都与图中所代表的各个学科或分支同样重要的内容都包括在内,我们会得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人类福利集团将完全等同于耶鲁大学!我们将完全回到我们的起点,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理念变得更加充实,却会因为楼房和资金的增加变得更为穷困。耶鲁大学会因为建立四拼八凑的集团而蒙受损失。正在自食其果的医学院院长写道:“医学院……有目的地缩小了自己的目标。”

(在下页图表里,由于表格空间所限,只有生物学方面和精神病学方面画得比较详细。很显然,图表的“A”部分所列出的任何学院的活动都可进行同样的概述。因此,“B”部分只列出对医学院有影响的系科。这些系科在研究生院也起作用。该部分位置较下面的一排显示的是大学临床医学系的科室。“C”部分显示的只是临床医学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科。其他科室如妇科、儿科或外科,都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概述。

该图表必然是不全面的,它只是以医学院和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系为例,表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里的活动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人际关系研究所是该集团的活动中心和联络机构。)



人类福利集团的组织

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最初承担的那些项目从形式上看被公认是尝试性的,它们既表明研究某些问题时必须实行“分科制”,也表明伴随着“打破障碍”的努力会出现混乱不堪与互不相关的局面。该研究所以一项源于一次问卷调查的失业问题研究为开端。而该项长达14页报告的研究并没有超出一个普通经济学系的范围。有什么必要撇开经济学系而将这类研究置于一个新的研究所之下?课题属于经济学,问题属于经济学,所参考的资料属于经济学。我向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指出这一事实并请求他们予以说明,但我希望讨论一下这一课题的约会要求却被他们婉言推脱了。

更糟的是对新泽西州1500个破产案例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追踪研究。当然,该问卷调查也说是“尝试性的”,无疑要作修正。但重要的事实是,调查本身明确分为三部分——各部分都是高度分科的:法律部分、经济部分和社会学部分。在社会学部分调查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

破产者是住在一套 apartment(公寓)里,一套 flat(公寓)里^①,还是出租房里?

有多少房间?

说明是否大多数房间位于通风道上。

睡眠时数?

他有焦虑倾向吗?

在他居住的街区里(同样地在他工作的街区里)有没有车库、剧院、墓地、汽车修理厂、马厩、警察局或台球房?

① 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够区分一套“apartment”与一套“flat”之间的差别。

不管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有多微妙,有谁会相信新泽西州破产者的困境会因为他的多少房间位于通风道上或他是否住在墓地附近而得到说明?难道需要靠这些事实来辨明他的生活水平?想像一下导致浪费与失败的根源,以及这种复杂圆滑之术对研究者的探索造成的阻碍吧!

人际关系研究所也忽视了真正的思想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征。通过特意安排的组织去促进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就像通过一个委员会去写一首诗或作一曲交响乐一样容易。但各个领域真正一流的思想家能够被人为地和机械地安排在一起进行合作研究吗?如果某些平庸之辈机械地将活动汇集于一个“信息交流中心”,有可能取得什么新成果吗?领导德国威廉皇帝学会的著名学者曾经写道:“科学,本质上和最终都是个人的事。任何发展都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有些工作会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有些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它们;还有些工作是如此复杂,必须进行劳动分工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近一些看,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一项范围更大的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以孤立的方式加以对待,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样,我们就面临一种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很大限制的困境:科学是个人的事,但科学问题决不能由一个人去解决。我们如何摆脱困境?我们不能将科学完全留给一个人的书房或实验室,我们也不能在一个公共工作室里进行科学研究。我们最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中心圈中开展工作,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使工作者保持非正式的接触,努力

取得系统性的进步。”^① 换句话说,太多的计划,太刻意的计划,太多的结合,太刻意的结合,会摧毁作为进步的最终基础的个人自由。知识和实践的进步既需要专门化和分科制,也需要自由便利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耶鲁大学校长对此不是没有认识的,但他认为新的研究所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②。我不能同意他的乐观的期望。思想史也不赞同这种看法。大学里轻松自由的交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刻意安排的合作则令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汗颜。它只能吸引平庸之辈,决不能吸引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学者。津瑟教授写道:“真正的学者——如果他是称职的,他一定是固执的——不会仅仅做一个佃户,而会开垦自己耕种的土地。”^③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人类福利集团的各项计划是失败的。医科学者的工作无休无止,法科学者的工作无休无止,在

① 哈纳克(A. Harnack):《论科学的广泛应用》(*Vom Grossbetrieb der Wissenschaft*),载《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ucher*),1905年,第193—194页。完成上述著述后,哈纳克教授就去世了。

② “首先,毫无疑问,目前现有各系的成员正在进行的个人研究或多或少永远存在。例如,心理学或社会学领域的一名学者不会因为他是该研究所的一名成员,就被要求中断或放弃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也不会因为某项研究对该研究所成员有重要意义,就会强迫他从事他毫无兴趣的研究工作,虽然从实际情况看,该研究所的成员总是在相互关系十分密切的领域中进行工作。但在另一方面,更充分地理解人的行为和社会组织,发展基础领域的合作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该研究所的明确目的。这类基础研究既可以由为完成课题的某项特定工作而临时兼职的学者进行,也可以完全由——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专任学者及其助手进行。该研究所目前计划首先进行研究的领域之一——家庭,可以提供一些说明。”安杰尔(James R. Angell):《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见《耶鲁大学校友周刊》,1929年4月29日。

③ 汉斯·津瑟(Hans Zinsser):《捍卫学术》,布朗大学论文集,布朗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12页。

在我看来,认为事实上有效地填补鸿沟会像纸上谈兵那么容易,那就太荒谬了。在这方面,就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资金预算会揭露老底。我说过,人际关系研究所的办公大楼主要用于“儿童发展”、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此它获得总数达 30 万美元的年度拨款;其他一切都属于医学方面,应被称为医科研究。据宣布,该项目需要的其他经费为:

人类福利集团资金需求汇总

妇科部	500 000 美元
外科部	600 000 美元
隔离部	450 000 美元
保密病人部追加	650 000 美元
医院捐赠	2000 000 美元
护理学院捐赠	1000 000 美元
临床社会学捐赠	1000 000 美元
积极健康捐赠	500 000 美元
医学教育研究捐赠	150 000 美元

仔细检查一下“资金需求”情况就可看到,在打破分科制问题上,尽管情况并不复杂,但耶鲁大学或许有意用语言修辞混淆视听^①。只有一项明显的创新建议被提了出来:设立临床社会学教授。但哪家优秀的医院会缺少社会工作者,并且

^① 该项计划的倡导者之一曾在《科学》杂志(1930年第71期第235—236页)写道:“对那些从研究、教学或治疗角度关心人类福利问题的大学组织而言,该研究所起着—个发电厂和装配厂的作用。”—个“发电厂”和—个“装配厂”!比喻的混乱与思想的混乱相对应。

让他们只工作不讲课呢？耶鲁大学需要的，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研究所，而是像哈纳克教授指出的，需要创造一种便于轻松自由地进行各种学术交流的环境，并通过招聘一流学者发展基础学科。这些学科包括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犯罪学等等。确实，这些学科本身已相当复杂，涉及解剖学、生理学、社会、经济和教育等各种因素。对一位精神病学家，是不加干涉地任由他根据情况进行他认为有价值的综合和简化对他帮助最大呢，还是让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涉及法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等的庞大组织的一员对他帮助最大呢？^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一个有关法学问题的研究所。在大学取消了法学部之后，一个独立的研究所应运而生。很好！那么研究所的计划是什么？“对广泛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研究，以期研究结果具有直接的价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的学者选择的研究课题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深刻的意义，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它们令作为“固执的个人”的真正的学者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们“具有直接的价值”。的确，正是罗兰（Rowland）、西尔维斯特（Sylvester）、吉尔德斯利夫、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Adams）和摩尔选择了研究结果有希望具有“直接的价值”的课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才变得非常著名和有影响！但这还不是一切。该研究所已发表了第一项成果——根据问卷反馈情况编辑的长达 200 余页的《法学研究现状（1928—1929 年）》

^① 耶鲁大学一位在科学上取得杰出成就的教授写道：“虽然我还缺乏勇气发表我的看法，但我认为——我相信这里其他许多人也认为——最近那项最庞大的发展计划追求的是十分模糊的目标。”

(*Current Research in Law*)。法学领域的“研究”事实上已成为已出版的或正打算出版的东西的代名词：因为该书列出了新版或修订版教科书，新版或修订版案例著作，法规汇集，法学评论文章，翻译著作，“黑人律师的尝试性发现”以及五花八门的报告等等。有一点一定会令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人文学者或医学科学家感到羡慕：法学研究者常常能够事先预言什么时候完成研究(6个月，一年或两年)，出版成果需要用多少张纸——如一卷、两卷，一本书，一篇论文，等等。

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和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设立了全国性的咨询委员会——它们都是由律师、医生、编辑和各种知名人士组成的奇怪的集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难道这两个研究所的学者对他们的目的是如此不确定，以至需要别人提供咨询？这样他们就能明确目的了吗？耶鲁大学咨询小组的成员被告知，他们既不需要花时间，也不需要作出努力；霍普金斯大学咨询小组的成员“将在2月份的晚餐上相聚”。我曾问过这两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他们设想自己该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一个答案是相同的。一些人则承认自己不知道，还有一位在霍普金斯大学咨询委员会任职的著名律师让我弄清楚后告诉他^①。事实上，任何大学都无权为了一种标新立异但令人怀疑的革新求助于公众的支持，摆出一些名人支持自己的计划，而这些名人实际上对此根本不了解或仅仅不愿意站出来表示反对，只是出于友好的

^① 耶鲁大学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写信给我，说他曾认为会要求自己提供咨询：“然而，没有人向我们请教。相反，最近的一次宣传却使我有了一种感觉，即大家不过是‘橱窗里的摆设’。”

目的将自己的名字借给这些计划。在一个未知领域开展特定的研究和革新应悄悄地进行,无需大张旗鼓进行宣传。耶鲁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这两个研究所为了宣传的目的,都通过报社或直接地通过大学自身发布了一系列“消息”。它们的一些说法是不成熟和不合理的。至少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应该搞有偿宣传。使霍普金斯大学自豪地成为各路英才的汇聚地的那位伟人,就没有对这些英才在此领域或彼领域所能取得的成就作过预言。

十七

我曾经说过,研究生院是美国大学中最值得称赞的部分,并且我引用了教师、实验室和图书馆的情况来支持这一说法。但由于人员过多、变化无常(尤其是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研究所的存在,研究生院现已面临被淹没的危险。50年前,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还是件有意义的事;今天,它实际上已失去意义。研究也一样。一代人以前,在霍普金斯大学或哈佛大学它指的是做研究或合作研究。毫无疑问,出版物数量的增加(尤其在美国和德国)已使研究水平下降。科尔引用丹麦生理学家克罗(Krogh)的话说,“进行了太多的实验和观察,出版了太多的实验和观察结果,而关于这些实验与观察的思考又太少”。克罗教授说的是“实验与观察”,对美国现在那些通过问卷调查进行的所谓“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克罗教授又会说些什么呢?这种问卷调查发出的信

函数以千计,许多信函常常被人扔进废纸篓。有时收回的问卷填得很随意,或者满纸批评意见。这些资料在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之后被整理成表,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要么是凭调查开始时的常识就显而易见的,要么是最终得不到可靠证据支持的。问卷不是一种科学的工作,它只是一种廉价、方便和快速获取信息资料或非信息(non-information)资料的方法——这两者的区别没有人会知道。在实验科学中,没有人尝试过问卷。在教育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里它也同样没有价值。因为同样的词对不同的人决不可能有同样的意义,没有办法预料到一个人是分析能力差呢还是实际上在开玩笑。因此,邮局决不能替代麻烦和思想;随着问卷的数量、复杂性和规模的与日俱增,它将成为越来越不合适的替代办法。人的问题只有通过捕获信息进行研究;而要捕获事实,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必须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追根寻源。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决不会向两个人问同样的问题,这样说不会太过分。因为每一个答案都是独特的,都可能提供一个能够揭开迄今尚未考虑到的研究源头的线索。^①

这样,我们就遇到了研究究竟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的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报告不是研究。检查不是研

^① 《学校评论》杂志上一位作者对问卷的缺陷作了清楚的表述:“社会科学领域处事谨慎的工作者依靠长期的经验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能充分依赖通过问卷收集证据。很少有人精于分析自己的经验,并善于对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自己形成现有的思维模式得出可靠的结论。”

究。女售货员、速记员、女招待、院长、破产者和诉讼当事人富有同情心的叙述,学校制度,教育系学生的喜怒哀乐,招生中怀疑学生是更爱父亲还是更爱母亲^①,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也都不会称之为研究。

那么,什么是研究?虽然学术合作也是一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不能被排斥在外^②,但研究不是通过雇用他人而是个人独自作出的静悄悄的和艰苦的努力。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多么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领域,必须在最严格的条件下建立控制权;可预言性如果切实存在,则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控制也好可预言性也好都是行不通的。有人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究竟是否属于科学。让我们假设它们是。正是由于它们有这样的缺陷,因此它们必须有更强的批判性而不是相反。纯粹的数据、资料 and 事实(也许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事实)的收集可能完全是毫无价值、劳民伤财的事情。诚然,有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有通过归纳法进行研究,但科学的本质要求研究者要有一种思想,虽然他坚持这种思想的方式可以十分灵活。如果事实与他的看法相反,他必须随

① 这个问题的确在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一名教师提供的问卷中问过当年的新生。

② 我强调的是学术合作,它不包括根据指令进行工作的技工。

时准备修正或放弃自己的想法。无休无止的计算决不会产生理论、原理或思想。目前从社会学系、教育系、社会科学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产生的很大一部分文献毫无意义,根本没有启发价值^①。因为这些文献十分肤浅,涉及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单凭经验就可得出的结果或依靠普通常识就可得出的结论,它们通常也毫无贡献可言。我已经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支持这种看法。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都是由大学、社会学大会和教育学大会等提供的^②。我并不是说物理科学

① 笔者曾在向全国社会学家会议宣读的一篇论文的结论部分指出:“我根本不清楚我们在权衡什么。”

② 我禁不住再提一些本书中未涉及到的学术论文:在1929年12月美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题为《面对面相互影响实验研究》;还有锡拉丘斯大学一位教授撰写的论文,题为《事故的易感性》;《家庭丧事论》——这是西北大学一位教授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还有《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个性问题》(芝加哥大学),《家庭生活发展中的诉讼技能》(图兰大学)。我愿意为罗彻斯特大学卡森(Cason)教授所作的题为《普通烦恼的起源与性质》的问卷研究颁奖。卡森教授在1929年9月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了这篇重要论文。经过几年的工作,他收集了21000种烦恼,但在发现有重复和许多假造烦恼的例子之后,他归纳总结了507种烦恼,并设计了分值从30—0的量表。“在我吃的食物里找到头发”,分值为26;“床很脏”,分值为28;“有蟑螂”,分值为24;“看见一个秃头”,分值为2,等等!该项“研究”已由心理学评论公司(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Company)作为单行本出版,售价3.25美元。

另一方面,荒唐之事不只出现在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在我撰写本书时,我收到了堪萨斯州立农学院的一篇部分完成的理科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棉背心的细菌内容分析》。从外在形式看,该论文符合学术性要求——有问题评述,文献评论,研究描述并以总结和结论作为结尾。论文里有不少制作精细的图表和表格并列出了详细参考文献。从其结论我简单地引一段话:“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内衣的确含有不同数量的微生物……热天时由于身体大量排汗,很可能导致微生物快速繁殖……对穿着时间长短不一的衣服所作的比较显示,细菌的数目随外衣穿着的时间长度而增加。”

和生物科学就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些缺乏训练却急于大胆地宣布“结果”的工作者,在这些学科领域也比比皆是。但至少在这些领域已创立了标准,并存在能够最终区分良莠——通常都很迅速——的有效机构。在社会科学领域尚未确立起这种批判性意识。那些学科带头人不但不能使其他人有所克制,自己也往往是成果经不起检验的学科“倡导者”。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表明,他们对科学工作是多么的不尊重。

十八

现在我来谈谈美国大学的“服务性”(service)活动,它们部分与本科生系科和研究生系科相分离,部分——如我已经指出的——与这两类系科或其中一类系科相互纠缠。我先请读者注意美国普遍存在的对知识、信息或培训的渴望——这种渴望部分是健康的和自发的,部分是不健康的和被引发的。一个民主国家希望懂得道理或不断进步,这当然是件好事。如果一帆风顺,变化可能是根本性的。如果只能维持现状,变化可能是肤浅的,但这仍是件好事,因为这一代人取得的肤浅的进步可能导致下一代人取得根本性的进步。美国充满了真正希望改善境遇的个人和家庭。它的松散型的制度结构使人们的精力和才能能够得到比在旧世界里更多的表现机会。因此,任何能够激发努力和培养才能的事情都是有利的——只要它对大学、有关个人和广大的社会来说利大于弊就行,否则

人的努力和才能就有可能得不到激发,或受到误导甚至压抑,或在较低的水平上以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

但正是因为一个美国人的升迁或变化相对容易,保持纯洁的标准和价值观在美国就显得非常重要。幼稚的和缺乏教养的人是很容易被愚弄的,现实应在最大程度上受到指摘。幼稚的和缺乏教养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信息、训练、诀窍与技巧等之间的区别。理想是受大学保护的。大学在理智上和道德上必然具有诚实性和一致性。如果它们带错路,它们决不能请求谅解。也许应该建立一些组织去创造和满足各种需求。例如,既然无可争议地存在着一个成人教育领域,或许就应该建立成人教育机构,灵活地适应社会对成人提出的不同需求。成人受教育者既具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和社会背景,又充满各种眼前的愿望。然而,成人教育必须达到较高的水平,然后大学才有理由注意它。如果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去利用民众的易受骗性,那么整个“服务性”组织都将面临人们严重的怀疑。

十九

为什么有些美国大学觉得自己有压力去开发“服务性”职能,甚至称自己为“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机构呢?理由有很多。州立大学不得不使自己显得“有用”——或者它们认为自己的确有用——以向平民大众证明它们有理由存在,因为它们的收入取决于州立法机关的拨款。这样,大批的人——

其中既有长住居民也有非长住人口——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或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并能从中获益的信息或培训。虽然正如我已强调并将继续强调的,这种东西根本不值得冠之以学院教育或大学教育的名称。受捐助院校认为它们必须是有用的,以鼓励校友、当地社区和普通公众捐赠财物,同时避免自己被指责为贵族化或趾高气扬,对普通百姓的需求漠不关心。我所说的“有用”,指的是直接的、立即的用处,因为美国人喜欢看到“结果”。我认为,美国公众——包括校友——的智力和慷慨之举因此而受到低估和损害。但不管这是真是假,大学有责任要承担,有职能要履行^①。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很有才能而且经验丰富的大学校长最近写信给我:“我倾向于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的确把教育视做商业财产,而不是把教育看做是进入理性经验的快乐的通道,或通晓人类历史精华的活动。他们不是把教育作为一种经验而是作为一种工具加以重视。可能美国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一切事物——不是从事物自身的理由,而总是出于某种眼前的利益,去看待教会、宗教、婚姻、旅行与和平。在我们美国人的生活中,未来的观念具有巨大的力量。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不关心过去,甚至如此不关心现在,而至多把它们看做是通向能够带来财富、动力与物质进步的明天的石阶。所有这些都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

^① 一所州立大学的新任校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头脑简单地”开始研究课程后发现,“课程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分化将导致它们最终不能得到大学方面的承认。那些专业院系由于开设了本属于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课程,从而变成贫瘠荒芜之地”。(引言稍经简化)

的影响。”^①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说明大学教授对待实践的正确态度。巴斯德是一位化学教授。在他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的过程中,法国的繁荣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幸福受到了许多问题的威胁,包括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巴斯德放下手头的工作,以专心研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完成这些工作后,他发表了研究结果,又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不管他的课题是研究家禽、酿酒还是化学,他的方法都是学术性的。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农户当顾问,也没有开设养蚕、酿酒或养鸡方面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这不是通常美国的大学提供服务的方式。当然,也有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对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感兴趣,并在取得了科学成果之后,将其通报世界,然后转向研究其他问题。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大学工作者。因此,我不是在恳求人们信奉经院主义或学究古董——而是在恳求人们运用判断,维持尊严,保持一种价值观和良好的心态。

因追求“服务性”抱负而导致某些大学出现的荒唐之事,在美国以外——有时在美国国内,甚至我怀疑有时在有内疚感的大学里——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让我先承认,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有些才华横溢的人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与大学有联系的年轻人也能学到一些有关他们生活于其中的

^① 引自布朗大学已故校长方斯(W. H. P. Faunce)1928年1月16日的来信。

世界的某些知识和某种教学技艺,只要他们能够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值得在大学中占一席之地的学科,针对那些成熟、能干和严肃的学习者开班授课。但我顺便提一下,下面这些条件是很重要的:学科必须是有重要价值的;学生必须是有能力的和严肃的;教师必须是高质量的,并受到严格的防止剥削的保护。就我对美国大学推广教育所了解的情况看,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大学没有一所遵守这些或其他可以查明的条件限制。的确是有一些严肃的学生,他们年复一年地认真学习,而且比起学院学生的正常到课率,他们的坚持不懈更有意义,但也有成千上万的流动学生在大学进进出出,一无所获。1928—1929 学年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了 12 000 名推广班学生,其中 10 000 余人是在所在地“长住的”,其余是非长住的。该大学确实开设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课程——如有关莎士比亚、经济学、现代语言和哲学等方面的课程。这种做法,如果遵守原则并起点较高,应该说是合理的,尽管分设一个独立的成人教育机构可能同样有利于甚至更有利于做好这项工作。但当哥伦比亚大学针对受到误导的学生开设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推广性课程,从而既迷惑了公众又贬低了自己的尊严时,人们对它的理想还能说些什么呢?这些稀奇古怪的课程包括“少年故事写作”、“批评性写作”、“杂志评论”、“论劝说”、“广告设计”、“实用广告创作”、“零售广告与促销”、“广告研究”、“小说创作中的个性问题”、“独幕剧创作”、“图书选择”、“说书”和“邮售与广告”等等。如果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做广告者正在不顾人们的需求、愿望和偿付能力,强迫几乎每个人都买同样的东西,破坏人们的个性,那就是美国。本来应该作为抵抗统一性的堡垒与捍卫理智与文化的正直性、独立性和

特异性大本营的哥伦比亚大学,却玩起了纯商业性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商人只关心利润,售货员则认为一份商科学业证书可以使自己获得加薪。这个集各种有意义和无意义事物于一身、奇怪且毫无价值的混合机构的主任,同时也是拉丁铭文学教授、大学推广部主任、商学院院长,以及我前面提到过的反动的布鲁克林医学院的院长。说到哥伦比亚大学对拉丁铭文学的价值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一个外行可以根据该教授的行政责任去大胆地猜测:他的推广班和函授类学生人数可能达到20000人,所涉科目无所不包,更不用说他还插手医学教育和商业教育的领域。

想要以哥伦比亚大学那种方式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大学,过的是一种变化不定的生活。例如,我提到过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故事影片”课程这样一个事实。但普通的故事影片已被“有声电影”所取代,结果我被告知这门课程已被取消,开设这门课程的女士现已去好莱坞,在那里她将花一年时间学习“新技术”。当这位女士离开好莱坞那块迷人的乐园,回到莫宁赛德高地的学术园林时,我猜想哥伦比亚大学将开设“有声电影”方面的课程。

这还不是一切。有些人不能去大学或大学的某个中心学习推广课程。他们可能完全没经历过“初步的学术性学习”。他们是否应被排除在外?绝对不行。这个群体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其中少数人希望为自己打发比较空虚的闲暇时间获得某些指导,更多的人则愿意“听信”那种迷人的广告,它向他们承诺花少量的钱就能快速获得教养或特殊的速成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用整版的报纸和期刊广告并加盖大学公章吸引他们(见下图)。(图中左下方原广告中的大学公章此处无法画

出,故以圆形代之。——译者注)

1929年12月1日,星期日

第13版

过去3年你有进步吗?

很少有人会对诚实的回答真正感到满意。直率地提出这一问题是为吸引在家学习的男女。成千上万的人认为他们应在家学习,但从付诸行动。这成千上万的人想提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素质,却又迟迟没有行动。他们知道他们应进步得更快些,更多地享受生活,但他们仍拖延不决。

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世界最好的教育机构之一,敦促您利用部分时间通过学习增长自己的能力以使明天的生活更美好。您可能整天繁忙而很少有时间直接用于学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有不少时间可用以掌握有益、快乐而有趣的知识。本大学提供的学科范围就很广泛。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提供以下大学层次科目的函授课程:

会 计	微积分	绘 画	投 资	人事管理
精算数学	化 学	经济学	意大利语	哲 学
代 数	儿童心理学	经济地理	青少年写作	电影剧本创作
美国政府	儿童文学	美国经济史	拉丁文	物理学
美国历史	基督教,古典语研究史	英语	图书馆业务	诗 歌
美国文学	社区组织	英国文学	文 学	政治学
应用语法	创 作	作文写作	美国、圣经、	葡萄牙语
天文学	戏剧、初级英	欧洲史	古典、比较、	心理学
银行业务	语、拼贴画、	金融	当代、英国、	商业心理学
《圣经》文学	法语、意大利	火灾保险	法国、希腊、	儿童心理学
希腊文《圣经	语、拉丁散	法 语	意大利、少	公共卫生
·新约》	文、抒情诗、	几何学	年、拉丁、	演说技巧
生物学	公共演说、	德 语	西班牙等各	宗教信仰
簿 记	西班牙语	管理学	类文学	罗曼语
植物学	现代小说	文 法	杂志文章写作	秘书事务研究
男童子军活动	成本会计	希腊文	人造煤气	短篇小说写作
预 算	几何制图	和声法	销售学	计算尺
企业管理	作 图	中学课程	数 学	社会学
商业英语	戏 剧	历 史	机械制图	西班牙语
商业法	创作、法语、	美国史、基		建筑制图
商业数学	意大利语	督教史、欧洲史		打 字
商业统计				世界文学等等,等等。
商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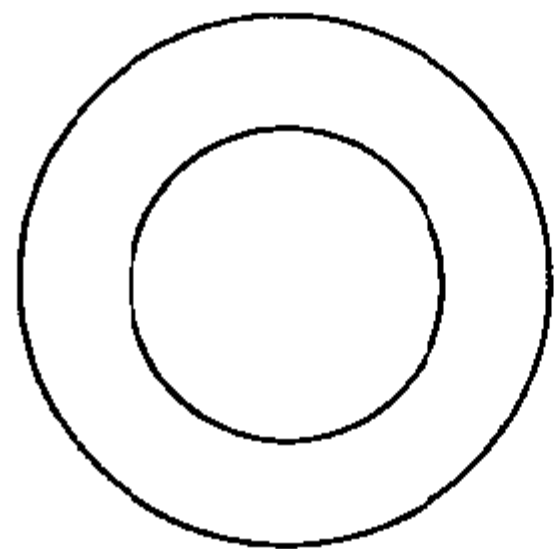
我们的教员为满足函授的特殊要求准备了上述课程。在为充分理解每门课程提供充足而必需的基本资料的同时,允许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学生的个别需要。每位注册学习哥伦比亚大学课程的人都由一位大学的教学人员进行个别指导。本大学将根据要求寄发有关函

授课程的所有信息。为您方便下附印刷表格一份。如果您愿意来信简要地谈谈您的教育兴趣,本校教员可为您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谈谈您对哪些课程感兴趣,即便这些课程未在此列也行。此外,本大学将不时对上述函授课程进行更新。

中学和大学预科课程

哥伦比亚函授部提供相当于4年中学学习的各类课程。不能从事课堂学习的人可获得

这种完整的中学或大学预科培训,我们将很高兴地根据您的要求,给您寄上我们的特别公告。



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函授部
纽约, N. Y.

____年____月____日

请寄有关哥伦比亚大学函授课程的全部信息。我对以下学科感兴趣:

姓名 _____
街道及门牌号 _____
城市 _____ 州 _____ 职业 _____

然而,不再现为了吸引天真的学生而加以巧妙设计的这种样板和安排,人们就无法客观地看待这种宣传材料^①。对

① 1929年发行的一份浮华的小册子写道,有7519人报名学习函授课程。“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关注,都被“个别地”加以分析。这一点可从这样一个统计数字看出来,即在上述人数中,有884人的年龄“尚未确定”,有794人以前的教育情况“尚未确定”,有1361人的职业“尚未确定”。在有关材料中,“个别化”的调子都是一成不变的。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有一份像传单一样供人随手取阅的活页资料包含以下内容:

哥伦比亚大学根据函授的特殊要求开设了供自学的正规大学课程。这种做法将一所著名大学的教育上的好处扩大到各地无法参加课堂学习的所有人身上。

个别教学。自学将得到经过认真设计的教学方法的指导,以使学生享受到各种好处,包括接受大学教师提供的大学层次的教学,全面的教学,连续不断的指导、建议和批评。

这些“在家自学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提供各种函授课程，“课程内容与住校生范围相同”，“教师都是(大学的)教职员”，尽管人们有理由怀疑大学任命这些教师有时是出于刊登广告之需要。1928—1929 学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的函授学生人数超过 7500 人，如果真像广告所说的那样所提供的教学都是“大学层次”的话，那么人数已相当可观。十分矛盾的是，函授不实行“学分制”。如果它是“大学水平”的，教师也都是正规的“大学教职员成员”，那么为什么不实行学分制呢？函授部“开设的课程”包括艺术、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经济学、数学等严肃的学科，但也包括“童子军领队的培养”、“初级英语写作”、“抒情诗创作”、“火灾保险”、“少年故事写作”、“杂志文章写作”、“哲学”、“电影剧本创作”、“初级打字”、“人造煤气”、“人事管理，包括如何推行人事政策”、“文书函件”等科目，甚至包括“如何在一封信中表现个性”、“商事论”和“艺术教学中视觉训练的克罗斯(A. K. Cross)方法”之类的专题。针对最后一个专题，教师从缅因州布斯贝港(Boothbay Harbor)写信说^①：

“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提供一种函授艺术的教学方法，依靠这种方法在家学习一个学时，比在艺术学院上几天学还有收获。”

还有：

“随信给你寄上一些有关一种新的视觉训练方法的资料。这种视觉训练方法将给儿童或成人、业

^① 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如果学生可以住在俄克拉何马州，教师为什么不可以从缅因州写信给他？但在这种情况下系主任如何维持“大学标准”呢？

余爱好者或艺术家以与自然景象同样的视觉和思维形象。达到这一目的既不需要学习理论,也不需要通过面授,而只需要通过运用一种简单的技巧确定透视和色彩的景象。”

对此也许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从缅因州那边开展工作的大学还可为询问者提供大量有关各种药的推荐书。我从中引述布法罗市 N. P. W 女士热情称赞她的丈夫勤奋好学的一段话:

“我的丈夫进展顺利,这是我嘴上说的,但我心里想的是,比起他刚开始跟你上课时的情况来,他现在的作品更具有艺术性了。10月份以来我们已支付了上课所需的全部费用。……我丈夫是个好人,但对为生计所迫而做的工作并不感到愉快。我相信这种情况不能使他的绘画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快乐。……上帝保佑你。”^①

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函授部可以不顾学生的年龄或以前的教育经历,通过函授的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大学层次的教学”,的确令人感到非常有趣。这种事情大学本部并不想做。相反,在大学本部,校方会通过使用心理测验和其他测验的方法淘汰不合适的人。很清楚,邮件也可以自动做到这一点。难道大学不能节省经费和简化工作,如果它只要求学生邮寄申请书,并以此取代确定合格者的心理测验和其他测验? 如果

^① 这些证明包括好几页。人们会感到奇怪,由该大学“正式教职员”中的一名成员挑选出来供散发所用的推荐书,会有那么多文理不通之处。

“从物质利益的观点看,大学确保所开设的许多课程是一项短期有利可图的投资。”见1930年10月份《通告》,第10页。

哥伦比亚大学能够从很远的地方为住在任何地方的申请者提供“大学层次”的教学,为什么还要在纽约市莫宁赛德高地维持一处耗资巨大的设施?

我们只能对哥伦比亚大学开展“服务”时所使用的商业化方法表示钦佩。校方在几家星期日出版的周报和一些月刊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并附上一张供任何希望得到信息的人填写的单子,请求未来的消费者“提出想学的科目,即使它们没被列在广告上也行”。在我的建议下,一位住在纽约州北部一个遥远偏僻、交通不便的村庄的女士填写了附单。之后不久,她要的小册子寄到了。后来,她收到了校方寄给她的一封信,向她保证她将受到校方给予的与“校本部学生”同样热情的关心——情况的确如此,虽然它与校方刻意给她的印象相距甚远。收到这封信后,她没有再回信。一所一心想提供“服务”的大学不会就此罢休。一封以“我们是否应保留您的名字”为开头的信件随之而来,信中对校方“迄今未能有幸接收您为学生”感到遗憾。该信接着写道: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公共服务机构,它希望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为您服务。同时,今年已有 75000 人来信询问这项工作,我们有限的设施已负担过重。”

现在我承认自己感到困惑:如果该大学已经负担过重,为什么它还要如此紧追不放?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无疑应有对思想负责的使命感,就像中世纪教会觉得自己对灵魂负有责任一样。决不能听任迷途儿童在黑暗中流浪——如果一种使该大学获利颇丰的函授课程能够为其提供照明的话。后来,由于焦急的校方未收到回信,一位“英俊的先生”骑着一辆漂

亮的摩托车出现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亲自“续访”美国股票推销员称之为“潜在主顾”的这位女士。我得到了那张制作精致的名片,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一行迷人的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喜欢安静的人必须慎重,不要轻易起好奇心并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索要有关函授课程的资料;即使警觉和努力可以帮他们的忙,他们也难以逃脱。函授学生还得到保证:“校方鼓励他们提出疑问和呈交难题。他们在一个问题方面得到的服务的价值常常远远超过所付的学费。函授学生的问题就像他们的医疗问题一样将得到个别对待。”

另一个朋友,在收到一份附有回执单的大学函授教学传单后,在我的要求下,签名寄回了回执单。结果从此她受到了狂轰滥炸。函授部显然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或者一个签名或地址对那些精通笔迹特点的人来说能够传达深刻的含义。不管怎样,之后不久她就收到了以下通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部

函 授

亲爱的学生:

好像有预感似的。每天我都收到许多询问信件,并常常从中挑选出一些需要回复的,我很高兴为您寄上这份小小的“表格”,并附上常规的空白约会单。

坦率地说,在某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真诚愿望和真实兴趣的表露。事实上这样的学生正是我们所欢迎的。

我希望您能看看那些支持通过函授方式充实人们思想的“开门”办学的信件。

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询问以及促使您提出询问的积极动机,我无疑将很快收到您寄回的附单,并要求在本办公室安排单独会谈。

愿候回音。

尽管她没有寄回回执单,事情却并未就此了结。几天后她又收到一封哀怨动情的呼吁信,信中表明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部
函授

亲爱的询问者:

小时候妈妈常让我跑腿,并会在我的手指上扎根细绳“以免”我“忘事”。

我们所有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容易忘事。这张小便条可以帮助提醒您:您有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函授充实思想的积极动机。

我们非常乐于为您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

现在请您将积极动机转化为即时行动,盼早日收到您的面谈要求。

我们再附上一张约会单。也许前一张您丢失了。请不要耽误,还有其他人等着呢。

真有其他人在等待吗？有多少其他人？为了寄通知追踪他们，用一些新奇的技巧强行引起他们的注意，哥伦比亚大学要在询问者名册上将他们保存多久？在我撰写本书之时，一位三年以前换了住址的朋友还收到寄往他旧住址的呼吁信！如果有其他人在等待，一所名牌大学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个偶尔碰到的素不相识者承担如此繁重的责任呢？答案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教育机构而享受免税待遇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经商，它有教育可供“出售”。

事情到此地步仍未结束。既然对理智的呼吁没有反应，那么只好寄希望于良心发现，正如我的朋友在一周后收到的有关来函所表明的那样：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部

函 授

最后通知

亲爱的拖欠者：

您是否欠我们什么东西？昨天已于昨晚消逝，留下许多欠债。

耶鲁大学的费尔普斯教授说过：“最持久的快乐是精神的快乐，最幸福的人是具有最令人感兴趣的思想的人。”

因此，我们很高兴指出您在追求完善方面的兴趣，并寄给您一些资料手册，敦促您接受我们的咨询服务。

我们一直未收到您的回信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您本人和我们是否都应该得到某种回应？是什么使您忽略了我们的好意？

让我们尽早确定约会时间，或至少您写一句话告诉我们您对这件最重要的事情缺少兴趣。

收到这封呼吁信的人最后回信表明自己没有时间并缺少兴趣。哥伦比亚大学是否到此为止，放弃追踪了呢？根本没有。电话开始起作用了。“拖欠者”仍不接受劝告，但“教授”留下了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以备她改变主意时所用。

热心于在这个危机时代提供服务的哥伦比亚大学此时是不能休息的。此后不久，它通过邮件散发了一份传单，题目为《告投资者书》。收信者被告知，“3月15日是投资者的新年元旦”。为什么？因为“返回给他的所得税使他可以回顾自己当前的状况和过去的成绩。它使他注意自己的收入，记住自己的损失。它使他下决心在当年进一步扩大利润，弥补损失。……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基本原理知识基础上的投资者通常才能在一年后的3月15日拿出一张良好的益损表。那些根据所谓‘预言’或行情预测，或根据表面的资料采取行动的人决不能得到这样的保证。哥伦比亚大学的投资学课程在基础原理方面很有优势。……它是很实用的课程，由经验丰富的专家编写教材并负责讲授。它是一项时新的服务，完成于1929年底，1930年2月又作了调整。它为投资者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十余年函授教学的经验。已有1000余名投资者入学。……也许本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还有什么“服务”是哥伦比亚大学不敢提供的？从这一全国性大都市的中心，该大学宣布准备组建一个农村生活研究所。它开设了一门有关经销药品的课程，涉及的具体专题包括“个体农村药店”和“杂货铺”。当然，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必须开设“建筑管理”方面的课程，其中分设的专题有特别注意“看门人服务”的“办公大楼”、“公寓”、“统层楼”、“金融楼”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所处的纽约市几乎没有一寸空地，哥伦比亚大学为表现出一所现代大学对环境的适应性，专为长住该市的推广部学生开设了“实用家禽饲养”、“养蜂”和“居家蔬菜与水果种植”方面的课程。难怪它还建议系统开设部分时间制的“火灾保险”课程，以及开设为期两周的研讨班，为商界领导人讨论“高度繁荣所产生的问题”提供场所。后者是两年前宣布的。鉴于近来的投资恐慌，该“研讨班”现在不妨用两周时间将注意力转向方向正好相反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确也这样做了。该大学紧随最近的股票市场危机，散发了以下印刷传单。

哥伦比亚大学 新设投资函授课程通告

现在是投资者举棋不定的日子。

过去几年是黄金岁月。各种债券的市场价格几乎都在持续上扬，结果几乎大家都必然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赚钱。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过去几周的事变证明，价格既会上扬，也会下跌。这些事变使投资者深切认识到这样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真相，即一个人在市场上既

会成功,也会失败。

这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时代。很少有投资者真正知道是该买债券还是该卖债券,抑或应静观其变。很少有投资者真正知道未来能够获利的领域是普通股还是债券。

……

也许您有兴趣了解这门课程的更多情况。如果是这样,请寄回随通告附上的明信片。

当然,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服务”大部分不是教育。没有一所大学能够通过“推广”或函授或其他任何方式对2万名学生进行教育。整个事情都是做买卖,而不是教育;通过这项商业活动,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就赢利30万美元^①!

尽管存在着我所揭露的哗众取宠的行为,我还是要重复一句,哥伦比亚大学也在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从事严肃的工作,拥有认真的学生。但这不说明问题。在一个头脑发昏、大师匮乏、缺少标准和往四处插手的大学里,文化不可能繁荣。要美国全体公众都很开明也许永远做不到。美国对文明的贡献不是取决于全体公众,而是取决于少数志同道合、富有敬业精神的天才。这少数天才需要得到保护,不受庸人与骗子的冲击。未能对他们尽到这一责任的大学,必须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做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应具有某种意义,但当注册学习我所列举的上述课程的学生说“我是一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时,当大学的《年度报告》将他们计入学生总数时,

^① 见1929年《财务主任报告》。

“大学生”一词又具有什么意义？哥伦比亚大学这不是在构建美国文化的同时贬低美国文化吗？它在响应某种自发的需求还是在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

二十

芝加哥大学也像哥伦比亚大学一样急于提供“服务”，它的函授部依靠泛滥成灾、使人误入歧途的广告、信件和传单等各种手段，工作也开展得同样“有效”。下列广告可以被看做是争取学生运动的发令枪：

在 家 中

发 展 能 力

开始、坚持、实现；使您终身受教育；通过 450 种课程
为取得博士学位挣学分。

芝加哥大学

函 授

查询本广告请寄函至

伊利诺伊州爱丽丝·霍尔大街 329 号芝加哥大学

“我校函授课程主要面向学生实行优惠。”但事实上，“它

们为许多行业需求和水平差别极大的人提供帮助”。所有索要资料者都可收到一封信,确保他们“将发现有些课程是有用的”——必用之词。校方进一步向他们保证,通过函授他们可以得到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得到的一半学分。“本校的课程”还“允许进行最大限度的面授教学”。芝加哥大学也像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对极其偶然的询问者非常牵挂:“我们能否早日听到您的回音?”如果该大学听不到回音,它就不停地寄美术明信片 and 打印信件,提醒对方“回忆双方以前的通信”。此外,该大学似乎对成本较高的校本部教学表现出一种相当谦卑的看法,因为它散发的一份小册子里,校方引用一名对校本部相当了解的函授部学生的话说:“我发现函授方式在几个方面优于住校学习。……函授方式比住校学习能更大程度地实现真正的教育理想。比较一下函授条件下的阅读、思考和有条理地记笔记与坐在课堂中边听课边记笔记的情景,这种课可能组织得不错,但往往讲解得很差。”另一名学生说:“这种课程的教材比我所赞赏的许多科目的课堂教学学得更透彻。”还有一名学生说:“比较一下这门函授主修科目所具有的价值与我最近住校学习的主修科目的价值,我认为我‘擅长于’按照你们组织的方式进行学习。”更有一名学生说:“芝加哥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全美国最好的。一个人必须交货,但他收到的货也远远多于我所知道的其他大学的同类系。”看哥伦比亚大学和州立大学还敢不敢站出来应战!

同时,因为急需收入与办公用房,芝加哥大学——如果它的通告说的是真的话——也像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准备将它的宿舍改成收费公寓,并将一些实验室改成供函授课程所用的办公室。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包括大量内容充实的学

科,避免了哥伦比亚大学极其庸俗不堪的一些做法。但即使如此,它的课程里仍有不少是相当荒谬的。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来:“广告与销售心理学”、“投资者指导”、“高级设计”、“建筑制图”、“(社会学)社会调查”、“服装设计”、“校对术”、“文字编辑”、“做诗法”、“编剧与编剧技巧”、“有机化学,包括脂肪族系与芳香族系”、“图书馆学的技术方法”(原文如此!)、“儿童教育”,等等;更极端的还有“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些课程可使“学生彻底掌握(所学语言的)阅读与写作”;而要学法语的“语音知识”,可指导学生听“法语唱片和特殊的语音教材”。因此,函授课程可说是用途广泛。在一个邮费低廉、浮夸之风泛滥的国家里,函授课程很可能大量地冒出来。但芝加哥大学的声望被用来欺骗缺乏训练的善良之辈,使他们以为他们接受的是中学教育或学院教育——这种做法真是丑恶至极。公正地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中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对此是深恶痛绝的。

二十一

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甚为得意地认为——在我看来并无根据——它们为依靠立法机构提供资助的不幸者树立了榜样^①。如果像这两所大学那样实力雄厚的私立大学都有

^① “榜样”有好有坏。安·阿伯尔(Ann Arbor)的《每日新闻》(1930年8月25日)宣布,密执安大学将“仿照哥伦比亚大学计划的模式开设函授课程”。

过失的话,那么人们对州立大学所做的任何事情也就都不会感到惊讶了。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从“初等学校和文法学校教育”到“通过累积学分攻读学位”的几乎各个层次的大学函授课程。学习的机会相当广泛,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发音对函授学生会非常容易!),“比较文学”,“工程学(民用工程、电器工程、结构工程和机械工程)”,“自然科学”,“商业学”,“数学”,“图书馆管理方法”,“演讲”,“药学”,“体育”,等等。在这些总的标题下,还包括许多特别的课程,如“零售广告”、“海报创作”、“职业指导”、“商业算术”、“化铁炉实践”、“未来母亲”、“患病儿童”、“乡村学校烹调法”、“缝纫”、“小学图书馆管理方法”、“社区音乐”、“开处方实习”、“演说词创作”、“辩论”以及“演讲教学的问题”。州立大学的服务也不限于一般性的函授教学或“研讨班”。在某种程度上,教师与商业界、企业界、卫生界或慈善界的交往对他们来说是更为至关重要的。在那种程度上——也只有在那种程度上——这种交往才会发生。但因为大学的职能是增进知识和培养人才,因此,如果交往的增加和责任的扩大超出了我所指出的程度,这些交往和责任就会有损于大学,因此也会有损于社会。这种有害的和破坏性的发展的例子举不胜举;不管有没有报酬,不管付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如何,当大学教授完全听命于企业、会议和政府时,这种情况在受捐赠院校就会产生;在那些依靠税收资助的院校里,当经济学家受到心急的公司干扰时,当化学家和农学家被迫对牲畜和庄稼承担一种有私利而非科学的责任时,当教育专家被要求从事与解决国家或地方教育问题有关的服务时,这种情况或许更容易产生,并更具有灾难性。我承认分界线很难划定。但同时大学应该通过教

训与榜样使公众相信,如果公众将大学主要作为一个服务机构加以对待,从长远的眼光看,公众将招损而不是受益。无论如何,像俄亥俄、密执安和威斯康星这样的大学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它们插手根本不属于大学的实际责任事实上阻碍了适当的政府机构的发展。它们不应该什么都做,而应该尽量少做——应培养人才去承担大学目前的活动本身的确不能开展的工作。

经询问,我发现对承担“服务”重任的人员的评价存在不同看法。某大学的函授部主任曾向我保证,承担函授工作的都是各系里推荐的“最优秀的年轻人”。但同一所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则向我保证说,没有任何一位“一流人才”被分派去担任此项工作:“我们推荐的是三流的、需要其他收入补偿低薪的人。”这种观点上的不同不论对能力较强、热爱学习的学生还是对仅仅作为精明广告的牺牲品的学生来说,都不无意义。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怀疑,即美国教育中对“学分”的狂热的确代表了人们对获得教育的渴望,或者表明学院和大学在努力“出售教育”^①——值不值得做并不重要,只要能获利

^① 这一说法实际上出自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理事会下属特别课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29年6月5日):“他们(明显指教师)中有一位一开始就以这样一种假设表明了他的看法,即学院是出售教育的商业公司。”对这种称赞性的看法,《纽约时报》的社论表示异议:“它(指三一学院)是一个文化的机构,它的职能不是商业性的。”但上述报告讲出了真话——虽然并不全部是真话。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各州立大学和其他许多同样著名、同样重要或不那么著名、不那么重要的高等院校都在“出售教育”;但它们的商业化程度与声誉好的商业性机构相比要低一些,因为“货物”如与广告的条件不符,后者必须将货款退回购买者。我们那些曾“出售”过“宗教”的大学还明显未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样,可能超越大学的教会也明显未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有一天“货币兑换器”会被赶出或轰出大学殿堂。

就行。1929年12月9日,美国学院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常务秘书致信每一位“亲爱的同事”——涉及的学院数逾四百所,大意是:正在筹划将“各学院形式多样的宣传材料的展览会”作为“年会的一个特色”。他希望获得“既有学院通常的宣传价值又有利于筹集资金、吸收成员和促进实现良好愿望的代表性宣传材料”。他还希望得到的其他材料包括典型的“新闻报道,包括故事选萃”、“市内有轨电车招贴画”、“演说精选”等等。美国老百姓追求教育的愿望是如此真切和自然,以致大学抱怨说它们已被这种需求所淹没^①!

二十二

尽管上述话题应就此打住,但有一个人们尚未注意到的荒谬至极的矛盾现象仍值得一评。目前有关学院教育的文献都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接触的重要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学院教育的失败归因于校园内的大众教育(mass-education)现象。人们经常回忆起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的名言:理想的学院是一段木料,一头是教师,一头是学生。威尔逊校长在普林斯顿引进导师制(The Preceptorial System),哈佛和斯沃索莫尔引进荣誉学位制,哈佛推行重在个别指导的导师

^① 这一组织包括美国的422所高等院校,其中有斯坦福、耶鲁、芝加哥、阿默斯特、威廉姆斯、哈佛、拉德克利夫、达特茅斯、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乃尔、布林莫尔、斯沃索莫尔和范德比尔特等院校。

制(The Tutorial System)——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建立学生和教师双方密切的和非正式的联系。如果被攻击的困难的确存在——没有人会对这一事实产生争议——那么一个人应如何评价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向成千上万的人散发广告,宣传通过函授可以获得同样优良的教育——一种“大学层次”的教育——这样一种做法?美国的问题不是存在崇尚实利主义的典型的小城镇观念,这种观念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美国的致命伤在于知识界不能和不愿对真正的文化与浅薄的东西作出区分,在于将本应展示学术优势的机构降格为专卖药贩子的水平。同样,不仅美国有巴比特^①,所有国家都有巴比特。但主要大学的校长普遍是巴比特式的人物却是一个美国独有的现象。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随意地对待要求严格的领导职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建时的情况,加州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工作的情况,斯沃索莫尔改组时的情况,就是明证。但历史——甚至是不久前的历史——的教训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这一时代著名的大学首脑抛在脑后。诚然,大学也许太遥远,太封闭,太学术化。但美国大学仍需要理解:只有服从于教育的职能,只有在一个高度的、无私利性的理智水平上,参与才会是有益的^②。

① 指庸俗、短视和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译者注

② 在我所提到的美国主要大学中,有一所大学,即普林斯顿——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所学院,尽管在它的一些系科内正在形成重要的研究生工作小组——没有开展我所提到的任何一类“服务性”活动;耶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一所学院——也基本上未从事这类“服务性”活动,并且“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的雄心”。(引自校长来函)

二十三

在美国许多大学从事的“服务性”活动中,我将某些“学院”或“系科”划入职业性一类,如家政科学或家务技术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图书馆学或图书馆管理员学院、验光配镜技术学院、旅馆管理学院等等,它们中应没有一个属于大学。限于篇幅,我无法分别全面地对这些学院进行讨论,但我至少可以提出将它们纳入现代大学是否合适的问题,并解释我为什么有疑虑——我克制着让自己使用一个温婉的词。

让我们暂且先看看家政科学学院。人们感到奇怪,“科学”一词对开办或容忍家政科学院系的大学当局究竟意味着什么。家政系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各州立大学中像黎巴嫩雪松般大量涌现。尽管有关大学及其医学院很难聘请到生物化学学科的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家政科学或家政技术系科却吹嘘拥有研究营养问题的学者,并不分对象地既为撰写内衣方面问题的学生授予高级学位(文学士、哲学博士),也为撰写生理化学领域中有关课题的学生颁授高级学位。课程表上酒席承办课和食品与营养研究课并排而立。在声望卓著、地位重要的学术系科和医学系科对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的迫切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认为上述系科能够拥有优秀教师或优秀学生,当然是荒唐可笑的。芝加哥大学的家庭经济与家政管理系也毫不示弱,为下述论文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学童的基础新陈代谢与尿肌酸酐,肌

酸与尿酸研究》、《一种简单混合食品的消化系数与特定机能活动：不同类型者之对照研究》、《不同收入水平的服装需求差异：消费者行为之研究》；为下列论文授予文学士学位：《沸冰摄相研究》、《袜类广告的趋势》、《对削皮刀削土豆的时间与材料浪费状况分析》、《煎火腿的控制条件研究》、《妇女服装邮购研究》、《妇女内衣时尚周期研究》，最后，还有《四种洗盘方法的时间与动作比较》。形式和题目都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例如，上述最后一篇论文的扉页是这样的：

芝加哥大学

四种洗盘方法的时间与动作比较

呈交研究生部

申请文学士学位之论文

不止是扉页在形式上与科学研究十分相像。该论文包括：导论，文献评论，研究目的，局限性，步骤与方法，结果与比较，结论与建议，结论（又一个！），参考文献。“从餐桌收走盘子放入茶具车”及类似的动作都被计时和计数。洗盘子时，计数并被列入表格的动作有“走近炉子，拿起茶壶，揭开炉盖”，“走到洗涤池，打开热水龙头”，“把热水龙头关小”，“走到炉子处，换盖子，打开燃料开关”，“走近洗涤池”等等。各种表格与诸如“弯腰和提物使人感到疲劳”之类的解释性评论占了一百多页打印纸。为寻找论文题目，教师们绞尽脑汁，对家庭和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搜索，以便获得零星的启发。因此，关

于洗盘子的研究结论也许不如它的启示意义那么重要。一个有责任寻找研究课题的系主任可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喜形于色,即同样的“职业分析”方法可以运用到属于家庭主妇活动的一部分的“所有三百余道工序”中,这样近期就有三百余个论文题目好做。这三百余道工序每一道可以再衍生多少论文,一个专业数学家可能都无法想像。当然,忙于自己活计的年轻家庭主妇不但必须阅读这篇论洗盘子的论文并学会应用,而且还必须阅读其他三百余篇论文再加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论文并学会应用。如果她每天读一篇论文,她将要忙一年;对她来说幸运的是,上述那篇论洗盘子的论文尚未付印。

上述情况为“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因为如果各种洗盘子方法的相对优点可以成为得到学术认可与开支的有价值的课题,那么做冰淇淋、调配软饮料——或硬饮料等——为什么不可以?如果男士内衣里的细菌可以成为课题,男士袜子里的细菌或每一件男士与女士服装里的细菌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课题?可惜的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相比,服装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因此该领域的范围比较有限。科学的征服将很快使研究无事可做——这种担心在新的亚历山大们面前荡然无存,因为他们已经发现由鸡毛蒜皮、雕虫小技组成的无限世界有待征服!

我不想给人以轻率地谈论芝加哥大学家庭经济与家务管理系的印象。由于充分认识到我不是一个厨师、化学家或女装裁缝这一事实,我将芝加哥大学的论文一览表送交生物化学和营养学领域两位著名权威审阅。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并发表了深邃的见解。化学家写道:

“我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标准对所有系科应是一样的。在所列举的问题中,也许只有两个需要使用达到申请理科博士学位最低要求的方法。”

另一位写道:

“这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即整个事情十分浅薄,课题的设计仅仅是因为有必要写篇论文以争取获得学位。通过一项《产科医院 200 个病例的统计分析》,你得不到有关‘母乳喂养的程度’这一问题的任何收获。同样,通过研究《260 个学前儿童的喜好与厌恶》,你也不会有任何长进。还有如《炸面饼圈所用脂油的脂肪常数变化》,为什么选炸面饼圈?就我的看法而言,我希望这一研究不会有任何结果,否则,合乎逻辑的事接下去就要研究与炸香蕉、炸茄子、炸牡蛎等有关的同样结果。整件事情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机器的时代和一个批量生产的时代。”

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该大学通过其师范学院开设的课程包括“实验与比较烹饪法”,通过学习可获得学分的课程包括“茶室烹调法”^①、“饮食礼仪与好客”和“家庭洗衣原理”。博士学位论文的课题则包括《根据不同烹饪方法进行炉灶温度标准化的一些尝试》及《若干日常低

^① 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一门很有吸引力的课程——“茶室与餐厅管理”,因为“需要安排一次去芝加哥的考察旅行”。

糖糖果研究》^①。由一名讲师撰写并由一名教授作序的《烹饪与相关学科近期研究摘要》一文在第一部分讨论了“冷藏”^②。我引用以下几段话作为该“研究”科学深度的见证：

“冷藏的理论指的是将一个物体的温度降低到低于周围环境的温度。”

“经常开关食品柜的门会增加冰的消耗并导致食品柜温度的暂时上升。”

“一个好的冷柜具有满足保存食品所需的温度。”

第二部分同一系列的《研究摘要》论述的是“冰淇淋”。这一部分告诉期待中的公众，就“糖的影响”而言，糖在冰淇淋中的首要功能是增加甜度^③。文中没有谈到第二和第三种功能。我必须记住要提醒大家注意支撑这些深奥论据的参考文献——在被引的81项资料中，有许多属于广告！

我承认美国需要训练一些人从事烹饪、制衣和理家的工作，需要训练一些人去教授这些科目，虽然我强烈地认为依靠一种基础良好的通识教育——即使是有限的——所培养的厨师和烹饪教员，将优于依靠上述那些不成熟的和狭隘的特定工作所培养的厨师和烹饪教员。但无论如何，什么人需要受

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家庭经济科目的活动只限于“家庭经济新趋势（粗体符号为本人所加）概论，包括食品与烹饪、服装与纺织品、家庭管理与照看儿童方面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计划”。如果“趋势”一词从学术词汇中删去，人们不知道美国高等教育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不知道因此可以节省多少无用的劳动和开支。

② 见《师范学院档案》，1930年1月第320—331页。

③ 见《师范学院档案》，1930年2月第472页。

培训,什么人提供培训,或者培训科目本身是否具有大学程度,都不是由文化的或实用的观点也不是由科学的观点来决定的。由毕业于经验性学校的教师负责管理并具有费用低廉、朴实无华特点的单独设立的培训机构,将比目前妨碍许多大学发展的那些傲慢自负的机构更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一旦类似“扩展”教育或“函授”教育这样的活动回归至适当的位置,科学和文化的正确观念变得确定并获得权威的可能性就更大。事实上,今天的儿童在小学“学习”家政学,在中学又“学习”家政学,现在我们发现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的学生还在“学习”家政学。他们最终真正能做什么?美国中西部两所主要大学面对学校常年赤字的困境,发现找不到一个能够处理学校的食品问题并能够平衡预算的家政学博士。其中一所大学将处理这一问题的任务交给一位女士,她虽然只受过普通教育,但成功地管理过一所供膳食的寄宿舍。结果很快出来了:该校的赤字立即消失,学生用膳状况也明显得到改善。另一所同样感到失望的大学结果也撇开家政学毕业生,转而将问题交给一位希望在该大学从事管理工作的年轻的法语教师。第一年年终时,有关系科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赢利近五万美元。因此,可以说,为了毫无价值和不切实际的“训练”——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训练——各学校、学院和大学抛弃了真正进行教育的机会。如果对小学、中学和学院农学教学的状况进行调查,就会发现经费浪费更多而具体成果更少。真实的情况是,受过教育的妇女面对突然冒出来的家政问题,会很高兴和很轻松地加以解决。乔治·赫伯特·帕尔默(George Herbert Palmer)在描写其夫人生平的书中,用一段话对全书作了总结:

“在生活中所有这些家务事方面,她都以愉快的心情对待之,因而不仅成为比较易学的‘家政学’方面的快乐行家,而且成为比较精妙的家政艺术方面的快乐行家。在别的地方通过训练获得的能力很快适应了家庭的需要,被用于做她所爱做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她曾因糟糕的面包老是与新厨娘发生争执。在听了一阵对方常用的怪烤炉、面粉和发面饼不好的理由之后,她自己走进了厨房并亲手做出了一条极好的面包。惊讶的布里奇特用一个警句对这件事作了总结,这个警句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这就是教育的意义——使你能够做你以前从未做过的事。’”^①

教育理论从未得到过如此深刻透彻的表述。布里奇特的话可以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推荐给商学院、新闻学院和家政学院的负责人。而美国确有像“布里奇特”一样聪明的学院院长。英语教授、拉丁语教授或哲学教授一旦担任了院长职务,就不得不尽快着手处理下水道、发电房、食品、体育运动、房顶渗漏、新建楼房和教育改革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依靠训练有素的头脑,他们轻松、合理而愉快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① 乔治·赫伯特·帕尔默:《艾丽斯·弗里曼·帕尔默的生平》,波士顿,1908年版,第225—226页。

二十四

与大学烹饪院系和服装院系同类的,我认为还有大学新闻学院,其教师通常由记者组成。他们中有的已退休,有的则还很活跃,担任着日报夜班编辑、总编辑、图书编辑或戏剧评论家。根据这些事实,人们就可以猜测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水平。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类课程需要学四年,前两年安排学院教育的常规内容,即属于学术性中学范围的内容。为未来年轻记者提供的这一层次的教育机会是高质量的,如果他聪明、运气好、能干并且勤奋,他可以在英语、现代语言、政治学或经济学领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从第三年开始,即从新闻学院第一年这一沉闷的时期开始,“专业”课程就只与以下名称有关了:“新闻实践”、“新闻兴趣心理学”、“新闻报道”、“诽谤法”、“特写写作”;“毕业生”的课程则为“图书评论”、“戏剧评论”和“星期日副刊编辑”等。甚至还有人建议再设一门课程,教学生掌握利用新闻业和其他媒体传播新闻报道和特写文章的技巧——这门课程甚至新闻界也提出反对,理由是它有损新闻界的尊严,会失去人们的信任。除了技巧性课程之外,校方还点缀性地开设了一些选修课,如“现代欧洲小说”、“国际关系原理”等。面对这种课程计划,学生往往疑窦丛生。

几年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学生写道:“在我读书时,院方根本不开设对新闻业进行批判性或建设性评价的课程。一个人若要尝试将新闻业作为一个既肩负责任

又充满机会的社会组织来看待,就会使教师皱起眉头。除两位教师(其中一位现任院长)之外,其他教师都是‘强硬’的现职或退休新闻记者。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只要你有技能,你就能在其中找到一份工作。‘博学者’不受欢迎。在这个年代你必须受过‘训练’才能生存……新闻学院导致这一专业一成不变。”

学业结束时,学生通常获得文学士学位。但只要再学一年,并在学习结束时提交一篇“论述某一新闻专题、篇幅不小于15000字的内容充实的文章”,学生就有资格申请高一级的理学硕士学位。

威斯康星大学比哥伦比亚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体现现代性,就必须专门化,因此威斯康星大学提出了五套课程:第一套供日报组学生学习,第二套供社区报组学生学习,第三套供广告组学生学习,第四套供杂志组学生学习,最后一套供新闻专业师范生学习!

结果,假借一门专业之名,教授些一名受过教育或比较聪明的青年通过“在岗”工作就能够迅速掌握的实际技能,从而已经稀释了的教育被进一步稀释。当然,报社的训练和价值观的形成只是时间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学生还写道:“我十分肯定,掌握那种技巧不需要两年,并且我很怀疑‘离岗’学习能否掌握那种技巧。”对我提请读者注意的种种荒唐做法,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评论。新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很值得纳入一个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范围。但是新闻仍不是法学和医学意义上的专业。新闻学院的“专业”训练完全打断了人在最重要的时期接受真正教育的可能性。可以肯定,虚假的“专业”训练决不能弥补在历史学、政

治学、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未受到充实的教育的损失。

二十五

本科生层次的商学院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①、各州立大学和其他院校早就存在。在我看来,它们良好的本科通识教育的糟糕的替代品,并且即使从职业的观点去看,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更加自命不凡——因此也更加危险——的是在理论上算是一个专业学院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对它,我持保留意见^②。

商科是不是一个专业?一般地说,“专业”仅相对于“业余”而言。因此,人们可以说一个专业厨师、专业橄榄球运动员、专业理发师、专业舞蹈家或专业商人。但从大学的立场看,虽然许多院校里厨师和商人都能在学术园林中安度时日,清算的日子却即将来临。诚然,时代在变,以前不属于学术专业的理发师今天合理地成为外科的专职教授。现在不管作出什么决定,我们都决不能认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改变,伦理价

① 在这一点上,我再次提请诸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推广部主任和拉丁语(铭文学)教授。想一想如果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担任牛津大学商学院院长或维拉莫维茨教授(Wilamowitz)担任柏林大学商学院院长,所有欧洲人都会表现出的那种讥笑表情。当这些不同的职责荒谬地结合在一起时,大学究竟把古典学科或商科看成了什么呢?

② 本书提到的其他商学院也提供高级学位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价值观体系的变革,经济学知识的深化,不会在某一天将商科转变为一个专业。但在今天,它是否已超出上述的业余性而成为一个专业了呢?哈佛商学院是在帮助还是在阻碍一个真正的专业逐步形成?

我已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专业是学术性的,它们拥有文化根基,拥有体现一种理想的准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表现出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智本性。商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①。赢利的动机必须起主导作用;广告推销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经商的手法已经改变——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偶尔也会有某个商人以一个艺术家或哲学家的态度从事经商活动。但总的说来,商业一如既往仍是商业,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只是它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主宰了世界,以自己的准则侵占了别人的领地,卷走了本可以在政治、科学或艺术领域有所作为的种种人才。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去掉商业。商业过去一直伴随着我们,今后它仍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它应该永远伴随着我们。除了其他作用之外,商业既提供“服务”,又促进文明。正是通过商业,世界变得更加幸福,更加舒适。也正是通过商业,文化和知识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所掌握,而本来他们只能靠做苦工度日。但是,在今天,商业本身作为一个目的,是否已够完美、够客观、够理智、够严谨,以至于值得称之为一个专业呢?我本人认为并非如此。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普

^① 盖伊(Edwin F. Gay)教授在其论文《社会进步与商科教育》中也确立了大致相同的标准。见《西北大学商科教育会议论文集》,1927年6月,第84页。作为哈佛商学院第一任院长的盖伊教授对商业和商科教育都采取了一种怀有希望的——或者说怀有祈祷愿望的——观点,但他未详细论述他的看法。

遍的看法也认为并非如此。在那些文明国家中,现代商业虽然发展蓬勃,但也不得不根据在数百年沃土中积淀起来的宝贵文明来评判自己。可叹的是,在今天的美国,历史的土壤贫瘠。在贫瘠的土壤里,艺术、科学和哲学不容易繁荣,而商业却很容易。

现代商业不符合一个专业的标准。它的特点是精明、充满活力和机敏而非有理性。它着眼于——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里它必须着眼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崇高目的。许多成功的商人向慈善事业慷慨捐款这一事实并不证明今天的商业作为一个行业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或应该拥有成功以外的其他目标。不过,在另一方面,商业上的成功也不否认那些经商时深受审美的、科学的和利他的思想影响的个别商人,关于自身努力的较高的、具有受人尊重的专业特征的看法。

商业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这一点无可否认。因此,对各种现象和问题感兴趣的大学研究有关商业的各种现象与问题,也是应该的。然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商学院或经济学系研究现代商业的现象是一回事,现代大学承担“缩短”有关体验的任务,为银行、商店或运输公司提供广告人、推销员或能工巧匠则是另一回事——并且在我看来是一件毫不相干、毫无价值的事。让经济学家研究金融、商业周期和交通,让化学家研究纺织品和食品,让心理学家研究广告——不是为了训练商人以吸引公众,而是为了让公众在出现“整车不闻咳嗽声”之类的广告劝说全国老百姓购买一种新牌香烟时,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推销术之类的技术性技能属于技术学校,或必须留给学徒制去培养。

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教授、塞利格曼(Seligman)教授及其同伴有理由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正如研究太阳黑子的天文学家或对巴尔干半岛问题冥思苦想的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一样。但这两位研究税收或经济学问题的杰出学者都不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工作。哈佛商学院不乏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如研究经济学史以及有关经济学的、交通的和金融的各种现象的学者。然而,尽管哈佛商学院中的学者不但对各种现象兴趣浓厚,而且具有批判性眼光,院方管理层主要强调的却是“出人头地”——美国人生活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此。有一份长达145页的小册子对该学院作了介绍。从头至尾它没有一处提到专业的或科学的概念。“以前,从基层干起逐步发展的人曾拥有比较有利的机会”(第11页);“今天一所商学院提供了工作所需的训练”(第11页);“教授得当,毕业生进入企业时已经具备取得迅速进步的潜力”(第12页);“近期完成学业的人在商界普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第14、15页)。大学医学院是否敢用这样的话确定它的理想与成就?我们且将这些讨厌的、专门诱人的说法与一位牛津大学教授的尖锐看法作一个比较,后者既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

“商人必须了解的大多数事实学生都可在进大学以前获得——如果它们属于一般性的知识内容的话,也可在他进入商界后获得——如果它们碰巧对他的行业有特殊价值。”^①

^① 这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是马达里亚加(de Madariaga)。

即使从商业本身的立场看,哈佛商学院的观点也是狭隘的。是否应根据现代商业自身的要求接受现代商业?或者说一个文明社会是否对现代商业负有某种批判性的责任?哈佛商学院既未提出伦理性的问题,也未提出社会性的问题。它没有像哈佛医学院使经验医学处于守势那样,使商业处于守势。它甚至未从一种广义的角度来看商业^①。例如,该学院在介绍外贸系时,没有一处提及掌握外语的重要性^②或适当掌握外国历史和习俗知识的重要性。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肤浅的技巧上,而这类技巧只要通过实际交往和经验就能获得,如“出口部门的组织”、“广告术”、“销售人事”以及“出口销售人员的选择与管理”等。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即使从纯商业性的观点看,也缺乏想像力和远见。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并且总的来说也是最有成就的大学,但它的这一自负的研究生层次的学院却坚守一种十分狭隘的基础与精神,仅将广告术作为“一种促销的工具”。广告术方面的课程有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问题?根本没有。它只认结果并在学业上训练“经理”去“考虑应用广告术取得某些成

① 商学院的一位学生写道:“我很失望地发现,至少在第一学年,院方并不鼓励学生从任何价值观体系出发权衡他们所研究的制度的利弊……观点仍是分析性的,着眼于行动。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必然的起点。对‘哲学化’——有位教授当着我的面这样说——冷嘲热讽的教授太多。所需要的是对‘怎么样’(How)的‘坚定的’思考,而对‘为什么’(Why)的思考被认为是学术性的。”

② 该小册子有两处简单提到现代外语:在描述“预备科目”时,婉转提到学习现代语言是“有益的”;为获得博士学位(而不是硕士学位),“申请者必须在其专门领域至少能够使用一门现代外语”——这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要求,并只与授予的高级学位有关。1926—1927年,该学院有两人获得高级学位,学生总数为785人。

果”。该学院甚至每年颁发广告奖^①。最近一份 2000 美元的奖金颁给了一位女士,奖励她组织了一项“宠物饮奶运动”。与企业合作推销这种或那种产品,是否应成为哈佛大学关心的正当事情? 1929 年的一份奖金颁给了一则题为“能够唤醒任何母亲的呼叫”的广告;前一年的奖金颁给了一则题为“为一位编辑宰我的牛? 我说不行!”的广告。“一份 1000 美元的奖金将颁给显著地促进了广告知识与广告科学发展的广告研究。”^②“广告研究”!“广告科学”!哈佛大学教职员中那些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是怎样看待大学逼他们与之为伍的这类同伴的? 对一个其图章中继续包含“真理”(Veritas)一词的机构的理事们来说,这似乎不成问题。而“真理”与上述现象毫不相干!也许某一天哈佛大学的新图章可能刻上“真理及经商才能”(Veritas et Ars venditoria)这些字眼^③!

由于突然面临为企业培训上千学生——研究生——的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不得不编写大量的文献资料以供需求。哈佛大校园内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当然已相当丰富。但商学院必须做一些本校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当中有些人已受商学院诱惑去从事新的事业——或一个普通财会学院尚未做过的事情。该机构的负责人产生了一个灵

① 哈佛广告奖从 1923 年设立的一项基金中支付。每年颁发此奖的评奖团由广告部经理、宣传部主任和哈佛商学院一些教师组成。

② 《1930 年哈佛广告奖》(*Harvard Advertising Awards for 1930*),第 9 页。

③ 虽然我挑选哈佛大学商学院进行分析,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大学的商学院也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销售心理学,旨在“以一种科学方式呈现与销售过程有关的心理学事实”;“春季学期的(广告研究)工作将由……一系列有关广告、广告用语和广告标识的测试组成”,等等。

感：既然伟大的兰德尔(Langdell)想出了法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材的主意,为什么商科教学里不能使用案例教材?他也许不知道,从大学的观点看,法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材已产生种种原先未曾料到的缺点。不管怎样,哈佛大学商学院就很快搞出了一套商科案例教材。研究工作也很快开始启动^①。从商学院研究部发表的文献题目中,人们对体现商学院设计者特点的智力水平和幽默感有所了解。这里是一些样本:《零售药店账目管理》、《零售杂货店账目管理》、《零售五金店账单记录》、《百货商店女鞋部商品管理》、《零售珠宝店管理开支》(从1919年至1928年每年单独出卷)、《1918年批发食品业务的售货员薪水支付办法及其管理开支》^②。如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真的希望成为一个零售药店或五金店的商人,或一个食品批发商,那么由哈佛大学为他提供研究生层次的特别的职业训练,学校不是既降低了自己的训练价值,又低估了受训者的能力?难道就不能给知识性、经验性或职业性的“商学院”留些余地?再者,这种事情对整个大学、对美国文化和文明又能起什么作用?学生被告知这种做法可以激发学习职业性课程的愿望——而这恰恰不是哈佛大学应该追求的目的。

① 不过商学院本身的财务管理太糟糕,结果没钱用于研究。

②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该商学院出版了15卷有关广告和销售管理等方面“问题”研究的巨著。“在10个月的时间里,本系列丛书至少出版了8部。”(《哈佛问题丛书》——见扉页)这是否算得上高生产率?书的厚度从386页到1050页不等。这套丛书的目的陈述得很大胆:即“使学生做好经商的准备”。整套文献丝毫未涉及社会的、伦理的、哲学的、历史的或文化的内容。它是“广告”,在文字和精神方面与推销巴黎吊袜带、专卖药或人造丝袜中使用的那类广告毫无差别。

哈佛研究生商业管理学院在组织上与普通职业性商学院相似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有一次访问该学院时,我从公告板上摘录了下述通知:

下列学生尚未上交规定的图表作业

(70 多名学生的名单)

除非马上上交作业,否则成绩作零分计算。

请记住,这些学生都是本科毕业生,从他们当中将产生各种“经理”。当我询问为何使用这种对付小学生的方法时,给我的答复是“否则教师不知道如何评价(因此也不知道如何推荐)他们”。显然教师没想到:对一个接受培训以后要担任企业负责人的学生而言,在没有强制性压力的情况下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也许是应该记录的最重要的事实!一份强制性的图表作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一个研究生是否成熟和够格呢?

哈佛大学商学院是由一名纽约金融家捐资 600 万美元创办起来的。在这笔捐资中,500 万美元立即被用于建造学生宿舍,原计划可容纳 1000 名学生。剩下的 100 万美元,加上后来获得的其他捐资共 270 万美元,则作为固定基金。学生宿舍现在一年赢利 10 万美元,捐赠基金一年增益 12.5 万美元,因此商学院主要依靠学费运转。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商学院要从事“研究”,而研究,即使是广告方面的研究,也是昂贵的。迄今为止,“研究”所需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①,结果

^① 引号中的话均引自近期发表的一份文献,题目是《哈佛商学院的 250 位合伙人》。

导致“财政不确定”，“图书馆计划面临严重的问题”。难道要求哈佛大学研究生商业管理学院的领导自身能够运用完全合理的经营方法会太过分吗？难道一个头脑清醒的商人会将自己5/6的原始资本用在砖瓦灰浆上，而将其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寄希望于运气？不知道那些商学院教师自己是否就不需要被送进学院——尤其是有经验的学院去学习！为了缓解经费使用不当所带来的困难，一个非官方组织的委员会已着手组建了一个有250人参加的协会，每人每年捐资1000美元，“以稳定和促进商科教材的研究与收集”。这笔资金的管理权属于捐资者选举出来的理事会，其成员自称为“杰出的商界领袖”。他们的目的无疑是单纯而高尚的——但如果一个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开展工作并研究“财政、政府、劳工关系……和公共设施”的学院，其研究资金不仅年复一年地依赖“杰出的商界领袖”提供，而且只归他们管^①，那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和科学精神可言？还能想得出比这更幼稚的事情吗？哈佛大学与此无关，因为在解释这一项目的12页文献中，既未提及校长和校方，也未提及教师！“商学院院长希望该协会的成员资格能使人产生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而这是在哈佛！

^① “所有成员都将获得亲自观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包括参与——本学院进行的实验的机会。”

二十六

如果我有时间和篇幅去讨论药学院、图书馆学学院^①、城市规划学院和社会服务学院等,我一贯努力强调的观点,即大学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承担各种各样职业性的培训,就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如果这些分支科目真的需要开办培训学院,它们也应设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大学校园。但我要冒昧地结束对这些“服务性”学院的考虑,并请诸位注意另外两种情况——它们也许是大学现代化的所有学术努力中最令人发笑和最应受指摘的事情。

几年前,纽约立法机构创建了视力测定法。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它与眼科学很不相同。与对眼睛的研究完全相脱离的视力测试本身是不是一种安全的或正确的方法?科学权威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必须提供“服务”。它立即开设了视力测定法方面的课程,其课程的设置不是以

① 图书馆培训属于大学吗?如果不是必然如此,它就应与大学无关——维护纯粹的大学理想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卡内基公司已经——在我看来并不明智——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服务研究生院拨款 141 万美元。类似的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威斯特里塞夫大学和一些州立大学里也已设立。然而,卡内基公司主席在他最近的报告(1929年)第 12 页和第 13 页指出:“应该指出,虽然普拉特研究所根本不颁授学位,但它却保持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最佳学院之一的地位。”——因此完全将“大学”抛在了一边。

再者,在此凯佩尔(Keppel)校长不仅彻底打败了大学图书馆学学院,而且指出:“应为富有学术趣味并受过学术训练的能人提供方便,使他们能从过于拥挤的英语教学领域(或者,我要补充一句,任何其他领域)转向图书馆学等领域。”

该问题的是非曲直为基础,而是严格地与纽约州的法律保持一致。法律要求在普通中学的基础上再学习两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就安排两年。1927—1928年该大学推广部的通告开列了一门“通向视力测定法毕业证书的两年制课程”,通告指出这只是根据条件所能做的“尽可能令人满意”的安排。这种廉价且便利的训练也不是美国“开拓时代”(“pioneer days”)涌现出来的、为消除学术的荒谬性而受到鼓励的事物,它仅仅是属于过去的事物。同时,校方在专业性课程中开设了“四年制理学士学位课程”加视力测定法学业证书的课程。为使事情简单化,未达到入学所需的最低教育水平的学生还可通过学习下午或晚间的课程获得另外的预备教育。因此,这一课程几乎可以涉及各类学生。后来,法律改变了,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也作了修改。的确,正如该大学所说的那样:“哥伦比亚大学的视力测定法课程总是根据纽约州视力测定法方面的法律进行计划并加以修订的。”^①起初,两年制课程就足够了,现在则不再开设两年制课程。是人的眼睛起变化了吗?不是,只是纽约州的法律改变了。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的相关系科为讨好纽约州立法机关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一位在国际科学界享有声誉的杰出的眼科专家向我保证——其实常识本身也告诉我们——“验光师发现不了刚开始出现的损伤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他补充作了同样致命的评论:“他们的方法还存在其他缺点。”但哥伦比亚大学会对此感到在乎吗?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康乃尔大学里可以找到的第二类院系,用以结束本人对美国大学的“服务性”活动不甚全面的叙

^① 《信息简报——1929—1930年视力测定法专业课程概况》,第5页。

述。在未知的海洋里闯荡的康乃尔大学发现,饭店管理的专业(请注意不是职业)已经得到了教育家的承认。通过美国饭店协会的合作与资助,康乃尔大学能够开设四年制的“学术性”本科生课程,其中包括要求学生“在指定饭店经专人指导从事三个暑期的常规领薪工作”。经过这一严格的知识训练和实践训练,学生以理学士的身份走向生活!课程包括“切肉法”、“辅助设备”、“心理学”、“人事管理”、“前台实习”和“饭店机械装置”等。为了说明获得理学士学位所需学分的经验类型,康乃尔大学列举了该校饭店专业学生去年暑期从事的一些工作——其中包括侍者领班、客房调配员、餐厅侍者助手、普通侍者、前台服务员、钥匙与邮件服务员、餐厅管理员、食品管理员——所有这一切都明显是非常重要的体验,是任何一名未来的饭店经理或职员在关键的大学教育阶段都不可以忽视的!将宝贵的四年时间献给这种激励性的、启发性的和广博性的大学训练的那些理学士们,已经晋升到了相当高级的地位——其中包括在马萨诸塞州斯旺普斯科特(Swampscott)任客房管理员,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火车站饭店任助理管理员,在纽约州斯塔莱克(Star Lake)任侍者领班,在宾夕法尼亚州托旺达(Towanda,人口只有4609人)这一无人知晓的地方任一家“旅店”的经理,等等。

二十七

在总结有关“服务性”活动的讨论时,我要提出我的最后

一点看法。是否有人真的认为,由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未设商学院,它们在未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就不如开办商学院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那么出色呢?或者说,未设新闻学院的哈佛大学,未来提供的编辑、评论者或记者将少于已开办新闻学院的哥伦比亚大学呢?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会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挤出工业、运输业和商业领域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会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挤出新闻界吗?对经济的重要贡献将来自商学院而不是经济系?批判性的和基础性的思想将来自依靠由“商界领袖”提供并管理的年度捐资生活的研究人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它们不会视现有的新闻学院和商学院为真正的大学事业。

人们会对法律或医学提出类似的问题。未来的律师或法学研究人员会来自哈佛法学院呢还是布鲁克林法律学校?医生和疾病的科学研究者会来自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还是某个培训“实用性”人才的学校?同样,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是答案。从这些答案里,我们可以发现哈佛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所体现的思想与哈佛医学院、哈佛法学院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所体现的思想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们可以将问题再推进一步。我写作的时间是1930年,让我们设想自己身处10年或15年后的时代,即1940年或1945年。我们正在考察那个时代的杰出的记者和商人的学历状况。他们会是新闻或商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还是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类似对付今天各种问题的培训、但却受过教育、能够运用所有智慧和以广博的视野处理所在时代不断变化之

问题的人才？这两类人中，谁对美国文明的贡献更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谁能代表更丰富的文化成果？

现在让我们从医学和法学的角度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过去一个世纪的欧洲和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的经验具有意义的话，那么医学和法学的进步将取决于大学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医学和法学都是专业，本质上具有理性和学术性，其发展需要只有大学才有的传统、资源、设施和交往。商科和新闻则不是，它们没有这样的要求。很久以前德国就懂得了：企业之所以需要大学，不仅是因为大学为它们的实验室培养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还因为大学训练了适用于任何领域的智慧。这一课美国的大学还有待于学习。

二十八

也许有人会指责说，我所描绘的画面过于灰暗^①。也许如此^②。没有人知道美国任何教育阶段合理事物与荒谬事物的相对比例。我多次强调美国存在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其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他们在努力进行享有国

① 在这一点上请容许我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实际上将讨论的范围限于美国的主要大学。如果我将那些教会院校和密西西比大学之类的州立大学——在这些院校州长“解雇”校长和教授既不需要理由也不必举行仪式——包括在内，画面是会明亮一些呢还是会更灰暗？

② 请参见亨利·普里切特(Henry S. Pritchett)为《第23号简报》所写的序言，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出版。

际声望的工作。我也一直在强调我们对现代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教育学——所作贡献的创造性和重要性。但我用了更多的篇幅讨论错误的、受误导的和短视的方面。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除去坏的事物，才能有效地发展好的事物。一个四分之三美丽芬芳、四分之一杂草丛生的花园，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花园。人们会羞于展示它，因为花园里面应该没有杂草。杂草不仅不雅观，而且会占领并摧毁花园。大学里也不应该有任何杂草。它们也不仅难看、不和谐，而且还带来危害。我很直率地批判了荒谬的事情，因为它们应该被根除。如果我不提供大量的例证^①，读者就不会理解我到底在说些什么，或不会理解事情到底有多荒谬。对美国的学术进步，或美国大学中的学术进步，我毫无疑义。学术在不断进步——按我们的意志发展：兴趣和忠诚既不会被贫困所吓倒，也不会为混乱所阻碍。但我们有理由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有利于个性发展，有利于建设性的交往，有利于进行合作，有利于维护学术标准。在这些方面我们远未尽心竭力，这一真相必须尽人皆知。

二十九

从行政的角度说，究竟什么是结果？我坚信，一所真正的

^① 美国有几位杰出的学者审读了我的手稿。他们坦言对手稿中披露的事实感到十分震惊。

大学是一个有机体,其特点是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能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但很明显,我们用来作例证的那些大学——即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大学——却不是有机体,它们仅仅是行政的集合体,且如此多样,如此多变,如此复杂,以致行政管理本身已简化为安排预算、统计学生和制作广告等事务。这种集合体即使有大学的名称,也根本没有通过某种合适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科学政策或教育政策。与它们谈理想是件荒谬的事。它们是中学,是职业学校,是师范学校,是研究中心,是“社会事业”机构,是企业——同时是这些事物和其他事物。在不计后果地竭力扩展、努力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同时,大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已经解体。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也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也好,都不是真正的大学,因为它们都不具有目的的统一性或机构的同质性。它们的中心都是资金进进出出的财务主任办公室和保存学生名册的注册主任办公室。

我们如何使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 依靠典型的美国方式。董事会拥有基金和财产,选择校长,实施某种总的监督。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说法,也不管能找出什么例外的情况,董事会一般既不干涉校长的工作,也不干预教师的工作。但校长的确由它们选择——有时它们会听取专家的建议,有时则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进行选择。一旦选好校长,它们通常就将大学的日常管理交给校长和教师。有时个别的董事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大学的事,但这部分人只是少数,尽管是颇受尊敬的少数。对这些人,再怎么称赞也不会过分。一旦选定校长,无论怎么说,绝大多数的董事也就很少再对大学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他们的间接影响,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

属于无意识的影响却可能是——实际上也常常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过去半个世纪是在朝坏的方向发展。50年前与实际打交道的人——如商人、律师,有时包括牧师——还不那么自信。我相信他们对穷教授要比今天尊敬得多。此外,他们过着比较简朴和比较安宁的生活。成功和享受占据了许多美国商人的身心并对他们产生误导——当然并不是全部,因为正如我要重复指出的,仍有一些董事和成功的商人颇具良知,思想开放,为人谦和。他们的经验和正确的见解是无价之宝。不过总的说来,董事会的成员不是由这类人组成。在一般的情况下,除少数不为人所知或办得较差的院校之外,指责他们压制言论自由的想法,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他们行事犹豫、缺乏自信的作风对最初的任命和晋升却不是没有影响的。

校长选出后,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可能需要得到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才代表着大学——的批准,也可能不需要。凭着交际才能和敬业精神,一位精明能干的校长可以赢得董事、校友和公众对合理的教育政策的支持,而作为个人,这些董事、校友和公众本不可能对这种教育政策表示很大的关注。过去50年的奇迹因此部分地可以得到解释。这的确是奇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突然兴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帕萨迪纳大学精华的产生,州立大学也不乏种种奇迹。我说的是“部分的”。因为机构自身不能创造。美国式的组织本身没有创造美国大学的精华,与其他地方的传统相比,它仅仅设置了较少的障碍,并使那些强有力的人物——如埃利奥特、吉尔曼和哈珀——能为人所认识。如果由一位平庸

无能的校长掌权,机构虽仍是同一个机构,人们见到的却会是死水一潭。我并不是说机构毫无用处,相反,我要指出,它可以使进步、堕落或维持原状变得比较容易,但机构本身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或选择性的动力,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美国善于模仿,竞争性强,拥有巨大的自由资源。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在努力向前迈步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却几乎停滞不前。我怀疑吉尔曼校长 1876 年所做的和所规划的也都在埃利奥特校长考虑的范围之内,但巴尔的摩那边迅速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加速了坎布里奇这边的步伐。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和芝加哥大学的创建加速了这一发展势头。校友、董事和当地社区所具有的荣誉感、所表现的活力和所提供的捐助,则在另一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由于步子迈得太快,批判意识迅速消失,方向也很快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开始变得随心所欲。过去 30 年中鱼龙混杂的现象迄今有增无减,未受到有效的抵制。对威尔逊山天文台(the Mount Wilson Observatory)、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以及新建的医学院起促进作用的同样的模仿精神、竞争精神和充足的资金,却使哈佛大学成为思想贫乏而发展迅速的商业教育的牺牲品,也使霍普金斯大学成为毫无必要建立的工程学院的牺牲品。无论对传统还是理想,既无制约措施也无修正办法。最优秀的学者也无法对董事产生直接的影响,但通过校长的瓶颈挤出来的种种措施却仍需要得到董事们的“恩准”。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校长与教师之间不存在什么鸿沟,因为校长认识到是教师而不是校长才意味着大学。但这样一种关系现在已很不寻常。一种包括社会性的平等交换的随意的、非正式的

关系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和巴尔的摩大学得以确立,并且一直维持至今,校长的住宅简朴端庄,教师们通常全体出席各种重要集会。但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新建的校长宫殿里,仅靠薪水生活的教授会觉得呼吸困难。正如德勒(Deller)博士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校长是“长者”(primus)而非“同辈”(inter pares)。只要迫使他投入影响巨大的董事和地位显赫的名流怀抱的环境还存在,他就很难做到不脱离教师,被迫——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生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之上。

校长的薪水从 11 600 美元至 2 500 美元不等;娱乐等方面的津贴从零美元至 20 000 美元不等。高出上述收入的情况十分少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说,大学校长的薪水一般说不上过高,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教授的薪水明显过低。除非教授获得与校长大致相当的薪水,住同样好的房子,受到同样的尊重,否则学术的尊严不可能得以恢复。如果校长的职位不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是比较现实的话,那么一项合理的补助就可支付那些原本就不必由教授承担的开支。这样校长就可树立他应有的形象,即“同辈中的长者”(primus inter pares)。美国也会由此意识到学问是比行政才能更优秀的产品,并意识到民主应发端于大学校园。

校长的职责既多样又艰巨:他既是获取资金或拨款的主要代理人,又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他要四处奔波,出席各种盛大集会并发表演说;他要参加数不清的委员会和理事会;他是广大校友的“好伙伴”;他要不同程度地参与教职员的挑选和制定各种政策——有关本科生院的政策,有关服务站

的政策，以及有关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政策等；他是沟通教职员与董事会成员的渠道；不经过他的批准，教职员工甚至连申诉观点的机会都没有。多么沉重的担子！一位极为英明的美国慈善家——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负责人，并长期担任一所著名大学的董事——曾对我说：“一个人可以当一个横跨大陆的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做某个国际财团的总裁，或任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但却无法承担一所著名大学校长的职位。”^①

因此，理解大学校长是如何产生以及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什么成绩，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直到 1876 年，美国仍然只有学院。但就在那一年，在吉尔曼先生英明和卓有成效的领导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得以成立。这所大学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而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些大学校长，董事们也好，教职员也好，都不会迅速仿效这所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哈珀校长重复了巴尔的摩的实验。全国各地那些强有力的人物也随之仿效。在大学发展过程中他们克服了来自董事、校友和教职员的惰性与阻力；他们使学院摆脱了旧习；他们募集了必要的资金。如果没有大学校长，我认为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美大学就会失去它们的精华。我进一步认为，如果过去 20 年中，学者与科学家在大学决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也许就不会为大学里的种种糟粕所烦恼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校长独揽大权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今后他的角色应有所

^① 要了解对条件普遍良好的美国大学校长的公正和深刻的分析，参见德勒的著作，引述同前，第 20 页起。德勒博士对学术自由的想法也是正确的。

不同。诚然，为确保政策的连续性，有必要设立常务负责人，我相信一大批教师也无法管理一所大学。人们经常将美国大学的教师与牛津大学管理一所学院的教师或德国的教师治校相比较，其实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因为，牛津的学院规模很小，德国的教师则与一个很有影响的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美国的教师治校只会是民主管理的形式，最优秀的人坚持搞实验或做研究，次一等而具有行政头脑的人就可能掌握控制权。教职员确应有人代表，但代表人的负担不应过重。设校长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校长不应孤立地处在教职员与众董事之间。

当然，校长不可能样样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①。因此，他通过“组织”行使职责——其中包括各院系负责人、秘书、文件归档系统、打孔资料卡、上下班计时钟、成本计算表格以及其他所有为有效管理一家企业所需的设备。所有学生的档案资料都用不同颜色的卡片记录保存，只要用力按一下存档仪，就可以显示卡片的相关数字。然而在采用企业管理办法的时候，企业与教育的根本区别被忽视了。企业必须赢利，企业生产标准化的产品。钢锭就是钢锭，原油就是原油，砖块就是砖块，丝绸就是丝绸，电光源就是电光源，电灯泡就是电灯泡。企业当然应该安排有序、井井有条，企业的繁荣当然有赖于其组织效率，为什么不？但人们是否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组织也同样必须存在于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估量的宗教、政治和教育领域？的确，即使在美国，有时也能见到一群人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进行某项了不起的工作，可惜的是，

^① 芝加哥大学设立了副校长办公室，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校长的行政责任。

一旦他们稍有些名气,某个商人、专家或设计师就会扑向他们。他会因此而“组织”一所大学,或“组织”一家慈善机构。尽管其意图很好,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建造了一架结构良好的机器,安排了种种“功能”,使各部分“相互关联”,还做了其他各种破坏创新精神的安排。因此,尽管他的手下汇聚了一批平庸之辈,他仍然可以画一张图向你说明,既不存在重复部分,也没有失去工作动力,但他不说他没给“迄今尚无人掌握的理念”留下“余地”^①。管理的效率与思想的丰富之间事实上并无关系——除了相互之间的摧残之外。对组织的狂热已经侵入到美国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俱乐部、研讨班、研究活动和体育活动。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中的“喝彩”也不能让观众自发产生,而必须加以“组织”。每所大学都拥有自己的拉拉队队长——不时机械地手拿麦克风高声尖叫,像个疯子那样手舞足蹈——正像大学拥有自己的院长和秘书一样。在这样一种庞大机器的冲撞挤压之下,理念怎能产生,又怎能获得威望!

三十

美国大学的严密组织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学生游学的情况已几乎不存在。例如,一旦一个小伙子进入耶鲁大学一年

^① 引用此话时请允许我向纽约市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博士致谢。

级,他就在该大学连续学习四年,直到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一时期,校方尽一切努力培养他对母校的感情。这种热切的忠诚既产生好的后果,也带来坏的后果:他成为一个潜在的、但却常常是重要的捐助人——这对耶鲁大学来说是有利的,但对需要资助的其他大学来说则是不利的,而有时对其他大学发展项目的资助比对他的母校的资助更为重要。此外,校方在制定大学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他作为一名校友的因素。总的来看,校友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他们太沉湎于院际之间的体育竞赛和所谓的“老学院”传统^①。

使本科生在同一所学院里学习四年的习惯同样也使研究生在同一所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学习三至四年。在某一所著名大学开始攻读希腊文、数学或历史学的研究生,往往就一直在那所大学学习,直到获得高级学位。各种影响势力都诱使他相信,他拥有的机会和导师是全国最佳的。他的忠诚感逐渐得以激发,一直到他对所学学科产生一种狂热。这样,当一门学科如化学衰落时——正如它已普遍衰落那样——学生通

① 下列引文出自纽约《世界报》近期一篇社论:

“显而易见,我国各院校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并且目前也没有好转的迹象。为了激发兴趣并获得捐助,各大学校长使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唤醒校友会并取得了成功。然而唤醒校友会之后他们却发现,它们手中拥有大量的弗兰肯斯泰因怪物(Frankenstein monsters)。(弗兰肯斯泰因是英国女作家玛丽·谢利(Mary W. Shelley)于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角。弗兰肯斯泰因是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怪物毁灭的医学研究者。——译者注)因为这些协会除了橄榄球外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对橄榄球的狂热则在校园内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干扰了学术工作。最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我国的院校要继续发挥其作用,它们必须理顺的事情之一就是校友的地位问题,尤其当校友认为有关院校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他们时更是如此。”

常也不会发现事实真相并转到其他地方去学习。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也往往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如果他不能逐步得到晋升,那一定是实在太差。尽管后来也出现一些学术流动,但这种情况在各个教育阶段仍然太少。为了所在大学的利益,或为了有关个人的利益,哈佛人教哈佛人、耶鲁人教耶鲁人、霍普金斯人教霍普金斯人的现象仍很普遍。

三十一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据各地向华盛顿教育署的报告,1927—1928年度共有1076所学院、大学和专业学院招收90余万名学生,今天的学生数一定远远超过了100万。同年,有83065人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美国的人口约为1.2亿,因此今天每125人中就有一人在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而且由于这一过程和这一发展速度已保持了若干年,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数一定十分庞大,总体的知识水平和教育水平也应该很高并且应很快地变得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很明显,所统计的这90余万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受教育,他们过早地接受了商业、新闻、体育、家政等训练或注册去学习推广课程及其他课程。即使注册为大学生或研究生,也不能肯定他们能获得相应的教育,或保证他们学习的是可以称之为自由教育的课程。从社会的角度看,如此众多的

人对获得某种教育感兴趣,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件新奇的事,并最终会产生今天尚无人能够预言的影响。但人们对此不能希望过多,除非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明确地根据学术的标准对学生进行区分。笼统地看,这些数字会有欺骗性。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报告说,1928—1929 学年该校共有学生 48 722 人。如果排除学习暑期课程、大学推广课程和函授课程的学生——这些学生不应包括在内,因为不管他们学习是否认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不能算是大学生——这一庞大的数字将减为 16 123 人。在这剩下的 16 123 名学生中,3 730 人是本科生,其中我怀疑一半以上学习的是中学水平的课程或在某个“专门”学系注册;12 393 人是研究生或专业学院的学生,其中有 8 000 人注册学习商业、牙科、口腔卫生、新闻、视力测定、药学、教育、图书馆服务和实用艺术,剩下的 4 000 人中,约 3 000 人在研究生院学习,在伍德布里奇院长(Dean Woodbridge)看来,其中只有 1/4 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生。从致力于高等教育——即研究学术或掌握学术专业——的大学的观点看,哥伦比亚大学拥有的学生数不是 48 000,而也许是 4 000(这一估计已经十分宽松)。据说,教学人员约为 2 500 人,其中 1 000 人仅仅是推广课程或暑期课程教学人员,剩下的 1 500 人中还包括不少医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的兼职教授和教师以及相当数量的进行初级和中级教学的教学人员。显然,根据大学提供的薪水标准,不可能在纽约市找到 2 500 名大学教师。当然,有少数学者和科学家是极为出色的,但大多数教学人员出身贫寒、缺乏训练、体质虚弱——不能适应一种比较紧张的生活。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教学人员中,相当比例的人逐渐被吸引到法律、医学和商

业领域。因此,一些职位尚未填满,另一些职位又很快产生。每创办一项值得怀疑的新事业——如商学院、市政规划学院和肉类工业学院,就从中心学科吸引走一批经济学家、工程师或细菌学家,从而削弱整个学科。为此我们被迫聘请训练不足的年轻人担任教授,而在国外,他们可能只能担任助教和普通教学人员,甚至连这一点也不能保证。本来可以维持一所大学正常发展的资金被分散用于如此广泛的领域,以致大学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资助。此外,如今同一个校园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教师和学生,他们集中使用相同的空间,挤在同一个图书馆里——橄榄球、跳舞、祷告、教学、攻读学位和研究等各种活动开展起来无不拥挤不堪。“学术和研究”,伍德布里奇院长说道,“不会在这种氛围里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①

芝加哥大学要管理近 30000 名学生——与其他主要大学一样,它也必须采用一种能够实施管理的组织形态。这些学生中有 8000 名函授生,6500 名暑期讲座学生,800 名注册学习教育,500 名注册学习商业,5000 名本科生,4000 余名研究生^②。假设学习推广课程、暑期课程和中学课程的学生不计算在内,假设技术性的“专门”系科被排除在外,假设将伍德

^① 在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 175 周年庆祝纪念会上,校方颁授了百余个荣誉学位,获得了 47 幅捐赠画像。校董会主席不无自豪地指出:“1/4 个世纪以前,本大学拥有 11 个学部,455 名教师和 4709 名学生。今天,我们拥有 12 个学部,5 个独立的学院,9 个附属机构,近 2800 名教师和 50000 名学生。”

^② 要协调美国教育署的统计数字和从各大学得到的统计数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分类有所不同。但本书中采用的统计数字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实际。

布里奇院长的标准应用到研究生院,那么芝加哥大学还剩下多少大学生呢?肯定不到5000。于是学校将不再需要庞大的组织,校园里将吹进新风,变得精悍的芝加哥大学不但不再为筹措资金和缺乏校舍压得喘不过气来,反而能比现在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生活和国家的需求——这一切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常常提及早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起的作用。在我读书期间(1884—1886年),该大学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本科生系(不到150人)和一个拥有200余名学生的研究生院。当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超过美国其他所有大学。它规模不大,其实规模大小并不重要。如今它的规模扩大了20倍,其《1928—1929年度校长报告》所列学生达5446名。这些学生来自何处?在学什么?他们4/5来自马里兰州,而在占学生绝大多数的马里兰学生中,除了900之人外都来自巴尔的摩。因此,巴尔的摩应该成为出类拔萃的文化中心,但它却偏偏不是。除了医学院的学生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几乎就像隶属当地公立学校制度的一所地方大学。此外,这5446名“大学生”在学什么呢?有465人学习技工夜校课程,1171人学习商业经济学夜校课程,1107人注册学习暑期课程,1526人在师范学院学习,72人为商业经济学院学生——总共4341人。他们多少都在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但不是在追求大学的目标。在剩下的1000余名学生中,283人在医学院学习,144人在卫生学院学习——前者令人称羨,后者也很出色,本科生院拥有343名学生,其中学习中学以上课程的学生不到一半,除非在哲学学部学习的527名学生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类学生更为出色——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否则也许只有 150 名学生配得上受这样的教育。结果,霍普金斯大学的 5000 余名学生被化为几百人——不包括医学院和卫生学院的学生。这少量的学生就可有幸得到一批高水平教师的指导。今天的霍普金斯大学也就可能仍然是立于山顶的一座灯塔,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它招收了 5000 余名学生,并在医科和卫生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失去了其原来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其他大学的水平提高了,大部分原因和主要原因还是它本身由于稀释和掺杂而江河日下。

与上述自主办学的私立大学相比,威斯康星这样的州立大学的确比较有利。它的注册学生数超过 28000 人,其中 8000 名是函授学生,6500 名是推广班学生,391 名在密尔沃基(Milwaukee)市读日校,4000 名学习暑期课程和短期农业课程,学生数因此可减少到不到 10000 人。如果可以使用与前面同样的分类方法,结果将表明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学生数可能不会超过 2500 人。哈佛大学的 10000 名学生可减少 50% 以上——如果将学习牙科、商科、推广课程、暑期讲座课程^① 的学生及本科低年级的学生排除在外,其研究生院学生为 1326 人。20 年前,据洛厄尔(Lowell)校长统计^②,70% 的研究生将全部时间用于学习,现在这个比例不到一半,只有

① “根据校规,几乎所有的暑期学校课程都可以计作文学士、文学准学士和理学士学位的半数课程。大量的暑期课程可以计入文学硕士和教育硕士的学位课程。”因此,耐心加算术就产生了哈佛大学的文学士和文学硕士!(见 1930 年暑期学校预告)我并不反对暑期学校,但它们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学术性的,其教师是四处随意招聘来的,不可能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挑选。这种美国意义上的“学分”不应该被“认可”。

② 《1928—1929 年校长报告》,第 11 页。

44%。“剩下的学生并不一定是差生,因为大学聘用许多研究生担任助教,它本身要负部分责任。但同样不清楚的是,这种做法对研究生和他们所教的学生是否有利。”此外,“没有人会认为,所有这1300余名研究生以及更多的青年男女学生能够对人类的知识做出贡献,或能够在教育领域达到较高的水平。”

是谁迫使哈佛走入歧途?没有人。哈佛办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并且这类事情能够引起它的兴趣^①!在学生方面,耶鲁大学的损失要少得多:它的5000名学生也许会减少到3000或4000名,主要被排除的学生是本科生院一二年级的学生,但耶鲁大学没有形成任何“服务”特征。这与“服务”活动十分兴旺的其他大学明显不同。

针对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的结合导致出现上述庞大的招生规模这一现象,有些人辩解说本科生院可受研究生院的刺激而发展,有些人则辩解说研究生院靠本科生院“喂”大。对前一种观点,指出以下一点是十分令人信服的:联合型的大学还应包含一所中学,与本科生院相衔接。事实上,以前许多本科生院设有预科,直到州立中等教育制度建立后才逐渐废弃。至于后一种观点,一所高水平的研究生院并不需要专用的“供给机”。敬业的学生会寻求优秀的教师,“忠诚”在此是不合适的。统计数字表明,最优秀的研究生院都在一

^① 有必要公正地补充一句,在同一份报告中,洛厄尔校长提出了研究生院的规模现在是否不应加以限制的问题,因为本科生院(3233名学生)、医学院(515名学生)、法学院(1589名学生)、商学院(868名学生)的学生数是有限的。的确,所有高水平的医学院都对每年的招生数有所限制,坚持理智和学术标准也会导致对其他系科的规模有所限制。

定程度上独立于本校的本科生院：在过去四五年里，哈佛文理研究生院从其他大学的本科生院招收了 75% 的学生；在过去两年里，即 1928—1930 年期间，哈佛法学院从其他大学的本科生中招收了 80% 以上的学生；在过去五年里，即 1925—1929 年期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本校本科生院之外招收了近 85% 的学生。仅就人数而言，本科生院帮不了研究生院多少忙，而这种结合对研究生院造成的损害我已作了解释。

通过对统计数字进行精确的分析而使人们估计到有多少美国人现在正在接受自由教育或高级教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数字要少于——远远少于——所公布的数字。统计数字被“浮报”了。断言现在只有少量的美国人能够在师资优秀的学院和大学学习，并且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有学问的或有才能的人才，肯定不会错。如果这少数学生能够集中在少数学术中心学习，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或一种重要的带动发展的因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分散在各个大学，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他们的影响被削弱了。他们不仅没有带动其他人上升到较高的趣味和思想水平，反而自己也被拉了下来。因此平庸之辈充斥美国决不是什么秘密。大学生人数不是 100 万，而可能是 10 万——甚至这个数字也达不到，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所受的是有缺陷的中学教育。大多数所谓的“大学生”都是在各种类型的大学和学院里学习特定的培训课程——南部和西部的人数要多于东部，或者学习技术性的课程而不是学习其目标和精神体现科学性或自由性的课程。这一结论，因所谓的知识阶级——如教授、教师、律师、建筑师和记者——所表现出的文化薄弱而

得到充分支持。统计数字虽可能误导，但林德（Lynd）夫妇在他们研究有代表性的美国社区的著作《市中心区》^①中披露的却是事实^②。

三十二

虽然捐助者和有捐助条件者的比例普遍被估计过高，近些年来，美国公民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慷慨，为学院和大学提供了大笔的捐赠和资助。然而相当数量的资助都捐给了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对象——如不是必需的建筑、大学不应设置或负担不起的系科和研究所。因此美国人的慷慨捐赠没有受到明智的目的控制或引导。从长远来看，捐助是否会充足到可以忽略这些浪费和误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应该指出的是，资源仍十分匮乏，但我希望先探讨一下资源的数目及使用状况。1906年美国教育署列出的大学、学院和工学院为622所^③，1928年为1076所^④；在同一时期，不动产从5.54亿美元上升到24亿美元，图书馆和设备的投资

① 林德和林德(R. S. Lind and H. Lynd):《市中心区》，纽约，1929年版。

② 学院和大学学生人数的膨胀部分可归结于入学条件的普遍提高：护理学院要求学生学过两年本科课程方可入学，图书馆学学院开始要求入学者拥有学士学位。因此学院和大学充满了不合适的学生和不切合实际的研究生系科。的确，哥伦比亚大学实用艺术学院的人学要求(学士学位)或图书馆学学院的人学要求，实际上要高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本科两年学历)！

③ 不包括专业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④ 不包括专业学院。

款从 0.45 亿美元上升到 2.45 亿美元,大学的房地产从 2.6 亿美元上升到 13 亿美元,产出性捐赠从 2.5 亿美元上升到 11.5 亿美元,等等^①。

关于这些巨资——再加上学费收入——的用途,我只使用近似的统计数字,因为这将足以说明我要阐明的主要观点。大学的核心是文理研究生院、重要的专业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哈佛大学的年收入现在接近 1000 万美元,其中只有 1/5 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文理系科。由于几乎一半的本科生教育属于中等教育层次,因此很显然哈佛大学用于大学教育层次的中心学科的开支不会超过 1/8。图书馆方面的开支虽然相当可观——全年达 30 万美元,但如果所招收的学生限于有才能的大学生,这笔开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建筑学院、伯西学院(Bussey Institution)、法学院和医学院、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天文台及其他若干个研究所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具有大学水平,它们的开支约为 200 万美元。这样,在总数 1000 万美元中,400 万美元被用于大学水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其他开支哪里去了呢? 10 万美元拨给暑期学校;近 100 万美元拨给商学院;60 万美元投入餐厅;约 100 万美元拨给体育运动委员会;50 万美元用于宿舍建造和管理;75 万美元用于行政开支。这些开支中,有些如餐厅和宿舍可从收费中平衡;体育运动的高额开支可由门票收入冲抵;行政管理的大量开支则部分可归结于大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部分可归结于商业管理方法的不当介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哈佛大学的预算中有

^① 我在此以最近似的整数表示。

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根本不属于大学范围内的事项。如果不是每年将 1000 万美元用于与大学如此格格不入的各项活动,而只用一半的经费发展摆脱了各种无关之事与荒唐活动的学术事业,今天的哈佛大学会显得更加伟大。更不必说,如果它将目前的全部收入用于扎实的和高层次的学术事业,它的影响还将远远不止目前的两倍。

哥伦比亚大学的总开支实际上同样达到 1000 万美元,但这笔开支并没有全部用于大学层次的教学与研究活动。行政管理——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变得代价高昂——全年用去了 50 万美元^①;由于学生人数庞大,校园活动繁多,一年用于各种校舍和场地的费用几乎达 100 万美元;剩下的种种不属于大学层次的活动需要 50 多万美元^②;大学推广课程和函授课程吞掉了 150 万美元,不过这些活动也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对此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商学院的开支略少于 16 万美元;用于研究的仅 71.53 美元!罗马尼亚研究所的开支则为 86.50 美元!无论如何,可别忘记分配研究所尚未建立!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出版物、法学院和医学院、图书馆及其他一些研究活动约开支 500 万美元。因此说哥伦比亚大学开支 1000 万美元显然是一种误导。就它实际上是一所大学而言,它的开支不是 1000 万美元,而是 400 万美元。如果它合理地使用这 400 万美元,它作为一种教育力量的影响会大得多,因

① 在此我省略了令人不解地列在“一般性大学管理”名下的若干开支项目,如“面向盲童学生的公共补助”、“面向教师子女的幼儿班活动俱乐部”、“人文科学研究”、“新闻研究”,等等。

② 包括“普通礼拜”(“Commons”)、国际关系协会、法兰西馆、意大利馆、德意志馆、牙科学院、暑期讲座,等等。

为它会成为一个学术机构——而它现在却不是。如果它能够把它目前的全部开支用于追求真正的大学目的,它将会更出色、更优秀。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财政运作值得认真关注。该大学(不包括管理得当的医学院和医院)最初获得的捐赠为 350 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几次金融灾难(其责任完全与董事无关)使这笔资金化为乌有。但后来捐赠资金不断积累,目前已经达到 600 万美元,其中 400 万为完全非限制性资金,不包括投资于一项新的基建项目的 150 万美元非限制性捐资^①。当然,这笔资金根本不够用,其购买力只相当于 60 年前霍普金斯先生所提供的捐献的 1/5。因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理学部这一大学的核心部分显得十分贫穷。显然,理事们应限制自身的活动,避开资金不足的风险项目,节省大学的资源。此外,美国总的学术状况基本上表现为,一所高水平的小型大学在大学领域所能取得的成就,至少相当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洛克菲勒研究所在医学领域所取得的部分成就。确实,各大学的理事、教师和校友近来一致同意严格实行这一政策。尽管资金尚未落实,但由于目的高尚,需求明确,开支有限,毫无疑问,计划项目往往会随之出台的。然而,虽然制定计划时热情十分高涨,但往往不出数年,所制定的计划就在惰性的作用下逐渐被中止,然后一个新的项目——尽管其本身不乏价值,但启动时严重准备不

^① 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应上一项新的基建项目是很值得怀疑的。大学负担不起,本来这一问题也解决了。但某些具体设想近乎荒谬:根据建议,建造“一座校友宿舍”需花费 50 万美元,校友提供 10.7 万美元。而理事们不但没有放弃这一项目,反而再向常规储备金借资 40 万美元,从而进一步耗空了常规储备金。

足——会取而代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大学工作所能获得的资金已被愚蠢地削弱了。但在过去两年里,尽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它还是创建了法学研究所,并筹资 17.84 万美元作为该研究所三年的开支。可是不过才两年,该所的支出已超过了预算总额。如果企业这样运作,任何企业都会很快失去偿付能力。用于教师和工程学院的年度总预算不到 100 万美元,其中 30 万美元用于行政管理、常规开支、推广课程和各种各样的零星支出。可以有把握地说,用于吉尔曼校长最关心的目的之开支不到总支出的 1/3。用于维持场地的开支多于植物学、哲学、植物生理学或希腊语等系科方面的开支。同时,即使将建筑物及场地设施等排除在外,仅医学院获得的捐赠已是文理学部全部捐赠的四倍以上!

我在前面提到过,美国大学的资源会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捐赠而大量增加。极为遗憾的是,这巨额捐赠被大量地用于次要或毫无价值的目的。大笔的开支浪费在无用的或奢侈的建筑项目上。所资助的都是威尔逊校长所说的“次要事项”,而为主要机构提供的资助仍很不足。有资金风险的项目匆匆上马,大笔开支耗在一些特殊项目上,结果捐赠不但没有得到积累反而被分散用掉了。无数的资金被用于复杂的行政管理以使学校这架笨拙的机器得以运行。每年还有大量的资金浪费在根本达不到研究的基本条件的所谓“研究”上。近些年来,美国大学的校长都难以做到勇敢地坚持原则,只接受用于一般的和重要的目的的捐赠——即用于主要学科和得到承认的必需专业的捐赠,而拒绝接受几乎必然使大学越来越穷、越来越弱而不是使大学越来越富、越来越强的特定捐赠。几

乎每一项活动一旦得以启动,它的发展就需要进一步资助,因此今天的财产会变成明天的债务。这一点本来有助于大学谨慎对待新的义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学新任校长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博士竭力要求人们注意,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尽管一方面其财富可能在逐渐增加,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因为接受多项专项捐赠而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前任梅森(Mason)博士已将芝加哥大学描述为“拥有捐赠的穷大学”。在这一点上,大学校长的处境尤其困难:为了提高薪水——尤其是优秀人才的薪水,发展陷入困境或缺陷明显的系科,大学需要额外资金,但这种资金却最难获得。相反,所提供的捐资都有特定目的——有些是有价值的,有些毫无价值;有些肯定能够及时赢得进一步捐助,有些也许将成为极大的消耗和沉重的负担。拒绝捐资可能导致疏远捐资人,并使这一微妙的事情产生许多不愉快的结果。由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金,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捐助人提供捐资的目的,因此大学根本做不到自主管理。经验使我确信,大学本身要受指责,因为它们往往过于羞怯,没能很好地开导捐助人。没有一所接受捐赠的大学必须承受它无法承受的任何事。因此,尽管大学财产有时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没有限制的、可任由大学当局支配用于发展真正属于大学的工作的非限制性捐资,却出奇地匮乏。一方面是在建造富丽堂皇的哥特式、新哥特式或殖民时代式的建筑,建造能够容纳五六万橄榄球赛狂热观众的水泥体育馆,设计精美的学生宿舍,另一方面学院或大学却在为自己无法支付像样的薪水而辩解——这种现象到处可见。真正的穷大学是没有那种自己其实无法负担的大楼可夸耀的大学。同时,十所左右的美国私立大学却

拥有多达 2000 万美元的捐赠——这相当于建造一艘巡洋舰的费用！尽管这些大学拥有商学院，却显示出了极低的商业意识，因为它们正在着手进行一项自己承受不起的大事业。

近些年来，一些大学采用各种可疑的办法筹集事业扩展所需的资金，尽管在许多特定情况下这种扩展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私立大学的资助取决于富人的理智和善意。大学应该等待这种理智和善意的形成。在这种理智和善意的形成过程中，大学决不应采取有损于自身尊严或面子的行动。不幸的是，大学都匆匆向公司、企业敞开大门，任由它们采用“房地产经纪人”在“开发”不动产项目中所使用的方法，帮助自己筹集资金。依靠这种办法筹资的所谓的“半个世纪运动”(Half-Century Campaign)接近结束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承认，尽管依靠此类办法进行了有组织的宣传，“(筹集的)非限制性资金总额只有 10 万美元”。大学雇用一批人做广告，这些人收了钱后愿意“吹捧”任何自称学术的东西——这种现象是否有损于大学尊严，我不想证明。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有人可能会辩解说，既然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开设研究生层次的广告术课程，大学就有权开展教学实践。

为了帮助哥伦比亚大学筹资 3950 万美元，一群杰出的公民正在呼吁纽约公众提供捐资。其他大学则嚷嚷要筹资 7500 万美元或 1 亿美元，还有 500 所学院要求筹资 5 亿美元。没有一所院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批判性思考；没有一所院校知道，要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它需要的资金应多于还是少于现在的估算。除非大学制定有关明确的学术标准的政策，否则大学不可能确定自身的经费需求。此外，私立大学所需的资金总数在持续增加，上升很快。能否解散一个系科并有节

制地重新确定新的发展方向？没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但是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了：随着知识的进步，在原定目的达到之后，各种因素——包括人员、资金和设备——应该加以重组，确定新的发展方向。除非大学当局不断伺机调整开支，否则以民间捐资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终将失败。

三十三

在上述分析中，我坚持认为大学的基础是人才。由于美国大学的涉及面是世界上最广泛的，学科分支的划分在世界上是最细的，因此美国大学需要最大规模的管理人员。其实管理人员的数量并无必要如此庞大，这是由于大学提供的服务过于琐细造成的。由于管理人员规模庞大，招聘的人员就不可能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大学也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资金。鉴于上述种种理由，美国大学教职员的收入就低得可怜。大笔的开支用在建筑和体育项目上，而这类开支再加上非限制性捐赠，本来可以大大地改善大学教授的状况。如果大学坚决放弃那些无足轻重的课程、讲座、出版物和荒唐的“研究”，减少教职员人数，大学教授的状况还能得到进一步改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其黄金时期只拥有两座经过改建的宿舍。据报道，一家报纸曾嘲笑这所新大学“在帐篷里授课，用空肥皂箱装书”。据说吉尔曼校长的反驳是：“这正是我们所提倡的。”

美国是一个生活费用昂贵的国家：房租、服务、食品、服

装、娱乐、旅行、书籍,都比其他任何地方昂贵得多。生活水准的确很高,教学与学问却并不受尊敬,因此社会声望不能补偿较低的收入。这一点与其他地方恰好相反。美国不具备与非学术阶级创设的标准无关的学术地位。几乎所有的生活力量,无论是可估量的还是不可估量的,都在推动男女青年进入企业、律师行业或医生行业。如今已没有人会认为大学的教职有利可图,能够吸引对教学和研究既没有兴趣也缺乏天资的人员。而事实上,由于这些教职的薪水如此之低,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吸引对任何特殊事物都既没有兴趣也缺乏天资的人员。这些人至少可以通过教学而糊口谋生,正如以前——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如此——同样这些人会进教会糊口谋生一样。我也承认有例外情况。有不少人才是贫穷和艰苦阻挡不住的,他们是美国学术专业的精华。有少数人——在如此富裕的国家这些人实在数量太少——尽管并不富裕,却乐于过一种宁静而富有成效的学术生活,还有一些人——我想人数不是太多——通过“与钱结婚”解决自己的问题。近些年来,薪水终于已有所提高,虽然它还远远不足以使一名学者或科学家能够藉以结婚成家、教育子女、生活稳定、购买图书以及轻松度假。许多透彻的研究结论表明,比较而言,一名大学教师还不及30年前富有。“在公民的平均收入增长200%的同时,教授的实际收入只增长了不到100%。”^①美国通识教育委员会(the General Education Board)主席特雷弗·阿内特(Trevor Arnett)根据一项涉及302

^① 自1900年以来。见诺伊斯(W. A. Noyes)提交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份报告:《付给教授的薪水是否公平?》

所学院和大学的艰苦研究得出结论说,“尽管人们作出了各种努力”,1926—1927年真正的平均薪水水平只是比1914—1915年略有好转^①。为该研究提供信息的人中,66.5%需要通过兼职收入弥补薪水不足,而这些人中有近3/4完全是由于贫困而兼职。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美国的大学体育运动》(*American College Athletics*)清楚地表明,体育教练的薪水要高于大学教授。在100多所学院和大学里,教授的最高薪水为1.2万美元,平均为5158美元;在数量大致相同的大学里,体育教练的最高薪水为1.4万美元,平均为5095美元;在96位橄榄球教练中,薪水最高的是1.4万美元,平均为6107美元。当体育教练的收入比当大学教授的收入更高!

哥伦比亚大学经过巨大努力,最近宣布,教授的最低薪水一般为7500美元——另特设9000美元、1万美元和1.2万美元三个档次。当然,这一薪水标准已有所提高,但尚不足以确保最受欢迎的教授仅靠自己的薪水在纽约市过上舒适的生活。因为从该市现有的价格水平看,2万美元一年的教授薪水对一位有水平、有教养的人才来说也算不上太高。除非迅速提高薪水标准,否则比较严肃的学科——如哲学、古代语言、数学——必将陷入人员不足的困境。然而其他学科将面临更惨的命运。我一开始就强调大学现代化的重要性,即运用纯学术的观点去解决法律、政治、工业、工程和教育的问题。但是,对这些眼前问题感兴趣的人也正是企业界、工程界和商

^① 《不定期论文集》,第8期(美国通识教育委员会出版物)。有关一所代表性大学薪水状况的详细而令人敬佩的研究,参见亨德森(Henderson)和戴维(Davie):《一所大学教职员的生活费用》,耶鲁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

界所需要的人。如果他们享有大学的声望,对工商界来说,就要比独立的个人或纯粹的雇员更有价值。因此,导致学术性医学发展的情景,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以一种更为尖锐的形式出现。一位报酬偏低的教授不得不要么离开大学,要么——或许是无意识地——使自己屈从于校外的津贴或工作。毫无疑问,后一种情况已经发生。系科应像法院一样具有独立性,正如塞利格曼(Seligman)教授所强调的,教授的长袍应与法官的长袍一样纯洁。大学的全面现代化,勇敢地解决当前社会迫在眉睫的种种法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大学使自己的教师彻底摆脱校外私人津贴的能力,这么说也许一点也不过分,否则很难理解教授如何才能保持完全独立的学术态度。不难看出,不管教授是否保留这种态度,普通公众仍有他们的疑虑^①。

真实的情况是——当然也有例外情况——美国的教授属于无产阶级,缺少他们有权享受的舒适生活和人格尊严。富有的大学生生活得十分舒适,他们拥有各种俱乐部场馆、兄弟会场馆,并经常住在豪华的宿舍里,但这些不是教学人员所能

^① 塞利格曼在1930年5月份出版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公报》第16卷第5期发表了一份有关公用事业宣传的报告:《学术的义务》。这份报告虽然没有涉及薪水问题——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智的与温和的讨论。在这方面,我再次提请人们注意哈佛商学院那些从事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管理的合伙人的愚蠢行为。不管这些人的出发点多么美好,他们却掌握了大量的资金,用以促进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那些领域的研究。

芝加哥大学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教授在他的著作《真实的工资》(1930年)的序言里,披露了进行没有实际利益的研究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事先就知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近六年的时间……以及那段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我也许没有勇气承担这项任务。”

享受的。因此,即使在我国教育水平最高、自我感觉最好的地区,在其空前丰富的国民财富中,也只有少量被用于一个文明社会会高度重视、总有一天也必须高度重视的那些用途。同时,本应吸引到大学中去的精神和物质的活力,却被过多地强行导向进展顺利时能够提供充足回报的那些活动。这种情况发生之时,正是理智的堡垒需要得到最有力的捍卫之时。

教授职位还有一点不利之处。以前做一个学院或大学教授具有某种意义,正如拥有一个学院或大学学位具有某种意义一样。这一合理的声望对所过的简朴生活不失为一种补偿。如今,形势已经逆转。经济学、物理学、哲学或梵语学领域的教授发现自己与商业英语、广告、新闻、体育或课外活动领域的教授同在一条船上。他们都拥有相同的职称,而后者通常收入更高,因为他们常常承担有报酬的校外兼职。因此,在牺牲学术目的的同时,大学也牺牲了比金钱更重要的学术声望。半因报酬低下、系科臃肿,半因声望降低,塞利格曼教授指责美国大学的人才观“不吉祥”是完全有理由的。

这些事实与数字叙述了一个故事——但还不是全部的故事。它们说到了几乎普及的教育追求,几乎普及但却幼稚的受教育信念,似乎教育的确不过是学习课程、接受面授、通过考试、储存“学分”。这一切都蕴涵某些积极的意义,然而消极的作用也确实存在。信息或许可以用“学分”计算,但教育却不行。教育是一项由个人承担主要职责的工作,一个明智的教师会认识到他所能提供帮助的范围是很有限的。此外,数字及这些数字增长的速度也表明了个国家同时百业俱兴——不仅在砍伐树木,推进边疆,而且在提升社会的、经济的、工业的和家庭的水平,开发艺术宝藏,对抗疾病,促进学

术。为了进行所有这些各不相同、互不相干的工作,必须找到或创建各种各样的机构。大学碰巧是现存的容量最大、最灵活的机构,大学本身也乐于被利用来履行任何冠以“教育”名称的职能。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但也犯下了不少弄虚作假的错误,正气的提升和良莠的区分因而变得极其困难。

三十四

依我所见,不管面临的压力有多大,上述情况并非必然出现。不管其他院校做什么,一些私立大学本可以坚守阵地,能够并且应该充分地体现现代学术、训练和研究的观念,而不必向各种突发的奇想敞开大门。用以辩解或解释目前状况的那些因素,也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维护标准和理想的最强有力的理由。用以提升舒适、健康、幸福和知识的普遍水平的精力和努力付出得越多,在某种情况下毫不妥协地维护正确的、真正的学术价值观的重要性就越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其次,也是因为它对普遍追求的推动。在这一点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再次提供了一个样板。它一开始就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并努力勤俭办学。整整 20 年时间里,它的资源几乎没有得到增长,但它没有妥协,最终它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成为与众不同、水平更高、质量优秀而纯正的学院。它的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公认的办学模式。曾有人竭尽全力,企图再造这所学院。该学院也时来运转,各种捐赠源源而来,

还得到了新的诊所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如果它在孤独而贫穷的办学初期就向当地的私立学校、疗骨术和顺势疗法妥协，它还能有今天的辉煌吗？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所能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也可以做到。它本可以做到“贫而诚实”，现在它依然贫穷。它努力追求大众化——发展本科生教育，争得美丽的校园，扶持体育运动，并与马里兰州签订无耻的协议——因此而失去了它曾一度拥有、并且本来可以继续保持的于国家福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地位。

照目前的情况，依我所见，显然任何美国大学都不符合我所强调的概念——既由于存在种种与大学不相干的事情，也由于各项严肃的工作所蒙上的污点。“责有攸归”，耶鲁大学校长安杰尔(Angell)——顺便说一句，没人会认为他反美、缺乏同情心和鉴赏力——写道：“责有攸归，我们在美国根本没有形成一种普遍尊重学术的风气……最终支持教育的广大公众对杰出的希腊学者的重视远远不如他们对体育运动、尤其是橄榄球及其所象征的一切来得重视。这一事实也许令人痛苦，灭人幻想，但毕竟是事实。”^①

怎么办？

首先，应面对事实，立即终止在美国已达到空前程度的自欺欺人现象，这是十分必要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最近的一次演讲里^②，根据对人类的相对意义，认真比较了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莫宁塞德高地“与世界上最神圣、最鼓舞人心的四

^① 《过剩的学院人口》，见《哈珀杂志》，1927年10月。

^② 演讲题目为《别了，不朽的母亲！》，1929年10月31日。

个地方——即芒特奥利夫斯(the Mount of Olives)山顶、雅典卫城(the Acropolis at Athens)、罗马卡皮托利诺山(the Capitoline Hill at Rome)和巴黎市坡度平缓的高地圣热讷维耶沃(Saint Geneviève)。”这种毫无批判性的语言泛滥成灾,严重阻碍了事业的真正进步。还有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障碍。“我们是一个新民族,我们正在穿越一个阶段。”因此随着岁月流逝,随着我们走出这一阶段,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然而,我却无法坦然地忽视那片辽阔的地区,在那里,尽管条件有限,但凭着努力、智力和资源,即使现在也能取得重要的成果。“在你们美国的新大学里”,30年前德国一名杰出的解剖学家在给一名美国学生的信中写道,“你们拥有强大的‘动力’(nervus rerum),如果能把丰富的资源引入合适的渠道,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取得累累硕果是有可能的。但在此要强调一点——涉及创造性的学术问题时,主宰进步运动的人应懂得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①“阶段”理论解释不了吉尔曼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哈珀的芝加哥大学以及美国医学院在1910年恶劣条件彻底曝光之后出现的突飞猛进。我曾指出,将理智、努力和资源结合起来,在美国有可能取得几乎一切成就,而这正是我们很少做到的。我们有理智——却被打入冷宫;有努力——却狂热急躁,毫无目标;有资源——却铺张浪费。今天的美国大学,缺少合理而协调的哲学、理论或原则作为基础。

^① 摘自威廉·希斯(Wilhelm His)教授1899年4月22日写给摩尔(Franklin P. Mall)教授的一封信。感谢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萨宾(Florence R. Sabin)博士为我提供此信的复印件。

人数的压力,对真正的或被淡化的知识的渴望,对学术标准的普遍藐视,政治与宗教的四处插手,理想是“贵族的”而压抑人才与智者的自由竞争是“民主的”荒谬观念——由于这一切,使美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迅速解决变得根本不可能——或者说,就此而言,使美国任何层次的教育问题的迅速解决都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缺少教师,缺少设施,缺少标准,缺少理解,也缺少接受差异的愿望。在一片喧闹之中,优秀的工作仍在继续。高贵的学者和科学家从来就没有被击倒过——战争没有击倒他们,贫穷没有击倒他们,压迫也没有击倒他们,将来他们也决不会被击倒,就像过去他们没有被击倒一样。

然而,“大学”一词能否得以保留,或甚至是否值得保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该词,用以指向那些我在本章描述过的无形的和不协调的活动——无论是正确的,错误的,抑或是无关的活动?如果“大学”真的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宣布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大学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事物,一种虽然不乏功用,但却肯定不是大学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为了体现一种真正的大学的理念,有必要创建一个新名词——如高等教育学院或研究院(a school o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以便它能自动排除与学术机构无关的低级活动。

很清楚,无论如何,任何统一、彻底和全国性的革命都是行不通的。在哈佛、哥伦比亚或芝加哥等大学可行的事情,在密西西比、得克萨斯或密歇根等大学就会在很长时间里行不通,因为密西西比大学或得克萨斯大学易受政治风暴的袭击,而在密歇根选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则是一种错误的大学观念。变革也决不能只限于大学,中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中

等教育包括目前的中学教育和学院教育的一大部分：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两个部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而不是三个（中学、学院和研究生院），这一点只要看看学院第二年教育结束时大学生人数锐减这一事实就很清楚了^①。因此，大学教育的改进取决于中等教育的改进，后者应尽快废除学分制，放弃将实用性或技术性科目成绩计入大学入学成绩的做法，并花更大力气追求全面性和连续性（即更高的标准）。我知道我提出的要求很高——但如果我所选择的那些大学能够做到注重质量胜于注重数量，在适当的时间里它们完全能够达到我所提出的要求。

在这些大学内——其他大学将在适当时候迎头赶上——可以进行同样的改革：主修课、副修课、学分将立即消失；一些大学将取消第一或第二学年；全部或部分保留本科学院的大学至少可以放弃划一的四年制课程，承认个人在能力和勤奋方面的差异，并将属于教师任务的真正的教学与属于学生义务的学习区分开来。千篇一律既不可行，也不应追求。虚假的专业——新闻、商业、图书馆学、家政学和视力测定术——可以放弃掉，大学或社会都不会为之感到遗憾。坦率地说，所解脱的那些工作本来就不是大学所应关心的，而应是由社会来关心的，应由社会创建适当的机构来履行那些真正值得履行的职责。

最可怕的“学院”——哈佛研究生商业管理学院——可以

^① 参见明尼苏达大学分别于1924年3月17日和1925年2月10日发表的研究报告《大学生的“失败率”》和《大学生的成功率》。这些研究报告显示，新生班中只有1/4学生最后学完正规的四年课程。

加以分离。幸运的是它地处波士顿,还有比波士顿研究生商学院更合适的吗?这样哈佛大学就可以享有自由,以实验方式处理商业领域专业训练的问题。教育学院也可进行改革,试行发展;医学院、法学院和工程学院也应广开言路,进行必要的改革。全体教职员应实行专职制:任何人都不必为了生计去做“零星杂工”。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大学一方和商业、企业、政府、教育和公共卫生另一方之间可以确立更密切、更有益的关系。因为对事物的金钱兴趣消失之后,教师可以将整个现代世界看成一个大诊所。只有如此,大学才可能实现我在开篇章节中所说的那种现代化,同时维护它的学术正义。推广课程可像英国那样限于有大学教育价值的科目和成年学生,函授系科应该取消。进行上述改革之后,美国的大学将得到极大的简化;广告将消失;管理将比较轻松且费用低廉;学术合作将及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将立即成为杰出的大学;它们在未来许多年里不再需要建筑;它们的财政状况将得到极大的缓解;它们将成为学者和教师小团体的代言人。由此,高得多的学术标准将得以确立。我大胆地认为,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大学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就将远远大于今天。

本科生学院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若干年前,我在波士顿的《实录报》(*Transcript*)读到一名哈佛校友的愤怒来信,抱怨大学正在“扼杀本科生学院”,正如随着中等教育的改进它肯定会这样做一样。在《哈佛回忆录》里,埃利奥特校长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哈佛的文学士认为,哈佛各专业学院的毕业生不能被视为哈佛的真正孩子,

而且哈佛大学通过其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学院为国家提供的服务,并不大于它通过其本科生院提供的服务。这是一种仍在阻碍进步的哈佛传统!”

的确,目前的阻碍还要大于埃利奥特校长写作的时代,因为根据现在的行政管理制度,虽然哈佛研究生院的发展取得了进步,校方追求的政策却明显向本科生工作倾斜。

直接创建一种研究生层次上的大学机构,即高等教育学院或研究院,将极大地有助于取得进步。它应该是一个学者的自由社会——之所以是自由的,乃是因为为学术目的所激励的成熟的人,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行政管理应是微量的和费用低廉的^①。学者和科学家应参与大学的治理;校长不应高高在上。“组织”一词应严禁使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不仅不需要填鸭式教学,而且对此极为憎恨——大学应向这些人开放而不管他们是不是本科生院的毕业生。大学应提供简朴的环境条件——图书、实验室,以及更重要的是安宁——以摆脱世俗事物的干扰或对不成熟的学生整体负长辈责任的烦扰,应为大学教职员的校内外生活提供比较舒适的条件。没有必要强调完整性或对称性,如果一个讲座职位得不到理想的补充,就应该让其保留空缺。美国不存在这一意义上的大学——没有专门从事高层次教学与研究

① 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给我写信道:“我认为,目前提倡反对行政侵夺某些只有学者才能适当履行的学术职能的趋势,是极其重要的。我常常认为,对我们来说有利的是,我们应该回归——至少是部分地回归——在德国长期行之有效的制度,即由商人和职员承担教育机构的房管工作和财务工作,而从资历较深的学者中任命院长,任职一至二年,解脱他们的教学任务,使他们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能有时间与一个由同事组成的委员会协商,专心考虑教育政策问题。”

的机构和中心的大学。在各地的大学里,本科生和职业性的活动阻碍了大学为之存在的严肃目的的实现。科学和学术因此蒙受损失,资金因此遭到浪费,就是本科生的训练也达不到本科生院独立办学应有的水平。

如果建立一所现代美国大学,我们有什么期望呢?最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将被吸引到它的教师行列,最认真的学生将被吸引到它的实验室和研讨班。它的规模很小,就像吉尔曼时期的霍普金斯规模很小一样,但它的动力却很大,远远超出它的规模的比例。它将像一块透镜一样,把现在发散的光聚集在一起。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规模很有限,其医院只有65张病床,但它毫不妥协的工作标准和成果标准却使它的影响遍及欧美的整个医学教育和研究领域。达到我所指出的那种水平的大学或高等教育学院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并最终推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组。

第三章 英国的大学

—

出于对照和比较的理由,请允许我在讨论英国大学之前,简单总结一下美国部分讨论的结论。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解释的,美国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当地的环境与眼前的压力。诚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已有一段历史,但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是如此贫瘠,这一点从它们所体现的精神、所付出的努力和组织方式与其他不久前创办的大学是如此相像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它们认为彼此不同,但这些差异是相当次要的,而相似性则是根本的和意义深刻的。这种相似性也不能归因于芝加哥大学和那些州立大学模仿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一事实。恰恰相反,热衷于现代化的哈佛大学,却不幸地与中西部的大学多少有些类似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由于作用于它们的是同样的力量,由于历史较久的大学的传统、理念或理想不能产生足够的抵制力量,它们的组织和活动十分相似。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大学善于革新这很好,但各种

事物不分良莠一起闯入大学,则令人悲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实现一项正确的发展——研究生院的创办速度和医学院的改组速度就是证明。但不幸的是,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在面对新的发展时,批判意识是如此薄弱。一方面,一位独立的美国人依靠自己的成就就可以当上教授,就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近的情况那样^①,一个新的学问分支可以很快具有学术形式;另一方面,弄虚作假者,精于技巧者,聪明的“推销者”,讲究实际者,也可能轻易得势。这些人挤进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社会阶层的结果,人们不得不设计一种异己的管理机构,以保持这架笨重的机器能够运转;一种野蛮的、不受控制和不加批判的大学扩展因此产生;严肃的事物退避三舍;冒牌学者发表了许多丑化研究的东西,他们发出的噪声淹没了美国本应倾听的仍很微弱的声音。就这样,一个“相信”教育的国家,居然允许政客败坏中小学教育,允许大学因承担不合适的任务而垮掉。

二

随着讨论的展开,我将描述并解释我对英国人的看法。在进行具体的描述之前,先作这样一个大致的概括也许会有

^① 英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同牛津大学已故教授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剑桥大学教授奥凯(Okey)和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丹尼斯(Daniels)的生涯所表明的那样。

所帮助。英国人相信宗教,讲究风度并热心于政治。在他们的历史上,教育一直是要么服从于宗教,要么惟风度至上,要么听命于政治,要么同时为三者所主宰。^① 但对待这一概括我将有所保留而不会全信。今天的情况已不像一代人或几代人以前那样符合这一大致的概括,因为在那时,英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独占鳌头。如果英国要摆脱目前的困难局面,出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它将与上述概括表明的情況相距更远。但即使是现在,尽管哲学激进派及其后继者做出了各种努力,纯粹的教育——即与实际、与教会或与贫困相脱离的教育,从原则或理念出发的、作为自由的人类理智权利的教育——在英国人看来也并无多大的吸引力。同时,据最早的记录显示,无论在英国大学之内还是英国大学之外,甚至在英国大学产生之前,纯粹的无私利性的学术和科学活动亦已在英国得到赞助和鼓励。当大学由于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偏执而近乎死亡时,杰出的学者们便避世隐居,做自己的学问。同样,在英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独行其是,与学术机构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一位银行家曾是直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最杰出的希腊史的作者,一位悠闲的绅士在《物种起源》中做出了对科学和哲学最令人意外的贡献。里卡多也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好,都不是大学教授。因此,不管什么样的英国人,都首先是一个有显著的独立倾向的人,他对自己的非逻辑性感到自

^① 在欧洲大陆,新教也对中等教育起推动作用,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教育信念的产生,新教的重要性迅速降低。在英国,正如我们后面所见,新教仍是一个活生生的、引起争论的影响因素。

豪也并非毫无道理。此外,那些古老的大学,不管它们有什么缺陷——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缺陷已被英国人以其特有的坦率加以指认——作为高等学府,仍远远优于美国目前已经产生的任何事物。因此,在所有国家中,英国是最难描述和最难判断的。然而,即使在美国,站在原则的立场去判断事物,采取行动,忘却权宜之计、历史或传统,也仍未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

三

决定大学的目的与质量的根本因素是中等教育。尽管哲学家和改革家做出了种种努力,英国的大学和获得捐赠的公学却几乎直到19世纪晚期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和知识圈。它们都是圣公会的机构;它们都对不信奉国教者抱有敌意;它们都是培养一种类型的人——英国绅士——的机构,这种类型的人注重的是道德的和社会的内涵而不是知识的多寡。拉格比公学(Rugby)的阿诺德(Arnold)博士进行的革命,导致性格养成成为绅士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是那些公学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工作中心。人们感到奇怪的不是性格和风度重要不重要,而是像清洁整齐或口齿清楚这些优点现在为什么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持久地强调早已牢固确立的、明显的、基本的和典型的民族性,往往导致注意力从其他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务分散开去——而在现代生活事务中理智已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

即使在宗教检查和其他标准被摒弃之后,我所描述的圈

子也很容易得到维持,因为公学的教师主要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它们的学生毕业后也进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一个圈子因此得以建立,纳入圈子的是某些明确的影响,而被排斥的某些联系有的是重要的,有的也许是有害的。有一点很重要,决不能被忽视,即:不管公学有什么缺陷,它们所有的一切都与大学相关联。由温彻斯特(Winchester)公学或拉格比公学毕业的男孩已完全具备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的能力。由公学提供的那种类型的中等教育是与大学相连接的,它们双方一起变化。既然学术成就在大学的威望日益提高,公学也就竞相努力,争取获得最多的杰出人才。同时,它们双方都继续以典型的方式养成风度,发展体育。这样,学术和体育,公学和大学,沿着两条线和谐地齐头并进。

然而,其他因素却使这一简单而单一的局面复杂化了。激进派和功利主义者从未对英国圣公会教义或有关教育机会的任何其他限制表示过满意。但它们的立场也并不令人愉快。它们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哲学越来越明显地剥夺了大众的教育机会和其他机会:自由放任时,国家的政策明显有利于特权阶级。对国家干预(更不用说国家控制了)的厌恶,在英国仍然势力强大。因此,国家垄断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想像的。1800至1870年期间民间力量在解决教育问题时只得到国家微不足道的资助。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指出了为全国中等教育提供适当设施的极端必要性。他撰写的题为《欧洲大陆的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 on the Continent*)的杰出报告,至今仍是充满生气的文献。在初等教育领域,格莱德斯通(Gladstone)先生的改良政府促使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义

务初等教育,甚至支持开办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学校和非教派学校。后来英国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令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的发展。1899年法主要是在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之一、已故的罗伯特·莫兰特(Robert Morant)爵士的努力下颁布的。该法为1902年和1903年立法铺平了道路,尽管这两个法令承认的是圣公会的既得利益。这些法令带来了教育的量变和质变。1918年通过的费希尔(H. A. L. Fisher)先生教育法推动了教育结构的基本完善。地方当局继续控制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央政府则提供教育补助。获得补助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由白厅制定。明智的督学深知影响比权威更适宜、更有效,他们漫游全国,与地方当局讨论计划与形势,他们决不挥舞“大棒”,他们也不制定法律,但他们在身后留下各种建议、问题以及在伦敦形成的有用的教学大纲,并告诉人们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获得国家补助的条件是什么。井井有条和生气勃勃的进步随之出现。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费希尔法最终将使英国建立高度灵活而恰当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制度。这一制度根基扎实,界限明确,依据白厅确定的明确标准开展工作。这是一种为英国人性格所接受的民间与政府的愉快合作。民办(非政府开办的)学校的数量仍占多数,虽然地方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要比民办学校多 $1/3$,但约有25%的初等学校的教师仍未获得证书。但上述事实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因为为比较聪明的儿童提供免费学额和奖学金的灵活自由的做法^①,为那些推动

^①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现有1301所中学接受补助。它们(1925—1926年)共招收了360503名学生,其中36.5%获得免费学额。见威尔逊(Wilson):《英格兰的学校》,伦敦,1928年版,第357页。

未来进步的人才打开了机会之门。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英国人愿意归顺美国人的理论,即认为一种学院教育或大学教育对任何能够读完中学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显然这不是事实。很多 18—22 岁的青年更适合于就业而不是读大学。英国人正是通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努力为这一批学生——也是大部分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和所能吸收的知识。但英国也和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财富仍然胜于理智: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未找到将懒惰愚蠢的富人子弟归入适当场所的有效办法。

在以教育机会增长和平等主义哲学兴起为特征的时期,为了维护某种教育的纯洁性,享有很高声望的古老大学虽然壁垒森严、抵制性强,却也施加了一种强大而有益的影响。它们适当地接受了科学和现代语言,但没有接受体操和烹饪。在英国,现代化并没有消除学术活动与低级活动的区别。因此,在职业性和实用性危及所有正确的教育观念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其纯洁性的机构^①。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这个商业国家没有慢慢地悟到技术教育或工业教育的需要。它只意味着英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失去对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区别的认识。德国各州教育部中那些训练有素、

^① 对此,人们将怀着由衷感激的心情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康德尔(I. L. Kandel)教授的下述看法:“外国对中等教育的内涵具有明确的观念,我们(美国人)应该下大力气去理解为什么这类教育应与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相区别。(美国)企图将各种类型的青少年教育活动纳入一个机构的做法,说明了为什么每一项教育活动都无法达到完美境界的原因。……对特殊的狭隘利益的适应将……与所谓的欧洲贵族文化一样具有瓦解作用。”载《学校与社会》,第八卷,第 261 页开始。整篇文章值得认真关注;我在不改变文章原义的情况下对引文作了简化。

头脑敏锐的人才为德国所做的,也是英国十分固执的公学和老大学在一种真正的价值观的帮助下为英国所做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不管好坏,还存在另一种局限性:公学主要为一个阶级服务;它只生产一种类型——一种精神类型、一种风度类型;它百折不挠、专心致志地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塑造学生。在其领域内,它是一所有效的教育机构,但其领域不能与现代生活共存,因为现代生活是一种参与世界各地的智力竞争和工业竞争的民主社会的生活。只要英国社会仍是贵族的等级分层的社会,公学就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但英国人的生活正在迅速地民主化,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实行共和制的美国还要民主——也许美国人对此会不以为然。在某种程度上,公学已经认识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如它们开发了具有现代性的领域。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贵族和希望跻身于贵族行列的富人的领地。至少在目前,由于另一类中等教育的日益发展,公学的局限性令人奇怪地得到了巩固。这些新建的百余所新型学校的地位仅次于历史上的公学。它们受公学的影响很大,但满足的是更为广泛的中产阶级的社会需求。这些学校接受了公学的某些传统,但主要为专业阶层和商人阶层服务。拥有免费学额的市立学校根本不具有社会声望,能够承受公学奢侈费用的人则往往被推向公学——因此民主的发展反倒奇怪地扩大了社会的鸿沟。如果公学找不到办法控制这一趋势,它们将注定逐渐失去自己的相对重要性。

英国中学的学生人数增长很快^①。然而,按人口计算的

^① 1908—1909年和1925—1926年,学生人数增长了165%。

平均入学人数仍远低于美国。但统计数字容易令人误解,无多大意义。美国的公立中学大多数仅是名义上的中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英国也有,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虽然白厅通过认可与补助措施而实施的间接控制划出了一条在美国不存在的界限。因此,尽管英国的中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一教育既不像它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充足,也没那么广泛。

四

我们的讨论是根据这一观点进行的,即: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培养远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学生。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不是当前美国的大学理念,也不是英国人的理念。威尔逊教授认为,“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现在具有、将来也永远具有需要履行的明确职能,即去发现并培养那些能够指挥国家之舰航行的最杰出的人才。否认这一职能就等于抑制了有机体的血液流动,注定要导致该有机体的衰竭,然后是过早的死亡。”这一描述在我看来是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从现在和未来的需求角度看也无论如何都是欠缺的。迄今为止,英国的大学 and 美国的大学一样,履行三种职能:第一部分职能——比美国要次要得多——属于中等教育领域;第二部分职能致力于“服务”,但服务的层次比美国要高得多;第三部分职能致力于真正的大学活动。但我不能像讨论美国大学那样从上述三个方面讨论英国大学,因为尽管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美

国的大学相互之间一般都很相似,而英国的大学则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型。从类型角度去分析英国大学,比从职能角度去分析更为重要。将三种职能依次与三种类型结合起来考虑会容易一些。这种多样性有其优点——对英国人这样一个多少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人类社会极其复杂,人类的能力和愿望极其多样。致力于高等教育的任何一类大学都不能期望具有全面的代表性和完全的适宜性。因此,差异性就可用来产生某种接近于全面的代表性、接近于完全的适宜性的事物。学生和学者可能发现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拥有更适宜的条件、环境、学风和活动。的确,同样一个学生可能某一个时期在此地比较愉快,另一个时期在彼地比较舒畅。在英国偶然存在的这种变化,对人类精神的复杂多变是有利的。与其由一种大学囊括所有这些差异,还不如由不同的机构来整合相关的差异更合适一些。

五

一所大学,不管它属于什么类型,如果说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这种活力不是由行政手段所带来,而是由理念和理想所激发——并拥有一种社团生活,那么我坦言我根本无法理解在何种意义上伦敦大学算得上一所大学。尽管伦敦大学避免了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过度行为和荒唐做法,但它却比其最接近的美国亲戚还缺少有机的统一性。它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虽然它的确也拥有总部办公室和范

围广泛的校董会(Court)和理事会(Senate),但它只是由大量的质量与目的很不相同的机构组成的混合体。在它的圈子里容纳了将近70所机构。其中有两所是相当完善的学院,即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它们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差别不大,但更为简单,更为实在,不那么做作。有一些是研究性机构,如其研究成果逐渐改写了英国史的重要时期的历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和新建的卫生学与热带医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其中有36所所谓大学的学院是一种不加区分的混合体,包括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一所家政学院(College of Household Science)^①——尽管它比美国的函授学校扎实得多,却仍不适合于大学——十几所医院附属医学院(Hospital Medical Schools)和帝国理工学院(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有23所拥有得到认可教师的机构——即多科技术学院、音乐学院、师范学院、研究所和特殊医院^②。在主要的方面,每一个机构都保留了自主权,尽管它们都上缴了一些权力,以使某种联合得以存在。有36个机构属于“学院”,

^① “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在1929年1月29日——……国王学院女子家政和社会科学系就变成了国王家政和社会科学学院,成了大学科学部的一个独立的学院。”参见《1928—1929年年度报告》,第5页。因此,它与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处于同等的地位!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尽管它所开设的课程大多比美国家政学院开设的函授课程更充实,但这些课程也包括了“家务、洗衣和烹饪”、“初级簿记”、“针线工”和“家用电”等方面的讲课和实习。这样一所学院附属于大学究竟有什么好处?“大学”包容这样一所学院究竟意味着什么?

^② 伦敦大学系科委员会与我同样觉得难以理解。见皇家书局出版文献,1926年版,第30页,第50页。

构成了大学的核心,尽管它们都是实体,却由大学任命教授和副教授——但不包括初级教师——并分配公共经费。财务由各院所独立核算,学位标准的确立和颁授学位的工作由大学负责。大学对各院所的工作质量进行“督查”,并因此进行巧妙的影响,必要时帮助有关院所逐步提高工作质量。剩下的23个仅仅是拥有合格教师的机构,它们也开设导向大学学位的课程,但获得学位的学生比率比“学院”要低得多。它们的学生中有些可以是伦敦大学的学生,最终攻读的是伦敦大学的学位。例如,在巴特西多科技术学院的2940名学生中,有226名(不到1/10)是属于伦敦大学而不是该学院的学生。在这60余所院所中,教师分为四类:由大学聘任的教授和准教授;几所学院自聘的初级教师;由学院聘任,但需经大学批准的得到认可的教师;与大学无直接关系的未得到认可的教师。大学聘任和认可的教师现在共有1140名,未得到认可的教师共有2306名。认可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教师而言,它意味着拥有大学总部签发的批准书;对学生而言,如果他就读的不是那些构成大学核心的“学院”,那么只有受业于被认可教师的学生才有资格获得校内学位。但是,认可工作本身缺少明确的原则,多少有些随意性和偶然性。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伦敦大学之所以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不是因为它缺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条件,而是因为它缺少精神和设计的统一。我不否认大学的各成员院所以它们各自的方式服务于各种目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把它们纳入一所大学,由于大学能够履行某些有效的决策职能,它们甚至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自的目的。但这仍然构不成将这些院所纳入一所大学的充足理由,或者说仍然得不出伦敦大学是一所严格意义上

的大学的结论。我同意,总的来说,医院附属医学院受益于“标准化”和各种联系,这要归功于伦敦大学。但是,它们真的标准化了吗?在什么水平上实现标准化?对它们起促进作用的各种联系是否提高了伦敦大学的水平?伦敦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医院附属医学院水平的提高,但它没有——在我看来也不可能——使它们成为大学的临床教学机构。

伦敦大学初建时期迈出的步子是正确的。当时一群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主张“不分阶级和信仰”,向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提供大学教育——当然是当时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为此他们创办了大学学院。这所新的学院办得很出色,它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剑桥生理学学院的前辈。不久,圣公会教徒在市内办了一所函授性质的学院,即国王学院,以与“不信神的大学”抗衡。伦敦大学联合了这两所学院而成立:每个学院保留自己的自主权,由大学负责学位考试。同时,独立的教学机构在全国各地涌现。为了控制局面,避免混乱,1858年伦敦大学受权负责各地学生的学位考试,不管他们如何学习,在何地学习。当然,好处是有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稳定,学生获得指导和激励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即使如此,坏处也留下了。书面考试的意义过去一直——现在仍然——被过分强调,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发展的可能性则严重地受到削弱。随意处理发展问题的做法——这种情况在说英语的地区很流行——导致了种种问题的产生。随意的做法是不能弥合所存在的各种差异的。

为伦敦大学辩护的理由是:像英帝国一样,它也是一个联邦。在它的范围内,各成员单位享有很大的自由。英联邦是一项不合逻辑但起作用的组合,松散而牢固地将英格兰、爱尔

兰、苏格兰、威尔士、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联系在一起。完全可以证明这种组合是给分散的民族带来和平与善意的最友善的方式。没有这一方式,这些民族可能会给相互之间或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麻烦。与之相似,伦敦大学也有理由作为一个由各种事业单位组成的联邦,这些事业单位联系在一起比分散独立时更有利于各自的发展。上述类比不能使人信服——各种类比都很少使人信服。诚然,伦敦是一个大城市,但它毕竟不是世界。加拿大、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和澳大利亚相互之间的遥远距离消除了产生摩擦的大部分原因,而国王学院、大学学院、多科技术学院和校外学生的近距离,则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诸领地和属地有代表参加的联邦管理机构是不存在的,它们通过王室形成各自的统一整体。但伦敦大学拥有一个大学理事会,各成员院所在理事会中寻求统一。这就产生了一种与英帝国十分不同的情况。即使类比十分完善,伦敦大学也不能由此成为一所大学。最多只能证明,从伦敦大学的情况看,数量众多的不同机构和活动可以以这种方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最高使命是否会受到忽视或摒弃,仍有待于证明。

伦敦大学通过校董会和理事会的各分委员会实行管理。校董会掌管财政;理事会由60位左右的理事组成,他们代表各院所或学科,负责制定教育政策。但正如我所指出的,不管校总部管理机构的权力和权威有多大,它只有有限的和间接的政策控制权。医学院——大学学院医院除外——近来排斥女生。它们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大学的一个委员会“看不出在医学领域反对实施男女合校有什么好处”。但该委员会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建议又是什么?它只能“向这些学院提

交报告,建议它们考虑招收一定名额的女生,以实行大学的政策”!校董会是一项革新,它可以侵占理事会的教育禁区,因为它“受权最终决定有关大学行政的财政问题”,不过“在对直接影响大学教育政策的财政问题作出决定之前,校董会应考虑理事会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报告。”^①校董会尽管纳入了一些院所负责人,但没有纳入任何教授。教师缺少与校董会直接和适时的联系。因此校董会与大学附属院所的关系,正如美国大学的董事与教师的关系一样。校董会虽拥有批准具体建议的权力,但对具体建议的优劣却往往缺乏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因此,在校董会里,一位心存不满的院所领导可以很容易轻率地否决所在院所教师提出的任何建议。理事会则明显是一个臃肿笨拙的机构,但这也正是它不会遭到反对的理由所在。理事会实行代表制——任何负责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教育机构都不会采取这种制度。结果,理事会时时都面临着一个统一的有机体难以想像的分裂局面——试图通过建立校董会来解决财政公平问题就是这一困境的反映。后面我们还要谈到,外部机构维护的是其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以前如此,以后可能仍然如此。它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尊严与声望,而不是什么共同利益——如果在利益如此分散的条件下还真的存在什么共同利益的话。由于同样原因,十余所医学院也需要有人代表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与理念。大学政治不可避免,而政治与理想则往往是同床异梦。

学科委员会(The Boards of Studies)是跨院所的机构。由于新章程的颁布,这类委员会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但它们仍保

^① 《根据 1926 年伦敦大学法制定的伦敦大学章程》,第 7 页,第 36 号。

留了混杂性的特点。这些学科委员会也许能够保护最低限度的利益,不像美国的巨型大学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利益保护。在避免荒谬行为方面,学科委员会和理事会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这只要看看为何新闻、药学、家政及各种纯粹的技术院校未被拒之门外就很清楚。由学科委员会带来的各种交往具有教育作用和促进作用,但它们的工作既费时又费力。我很怀疑它们的工作是否对最优秀的人才有所帮助——从大学的立场看,这一点具有至高无上和压倒一切的意义。从学生的角度看,也完全可以得出同样的看法。本科生和专业学院的学生很容易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但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一样,除非研究所在达到目的之前能够得到导师的指导,否则他们很容易迷失方向。绝大多数系科没有任何有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需要的组织和出版物。

从真实的意义上说,伦敦大学实际上既不是由所属院所构成,也不等同于这些院所。它是这些院所的外部机构。它与这些院所的关系非常疏远,其人员有的从各所属院所中挑选,有的从在有限程度上对所属院所进行管理的外部机构中挑选。大学学院、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和各医院附属医学院都派代表参加校部机构,以照管自己的利益。这种校部机构不管如何称呼,一般都通过一批行政人员开展工作。因此,与任何一所院所有关的管理机构都是由该院所的外在人员构成的。例如,当管理机构处理与经济学院有关的事情时,参与投票的大多数成员都与经济学院无关。他们既对经济学院了解甚少,也对经济学院没有什么特殊兴趣。相反,他们都对自己的所在院所感兴趣。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认真而努力地公平对待伦敦经济学院,但要他们

对伦敦经济学院和自己所在的学院一视同仁,他们得十分人道才行。其他任何院所与其管理机构的关系也是如此。要使教师们视野开阔并不容易,但在一个一体化的大学里,教师毕竟都由具有相同素质的学者组成,有一条捷径可以通向视野开阔、公正不偏和目光远大的行动,尽管此路困难重重。在那些一体化的大学里也会产生各种困难这一事实,最充分地说明了在管理机构和各委员会中纳入所有各类院所的代表并非毫无必要,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理解大学工作的特点。

中等层次的和 service 性的学校、院所与教师对一所真正的大学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研究性院所和若干所普通学院构成了伦敦大学的栋梁。我将后者——我认为这不会不公正——与美国的大学进行比较。它们是主要招收 18—19 岁男女青年学生的中等教育机构。它们的研究生工作不如美国组织得好,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的工作,但因此也更加有效而不是相反。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教员队伍里过去和今天都拥有一批最杰出的英国学者和科学家——其中包括皮尔逊(Pearson)、斯塔林(Starling)、希尔(Hill)、波拉尔德(Pollard)和理查森(Richardson)。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大学本身还是各学院,其主要功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创造有利于上述杰出人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环境。这种环境在历史研究所的确存在,但除此之外还会在什么地方存在?总的来说,高层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通常——虽然不是全部——都是利用本科生日常教学工作的间隙进行的。

伦敦经济学院一度曾是大学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学部。在其教员中仍有一些杰出的教师和研究人員,如:鲍利(Bowley)、拉斯基(Laski)、汤因比(Toynbee)、马林诺斯基

(Malinowski)和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与美国的同类学部一样,伦敦经济学院也从事研究或高层次的教学工作,有一些学者为成熟的学生举办研讨班。在适合于大学教育的经济学史或政治学史等学科领域,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最重要的研究生教育中心。然而,该学院还是以本科生工作为主。它不只是从事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它还进行英语、法语和德语方面的教学。其教授与美国的教授情况一样,面向混合班进行教学,不过教学水平要高于美国,结果是教授的注意力往往较为分散。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院方还为高级学生提供了几间工作室,但这主要是供高级学生安静看书的场所。更有甚者,重心似乎正在移向“服务性”工作和本科生教学。读夜校的学生往往显得筋疲力尽,教授的重复授课也常常是——虽然也同样不全是——一件苦差事。夜校生大多属非大学意义上的学生。1928—1929年伦敦经济学院共招收2577名学生,其中678人攻读某种文凭或本科学位,1720人属于兼读制学生,179人为研究生。因此,很明显,仅从学生情况看,该学院主要属于本科生层次的学院,学生的构成也是五花八门。

我已指出,伦敦大学共有12所医学院,其中11所属于过时的一类,只有一所——大学学院附属医学院——接近大学的水平。那些医学院之所以过时,有三个原因,涉及它们的教师、学生和设施。在医学基础学科,居支配地位的是专职教员,其中不乏优秀人物,但这些领域的人财物状况及注重教学的特点,使独立的工作很难开展也很少见到。大学学院的环境则极为有利。在该学院,医学学科可以取得与其他学科相近的进展,实验学科则可以获得比伦敦大学其他学院更令人满意的资源与设备。但伦敦大学各附属医院并不是真正的研

究性医院,与它们有关的实验室只能从事常规性工作,虽然一个有思想的人也可以找机会走自己要走的路。诚然,那些医院通常都拥有足够的床位,但床位的分配并未考虑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构建研究性诊所。医务人员由忙忙碌碌的开业医生和注定要接替他们的苦苦奋斗的青年医生所组成。他们都是偏重实际的人——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很少有时间、有资源或有兴趣开展临床科学研究。由一名高级医生和他的助手组成的“工作小组”需要照看少数的病人——正如实习医生必须处理各种疾病一样。英国医科训练的显著特征是重视与病人的接触,理论性和推论性的内容很少,也许是太少。学生们在门诊部和病房解剖与分析样本,研究病人。这种教学虽然注重实用,却缺少科学基础。它是优秀的医疗培训,而不是大学训练——大学训练应是在未知领域的边缘上探索,即使在已知领域,也要体现一种怀疑和探索的精神。医学可以按上述方式进行实践,但并不是说这就是最佳的教学方式。更加可以肯定的是,经验表明,按上述方式进行教学时,知识并不能以这种方式取得最理想的进步。事实表明伦敦大学各附属医院落后了——同样,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临床教师也落后了。

与德国的系科或美国最好的系科相比,英国人的发展十分缓慢,这一点在医学领域比其他任何领域表现得更明显。的确,德国人或美国人所指的大学医院在英国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类医院在人员安排和资金供给上要注意考虑教育和研究的需要,它们像大学而不是慈善团体那样运作,服从大学的管理,并与大学的科学研究保持有机的接触。争辩说英国人的工作做得与德国人或美国人同样出色是没有用的,事实

并非如此。偶尔也会出现一个利斯特 (Lister)、霍斯利 (Horsley) 或黑德 (Head) 在逆境中奋斗,但这种人才很少。不过以全时制诊所单位为形式的胚芽已经培育出来。虽然它们仍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但它们终将使伦敦大学相信,一个人也许做不了一名优秀的大学医学教师,但却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伦敦大学由校方负责聘任专职的临床教授和其他学科教授;各学院自己聘任其他的教职人员。由各学院若干学科教师组成的学科委员会达成某些总的决议,但这些形式上的和偶尔的接触不能产生大学系科,各种学科委员会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整合,成立一个医学部。大学和大学理念的影响与力量,在各学院的利益或偏见目前显得十分微弱无力。尽管有些医学院已行将消亡,大学却无法削减医学院的数量,无法将医学院的教学限制在攻读伦敦大学学位的学生范围内,也无法为任何一所医学院提供充足的资金。最后,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在招收女生的问题上仍拒不让步,不仅不愿对男女学生一视同仁,而且不愿在任何条件下妥协。在伦敦的医院附属医学院中学习的许多学生根本不是伦敦大学的学生,他们并不攻读伦敦大学的学位;他们的目标是攻读由联合委员会 (the Conjoint Board) 提供的某种其他学位或资格。1927—1928 年,伦敦共有 3425 名医科学生,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 (1814 人) 攻读伦敦大学学位。教学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为目标是学生自选的特定的考试。根据学生的不同目标,开设特定的课程。最优秀的学生通常都是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过医学基础科学的学生,但他们根本得不到临床实习或做实验的机会,这种情况与他们未受到良好的医学基础科学教育的同学完全一样。

由于死守滞后 50 或 70 年的学院体制,总的医学科学及英国的医学科学和实践蒙受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

伦敦大学校外机构的作用一直是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校外机构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为进不了伦敦大学的学生提供指导。在一个学院和大学发展如此缓慢的国家,某种中心考试机构亦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如果它要发挥作用,或许就需要一个叫得响的名称。人才因此而得以发现和开发。这也是在美国常常听到的“亚伯拉罕·林肯”派的观点。但不管原来的情况如何,这种做法如果持续时间过久,将有损于而不是有助于大学的发展,至少它们混淆了不同的事。与我讨论这一问题的一位前副校长指出:“我们一直说我们自己是一回事,无论是伦敦大学的所属学院还是伦敦大学的文学士学位,虽然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不是一回事,甚至不是同一类事。”外部的标准总是威胁内部的标准。它袭用了内部的做法,而不是独立面对自己的问题。

不管怎样,我承认伦敦大学校外机构使校外学位^①比美国的学位更加明确。但据权威人士告诉我,在聘任教员时,总要询问清楚获得的是哪一种学位——这意味着学位不同,质量也不同。然而,伦敦的校外机构尊重学科的尊严。它提供的教育机会限于具有真正学术意义与重要性的严肃学科^②;伦敦大学的许多校内学生离开学校时并未获得学位,因此它经常发挥一种为他们举行学位考试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它

① 另一方面,伦敦大学还拥有“联合学生”,即攻读该大学学位以外资格的学生。因此,混乱状况进一步恶化。

② 它提供的推广课程实际上也是如此。

使某些美国大学函授教学部开设的劣质课程无地自容。的确,有些校外学生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表现得比校内学生出色。但是,如果师生交往中存在着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教育中存在着某种书面考试根本无法测试的微妙复杂的内容,那么以一种教学大纲为基础的校外学习和校外考试,应该形成一个自行负责的独立实体。教学大纲和考试决不能替代教师与学生的人际交往。它们也许是很好的教学大纲和考试,但它们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可能不仅测试不出、反而可能扼杀了文化中的精华。邮局与教授本人不是同一回事。民主社会需要多种类型的机会和训练。这些机会和训练不一定全部或大多数属于大学。的确,如果大学去从事与之无关的和分散精力的活动,它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履行最崇高的使命。伦敦大学的校外机构也不例外。“校外对校内”(“internal v. external”)问题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兼容性。服务应该提供,但应该由其他机构提供,并且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英国与美国一样,成人教育发展很快。让一个灵活的容量大的组织承担成人教育,为进不了学校和大学的人提供训练或就业所需的特殊服务,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些职责不能大规模地交给大学去完成,否则只能使大学分散精力,管理机构日益复杂,从而使大学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为那些并不期望进大学攻读大学学位的人设立一个独立的考试委员会是可行的。联合委员会这个校外考试机构在医学领域确立了良好的校外标准,设立一个与伦敦大学相脱离的成人教育考试机构,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做得同样好。这样做仅仅是承认了现在被忽视的事实上的差别。任何考试委员会,不管它挂上什么大学名称,都不可能使

大学学院、韦斯特菲尔德学院、东伦敦学院(East London)及校外学生受一个标准的制约。为什么要妄求达到这一点?这么做又有什么影响?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获得学位,那又怎么样?随着中学的进步,伦敦大学也在进步,研究的数量在增加,质量在提高,范围在扩展,但除非伦敦大学经改革成为学术性教学和研究机构,使大多数性质不同、水平较低因而无法同化的技术学院、医学院以及其他学院脱离自己的运行轨道,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所杰出的或真正的大学,配得上伦敦和英帝国的名声并符合现代精神。当然,有不少杰出的学者、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在伦敦大学的某个学院任教。但正如我反复指出的,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在英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在其他国家也不时涌现,甚至完全在大学外涌现出来。当一个人在评说高等院校时,人们不能只引用逆境中成材的少数例子反驳他的批评。高等院校应该尽量减少障碍,而不是增加障碍。如果一所现代大学的目的是促进对真理的探索和培养能够增进和解释知识的人才,有谁会认为伦敦大学完全是根据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呢?不管人们会指出它有什么功能,我斗胆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目前的伦敦大学能否进行改革以实现上述目的?也许能够。但它抵制革新的做法难以使人对它在近期的未来——比如说,下一代人——抱一种乐观的看法^①。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霍尔丹(Haldane)子爵的《自传》,伦敦,1929年版,第124—125页。

六

英国的地方性大学像美国的大学、尤其像美国的州立大学一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于1851年开始了它的教学生涯,但直到1880年,即半个世纪之前,才成为有颁授学位资格的机构。从1880年到1903年,本部设在欧文斯学院的维多利亚大学还包括了设在利物浦和利兹的学院。1881年作为维多利亚大学所属学院之一开始其生涯的利物浦学院直到最近才以一所独立大学的身份庆祝了它的25周年校庆。约克郡学院在本世纪成为利兹大学。其他的学院和大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现在英国共有11所颁授学位的大学和5所不颁授学位的大学学院。在这些院校面前,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算是历史悠久了。

地方性大学未能更早出现的理由显而易见。它们必须等待中等教育的发展和圣公会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的瓦解。新的大学迟迟才出现也不都是坏事。它们从学院开始,教学工作要接受老的伦敦大学的监督,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是太忽视对学科内容的掌握,在英国则是太强调对学科内容的掌握,文化所最终取决于此的精深微妙的特点被看得太淡。这种情况很糟糕,并且尽管人们对它的消极影响普遍有所认识,这种情况却仍继续存在。但如果地方性学院必须满足伦敦大学的要求,那么这种做法具有

明显的补偿性好处。它们至少必须达到与伦敦大学同样的水平,并且伦敦大学的监督的确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如果它们必须满足伦敦大学的要求,污七八糟的东西就必须扫出门外。源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术与文化传统的善意影响,在这些学院过去一直存在,并在今天仍能感受到。地方上的中学生可以获得一张涉及有限的烹饪和针线活内容的考试文凭,但这无助于他进入一所地方性大学。学院所呈现的科目必须广泛多样,以使各种合理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获得适当的发展机会。通过联合委员会而采取的行动帮助北部的大学保持了相对高的学术水平。

除了在经济学之类相对较新的学科,伦敦大学和地方性大学并没有损害古老大学的崇高威望。只要经济上负担得起,能力出众的男孩几乎毫无例外都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上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并长期担任一所地方性大学教授职位的科学家曾告诉我说,他从未在自己的学生中找到合适的助手。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科的情况都是如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将迅速减少。因此,形势在推动变革。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甚至无法接纳所有前来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专业阶层的收入因税收而大幅度削减,因此他们也难以普遍承受送子女外出求学所需的费用。同时,随着中等教育的改进,有助于改善地方性大学的另一个因素也开始起作用。然而,由于期望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人数占很大优势,学生团体的质量有所下降。此外,由于最近通过的法规提高了成绩优异者的薪水标准,文科荣誉学位课程也大幅度膨胀。

地方性大学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但它也根据英国大学的传统作了改革。首脑——校长或副校

长——终身任职。他要参加各学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点在英国也与其他地方一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过去校领导还可以从事某些科研活动,但那个日子现已一去不复返。行政管理颇费时间,资金也不足。英国人鄙视——这完全正确——后来在美国涌现出来的“广告人”和“筹资人”。新的大学正在向前发展。在缺少国家中央教育部的情况下,一个训练有素并具有管理才能的学者必须自己领导这一发展。但无论校长还是副校长都不可能运用美国大学校长有时运用的那种巨大权力。学部掌管自己的事务,因此,各委员会的会议任务是繁重的。教学人员按照美国的做法加以组织,而美国的做法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的影响。每一所大学都拥有文学部、理学部和医学部。工程学部、应用科学学部和商学部的设立在各校之间互有差别。各学部教授会由高级教员代表组成,在此基础上又组成了通常不太活跃的评议会(the Senate)。比较有影响的是理事会(the Council),一般每月开两次会。在有代表性的曼彻斯特大学,理事会的成员由副校长、四位教授、若干名非教授教员代表和相当人数的董事会(the Court)代表组成。这一机构十分有效,并且正如后面可以看到的,它既代表了校外的利益,又代表了教授和行政的利益。在我看来,它比美国的做法要好。后者在教授会和董事会之间仅依靠校长穿针引线。因此,在英国的地方性大学里,教学人员的影响远远超出其人数的比例。董事会只决定经费。总的来看,如果考虑到它们诞生于地方工业中心这一点,那么它们的记录是值得高度称赞的。捐款者和地方当局代表了工商界,后者为每一所地方性大学带来了显著的特色。尽管偶尔会出现不妥当的做法,各大学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享有独立的生活,不受资本主义或政治影响的严重干涉。根据我的判断,在这一问题上古老大学的独立性再度成为稳定的和有利的因素。

在设施和资助方面,地方性大学没有招摇铺张。它们的收入主要依赖地方资助和中央财政补助,并且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往往显得比较寒酸。地方性大学中办得最早并属最有成就的大学之一的曼彻斯特大学,年度预算为100万英镑^①,其中部分来自学费,部分来自捐赠收入,部分来自地方补助(数额很少,因此不会威胁到该大学的独立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来自中央政府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提供的资助。大学拨款委员会——该委员会自1919年成立起一直由对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十分了解的苏格兰人麦考密克(Willian S. McCormick)爵士^②任主席——是一种和缓但却有力而积极的影响因素。在缺少教育部控制的情况下,大学拨款委员会促进了事物好的一面的发展,而对其他所有方面则默不作声,视而不见。

在教员聘任方面,地方性大学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其教授的薪水不断上升并且比美国教授的薪水还明显高一些,但实际上仍然过低,职位也很少;作为学术性大学,它们的声誉也比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弱得多,而从大都市的吸引力来看,

① 利物浦大学的实际情况也一样。它的各种收入在1913—1914年度为83720英镑,1928—1929年度为231150英镑。在这两个时期它的财产分别为1004109英镑和1967772英镑。地方拨款1928—1929年为25332英镑。资金的需求极为迫切,但它在开支和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实在令人感到惊奇。

② 于1930年3月23日去世。

它们又比不上伦敦大学。但是,尽管它们通常留不住来自老大学的最优秀的学者,它们却可以聘请到来自老大学的有前途的教员。牛津大学最近上任的两位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就是最初在牛津大学开始学术生涯,后来去地方性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晋升为教授,再由牛津大学召回的。希尔(A. V. Hill)教授也是先从剑桥大学去曼彻斯特大学工作,又从曼彻斯特大学应聘到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任研究性教授。地方性大学聘请卢瑟福(Rutherford)和谢林顿(Sherrington)这样的学者来学校短期任教,比长期聘任平庸的学者要好得多。他们的出现表明,地方性大学决不是完全处于本科生教育的水平,也有些杰出的人才留下来工作,例如罗斯科(Roscoe)、陶特(Taut)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就留在曼彻斯特大学工作。一些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了逃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养尊处优的生活,转到其他地方追求一种比较简朴的环境,以便——如其中一位学者所说的——“拯救他们的灵魂”。在牛津大学现任各学院院长中,有两位曾任地方性大学的副校长:一位是新学院(New College)现任院长,曾任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一位是大学学院院长,曾任利兹大学副校长。从校舍和设施等外观看,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地方性大学已有很大改观。但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负担,对捐赠的增加和物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一种长期的阻碍作用。

在教育范围上,地方性大学甚至比美国最优秀的大学还能体现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特点。尽管英国的本科生比美国大学本科生的年龄要小一岁,但无疑他们却更为成熟、更为训练有素、选择性更强。尽管如此,在中学与真正的大学之间仍存在一条大学必须予以填补的鸿沟。一位教育界资深人士曾

写道：“若要在大学维持独创性或探索性的工作，不再花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和训练，那么现在的知识和训练基础仍不够坚实，也不够广博。”大多数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即离开大学。我认为英国的学士学位比美国通常所说的学士学位更有意义，这部分原因是它的学科基础更扎实，考试难度更大；部分原因是校外考评专家参与学位考试，这一方式在美国除了斯沃索莫尔学院之外，其他任何学院和大学都没有系统地加以采用。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用3—4年的时间攻读三门学科——其学业的专精程度远远高于美国本科生。因此英国的学士学位更显深度与水准。但尽管英国的大学不存在美国大学中到处可见的荒唐怪事，它们却也正如一位尖刻的英国评论家有一次对我说的那样，“橱窗里陈列的展品要多于货架上摆出的实货。”

虽然地方性大学主要以本科生教学为主，它们也开展高层次的工作。本科生荣誉学位的工作无疑就覆盖了美国研究生院第一学年——或许还不止——的工作。在曼彻斯特大学，已经形成了有名的中世纪史学派以及哲学和物理学学派。布拉格(Bragg)教授手上有十几个物理学研究室供其使用。工业与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目前拥有31000英镑的科学拨款，这笔拨款大多数用于地方性大学和其他大学的高层次人员的维持经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英国人却非常不乐意将研究生看做是一个群体。他们是很有良知的教师，“教学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他们的教学信念是，学生一旦通过荣誉学位考试，就不再需要与教授频繁交流。与美国研究生院一如对待本科生那样经常牵着研究生走路的做法

相比,英国人的做法无疑更胜一筹。但我认为,英国人没有看到研讨班的独特价值。正是在研讨班中,学生不但相互交流,而且也与教授交流。在研究生院中应该出现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思想碰撞,在英国很少见到。我不想被指责为过分偏爱组织。在美国,组织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但组织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类似于德国研讨班之类的东西也是需要的,以便最有才华、最训练有素和最成熟的学生能够相互交流,并与导师保持交往。所有的英国大学,尤其是伦敦大学和地方性大学,都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重要的道理。再举曼彻斯特大学为例。1882—1928年期间,共有2932名毕业生获得该校的文学士学位,1019人获文学硕士学位,3543人获理学士学位,1227人获理学硕士学位,143人获科学博士学位,74人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数字之所以具有意义,不是因为获得高级学位的人数很少,而是因为比例的差异表明教员过分偏重于教学。在教学对象里,有相当比例的人毕业后做教师。诚然,教师也需要受教育,但大学里的师范生很快就会饱和。越过这一界限,研究的闲暇和意愿就会受到影响,大学往往蜕变成师范院校,尽管聪明的人不管如何最终会获得成功。

地方性大学都是从本土涌现出来的。它们通过满足地方需求获得部分资助。体现地方特色的技术开发活动,一般都是地方性大学的强项。不过有些地方性大学过于偏重这方面的活动,因而显得过于专门化。许多地方性大学所表现的特殊性完全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虽然学位的领地得到了适当的保护,但文凭和证书却向技术性的训练开放。如曼彻斯特大学向高等商业学(二年制)、摄影技术(二年制)、企业管理(一年制)颁授证书(不是学位);伯明翰大学向酿酒术(二至三

年)和社会研究(二年制)颁授文凭或证书;布里斯托尔大学向家政学(四年制)颁授理学士学位,并向教育学和生物学(一年制)颁授考试及格证书;利兹大学向染色术、煤气工程学、染料化学颁授文凭;谢菲尔德大学向玻璃工艺学(二至三年)颁授文凭。同样缺乏远见的荒谬做法还有,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设立的图书馆学学院和新闻学课程(只授文凭,不授学位),以及利物浦大学设置的城市设计系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的汽车工程系。与美国大学相比,英国地方性大学中技术科目的发展是有限的,但这仍很可悲。我们希望这是因为这些大学年轻而产生的缺陷,因为这类活动既不属于自由教育,也不具有大学质量。

然而,其他的因素对地方性因素起了平衡作用。尽管地方性大学产生的动力来自地方,但它们的教员——正如我已指出的——起初都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一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它们的管理机构——这一点我也已经指出——既有学者参加,也有校外人士参加。因此,比较古老的和比较坚实的学科不仅在课程安排中有所体现,而且在管理中也有人代表。地方性大学因此也不像美国大学那样过于放肆。我所遇到的大学校长没有人担心英国的大学会纵情享乐,变得像美国大学那样荒唐可笑。尽管它们囊中羞涩,头脑却很清醒。伯明翰大学霍尔丹(John S. Haldane)教授领导的矿业研究实验室就是对环境作出合理反应的一个例子。起初人们认为该研究所不过做一些工业方面的杂活——如作些分析等——而已。霍尔丹教授“将那一切踩在脚下”。霍尔丹教授本着巴斯德的精神,对热和呼吸作用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研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说:“如果研究思路得当,实用性的事

物也充满了科学的趣味和刺激性。”这些“实用性事物”也对应于大学医学诊所中的病人。研究的问题就谈到此为止。至于训练的问题,正确的理论也同样明确。如果一所大学热衷于开设如何推销煤的课程,它就放弃了自己的职能;开设涉及煤矿的科目——如物理学、化学、金属学——则属于大学范畴的工作。因此,从大学的观点看,酿酒应该属于生物化学和细菌学系科的工作,本科生学位仅仅是发酵方面的生物化学的学位。若要获得荣誉学位,附加麦芽制作和酿酒术的文凭,意味着需要在酿酒厂“实习”两年——这种做法令人怀疑。这不属于我所使用的那些术语意义上的大学学位或研究生学位。同样的看法适用于其他大学其他一些行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商科方面:伯明翰大学创办时,约瑟夫·钱伯林(Joseph Chamberlain)先生为了吸引地方的兴趣,承诺开办一所商学院,尽管他对要办什么样的商学院并不清楚。伯明翰大学文学部不可能做的那类不合适的事情,商学院也很少或根本不承担。否则,或许它可以变得更强,但它也会因为纳入那些不适当的事而失去某种文化底蕴。该商学院对地区经济史进行了一些研究,在其他方面,涉及的工作有经济学、经济史、运输和现代语言——在美国,这类教育还将导向普通学位。销售学和商业广告这类实用性的课程令人注目地空缺。教员们并非不熟悉美国的发展,但他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不愿装作是深谙实际的人,似乎自己有本事进行商业推销。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部的任何教员都没有与企业建立有报酬的联系。企业虽向教授寻求咨询,但教授并不收取费用。他们也同样发现,商人们没有任何可向学生们传授的东西。这些商学院实质上是教授经济学和现代语言等学科知识的高级本科生学

院,只是它们比一般的系科更关注地方的需求。因此,总的来说,地方性大学代表了对那些古老大学所奉行的企业政策的一种保守的偏离,同时体现了以本科教学为主的特点。

再简单说一说教育学科。地方性大学都开办了教育学院或教育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则设立了教育学准教授(reader)的职务。但该学科在任何大学都未受到认真的对待——或许是受到不够认真的对待。地方性大学教育科前三年的课程与一般学术性课程完全一样,第四年用于教育的“原理”、“方法”、“心理学”和“历史”的教学——都是些“罐装的”东西,在一所大学有人这么对我说。这种教育对实用性的方面重视得不够,但由于它给理智留有余地,并且重视学科知识,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优于美国的荒唐做法。剑桥大学和地方性大学都颁授教育学位——但很清楚,获得该学位的基础主要是学术成绩;牛津大学则只颁授教育文凭。

古老的大学也好,地方性大学也好,其开设的推广课程、墙外课程和辅导性课程,都同样地避免了美国同类工作的狭隘性、实用性和特殊性。这些课程是教育性的。它们涉及的学科具有学术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如伦敦大学开设的校外课程,包括经济学、中世纪史和近代史、政治学、文学、工业史以及社会学。学生们不会求助于大学去解决他们在行业或职业中遇到的问题;大学也不会奔劳于无足轻重的事情。英国的工作者希望利用闲暇的时间摆脱日常工作的限制。科利格·哈莱克(Coleg Harlech)在一所小规模而独立的威尔士学院实施的计划具有深刻的意义。参加这一计划的学生都是店员、矿工、钢铁工人、采石工人、寄宿舍房东、纺织工和普通职员。在1928—1929年他们学习什么? 历史学、哲学、心理学、

经济学、政治学、威尔士文学和英国文学。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教育可能属于中等学校的教育,但它具有良好的声誉,并且在经验起重要作用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这种教育可以进行得非常深入,并对学术的观点起充实的作用。

尽管我们所讨论的大学在发展各项服务性活动,但这类活动也许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展开。这类活动应有适合自身的组织和管理类型,尽管它们眼下尚未降低院校的尊严或破坏院校的目的。大学推广辅导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它们不能老是代替一种健全的国民教育制度。这种制度目前在英国和美国都不存在。而与美国的大学不同,英国的大学在努力诚实地、正确地填补留下的空缺,而不去考虑是否赢利的事情。一位眼光犀利的外国评论家写道:“几乎没有一座城镇见不到它(指大学推广教育——原作者注)在教育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许多地方,这项运动发展成一所学院(诺丁汉,埃克塞特),在其他地方(谢菲尔德,里丁),这项运动发展成一所大学。在全国各地,对英国人——当然也包括英国工人——的生活中出现的沉闷的实用主义和苍白的物质主义而言,大学推广运动成了一帖作用明显的良药。”^①

^① 威廉·迪贝利乌斯(Wilhelm Dibelius):《英国》,玛丽·阿格尼斯·汉密尔顿(Mary Agnes Hamilton)翻译,伦敦和纽约,1930年版,第426页。

皇家书局1929年出版的一份题为《兰开夏郡和柴郡的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 in Lancashire and Cheshire*)的小册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所开设的学科既广泛又扎实(第6页),学生都是工作者(第23页)。以下的评论包含着对美国大学所开设的函授课程和推广课程的尖锐批评:“与过去相比,学术性的观点能够更容易地得到理解,墙外课程与墙内课程在观点上的差异变得更小。”(第18页)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墙外课程也是如此。

就几种专业学部而言,我自己只限于谈医学。从实验科学的情况来看,地方性大学的医学部与伦敦大学的医学院有所不同。在伦敦大学,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除了大学学院和英王学院的医学院之外,一些医院附属医学院的实验科学的发展带有严重的缺陷。在地方性大学学院里,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领域里的教授拥有和其他理科学部——如化学和物理学——的教授同样的地位和设施。他们的预算非常节制;他们的设施通常限制得很紧;他们的图书馆藏书很少;他们的教学工作相当繁重。然而,他们却是大学自由挑选出来的教授,并且也都拥有未来;他们的研究条件与其他领域同样有利。谢林顿、希尔和迪安(Dean)三人目前在各自学科领域占有英国最令人称羨的讲座席位,并分别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任职,但他们以前是在利物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正是在那里他们成为杰出的医学科学家。

地方性大学在临床医学领域既缺乏组织,又十分落后,甚至缺少像伦敦大学那样能够避免困境的少数实行专职制的临床机构。医院都是慈善性机构,不是诊所;它们的职员都是地方上的专业人员,通常对严格的科学研究既不赞同也不参与;供研究用的实验室设备严重不足,幸好病房能够向学生开放,使他们能够接触病人,但这方面的工作也仍有待于进一步现代化。大学既不能获得比较有效的内部组织,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聘请有前途的年轻人填补教员空职,打开临床教学和研究的职业通道。论资排辈通常十分流行。大学没有采取美国那种比较激进的措施,对现有的医院进行改组,或创建新的独立的大学医院。伯明翰大学现有一个机会,它的两所现有的医院在大学校园里得到一个可以建造一所宽敞的新医院的场

所。如果现有的组织能够被抛弃,临床的设备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实验室能够建立起来,有教学和研究能力的教职员能够聚集在一起,地方性专业人员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英国也会拥有一个现代医学院,但我担心机会正在失去。一个重要的缓和因素是医学研究委员会(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它在汉普斯特德建立了国家医学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并为个人或组织提供研究项目补助。它动员了对科学医学有兴趣的人开展工作,在整个医学科学领域提供了特定的调查研究所需的人员薪水、维持经费和项目设备。然而,不幸的是,经过这种培训的年轻人仍然没有出路。种种项目仍可以完成,种种人员仍可以训练出来,但在临床医学领域,仍然缺少持续性的机会或资助的保证。英国所需的是一所现代医学院——先有一所,其他的经过一定时间再建立。各大学与医学研究委员会进行合作,负责培养人才,但由于医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个政府组织,它不能集中资金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大学医学部。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或伯明翰大学,可以先建一所现代医学院,这或许在适当的时候会对全局产生影响,如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美国的医学教育产生影响一样。这种需求不是没有人认识到,但至今所需的资金和机会仍未出现。

七

可以认为,英国地方性大学的发展总的来说类似于美国

大学的发展。它们偏重科学,并且都面临过于顺从地方利益和实际需求的危险。但是,由于前面已经强调的理由,这一危险远不如美国那么严重。另一方面,目前英国各地与美国的情况一样,人文主义不能说已得到公正的对待。在未来许多年里,能否获得支持大学充分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资金,也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取决于国家的繁荣和国民开支的重新导向。无论如何,英国的中等学校要发展成为与欧洲大陆法国国立高中或德国文科中学同样扎实全面的学校,仍需很长的时间。独立设置的高级中学,即美国所称的学院,也不容易产生。因此,英国的大学仍将和美国的大学一样,在很长时期内既履行中等学校的职能又承担服务性的职能。同时,在研究委员会、研究的理想、实际的需求和其他因素的推动下,高层次训练和研究的发展将组织得更好。在工业界和政治界,优秀的英国业余人才一直很走运,研究生院必须将其转变为一个专业人才。英联邦比任何其他结构比较严密的国家更需要人才——不仅需要能够执行任务的人才,而且需要受过广博纯正的文化与科学训练的人才,能够对现代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哲学问题发起有组织的进攻。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英国业余人才最优秀的素质会因此牺牲或受到伤害。这种素质既显著地体现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者身上,也显著地体现在公学校长和领地总督的身上。虽然英国不具备大量产生学者、科学家和世界名人所需的组织,却再没有比英国产生这类人才的那种独特的组合更合理或更明智的模式了。我称之为组织的发展会损害这种模式吗?不会,除非它加上在美国建立起来的那种机构。但那种机构在美国就是不必要的,自然也会招致英国的反感。如果英国的大学表明,作

为大学的心脏的研究生院可以在自由的基础上、在有利于理念发展的氛围中创建起来,那么美国就亟须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

八

在高等教育领域,现在是古老的大学主宰天下,并且就人们所能猜测的情况看,它们将长期地——或许永久地——继续主宰下去。它们的独特条件使它们肩负巨大的责任——依我所见,并且出于我将阐述的种种理由,它们目前尚未充分履行这些责任。与地方性大学相比,它们属于全国性的大学,它们的声誉与资源使它们能够以一种民主的方式集聚一批学生,这批学生总的来看既代表了那些继承了财富与机会的人,也代表了那些只继承了聪明才智的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陷——它们的缺陷既不能说少也不能说无足轻重——在这两个学术重地汇聚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极为出色的科学家,却使英国,更确切地说,英帝国获得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因缺少这种条件而受损颇大。这是两个真正的学术中心,规模宏大,学科多样,基础雄厚,独立自主,有充分的条件建立和维护学术标准。我已经分析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如何被卷入旋涡并因此而失去权威的——在一个文明国家,这种权威必须有

扎根之地。在英国,这种权威扎根于古老的大学^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管英国变得如何民主,人们也会宽容它的学术放纵。而美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生活目前由于缺少一些稳定因素,却在这种学术放纵中苦苦挣扎。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权威”容易变得保守。牛津大学过去和现在都很保守,比剑桥大学更保守。但不能通过抛弃卓著去医治“权威”的缺陷,必须——而且我认为能够——找到某种别的更好的办法。

牛津和剑桥是如何碰巧成为伟大的学府的?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高级的中学,它们仍充满各种明显与其学府性质不符的偏见和惯例。牛津大学直到近期仍由圣公会教义控制,并且仍然珍视圣公会的规范;进步的努力所可能遇到的难以捉摸的和顽强抵制的传统,如同伦敦的浓雾一样难以穿透。两所大学虽然都向赢得奖学金的贫困学生和中产阶级自由开放,但频繁光顾它们的都是希望进入专业阶层或公共生活的豪门贵族子弟^②——人们也许会想,从这种奇特的人才组合中竟可以吸纳到足够的、为创造和维护一种理想所需的、公正无偏见的学者和科学家!牛津大学近代最杰出的领导人,即乔伊特(Jowett)那样的人,以及学者们自己,比较关注的是培养那些主要兴趣在进入议会、文职部门或自治领地的人才,而不是培

① 如果我写苏格兰的情况,我的这一陈述将无疑包括那些维护纯真学术之崇高理想的苏格兰大学。

② “我们认为牛津和剑桥一起承担了完成青年人教育的特殊职能,这些青年人来自有教养的家庭,大多在公学接受训练,并注定要进入政治生活或有学问的专业阶层。”见费希尔(H. A. L. Fisher)著:《大学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牛津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4页。

养哲学家、学者和科学家。在大致相同的时期里,剑桥大学中一群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如休厄尔(Shewell)、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凯厄斯学院已故院长休·安德森(Hugh Anderson)爵士及一段时期里与三一学院联系在一起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脱颖而出。这两所大学的历史都非常奇特,一波三折,重温它们的历史自然能够加深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断断续续地一会儿支持这项事业,一会儿支持另一项事业,一会儿又处于休眠状态,不时有少数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对它们的惰性感到愤怒。然而正是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成为最纯粹和最高意义上的学术机构,成为国家抵抗学术生活中一切浅薄、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东西的堡垒。我尚未透彻了解它们的秘密,但我将努力接近它们的秘密的核心。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互不相同,不仅在主要的和特有的文化兴趣上互不相同,而且以外国人无法理解其全部价值的微妙方式体现它们的互不相同。一位出色的剑桥人在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苦苦思考我向他提出的这一问题。第二天早餐前他给我写信说:“可能存在着两种知识——精确知识和价值知识。剑桥主要代表前者,牛津主要代表后者——当然有时你在一个实验室里会发现真正的价值,但那只是后一个回合的事,至多不过是一场对教条的辩论。”但随着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模式在牛津得到发展,两个大学在这方面将变得越来越相似。再者,在两所大学内各学院也各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的确存在,只是外人不易察觉罢了。然而,即使外人也能够意识到在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与莫德林学院(Magdalen)之间,在剑桥的三一学院或凯厄斯学院与考珀斯

学院(Corpus)之间存在的真正差别。时而在这个学科,时而在那个学科,互相变化、互相竞争和互相模仿的中心因此得以维持。也许正是微妙不同的实体在表面掩盖之下进行的静悄悄的竞争,激发了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从以青年人的培训为主要任务的学院的聚合体中创造出一所学术机构。“我投身于剑桥,交费初衷要做的是一件事,实际做的则是另一件事”——正是这“另一件事”做得如此出色,才构成了大学。很清楚——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一点——容忍无所事事、心不在焉或敷衍塞责的环境,也同样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类理智作用所需的必要环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十分幸运,能够提供各种环境。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游手好闲者可以无所事事,认真做事者可以埋头工作,勇于创新者可以开拓创新。游手好闲者也具有某种价值,他们以后或许可以为英帝国效力,尽管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很不相同。不管怎样,英国人的学院不会试图采取强求一致的政策,他们没有插手每一种事情的想法。我们美国人却恰恰相反。我们的做法失败了,最优秀的大学受到了损害。德国的大学较为明智,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尽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种种章程、制度和惯例的限制,它们也同样是明智的。

九

从历史上看,大学先于学院而存在。大学是贫困的师生经常前往教书与学习的场所。学院都是宿舍,院士职位

(fellowship)是“研究性”的,而非教职。随着学院发展成为教学中心,大学的重要性逐渐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仅仅成为学院集合体的名称,甚至大学教授和讲师也仅仅成了为向不同学院的本科生教授不同学科提供便利的参与者,这一点直到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一个学生要进入大学,他必须进入一所学院。学院主要希望招收本科生。海外的大学毕业生前往英国留学,他们得到的建议通常是攻读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学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合理的建议,但这一政策却不利于研究生工作的推进。由于一流教师的主要身份是学院导师,因此他们所承担的研究生工作被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他的成绩取决于本科优等生(“firsts”)的培养,而不是成果丰硕的学术工作。许多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如果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我不想过分强调数字的重要性,但以下这些数字的确说明情况。根据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报告,1928—1929 学年这两所大学共有8900名全日制男生和 1312 名全日制女生——总数为10212 名学生。共有 563 名学生(其中男生 482 名,女生 81 名)攻读高级学位。在 1929 年复活节学期结束时,在剑桥大学注册学习的学生近 5000 人,高级学生为 308 人;在 1928—1929 学年,剑桥大学共授 58 个高级学位(49 个哲学博士学位,7 个理学硕士学位,2 个文学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1930 年三一节学期(Trinity Term)的第一天,向高级学位委员会注册的高级学生总共为 212 名,其中 79 名攻读文学士学位,49 名攻读理学士学位,84 名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人数少得不成比例,并且分散在各个学部。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院和大学的组织管理极为复杂。即使在这方面能够进行描述,也无法得出什么认识,因为章程和条例实际发挥作用的方式,无法从这些章程和条例的字里行间去推导。为了对它们的组织作出尽可能清晰的描述,我暂时只考虑牛津大学的情况,并且人为地将不可分割的事情分开考虑。这样来看,牛津大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部分其本身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首先,它是约 30 所学院^①的集合体。这些学院碰巧坐落在同一个小城市。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学院是自主的 (autonomous) 和自治的 (self-governing); 学院的院士 (fellows)——他们有时是高级教员(如万灵学院),有时是教授(如其他学院)——要尽可能承担学院的教学工作。但由于每个学院自身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教师承担每一学科的教学,各学院在某些学科领域开展合作。在现代语言和科学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留给大学或大学研究所,以及有可能担任学院院士的演示人员。这样,分设的、自主的和独立的各院所不但不可思议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与由它们所构成的大学也相互交织在一起。当这一切合在一起时,它已超出了学院模式的意义。

其次,大学由于拥有学院可以利用的教授、研究所和附属机构以及与学院无关的人员,它成了学院的补充机构。例如,在牛津大学,为各学院提供设施的大学机构有博德利图书馆、考试院 (the Examination Schools)、农业和林业研究所、泰勒现

^① 这一数字包括 21 所学院 (college) 和 9 所附加学院 (institution, 如女子学院等)。

代语言研究所(the Taylor Institution for Modern Languages)、科学实验室、博物院和阿什摩尔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等;在剑桥大学,大学图书馆、费茨威廉博物馆(the Fitzwillian Museum)、古典考古学博物馆、卡文迪许实验室、莫尔特诺寄生虫学研究所(the Molten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arasitology)及其他各种纯科学或应用科学实验室是属于大学的。大学里共有 10 个学部,它们由教授、准教授和讲师组成,任务是开设讲座和课程,供各学院的学生选修。这些教员或者在名义上或者根据权利与学院保持关系,薪水或者由大学提供,或者由某所学院提供,或者由大学提供再加学院给予的津贴。此外,大学还设有一个总的学部委员会(Board of Faculties)和一个高级教学委员会(Committee for Advanced Studies),关于这方面,后面再详叙。

最后,大学本身是一个自主的和自治的实体,负责颁授所有学位,作出总的决策,如招生要求、女子地位等。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它再次与学院交织在一起。因为,大学所有的活动都受到一个主要由学院成员组成的机构的管理。在牛津大学,目前由“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Congregation)选出的“七日理事会”(the Hebdomadal Council, 又称每周校务会)成员有:校长,这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副校长,他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担任为期三年的大学负责人;每年选出来担任学监的 2 位院士;7 位院长;11 位院士(或学生),其中有几位是大学讲师或大学教授。这些人中有些位置坐在学院一边而不是大学一边。此外,与美国或德国的大学一样,在英国的大学里也可以找到大量的委员会。因此,从管理的角度看,大学的确是学院的产物——在涉及革新或开支的问题时,这一点

显得极为重要。各学院虽然财力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很富有,并负责管理自己的资产。大学的资产甚少。它从学院那里获得资金,后来又从国库获得资金。没有这些资金,大学付给其教授的薪水常常只是名义上的。从研究生发展的观点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学院主要负责本科生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大学的事情,但大学缺少必要的资金和管理机构以负责研究生教育并制定和执行有远见、有连续性的政策。

不揣重复,让我回顾一下前面分别叙述的三个方面并作些归纳。30所自治的学院由它们的教师团队即院士治理,他们根据所设职位担任各种职务。行政首长,即院长,有“warden”、“master”、“principal”、“president”等各种称呼,因其天赋能力和卓越程度不同,影响也多少有所不同。院士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治理团体。学院是相对自主的——拥有捐赠、制定规则、选举官员、招收本科生,好像根本不存在大学似的,尽管学生只有达到大学确定的人学标准方能进入一所学院。另一方面,不是出于自愿就是因立法规定,学院将某些权力交给大学,后者为包括各学院全体师生在内的法人团体。学院任命自己的导师(tutor),但大学也聘任作自由公开演讲的教授、演示员和准教授。只要教学还只限于语言、历史和哲学,一个学院就完全能够自我满足需求。但随着总体知识的进步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几所学院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和条件不足。院际教学因此得到发展。在某些领域,尤其是科学和医学领域,大学创设了面向所有学院学生的教学机构。但除了某些依靠捐赠设立的大学教职外,大学缺少用于公共教学所需的资金,这种资金部分来自向学院收取的费用,急需时则部分来自国库的补助。没有人对大学的发展

作出规划,并要求学院拨款资助大学的发展,除非英国人养成高等学府慷慨捐资的习惯,否则中央政府的贡献——最终还有影响——将不得不逐渐增加。

牛津大学的行政管理是在一个分级系统中实现的。“教职员全体会议”(Convocation),由所有大学的硕士和博士(不论是否寄宿在大学)组成,目前人数将近1万;“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由住在大学中担任教学或管理工作的硕士或博士组成;“七日理事会”,其组成前文已叙。教职员全体会议是一个影子团体,立法由“七日理事会”提出,提交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批准^①。从大学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管理方式是不力的。学院设常任院长,掌握充足的资金;大学校长则经常调换,校长同时担任一所学院的院长,他所在的学院及其他学院通常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最后,在“七日理事会”中,大学教授要与通常代表学院固有利益的人以及在构成与倾向上以学院成员占绝对优势的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相抗争。此外,近亲繁殖的状况已持续多年。院士通过选举按自己的学衔填补空缺。牛津大学各学院自由地从本校其他学院中选聘人员,但很少从剑桥大学选聘,而且几乎完全不从地方性大学选聘。学院数量众多,差别很大,因此应该可以避免僵滞,但它们对其他学校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环境里,我称之为“大学”的那种总的、高层次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代表,因而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形成持久的政策。在过去70年里,曾连续有三

^① 在剑桥大学,相应的机构称为“评议会”(the Senate),由所有硕士、博士和神学学士组成;“评议会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Senate),其成员由住在大学中的评议会成员选出;“副校长”,通常任职两年。这两所大学相互之间并不十分了解,一些学院也常给人以它们之间互不了解的奇怪感觉。

个皇家委员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解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将这两所大学引入现代生活主流的目的。但依我所见,它们几乎没有触及大学活动与组织的根本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三个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影响了他们作出深刻、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最佳愿望就是在代表各自学院的同时,也成为各自大学的代表。

从理论上说,政策似乎是由大学通过各学部来确定的。各学部都通过学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且每一个高级学生都有一名导师指导。但学科委员会(the Boards of Studies)在肩负重任时更倾向于考虑学院的利益而不是大学的利益。因此,很显然,相继颁布的法规名义上加强了大学的权力,但中心管理机构的权力实际上远远没有其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以男女青年的教学为己任的学院^①仍占主导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说,“学部”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中,学部的工作会受到学院因素的干扰,并且也会受到“七日理事会”和老学科占主要地位的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的指摘。此外,由于教授由特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遴选,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推行某种思想——例如创办一所注重增加研究生教育机会和组织管理的大学的想法——的难度。

就本科生教学而言,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表述这些古老的大学所取得的成就的词语。在英语中我没能找到这个词。不过,我不知道德语中的“Bildung”(教养)一词是否能够大致满足我的要求。什么是“Bildung”?它指有助于人们在

^① 不招收本科生的万灵学院除外。

保持尊严、施展能力的同时履行生活职责所需的知识、修养、表达能力、性格、风度以及各种相当均衡和成熟的品质。正如大量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所表明的,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都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然而学院生活的组织却不能说明智力是它最热衷的事情。学院组织的考试之多远远超过了适当的程度,考试的内容往往偏重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将考试作为发现特殊人才的途径。令学院感到骄傲的是有才华的绅士而不是有独创能力的学生。它挑选学生时也经常听取一些中学教师和牛津人或剑桥人的建议,这些人十分关注寻找这两所大学所珍重的特殊人才。风度是公学、贵族乡宅、学院的集体生活以及周期性出现与消失的俱乐部的产物。最终的产品是令人敬佩的——即有教养的绅士,他思维清晰,善于写作,行动敏捷,能够充分适应兴趣广泛的英国人迟早要面临的实际环境。因此,老大学培养出的人能够创设地方性大学,能够正直、有效并且像绅士那般治理英国和众多领地。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头脑冷静,判断准确。当然,这部分要归功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但确定无疑的是,部分也要归功于英国人在中小学和学院受到的那种教育。我们在美国无休无止地谈论教育技艺。我不否认这样做具有某种意义。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种种个人的局限性,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的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安排对师生双方都具有风险。一名学生可能得到一名较差的教师。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学的讲座就可能对他有所帮助,或者他也可以拒绝接受安排。缺

少班级教学刺激的导师也许会变得墨守成规,因此正如我已指出的,经常会出现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毫无理由地逃离大学的情况。

就这样,古老学院的优缺点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作为单独的学院,它们过着自己特有的社会的、学术的和教育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并不完全与其他学院的生活相脱离,但也决不会相互融合在一起。本科生通常来自一所由牛津人或剑桥人任教的公学。他进入牛津大学的某所学院读书,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自他的导师——一位牛津人或剑桥人。每周他向导师提交一篇文章,接受导师多少有些严厉的批评指导。没有人知道导师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方法,或是否坚持同样的标准。没有办法比较、转移或分享教学经验。如果一位导师是优秀的,学生就是优秀的;如果导师很差,学生也就是差的。只有期终考试能够说明情况。这些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一如法庭上对律师智慧的考验。没有人会认为律师对案件事实的掌握或在陪审团面前的相互诘问、辩论、展示物证,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创造性学术活动。持这种否定态度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成功的律师对世界思想的贡献很小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许多导师的确对学生起了启发作用,但即使如此,也不存在将他们的经验传递给其他导师的有系统的方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导师的个别教学可以得到大学课堂教学的补充,尽管学生常常不是课堂教学的爱好者^①。

^① 吉尔曼校长(写于25年前)引用弗里曼(Freeman)教授的话说:“这真是令人失望,令人沮丧。我已尝试所能想到的每一种讲课方法,并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但仍然无人前来听课!”见《一所大学的创办经历》,纽约,1906年版,第84页。

他们被送去参加有助于考试的课堂教学。考试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大学里被夸大了,而且对学生的一生都产生影响,因为它永远不会被忘记。上述环境合在一起所培养的那类人才是否太传统,以致他们不能以最广博的视野与正在诞生的新世界而不是正在消逝的旧世界打交道?

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学习 3—4 年后,聪明而有风度的年轻人尽管实质上还不很懂行,却能够进而进入议会、文官阶层或某个专业施展才华。不管怎样,这方面的情况也就谈到此为止。迄今为止,依我所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已经刚刚跨过现代大学的边缘。但它们毕竟已经跨过了这一界限。在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攻读荣誉学位的本科生所做的工作无疑相当于美国研究生院或德国大学层次所做的工作。的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运用的教学方法,荣誉学位攻读者独立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程度,学生与优秀导师的密切关系,学校竭力避免的在美国甚为流行的填鸭式教学——这一切都说明,这种教学方式比美国研究生院的许多工作更能与真正的大学精神保持一致。荣誉学位模式很容易占主导地位,因为在牛津大学目前只有少数学生攻读普通学位,而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有数千人,尽管这些学生中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合攻读普通学位。相当人数的牛津大学本科生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研究生层次,这样说绝不夸张。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待在幕后的导师、教授和高级学生的情况。大学在何种程度上对他们有利?

在导师方面,当被选中的学生开始担任一个学院的导师时,人们难免疑窦丛生。我说的是一名刚刚还是学生身份的人成了一名导师。如果他尚未结婚,在花钱和社交方面马上

会变得自由自在。他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社会里的一名成员,并且已成为他的前辈的同事。他可以与世隔绝,并拥有宽敞的住房,幽静的环境,上乘的饮食,漫长的假期。在美国,我们会说他已经“成功”了。当然,他也许会继续努力。凭他的才能与雄心,他一定会努力,也的确作了努力,尤其在他以任本学院或其他大学的教授为目标时更是如此。他已经被打上了“一流”或“数学学位考试第一名”(senior wrangler)的标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获得院士职务后会继续发奋努力——这种假定十分危险。绝大多数人需要不断的激励。这种激励性的机制是我所描述的组织所固有的吗?相反的情况真的不可能发生?担任辅导工作的院士承担着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对待教学通常又极其认真负责——如一位导师所说直到“筋疲力尽”,再加上他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日常工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很高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回报。我说的不是个人的情况,而是趋势与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实现大学的理想吗?

从大学的观点看还有其他的缺陷。繁重的教学任务使得导师只能保持一种对待本科生学业的批判性态度,而不能保持一种对待广大学者和科学家的竞争性态度。他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如果他结婚成家,他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机会就更加有限。然而“院士制度发端于促进学问而不是促进教学的愿望。”除非他晋升教授职务,否则开始时他拥有最大的机会和报酬,但随着子女进学校受教育,他要承担更多的日常工作。因为,要增加收入通常需要承担更多的额外工作,如撰写材料和参与考评,虽然还有间接的方式——尤其是那些比较富有的学院——可以帮助他摆脱困境。这种简单、严厉和民

主的生活方式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人们也感到奇怪事情为什么不可以颠倒过来做。艰苦对年轻人是有益的。它劳其筋骨,促其向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刚好在一个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刺激学问增长的时候使其免除了这种艰辛。而四五十岁时的艰辛是令人沮丧的。那个时期似乎应该过上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最有可能享受到的舒适生活才好。

与我刚刚谈到的学院导师有所不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还拥有教授、准教授、讲师和高级学生。大学日常工作的任务不重。教授一年只上 36 次课。其他时间他可以干他自己的事。为照顾兼任大学所聘职务的导师的利益,他们的学院工作负担有所减轻,但两方面工作加起来任务仍然很重。零零星星的改革会遇到什么困难,只要看看不久前皇家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建议的结果就清楚了。为了促进大学的发展,校方设立了讲师的职位。但填补讲师职位的不是研究工作者,大学把这一职位提供给了本应晋升的导师,尽管这并不完全符合创设讲师职位的宗旨。在剑桥大学,新设的讲师职位大部分被作为一种经费补偿给了那些老教师。因此,皇家委员会的计划不能说是成功的。教授,有时包括准教授,原本从整个英帝国选聘,有时甚至从英帝国外选聘。这样大学得到了发展,并在独立发展的同时牺牲了学院的某种利益。在许多学科领域,图书馆设施是一流的。实验室近些年来也有很大改进。在某些分支领域,如物理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它们具有欧洲大陆意义上的、优秀而真正的大学研究水平。它们得到了抵制差生的有效保护,因为学生经过个别考查之后才能进入高级阶段的学习。这种做法就其本身而言值得称赞,但当人们研究了世界的和英国的需求之后,不免会

问：“这么做就行了吗？”没有人希望减少学习古典文学、古文书学和哲学的机会，人们所希望的是将这种机会扩大到尚未被包括的领域。重点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社会科学，也许还有现代语言，并没拥有所需的条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则根本没有足够的出路。

在高级学生方面，我已经指出英国人的观念，即一旦获得了荣誉学位，就可以比较放心地让高级学生随心所欲；同时，我也指出了这种观念的不足。但另一方面，“填鸭式教学”和“过度的组织”(over-organization)则更糟。诚然，一个总的学部委员会在决定学习科目时也考虑高级学位的情况，但无论在人文学科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这都不是产生适应现代知识的复杂性要求的稳定的进步压力和密切的内部联系所需要的那种组织。如果——我同意这种观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英国教育领域最迫切的需求，那就必须建立某种致力于高层次教学与研究的研究生学部，暂时不必考虑学院。目前那种不规则、偶然和附带性的上层结构有必要加以规范并正式确立起来。现任新学院(New College)院长撰写的维诺格拉道夫(Vinogradoff)回忆录表明可以怎样完成这项工作——并且表明牛津大学现有的学术如何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更不用说必须及时补充的科学和学术了：

“研讨班的设立与牛津的传统不那么一致，但维诺格拉道夫却使他的研讨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个通过难度很大的综合性考试比需要耐心的发现性工作声誉更高的大学里，取得这一业绩是有相当难度的。牛津没有任何一位法学教授，可能也包括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教授，能将如此多的男女青年

引上硕果累累的历史研究之路。他的方法,他的深刻性,他对法学与历史学的把握,他那种将细枝末节与比较法学和历史学的广博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罕见的才能,使他成为一位给学生以深刻印象的教师。如果他能够给人以鼓励,那么他也能够使人感受到严厉。如他的研讨班中哪位粗心大意的学生写信向他要证明书,下次上课时他就会对着全班喊道:‘我什么也不给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因为他决不宽容自己,因此他希望学生也付出同样的努力。

莱韦特(levett)小姐写道:‘研讨班是一种艰苦的训练’,‘牛津的青年人不热爱高等教育’,这是维诺格拉道夫失望时常常发出的感叹。然而总是有一小批学生准备跟着他研究凯尔特人的采邑习俗或年鉴手稿,或舍利法典,或末日裁判日的经济统计资料。有些人已从他在巴黎的朋友夏尔·贝蒙那里理解了维诺格拉道夫观念中的‘高等教育’含义,许多人欢迎将研讨班的方法引入牛津。在罗得斯基金会资助的学者中,他也发现了与他的小团体志同道合的人。不止一个人来自比较远的剑桥和伦敦地区。

他对初期的无知并不在意,只要学生有某种明确的目的和研究能力就行。他惟一严词相斥的就是自以为是的作业。他会把文章还给学生,简单地说一句‘重做’,但对初学者或胆怯者他决不这样做。他对英国某些类型的评论工作持不抱偏见的藐视态度。在得知一位评论者对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表现出极不妥当的滑稽态度后,他说道:‘你会认为我很

粗鲁,但我认为它是你们英国人养成的愚蠢的一个范例。’发表不合适的成果会激起他的怒火。‘它是一个错误,一种失败,一项罪恶’,这是他对一个案例所作的结论。最后,他用从来没有熟练掌握的带有缺陷的口语说,‘他是一个坏家伙。’然而,他表达赞赏时也是慷慨友好的。‘如果梅特兰(Maitland)还活着,他会非常高兴’,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奖励。”^①

维诺格拉道夫的一名学生这样写道:

“我们先花了四个星期做准备工作,然后我们轮流交换看法。这包括就原先共同确定的题目宣读一篇文章——例如,我的文章题目是《塞尔登对布莱克顿的批评》,我们每个人所选的题目既与布莱克顿有关,也与我们每个人专攻的历史分支领域有关。文章要在研讨班上大声宣读,然后维诺格拉道夫会拿走文章,在他有空时阅读。下次上课时提出他的建议和批评意见。他总是很少表扬学生,但另一方面,他在表达批评意见时也很注意不去冒犯学生,他提出的建议总是很有帮助的。研讨班结束后,他继续与研讨班的成员保持联系。学员们离开他时都感到自己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我在研讨班的经历使我确信,维诺格拉道夫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师。他善于因材施教,善于激发学生的热情,并通过鼓励和指导去引导和保持学生的

^① 《经济学杂志》,1908年6月。

热情。但他决不是一个什么学生都喜欢的教师,因为他的工作不是要传递信息,而是要培养追求知识的热情和能力。他的研讨班在方法论训练上特别有价值,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当时我的学院日常工作任务很重,并倾向于认为自己只适合于埋头做苦工。维诺格拉道夫恢复并开阔了我过去的理想,我所遇到的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这种深切的感受。”^①

将上述情况推广到研究生教育是再合理、再令人信服不过的了:各方都能得益——学者自己、他的高级学生群体、学院导师,还有学术。假设每一个学部都有一个研究生组织取代一位维诺格拉道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呢?维诺格拉道夫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他本人就提到了梅特兰。可提及的还有整个剑桥生理学家群体和杰出的古典学者、数学家与哲学家。但每个人都是一种个别现象,每个人都得开辟自己的道路,尽管剑桥生理学家的不断涌现——如福斯特(Foster)、朗利(Langley)、谢林顿(Sherrington)、霍普金斯(Hopkins)、巴克罗夫特(Barcroft)、哈迪(Hardy)、卢卡斯(Lucas)和阿德里安(Adrian)等——也表明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但体制帮助不了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体制不是一种机械的体制,而是指大学能为各种类型的人提供灵活的机会,使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处在增进知识和训练学生的最佳环境之中。人数多少或环境如何,因学科和教师不同而异。

^① 费希尔作序的论文集,克拉伦登出版社,第32、34、35页。

但我希望谨慎行事,不想夸大其词。美国大学的动力通常来自校长。没有一位精力充沛的校长,教授个人仍可以工作,但整个机构将停滞不前。在德国,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略去柏林或其他首府的教育部所发挥的作用不说,由正教授(Ordinarii)组成的教授会负责管理工作,而副教授(Extraordinarii)、助教和编外讲师(Privatdozenten)的发言权要小得多。与这些集权的制度——即一种是个人集权,一种是小团体集权——所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制度,后者拥有一批学院,每个都是独立的实体,都有自己的历史、特色、习惯和传统;学院组成了大学,它们与大学的关系多少有些不同。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难设想有一种不适于取得进步的组织,但事实上在大学的历史上的确存在停滞不前的时期。作为一个机构,它十分贫困、累赘、笨重、浪费,因此对那些正确的并知道自己正确的人来说,它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然而,如果我们将过去半个世纪中哈佛这样的大学在一位伟人领导下取得的进步与同时期剑桥取得的进步相比较——前者没有需要与之抗争的传统,只有需要突破的障碍,后者则背负已渗透到习俗或法律之中的种种传统、种种限制和种种偏见——那么,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与1870年时的情况相比,古老的大学在过去60年中已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诚然,它们仍然顽强地坚持前几代人的风度、礼节和惯例。此外,在1783年革命战争结束到1789年通过联邦宪法这段不愉快的时期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各分设学院与大学之间关系方面的结构、组织和惯例与美国是有些类似的,但也存在差异,因为由敏感的殖民地组成的十三州联邦什么事情也难干成。牛

津大学,如同马修·阿诺德所说的,“虽然以自己的缓慢方式”^①向前发展,但已取得很大成就。尽管有时不免混日子,但它却已经建立了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并且目前正在犹犹豫豫地考虑高级学位的组织发展和建造一座条件更好的大学图书馆的计划。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一些能干的个人在开辟自己的道路,而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个性的联系松散的学院制度为他们这样做创造了条件;是因为一所学院——例如贝利奥尔学院、三一学院或凯厄斯学院——稳步前进引起了众学院之间的竞争;是因为皇家委员会的偶尔干预消除了限制障碍与糟粕污垢;是因为结构松散带来的学科自由发展的内部压力;是因为有可能为某个特殊的导师、教授或学科的利益而作出任何一种特殊的安排。

从研究的观点和尊重研究的情况看,剑桥大学从总体上是两所大学中比较现代和比较重要的一所。诚然,牛津大学出版了优秀的词典并且在发展它的科学实验室,但剑桥大学在现代史方面也成就斐然,并且总的来说在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水平超过牛津大学。要解释这种差异并不容易。但人们怀疑这一结果与关于牛顿的传说、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建成、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独特天才^②以及较早放弃独立的院属实验室的做法等不无关系。近些年来,已有四项诺贝尔奖归属卡文迪许实验室。剑桥的大学数学史十分奇巧。起初当然是各学院各教自己的数学,后来四所较小

① 写于1865年的《书信集》,第1卷,第341页。

② 福斯特不是由校方而是由三一学院请到剑桥大学担任生理学讲师的。三一学院的院长当时碰巧对该学科感兴趣。

的学院开展了合作教学,并使这一学科的教学分化出来。三一学院规模宏大,实力雄厚,足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独立。现任伯明翰主教 25 年前在三一学院任数学导师,当时正是他将三一学院也引入了合作教学。接下来一步,即建立大学数学学科委员会就很自然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可思议的不足之处。在新建的条件很好的病理学系实验室里,只有动物材料被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该系既很少进行临床教学又几乎不做尸体解剖,因此它在艾登布鲁克医院(Addenbrooke Hospital)中毫无地位。

顺应性在美国所导致的奇怪结果,我已作了详细分析。它在伦敦大学也导致了种种荒唐之事的产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实际上是能够避免这些荒唐之事的产生的,但当人们发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拥有一所政府开办并提供有限经费的农学院或林学院时,就不免有些惊诧。当然,农学和林学都值得办一所学院。但为什么将它们分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罗瑟斯特德(Rothamstead)大学?在这种状况下即使英国人也难以保持其稳健的特点。在许多令人惊叹的事情中,还包括牛津农学院出版的一份研究性出版物《屠宰场》^①,它告诉乡村屠夫“在屠宰小公牛时,通常认为需要一个 4 人小组。人员也可以减少”,但在那种情况下,“小公牛可能有时间挣扎,并会伤害自身”。当该出版物告诉我们“肉类展览中具有精妙的艺术时”,我们真搞不清楚我们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当然在英国,其时作者在列举消费者时将“医生、律师、种马场主、牧师、教师”等等都包括在“专业阶层”范围内。在我研究

^① 克拉伦登出版社,1928 年。

英国大学时^①，该出版物已经发行了 120 本。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此类事情的徒劳无益。我冒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两所大学在创设这些分散的学院时，是否完全是从林学与农学学科自身价值的角度去考虑的^②。

十

在描述和评价古老的大学时，我已尽力做到不偏不倚。要知道，我在意识到自认为能够纠正的种种缺陷的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还由衷地羡慕这些古老的大学。只有在一个耀眼而年轻的新世界——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才能充分感受到那静悄悄的四方校园、学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珍本和善本书籍）以及院士花园的魅力和教育价值。它们是民主与传统、禁欲主义和高贵奢侈的奇异结合。没有任何一所美国的或德国的大学享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无可估量的优势，能够以高尚而博学的方式与各界名流建立丰富的联系——这不仅带来愉悦，而且是产生一种深刻的精神激励的源泉。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学者不管收入多么微薄，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① 1929年5月。

② 属于牛津大学的有：(1) 农村经济学院；(2) 农业经济学研究所；(3) 农业工程研究所。三家机构都由该大学农村经济委员会管理。政府部门在剑桥大学设立了5个研究所：动物营养研究所、动物病理学研究所、园艺学研究所、植物育种研究所和小动物育种研究所。

成为一名政府部长、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座上客。最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可估量的财产中,还要加上克拉伦登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学者付出毕生精力取得的成果只是放在书橱抽屉里发霉,那还有什么成就可言?美国的学者一直为这一压力所担忧。自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的学者也同样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出于理智和公正之心,上述两家出版社的经理不仅出色地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者提供服务,而且还为全世界说英语和用英语阅读的学者提供服务。

至此,我已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包括大学本身及各自所辖的学院——作了概况性的讨论。现在我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虑作为本章的结尾,希望能更清楚地表达我的感受。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也在齐头并进。我曾对目光特别短浅的美国大学商学院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像研究疾病与犯罪那样对工业、商业、交通以及管理的现象进行研究。英国是一个工业国,目前正在与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作斗争。英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其现行政体在理论上与维多利亚时代基本相同,但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却是由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迅速传播所带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多大的勇气去攻克这些难题?相当奇怪的是,对这些难题的认识,剑桥大学似乎比牛津大学更为清楚。牛津大学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的摇篮居然直到大战爆发时还未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合理而重要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科目。大学根本未设有有关的学位(只颁文凭),也没有一个学院导师教授这门学科,只有巴尼特学堂(Barnett

House)中一批富有奋斗精神的非正式的成员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英国思想家为全世界开辟了道路的这一学科。战争结束后,牛津大学始设“现代文学士学位考试”(“Modern Greats”),它由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组成,分量很重。新旧“文学士学位考试”在要求上相差不会太大。学校在经济学方面仍然缺少足够的图书资料和辅助人员。有关的研究人员在伦敦经济学院可以找到更多的机会。但请想一想牛津大学在史学、法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水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丰富经济学研究者的思想,增强其洞察力,拓宽其视野!然而除非经济学本身得到充足的发展,否则所有这一切对经济学都无济于事。

不过,经济学仅仅是政治或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如果研究问题是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为财政问题和政府问题所困扰的英国肯定需要部分本国最出色、最冷静的人才去客观地考虑这些问题。有两条明显的道路可走,即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训练统治英帝国的人才——如殖民地总督、外交家、军人和文官。由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通过毕业生与全世界各种管理问题、财政问题、工业问题和政治实验问题保持接触。从这种丰富的实际经验中牛津人和剑桥人为各自的母校带回些什么呢?这两所大学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积累经验、更好地训练下一代人呢?只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善于利用经验并处理好各自的毕业生问题,它们就能够对管理和政治作出独特的贡献。

但这毕竟只是经验的方法。只依靠这种方法,难免危机四伏。殖民地的开拓、原材料的获得、民族的交往、古老政府形态的瓦解以及新的政府形态的构造与建立(它将满足本地

民族的愿望和古老民族追求空间和原材料而非贪图权力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问题虽然现在都由善意能干的行政官员进行处理,但由于他们既不了解也无法了解其他地方的经验,又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因此其处理问题的方式难免有些勉强。大学法律和政治学部的职能应该是不仅传授已知的知识,而且要研究并非明天就要做而是十年后可能要做的事情。正如一流医学院的职能应该是不仅使学生懂得今天我们懂得的事情,而且能够理解十年以后某人可能发现和提出的事情。经济学家和国际法学家并未设法这么去做。在牛津大学思考的那些人主要是根据英帝国的现状进行思考,并希望其思考结果有助于印度和非洲那些焦虑不安的行政官员。我相当肯定地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接近实际的决策责任,但他们的职责,正如生理学家和药物学家的职责一样,应是对各种现象进行研究、报告和思考,而将这一材料的有效运用留给行政官员,正如生理学家和药物学家将这一过程留给临床医生或中间人一样。这种工作不可能完全在图书馆里完成,研究者必须拥有时间并以超然的态度对问题进行现场研究,收集实际行政官员的经验,倾听他们的想法,但决不为他们的想法所左右。调查者可以信赖行政官员对学术性或理论性太强的调查结论所作的修改,但决不能为行政官员或殖民者的日常需要所牵制。调查研究人员需要有比一般人更加广阔的视野。

与罗得斯基金会在牛津大学新建的罗得斯学堂(Rhodes House)有关的一个有趣而危险的可能性因此产生。该学堂的设计和建造并没有明确的功用目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既然已经建造起来,并成为各种事物可以群集在其周围的有形物体,有人建议应使它成为政治学或其中某些分支学

科的中心场所。美国史和殖民史教授已经在该学堂拥有研讨班教室和学科资料室。该建筑很容易扩建,可以满足建立应用性和理论性的政治学部所需的为其他学者提供类似设施的条件,并可提供文书辅助人员的工作用房。危险存在于将罗得斯的名字与一个专门培养政治人才的学院联系在一起。有意创设一所政治学院并牢记一切历史和经验障碍的学者,必须站到新的高度,使自己的视野超越这种联系。他们必须研究政治学而不必考虑政策问题。英国人对政治学和政策领域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天生的兴趣,尽管他们在这两方面都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除非有影响的和独立的思想学派能够在大学里得到发展,否则在处理当前和未来的种种实际问题时很容易变得目光短浅。当霍布斯(Hobbes)、里卡多(Ricardo)、边沁(Bentham)、穆勒(Mill)、霍布豪斯(Hobhouse)和华莱士(Wallas)在著名的大学里缺少训练有素的接班人时,某种有意义的东西就已经失去了。

尽管我知道离开相当安全的一般性分析的领域是很危险的,我还是要大胆地触及牛津大学图书馆这一棘手的主题。该图书馆的情况不仅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它还阻碍了大学的发展。有些院士利用自己所在学院的房间藏书和工作,有些则利用自己的住宅,没有一个地方有总的目录,因此在学院图书馆、泰勒研究所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巴尼特学堂、罗得斯学堂之间缺乏协调的安排。与此同时,科学研究的活力和两者相得益彰则取决于各高级研究者小组与各学科文献的密切联系。很显然,牛津的大学图书馆实在宝贵,动它不得。同样明显的是,它不仅规模发展得过大,而且功能也已超出其范围。早在1880年时,由于它的实际规模有限,连藏书都无法

满足,因此需要使用毗邻“学院”的附加用房,并在后来又建造了宽敞的拱顶室。这毫无用处。在预计的时间远未到来之前,汹涌而来的图书浪潮已经席卷了它的每个角落。大学图书馆到哪里去寻找更多的空间?针对这一问题,一场尖锐的争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有名的学者则在考试学院空荡荡的大厅里授课,在自己所在学院的工作室里会见寥寥无几的研究生,并分别在大学图书馆、学院工作室和自己的家中进行自己的工作。由于目前大学图书馆甚至不适宜作为一个藏书馆,这就提出了大学未来的问题,并为鼓励和促进高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机会。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在半个世纪前就有力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最近的皇家委员会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即通过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而让本科生学院独善其身——已从改进大学图书馆,改进藏书办法,采取措施填补目前的藏书空缺,为研究生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创造健康便利的环境等需要中突显出来。

因此,我斗胆指出:虽然藏书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目前大学在次要的问题而非决定性的问题上投入力量太多。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应如何收藏牛津的图书?”而是“牛津在发挥大学的作用吗?”如果后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依据我的判断,在时代的压力下,这一问题必须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藏书只是考虑大学职能这一基本问题之外的一个次要问题。设想一下大学不仅是拥有一群偏激的研究者的学院之集合体,而且是能够为开展系统的研究和培养更多学术英才提供设施与机会的比较发达的上层建筑。新的图书馆将是所有与书本有关的学科的大学——包括哲学、历史、语言和文学。

它将是一个为阅读、学习和教学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的图书馆。因此,它的图书将部分地重新分类,图书将向所有合格的学生开放,并消除目前由于目录陈旧、人员缺乏、秩序混乱而带来的种种限制。图书馆中开设与各大学科关系密切的工作室,既为教授和学生个人分别提供安适的工作或学习环境,也为高年级或研究生的小组讨论提供场所。“一等”或“二等”的优秀学生不需要高级小组的激励和指导的观念将被抛弃。如果能将五六位有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学生组织在一起,和教授讨论与每个人的课题都有些不同的问题,那么他们人人都将获益颇丰。这只有在总的学科文献很容易获得时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当然,必须有足够的空间用于藏书;当然,在各实验室和罗得斯学堂仍必须设置系科图书馆。但藏书不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他问题将取而代之。一所现代大学的图书馆应履行哪些功能?哪种建筑适合于顺利地履行这些功能?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人员?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泰勒研究所和巴尼特学堂应设在何处并应如何与大学图书馆这一宽敞的建筑相适应?该建筑需有多大(藏书的问题)才能满足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如果这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得到回答,大学图书馆就将继续存在,尽管它将如何使用我不清楚,但它将以一个新的图书馆的面貌出现,与牛津的建筑处于最佳的和谐状态,并且不仅仅代表了大学的空间的扩展,而且是对现有建筑充溢着的一种先进理论的补充。为什么不?大学随着时代的改变不断汲取新的思想,并因此证明自己的活力所在。赋有某种新使命的学院一个接一个应运而生,各种限制已被取消,一些女子学院已经诞生,一批实验室沿着南公园路(South Parks Road)纷纷出现,有关东方研究、农业研究、林业研究的

学院也加入了大学。每迈出一步,大学的实力就增强一分,学院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没有必要为它们感到担心。因此大学理想的发展随大学图书馆问题的解决而定。如果解决得好,牛津大学将成为英帝国生命中一支更为强大的力量,并在文明世界中拥有比以往更重要的地位。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将使在牛津大学内部寻找出路的种种力量得以满足。

医学将提供最后一个例子。它是一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数学都在其中起作用的学科。但医学既不是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也不仅是解剖学、生理学或病理学。疾病是一种存在:生理学家不关心它,化学家或病理学家也一样。为对疾病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的希望在于以科学性取代经验性——就需要一个联合小组,其成员包括解剖学家、生理学家、病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当然还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临床医生。在丹麦、荷兰、奥地利、德国和美国,都有由上述人员组成的联合的医学院。在英国则一个都没有。伦敦大学的医院附属医学院在培训实践型医生方面相当有成绩,但它们在组织、设施、资助条件方面都不足于促进科学医学的发展。伦敦的大学学院在基础医学科学方面集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小组,但它在临床水平方面尽管已经有所提高,却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基础科学实力很强,各医学实验室也幸运地一起坐落在南公园路。但直至目前,牛津大学也好,剑桥大学也好,都未建成起学部作用的医学研究组织,即使在临床方面也一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医科学生在学完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富有启发性的课程之后,到伦敦实习时却降到较低的水平。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根本不存在真

正意义上的大学诊所。牛津和剑桥作为疾病的科学研究中心——这的确是帝国的需要——可能是完善的。两个市镇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决不是什么障碍,因为对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病人来说,哪里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们就会去哪里,如同他们去梅奥医院(Mayo Clinic)和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一样,他们也会去牛津和剑桥^①。同时,英国的医生也许是非常优秀的临床专家,像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亨利·黑德(Henry Head)、詹姆斯·麦肯齐(James Mackenzie)和托马斯·刘易斯(Thomas Lewis)这样的人物在今天发挥的作用,与哈维(Harvey)、艾迪生(Addison)和布赖特(Bright)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同样的——他们都对阐明疾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他们在今天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得到组织、设备和经费方面的帮助,他们将越来越不可能训练出后继者或者说数量足够的后继者。近些年来,美国在医学领域取得成就超过任何其他学科,为什么?因为它拥有威尔奇(Welch)和奥斯勒(Osler)这样的领头人,就像英国也拥有一样。但美国的学科领头人走在前面。美国在一些大学里依次将自然科学、医学科学和必需的诊所结合在一起,使它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为它们配备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充足的设备。除非英国提供同样的条件,否则依我的判断它无法取得同样的成就。因此,作为国家大学结构支柱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① 尽管剑桥大学拥有很好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院系,但与牛津大学相比,剑桥大学的医学院连一个学部也谈不上。它不但没有院长,而且对医学部的组织——不管其多么松散——有一种明显的厌恶。

在许多地方,人们能够感受到一所以稳固的学院结构为基础的现代大学已初露端倪;在某些学者和某些学科方面,人们也能够感受到比较先进的事物,尤其是某些在学术、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但是,一所现代大学的建筑师、砖块和灰浆在哪里?能够使基础完善的理念在哪里?从数字上看,“古典文学士学位考试”已不起作用,但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它仍然很有影响。

大学拨款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工业与科学研究署(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的创建说明了英国缺少现代大学这样一个事实。上述组织提供了临时的解决办法,即提供一揽子拨款,资助有前途的研究者或重要的研究工作。这些机构并非多余,无论如何它们有它们的用处,但它们不能替代捐赠丰厚、设备充实并拥有一大批献身于追求真理事业之人才的大学。这些组织的存在似乎是在说:“我们缺少发达的大学。当我们在等待它们出现或为它们的出现作准备时,让我们来培养这位或那位有前途的学者,让我们来完成这一件或那一件工作。”这很好,但不能解决问题。

坦率地说,尽管英国和美国都拥有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但这种事情对英国或美国来说都不容易做到。这两个国家都以自己是实干家而自豪:难道英国没有征服一个帝国?难道美国人没有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征服一个大陆?他们都是行动家而不是思想家或空想家。当大不列颠的命令等于海洋上的法律时,当印度的财富大量流入英国的国库时,当煤、铁和蒸汽使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时,当一个国家丰衣足食时,一切都平安无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凭经验生活。因此,在美国,只要森林几乎保持原貌,只要精力充沛的移民

若干年后能够变成一个资本家,只要本国能够无视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切都会非常完美。但无论在这两个国家,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秩序已不复存在。单凭经验办事已经不够,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再也不能产生世界性的思想或控制世界。无论对内部的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还是对外部的殖民地问题和外交问题,都必须有所认识。以同情和理解为基础的理智,必须加以控制。无论在科学与工业领域,还是在政治、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国家的重要性都不再与其人数或财富成正比,而将与其对思想领域的贡献成正比。

虽然自 1850 年以来,“研究”一词在有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文献中——如相继发表的皇家委员会报告,帕蒂森的著述和柯曾(Curzon)的备忘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批评者几乎都缺乏针砭时弊的勇气。柯曾勋爵认为,研究和高级教学作为一个方面,本科生教学作为另一个方面,两者一般属于不同类别的工作,把它们混杂在一起所遇到的强烈反对,不会亚于把温彻斯特公学与新学院混杂在一起引来的反对。因此,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迟早要被抛弃,提供连续性指导的、或许以英国地方性大学的主体为模式的研究生学部将不得不成立起来;目前的机构或许可加以精简,以满足本科生教育的需要;各学院可以各行其道;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和学者则必须拥有一个多少有些独立的组织,必须拥有采用最适合个人和学科的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自由,必须拥有学者和科学家为训练学生所需的设施条件。为了努力迈出这一重要的一步,所有影响学院和本科教育的小事都不妨搁置一边。

十一

在英国,能够用于资助大学教育发展的资金少得可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差别很大——有的很富,有的则相对贫困。它们的产出似乎与它们的财富无关。大学能够用于高级工作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地方性大学的研究生工作则只是附带性的。即使有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资助,也难以承担一些大项目,如建造牛津大学图书馆或为完善医学院提供建筑物、设备以至资助小型的大学医学诊所等。资金是相当短缺的:高等教育的年度总开支仅约 500 万英镑,低得可怜。不过,比较突出并且值得称赞的是,管理方面的开支也相对较少。

薪水比美国相对要高些,1928—1929 年教授的平均薪水为 1082 英镑,但教授以下的准教授和讲师职务的薪水要低近 50%。由于在这样一个小国家里,教授职位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人们进入学术生活的动机不是很强。所幸的是,学术生活方式有其特点:简单、高贵、超脱。因此,尤其在教授阶层,生活也不乏舒适安逸。依赖企业获得额外收入的做法因被视为典型的“不良方式”,也十分少见。另一方面,“其他专业和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现在的情况与组建前一个皇家委员会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已允许研究员结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希望享受自己的权利。一般的‘教师’现在都可在许多不同行业获得可观的薪水。通常他也不必非

要在教会和教学专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不可。整个英语世界现在常常向牛津和剑桥的学者提供薪水丰厚的教授职位。优秀的毕业生,尤其是理科毕业生,现在很容易在企业谋得理想的、并且常常是报酬优厚的职位。

尽管大学学者不能也不应该斤斤计较于企业所供薪水的高低,但足以维持生计的薪水也是必需的。人们愿意牺牲较高的薪水甚至较有权势的职位,以换取牛津和剑桥的舒适安逸、学术权利和生活理想。但不管他们多么渴望留在大学内,如果他们有条件养家与培养后代,他们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战前 500 或 600 英镑就能满足中年教师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之需要的话,那么这点收入在今天已远远不够。每一所大学都必须能够为所有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薪水和津贴,使他们能够成家、养家,并能够享受与其他专业人员家庭同样舒适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牛津和剑桥才能够在即将来临的岁月里留住足够多的优秀学生从事教学和研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①

应该记住,从为大学及其研究提供资助的能力看,事实上

^① 《皇家委员会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告》,皇家书局,伦敦,1922年出版,第 49 页。并参见大学拨款委员会 1928—1929 年年度报告,第 22—30 页。

同样的看法参见弗莱彻(Walter M. Fletcher)爵士论医学研究的诺尔曼·洛克耶演讲(发表在 1929 年 11 月 30 日的《英国医学杂志》上)。他说:“常常有人向我提到他们从战时法国一家医院的一位伤员那里听到的故事。有人问一位年逾 50 岁、原先给一位百万富翁开车的勇士为什么要离开家中那份安全实惠的工作去打仗时,他透过绷带露出了微笑,谦逊地说道:‘我想是我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我认识的许许多多研究人员都可以对他们的动机作出同样离奇而崇高的解释。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债务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与目前的债务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那次的债务并未偿清,但随着蒸汽、煤炭和钢铁推动英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实际上已变得无足轻重。难道不能设想:如果英国同样注重发展物理学和化学,就不会产生与之类似的现象吗?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近来一些国家走上了寻求大量战争借款的道路;任何国家从来都没有寻求过大量的教育借款。也许,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既有钱用于战争又有钱用于文明的富裕程度。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不可能两者兼得。新签订的海军条约允许美国支付十亿美元制造战舰——这笔开支要比我国所有受捐赠院校全部历史上的累计开支还要多。这真是愚蠢至极!在英国,与有限的教育开支相比,现在、过去或未来用于战争的国民预算份额也很大。除非这个数字颠倒过来,否则上述两个国家关于它们最重视什么的想法就纯属自欺欺人。

第四章 德国的大学

—

在本书所涉及的国家中，德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最接近于还高等教育以其应有的位置。美国，正如我已说过的，对教育的信仰十分幼稚。它对教育的肤浅认识可以从课程安排的杂乱性、对严格训练的反感、对社会活动而不是学术努力的过分强调等种种表现中看得一清二楚。诚然，课程设置长期以来过于空洞单一；诚然，学校是一个社会机构；诚然，社会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尽管这些都很重要，处于教育内部核心地位的却是严格艰苦和必不可少的理智训练。由于看不到这一因素，我们美国人毫不在意、无所顾忌地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各种各样的科目杂乱无章地堆积在我们的中学、学院或大学里。人们可以举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例外情况，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在英国则情况有所不同。英国的社会和教会需要并且形成了一些特定类型的教育。不管这些类型的教育有什么缺

点,它们已经确立了一种明智的、牢固的、权威的——尽管也是十分有限的——教育理念。一种对教育的真正的或公正的关怀有待于劳动阶级地位的提高。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政府当局才会努力采取措施,拾遗补阙,建立由不同机构合作管理的国民教育制度。这种将来某一天会形成的教育制度将有力地说明,英国人在实现一项宏伟的公共目标时是多么擅长把官方机构与私立机构的力量结合起来,但这一事业的发展速度将几乎完全取决于英国公共开支重心的转移。

二

在德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大学的水平取决于中等教育的水平。战前,德国的中等教育实际上由三种大学预科中学组成。因此,大学对新生所受过的训练和具有的素质了解得很清楚。但自德国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有必要进行变革。但所进行的变革并非仅限于所需要的变革,结果,教育的利刃多少有些磨损。

刚才我说过,战前德国拥有三类中学:文科中学(Gymnasien)、实科中学(Realgymnasien)和理科中学(Oberrealshulen)——每一种中学都适应于一类不同的人才

和目的。它们都是选拔性中学,并且要求都很严格^①。文科中学进行严格的文科教育;理科中学对有理科头脑的学生进行同样严格的训练;实科中学则走一条中间道路。分类以能力和兴趣为基础,但所有三类中学都制定了相当高的教育目标,并且确保学生能够在高水平教师的指导下接受相当长时间的连续性学术训练。它们的教育目标不是技术性 or 职业性的,因为类型的差异是为了满足学生的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满足他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的需要。主宰教育组织的是一种文化的理想,即教养,而不是专门训练。诚然,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如果认为德国人那些常常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与英国人对英国中等教育的批评、甚至美国人对美国中等教育的批评没有什么两样,那就大错特错了^②。为了发展有组织的职业培训,人们作出了一些让步。但发展职业培训的压力越大,来自教育的主体结构维护者的反对呼声就越强烈。

我已说过,德国中学的课程体系统一,内容充实,时间较长——至少9年。然而不幸的是,整个教育几乎完全雷同。虽然预科课程的教材内容有显著的差异,但在教学和管理方面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体育和社会活动方

① 这三类中学的界限由于所谓的“革新中学”(“Reform” schools)的创建而变得有所松动,因为后者所开设的课程脱离了严格的传统中学类型。卢卑克(Lübeck)的大教堂理科中学就有若干种。毫无疑问,太多的不同类型的中学能够——而且已经——创建起来,只是代价太大罢了。

② 就普鲁士教育部于1924年发布的题为《普鲁士中等教育的新制度》的备忘录而言,人们再怎么称赞也不会过分。该文件对普鲁士中等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坦率的评述,富有批判性和启发性。

面：户外锻炼或运动太少，而适度的户外锻炼是对年轻人进行道德的、公民的和体质的训练所不可缺少的；给个人发挥主动性和参与社会活动留下的余地太小。在上述方面，在9岁或10岁进文科中学学习的儿童与18岁或19岁毕业进大学——在那里他突然获得了彻底的个人自由——的青年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一个人入学时是儿童，离开学校时已是一个青年人，已经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在这整个教育过程中，他受到组织的严格控制。他学习十分勤奋，严守规则，但他很少体验到自由的滋味，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虽然近些年来对体育训练的重视使他的状况获得了一些改变。结果，有时要让他从优质教育的优越性中恢复过来，或许比让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从肤浅教育的不足中恢复过来要困难得多。不过，这不能作为赞成教育质量差的学校的理由。

学生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即往往是地位相当卑微的商人、官员、律师、医生和乡村牧师的子弟。而在文科中学或者——正如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在大学里，几乎找不到工人阶级的子女。工人阶级的兴起为德国人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力量，对此，战前德国的高等教育尚未意识到。我认识的一位学者上过三所不同的预科学校，但他在这些学校里从未遇到过一个工人子弟。这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工人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用，但经济原因决不是惟一的原因。工人子女因此只好满足于接受国民小学(Volksschule)教育，毕业后跟随父亲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这种社会差别孕育了一种不断郁积的仇恨，此即目前德国所面临之灾难的主要根源之一。

简而言之，这就是战前德国中等教育的光明面和阴暗面。

它的突出优点是具有完整性与连续性；它的缺点则是呆板僵化，负担过重，等级性强。一向直言不讳——在战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尤其如此——的德国改革家已经指出了这些缺点。偶尔人们甚至会听到这样的建议，即对过长的预科期实行分段，建立类似于美国学院的机构。可惜美国的学院在自己国家也是一件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物品，无法推荐其出口。

1919年宪法打破了界限。它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规定师资培训应该统一。它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普遍而统一的水平。该法提出的计划本身并无新颖之处。建立一种共同的初等学校作为国民教育之基础的思想，在教育繁荣兴旺的伟大时期，即苏维恩(Süvern)和洪堡(Humboldt)时代就已经提出过。该思想先是被搁在一边，1848年又被重新提出。但随着自由主义的崩溃，这种思想长期被人遗忘，直到世界大战再次提醒这个战败国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是何等重要。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普鲁士和其他地区正努力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形成教育制度。因此，以前在国民小学与文科中学之间存在的、将民族一分为二的社会差别，正在逐渐缩小。有没有可能在消除这种差别的同时不降低中学以至大学的水平？这个问题正是民主社会所面临的，不仅在德国如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美国和在英国都表现得更为清楚。

为了促进机会均等和增加灵活性，德国还进行了其他变革。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男女青年可以申请参加一种特殊考试，也有少数学生由此进入大学学习——之所以是少数，是因为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值得大学接收入学^①。普鲁士和其他

① 参见有关“无高级中学毕业证书学生的学习事宜”的官方通知。

若干邦国还创建了第四种预科学校,即初级中学(Deutsche Oberschule)。这类中学最初设想办成一种现代学校,强调现代语言和科学教育,但它现在已与理科中学难以区分。此外,大学已向数量甚大、种类繁多的所谓“特种中学”(Aufbauschulen)的毕业生开放。同时,体育也得到了全面的重视,这一趋势反过来肯定对中学起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德国革命为更多希望受大学教育的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但它并没有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消除已经存在的差别。在普鲁士,某些特殊领域的培训不属于教育部管辖,而是属商业部、农业部和公共福利部管辖。那些较小的邦国,行政分工没有那么明确,即使在普鲁士,这种管理体制的确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工作相互重叠,还需要额外增加开支。但承认这种差别有何重要意义,或许美国人最能够体会得到。在初等学校结束时,有各种道路可供学生选择。它们通往不同方向,吸引不同类型的学生。在美国,所有人都被引向一条大道——中学、学院和大学,这些学校都试图发挥一种综合学校的作用,但都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德国承认能力和目标的多样性,并努力适当地满足这种多样性。美国人的做法为德国人的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三

德国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但从我们的角度考虑,它们则发端于19世纪。德国的大学保持了传统的外观,如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那样,甚至建在科隆、汉堡和法兰克福的新大学也具有与其他大学相同的外观。但柏林大学的兴建,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一事件也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追根溯源,人们不难发现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及其他人的影响——他们都积极参与了民族文化的创造。但具体说来,这一新时代与稍后出现的一批人物有关,他们是黑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洪堡。这一事件旨在倡导民族精神,反抗暴力统治。

体现理智精神的黑格尔国家统一思想,旨在将一个分裂成许多小邦国、在拿破仑大军面前仰人鼻息的德意志从绝境中拯救出来。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德意志仍继续处于分裂状态,这一思想却受到了这个分裂的国家的拥护。并且,我可以预料,尽管地方自治主义的思想尚有一定的市场,但国家统一的思想目前仍会得到国民的拥护。在理想的统一国家中,黑格尔及其后继者视大学为为个性完善提供自由机会的场所。国家应由个性完善的人所组成——这就是黑格尔思想对德国意志复兴所作出的贡献。

在哈雷、哥廷根和耶拿等大学初步改革的先导作用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有意与学术传统作出了决裂。中世纪大学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特征,它只能随着18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发展而产生。新大学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知识,次要目的——或许是一种让步——是在能够增进知识的层次上训练专业人员和公务员。洪堡认为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就必须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基础是由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打下的,而且,19世纪的

军人和政治家对德意志的思想统一也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虽然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与大学的关系似乎并不特别亲密,威廉二世却为大学感到自豪,正如他为德国军队和德国商业感到自豪一样:因为他理解学者和科学家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学者和科学家是思想王国中成功的依据,正如军队和商业是行动竞技场上成功的依据一样。尽管从整体上看,君主精神后来逐渐渗透到了大学之中,但如果认为教授们是在寻求皇室的恩惠,此乃严重的误解。君主制对大学的影响,与现代商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有类似之处。社会民主党人被排斥在最高层次的学术职位之外,教授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各种荣誉、奖励和照顾。不过,总有少数像保尔森(Paulsen)那样的学者,始终坚持民主信念和简朴思想,拒绝向皇室卑躬屈膝。

因此,“铁血政策”只反映了统一德国的缔造者们的部分面貌。真实的德国不仅是俾斯麦及其将军和王侯的德国,而且也是歌德、席勒、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保尔森和微耳和的德国——在德国创建的过程中,哲学、文学、科学和战争起初都共同发挥过作用。经过一段曲折、辉煌、灿烂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战争的因素被大大地夸张了——德国现在回到了正路,但回来时已有所不同。因为尽管俾斯麦没有完全消除德国人的地方自治主义,但他使德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幸好不是单一的——政治实体。俾斯麦的冷酷无情促使德意志各邦国认识到它们必须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它们在自己的军事经历中亦已获得很大的利益。尽管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哲学和政治上的差异,德国的教育——即文科中学和大学——却促使德国形成

了思想的统一。最初表明这种统一的是“文化”(“Kultur”)①一词,但后来的世界大战却使其带上了极为恶劣的含义。

崇尚个性完善的黑格尔哲学,似乎与要求日益专门化的科学发展相冲突。但正如拉特瑙(Rathenau)指出的,经验可以看做是一个圆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从圆周的任何一点都可以达到中心。在德国,优秀的中等教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从思想上拯救了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这种情况在英国也经常出现,但在美国则很少见到。这就是为什么英德两国的学者和科学家经常给人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受过更好的教育或更具有教养之印象的原因。这当然也是为什么英德两国的大学都不能容忍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公然出现的非正规教育的原因。

在德国革命的影响下出现的种种变革,有些我已经提到了。德意志帝国的迅速崩溃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兴起,促使中等教育实现了部分民主化,由此带来的中学教育水平的降低和类型的多样化,同样也降低了大学的水平。另一方面,部分是由于缺少就业机会,部分是出于在此之前一直受压抑的那些人想“尝试埃及的奢侈生活”的天真愿望,大学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从而也造成了大学水平的降低。强调职业或准专业的主张在一些地方也赢得了立足点,尽管是不稳的立足点。必须“靠自己本事谋生”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损害了非赢利性学科的地位,提高了有助于即时谋生的科目的地位。

① 贝克尔(C. H. Becker)认为,俾斯麦政策所带来的德国统一主要是一项军事上的成就,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见贝克尔著《帝国的文化政策任务》,莱比锡,1919年版,第3页。

存款受损的那些教授,被迫承担额外的教学任务,以聊补家用。建筑物等设施的修建一直步履艰难。然而,令人惊奇的不是大学的暂时滑坡,而是在整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原始功能,是为使大学与当今的现实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常设性行政管理人员具有的优秀素质——他们在坦率承认以往错误和眼前不足的同时,努力坚持历史的理念。

在过去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中,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卓有成效。只要上述两项任务得到富有成效的结合,德国的大学不管存在什么具体缺陷都仍将保持重要的地位。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促进了英国大学的发展;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促成了新世界研究生院的诞生;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也使工业生产、卫生保健及一切可以想像的实用性活动受益无穷。功利性也好,甚至实用性专业训练也好,都不是大学的本质目的或活动。的确,德国大学经常听到的批评并不是它的世俗性,而是它的超脱性。

四

包括工业大学在内,德国共有 30 所大学^①。这些大学外

^① 根据权威的弗里德里希·保尔森在《德国的大学》(弗兰克·蒂利和埃尔旺译,纽约,1906年版)和莱克斯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柏林,1914年版)中所作的经典描述统计。

观相同,在一定范围内也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水准。这部分是受德帝国各种国家考试的影响,部分是竞争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学生和教师不断的流动,部分则是受大学年会^① 思想交流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或地理的原因,各大学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我们已经看到 19 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建如何动摇了整个大学体制,那些中世纪大学如何一个接一个匆匆忙忙地推行现代化计划以与柏林大学的理念相符合。当时普鲁士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庞大的规模和众多的大学使它从此获得了霸主的地位。但不能由此就错误地认为其他封建公国自此俯首帖耳。较大的公国,如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还有一些较小的公国,都保留了行动自由并实行之。一方面,由于普鲁士影响巨大,人们对它的盲目仿效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其他公国也开展了与普鲁士榜样很不相同的实验。这种独立倾向自德国革命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样,从维也纳到慕尼黑,从弗莱堡到汉堡,德国文化的个性表现得异常丰富。波恩和科隆觉得自己负有保护莱茵兰文化特色的特殊使命;新建的汉堡大学则将眼光投向了海外,布雷斯劳具有突出的东欧意识,寇尼斯堡则保持了显著的东德意识。然而,由于新大学的教职员主要来自老大学,它们不可能走得太远。原有的理想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德国的大学最终由一个中央权力部门管理,即八个邦国的教育部。不管这个部的准确名称是什么,其职责就是监管教育、艺术、戏剧和歌剧——也就是说,国家直接负有提高文

^① 魏玛宪法为此目的建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实际上不起作用。

化水准的责任,但在这儿我们只关心教育。

教育部长是国会议员——偶尔也有像贝克尔那样本身是学者的人。教育部下属的若干司局通常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负责。由于面临其他邦国的竞争压力,他们通常被迫作出努力,争取先进。在德国,由行政管理引起的精力分散问题比美国要少得多,大学的公务由当地的大学学监照顾,他通过身边的下属及通过与教育部的直接交往完成自己的工作。大学学监一方面是颇受信任的政府代表,另一方面在处理行政公务时也是深孚众望的大学代表。大学校长的任期只有一年,轮换很快,因此他既不可能使科学家遭殃,也不可能实施连续的政策。的确,各学部和教育部都是各行其是,按部就班。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管理委员会(Kuratorium)发挥一种“缓冲器”的作用。各学部,即哲学部(相当于文科和理科)、医学部、法学部以及神学部,都是各具特色、高度自主的,并且通常也是同样出色、同样发达的。通过与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协商,学部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公务。进步有时是缓慢的,各种委员会和会议名目繁多,各种对话也数不胜数。然而,尽管地方上有时也有种种明显的不满,但在战前的75年时间里,德国大学在办学设施、资金投入与规模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最显著的。

我认为德国大学生活中有四个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教与学的自由(Lehrand Lernfreiheit)。德国的教师,无论是编外讲师还是教授——其挑选方式我将作简要描述——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走自己的路。在准备讲题、决定讲授方式、组建研讨班和考虑生活方式等方面,他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学部也好,教育部也好,都不会对他进行监督。他享

有学术职位拥有者不听命于任何人的尊严。他的作用与一开始我归结于大学的作用一样,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保存知识,另一方面是增进知识:即教学与研究。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由于大学性质方面的原因,德国的教授只对研究有兴趣,而对教学则轻描淡写。这种错误的看法无疑源于德国教授不采取灌输式教学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学生不需要任何这类方法,他自己则不屑于使用这类方法。人们从未背离过洪堡有关大学应将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近期出版的有关维拉莫维茨较重要著作的部分文献目录几乎排满整整八张印刷用纸^①。对外国人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Gelehrter”)——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多产学者。然而,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维拉莫维茨认为他的著作是“我发展过程中可以舍弃的东西……在德国,一个人仅仅在次要的意义上是一名学者:教授职位才是主要的,我一直把将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② 大学中普遍使用的教学方式有三种:即大班讲课,与助教合作开设的实习课,为经过选拔的学生保留的研讨班。可惜的是由于经常开设必修性的研讨班,最后一种教学方式选拔的力度仍不够大,因此只好为有真才实学的学生私下安排超级研讨班(Superseminar)。要使学生了解整个学科,教授的学问必须渊博;要为高级学生开设研讨班,教授还应该积极发表成果。当然,要达到两者之间理想的平衡并不总是

① 该文献目录不是以德文原文而是以英文译文排印的(伦敦,1930年版),第391—399页。

② 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 - Moellendorf):《1848—1914年回忆录:序言》。我在后面所参考的材料引自德文版而不是英文译文版。

很容易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杰出的研究者往往是公认的富有责任感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师。近代这样的人物就有微耳和、莫姆森(Mommsen)、康恩黑姆(Cohnheim)、路德维希(Ludwig)、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哈纳克(Harnack)、弗里德里希·米勒(Friedrich Müller)和维拉莫维茨等。他们将一批热心学习的学生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弟子带着新思想,接二连三地成了古老讲座的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科就广泛的问题作一般性演讲时,使广大的听众深受启发。科学家的演讲往往吸引了文科的学生,人文学者的演讲则往往吸引了学习科学或哲学的学生。水平差的教师的确存在,毫无价值、迂腐至极的论文当然也时有所闻。海涅(Heine)的讽刺至今仍未完全失去其意义,卡莱尔(Carlyle)式的卖弄学问亦仍未完全消失。但即使如此,德国人的迂腐还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之上,毕其一生精力于次要问题的语文学家或哲学家毕竟对他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了解的。以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学问为研究对象的学究式工作,当然不同于冰淇淋制作者或学校看门人所从事的琐碎杂事。一位极有才华而年轻的德国行政管理人员在公文中写道^①:“大学既是研究的场所,也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正如一个民族应对理论问题感兴趣一样,除了科学从生活现实中能够获得的激励之外,大学还必须——尤其是现在——使所培养的人才能够在大学水平上运用学问。”^② 还有:“着眼于某种职业的专门化必然使德国的学生眼花缭乱。这一点

① 摘自未出版的备忘录。

② 参见我在前面所述的关于巴斯德和霍尔丹等人的看法。

与所有学科都有关系,因为大学的职责不是要引导学生将来去承担各种具体的工作,而是要使学生打好基础,使之以后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学生享有同等的自由。由于证书的字面价值得到广泛的承认,他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因此,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挤到人满为患的柏林大学去,尽管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可能对他更有利。他可以自己选择教师;他可以从一所大学游学到另一所大学;他可以沉溺于击剑或酗酒而不能自拔;他可以放弃假期到实验室或诊所做助教或助手。在那些重视学科知识的逻辑性的专业,他可以接受指导,也可以不接受指导,由自己承担责任。从他被大学录取的第一天起,他就被当做一个成人对待。

然而,实际上要想通过考试的学生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么自由。考试有两种,各不相同:一种是国家考试,另一种是大学考试。前者通向某种职业,后者通向博士学位;前者有教授参与或要向他们咨询,后者则由大学自己组织进行,并且事实上只有少数学生参加这种考试。规定性要求和强制性要求因此悄悄产生。有时规定性要求就是从学科本身提出的,例如,不懂解剖学的人不能学生理学,或不懂数学的人不能学物理学。在这类事情上,学科本身限制了“学习自由”。但“学习自由”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种种考试的损害。国家或大学或双方都下了很大力气——当然往往也是非常顺利地——为学生尤其是专业层次的学生增加独立开考的学科数目^①。幸

^① 一旦一门学科分支纳入考试科目,学生就必须注册参加考试并交纳一笔特别费用。

好对如何参加考试通常“控制”得不是很严。学生既可以勤奋学习,也可以虚度光阴;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学业,也可以用较长的时间修完课程;既可以只在一所大学学习,也可以周游西方。系主任也好,教授也好,都不会为他感到内疚。他已被认为能够照顾自己,能够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最后,当他自己认为时机成熟时,他就可以申请参加考试。没有校历告诉他什么时候考试及考什么。至于考试的次数,人们已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已经出现将德国人分为两类人——即主考者与被考者——的趋势。毫无疑问,学生参加考试的科目越多,他形成独立思想与自我拯救的机会——这一点恰恰正是大学工作的本质——就越受限制。但必须记住,无论是德国的学生还是英国的学生,都不可能以简单累积学分或学时的方式获得学位或通过考试,而只有当他认为已做好准备时,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只要主考者认为合适就行。

其次,我要谈谈正教授的选聘。此项工作始于教授会向一个教授会委员会提交有3位候选人的一份名单。在将名单呈交给政府部长之前,教授会可任意对名单作出调整。这一制度是大学避免国家插手大学之危险的堡垒。它的作用是双方面的:可使大学和政府部门都坚持高标准。热衷于维护自己权利的教授会必须意识到,要给政府部长以任命外校学者的理由,因为这样它提交的名单通常都会令人满意,部长也没有理由轻易忽视教授会提出的正确建议。政府部长可以自由任命3位候选人中的一位,而且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任命一位外校学者。部长偶尔也会反对教授会提出的建议,或退回候选人名单要求重新考虑。但他行使这种权力时虽然不可能

完全阻止校内集团的形成,却也会使之深感沮丧。由教授会提出的3位候选人几乎总是已在其他大学获得声望的学者。维拉莫维茨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半个世纪前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时代的情况时,批评柏林的重要人物常常劝说政府部长对不怎么有名的大学的教授发号施令。他写道:“微耳和有助手要求职,当我提出意见时,莫姆森公开说‘我们不需要他’。所以他成了格赖夫斯瓦尔德所喜爱的出色人才。”年轻有为的埃里希·施密特一度也被法尔克部长所宠爱的某君忽视。“在一个年轻人占多数的小型大学里,它有着特别的意义。一个人仅仅因为根本不可能得到聘任就得永远呆在那里,这种做法是很可悲的。”

在萨克森,自现任政府就职以来,教育部不止一次地否决了一所保守的大学提出的建议。在耶拿,最近教育部强行对大学作出了一项普遍认为不合适的任命。同时,杰出的学者受到忽视或发现自己处境不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普鲁士教育部现任司长写道:“在上一个世纪,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意味着,如果一个学者成为一所大学教授会的成员,他通常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叔本华、杜林(Dühring)、哈特曼(Hartman)、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弗莱塔格(Freytag)及其他人的命运却仍有可能再现:要么敲不开大学之门;要么梦想破灭,离大学而去。科学决不能无视它从这些人物身上可能获得的贡献。”^① 因此,个人的、政治的和种族的因素都会破坏德国大学制度的理想运行。

自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比较进步的那些邦国不得不对教

^① 维尔讷·里希特(Weiner Richter):《德国的科学组织》,第4页。

授会中普遍存在的保守态度施加更大的压力。目前,政府各部与受到广泛批评的法学教授会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一般说来,当一个强有力的教育部司长或教育部与一个强有力的教授会进行协商时,德国人的制度最能够体现其优点: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处理问题时就会深思熟虑;由于平等的双方都能够深思熟虑,问题的处理通常也就正确。如果政府部门一方很弱,大学的内部集团就可能占上风;如果教授会一方很弱,政府部门就可能占有不公正的优势。过去 50 年里,普鲁士教育部最有才干的人物阿尔特霍夫无疑是一个常常与大学相对抗的人物,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兰克(Ranke)、哈纳克和黑尔姆霍尔茨(Helmholtz)等人的晋升,研究机构的创建,医学方面的惊人进展,都要归功于阿尔特霍夫的知人善任和埋头实干。毫无疑问,一个如此精明强干和固执己见的人会引起麻烦和引发对抗。维拉莫维茨告诉我们,阿尔特霍夫喜欢自己发现问题,并最喜欢像“信使”(“messenger boys”)那样的大学学监,但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承认阿尔特霍夫非常尊重大学,并为把大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成果至今还在。去植物园阿尔特霍夫墓地凭吊的人应该知道,那里躺着一位正直忠诚的人。”^① 总而言之,人们从各种结果可以推知,大学的优势及其崇高的威望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说来,合理的考虑往往最终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占上风。

^① 他进一步指出,在哥廷根任职的 13 年半中,教育部只有一次任命了一位不是由大学推荐的教授,因为教授会无人精通那次任命所涉及的学科。那次选择被普遍认为是合适的。

我所考虑的第三点是大学教师的“游学”(Wandering)。虽然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大学与大学之间存在着家族般的相似性,但它们却没有近亲繁殖的特点。一个人可能到其他两三所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才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学位,并成为编外讲师,也可能应聘去蒂宾根或格拉茨(Graz)任副教授(Extraordinarius,相当于英国人所说的准教授或讲师,或美国人所说的副教授),接下去他可能应聘去波恩任教授,此后,如果他继续发表成果,他可能转到莱比锡,也许最后转到柏林或维也纳去任职。尽管也有些最有才华的学者可能会放弃都市的应聘机会,愿意留在规模虽小但生活“舒适”的大学里工作。大学的进步和资金状况取决于全国范围的激烈竞争,而要赢得进步和资金,主要的因素有两个:即作为教师的名声和作为研究者的成就,缺少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对晋级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

对自由和学术而言,一种更有效的保护来自“编外讲师”制度。教授最终也是从这些编外讲师中产生的。教育部在教授的选拔方面有否决权甚至有可能提名,但它在颁授“教学执照”方面却没有发言权,因为那完全是教授会的特权。“编外讲师”制度不仅仅是学术自由与安全的堡垒。战前,之所以有许多人愿意做当时这种严峻且无薪的见习期工作,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由此走上学术之路。大学声望之高,这种制度是最好的证明。德国的大学生若要获得博士学位,一是要通过学位论文,以表明他具备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某些能力;二是要通过一种考试,以表明他对相关学科的文獻有足够的了解,他希望走一条学术或科学研究之路。他是否因此就得到了大学的聘任,从而使自己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期把日子过得

舒舒服服并能够承担日常的教学工作呢？根本没有。他得到的是不发薪水的教师执照，成为他们所说的“编外讲师”；他只能开设一至两次讲座，并且要以某种方式与某个实验室、诊所或图书馆保持联系，以便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编外讲师形成了一个学术摇篮，德国大学根据教学能力和学术成就从中挑选所需的副教授；全德国和说德语的国家根据上述方式从副教授中挑选正教授。每一个选拔阶段都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候选人必须有能力阐释他的学科；必须有学术成果。这是一种十分严峻的制度。编外讲师往往经过多年磨炼而不一定熬得出头，尤其是正教授不关心他甚至对他反感时——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出现——更是如此。这就导致了有学问的——有时还是痛苦的——无产者的出现。但在每一个领域，如科学、人文学科、法律、医学和神学领域，这种制度打造了一批工作者，并为大学、中学、政府和企业提供了人才储备。就承担某些确定的和艰难的任务而言，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创建的制度相比，德国的大学——其本质特征我已在前面描述过——可能是考虑得最周密的机构。

最后，与教授一样，德国的学生也是游学者，尽管由于经济原因，学生游学的程度已不如从前。美国的哈佛人或英国的牛津人特有的那种忠诚，在德国鲜为人知，学生至多也就是对他度过第一个学期的大学有些情感依恋。德国不存在柏林人、格赖夫斯瓦尔德人或维也纳人之类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不讲究在哪里学习的态度是有代价的：德国失去了英语国家在舒适生活之外所具有的人际情感和母校情感；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失去了作为人所应有的某种东西。但不管个人或社会失去了些什么，从学术角度看，德国人从游学制度中得

到的益处远远超过其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有它的缺点：例如，对一位不想用功的学生来说，哪里最容易得到学位，他就会去哪里。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有才能的学生到学科研究最具实力的学校去学习，它可以促使教授做出最优异的成绩以吸引最有才能的学生——因为研讨班和实验室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教授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其学生的质量。

五

传统的学部有哲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法学部，各学部由学部长负责。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学部长处理的事务比较单一，其责任要比其美国同事轻一些。哲学部是大学的基础。神学部曾经辉煌过一段时期。医学部和法学部太接近于现实生活，以至于常常处在变为专科学校的危险之中，尽管迄今为止主要忙于培养未来医生的德国大学医学部比任何国家的医学院都更好地保持了其科学性。哲学部——即文理学部——仍然是洪堡所设想的堡垒。在19世纪时，任何国家都未能像德国那样聚集了一批批同样出色的科学家和学者，并为他们提供同样的设施，或对他们表示了同样的敬意。总的来看，哲学部保持了它的显著地位，虽然它也受到过我曾提及的种种力量的震撼。但在此有必要提出两点保留意见。规模最大的那所大学，认为单一的哲学部过于笨拙，难以管理，因此将文科与理科一分为二——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对该大学的

有机统一也是一种损失。此外,在语言、文学、哲学、数学和科学一直得到比较客观的研究的同时,社会科学则在君主制度下受到了一整套偏见的严重束缚,而且可能在社会民主制度下受到另一类偏见的束缚。历史研究一度曾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成果,但它后来却成了现实研究的障碍,而无论在言行荒诞的美国,还是在理性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以及某些英国的地方性大学,现实研究都已经得到发展。德国的大学却对社会民主制度的兴起格外无知。一旦这一时刻骤然到来,将使整个德国天翻地覆,甚至给大学带来麻烦。无私无畏的学者本应去研究工业生活的现象与法律的社会基础,而他们却埋头于对历史和抽象事物的研究。卡尔·马克思是一位头等重要的非凡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确切看法是,这位德国革命前辈最受尊重的经济学权威已经以一则短评什么的摒弃了目前在帝国最有影响的那种哲学思想。我坦率地承认,企图科学地处理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必定伴有特定的危险。目前美国在有关领域出现的混乱局面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些领域所包含的种种现象——不管对它们的研究伴有怎样的危险——已比中世纪时更可以理解了。对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中的种种问题,必须用一种超脱的、科学的与系统的观察以及反思法研究之,正如疾病的问题须用一种超脱的、科学的和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研究一样。门德尔松—巴尔特尔迪(Mendelssohn - Bartholdy)的“对外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客观公正,学术性强,是这方面的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子。人们既不必囿于对旧事物的研究,也不必像许多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所做的那样,将幽默感、价值感或客观性抛到九霄云外。

社会科学领域比较侧重现实问题的研究,这在德国革命之前已经初露端倪。已故的施特莱斯曼(Stresemann)博士的传记作者提请人们注意,施特莱斯曼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柏林瓶装啤酒贸易的发展》。人们可以想像一个美国人会怎样写这篇论文,但施特莱斯曼却发现了“独立的中产阶级”衰落的证据,其论文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写成的^①。他的经历是大学以合理方式在公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极佳例子。他先是获得良好的中等教育,然后在大学获得哲学方面非以“特定”用途为目的的普通教育。大学毕业时,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对世界大战与战后形势所带来的新问题,没有任何人曾学过或有可能学过如何去处理,但没有经过“特殊”训练决不是什么障碍。“机遇”,正如巴斯德曾说过的,“总是垂青于有思想准备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施特莱斯曼通过训练已做好方法论方面的准备。德国75%的大学生后来从事实用性职业这一事实并不重要。他们所受的教育使

^① “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两篇比较重要的科学论文。一篇研究货币问题的论文发表在科隆《大众报》杂志副刊上;另一篇题为《大商店的起源、发展及其经济重要性》的论文发表在《国家科学总论杂志》上。上述论文是对有关‘瓶装啤酒贸易’论文的补充。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阶级是怎样在总的经济发展中被摧毁的;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描绘了大百货店兴起的图景,并进而探讨大规模零售业的经济与社会重要性。两篇论文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论述商店的那篇论文可能是受个体贸易需要国家保护——这种保护体现在对百货商店实施特别税收这一点上——引发而写。”“施特莱斯曼不赞成以帮助弱者的理由对善于经营者和善于进取者实施惩罚性税收。他指出独立商人云集的产业界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出现新的繁荣。他表达了这样一种他一贯坚持的信念,即在经济与政治事务中,人们决不能阻止一种发展的出现,而只能引导它进入正确的轨道。”莱茵巴本男爵罗克斯(Rochus):《施特莱斯曼其人与政治家》,第30、32页。

他们能够运用经过教学与研究训练出来的思维能力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甚至德国也多少有些缺乏批判能力的人呼吁大学进行专门性训练,所幸的是,正如我已指出的,这些人得到的支持极为有限。冒着令人厌烦的重复叙述的风险,我再次提请读者注意教育相对于特殊训练的优越性,而美国教育现在受到的阻碍恰好来自这种特殊训练。

对上述四大学部,没有人认为它们具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如果宗教感情变得不那么强烈,神学就可以放弃。原则上也没有人反对增加其他学部。如果有人能够说服德国各大学和教育部,使之相信家政学部、教育学部、商学部、新闻学部和药学部与哲学部、法学部和医学部具有同等地位,应该纳入大学的框架,那么这些学部随时都可以建立起来。目前,人们一致认为尚未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学部是工程学部。它是否应该纳入大学成为第五大学部?这样做情况是否会更好?尽管工程学缺少医学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但它却与医学一样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在一起。然而,德国走了另一条路:新建或将多科技术学院改建为具有大学地位——即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工业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n”)。它们现在与大学是平等的,教师相互之间可以自由交流。起初学生的人数问题并不严重。但今天它们在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学基础上再增添 22 000 名学生时,这一问题就无法轻描淡写了。至于所涉及的种种原则,我从为我准备的一份简明备忘录中引述以下一段材料:“50 年前”——如果我可以稍加意译的话——“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以将‘工业大学’作为一个附加学部纳入大学之中,也可以建立与大学同一水平的独立机构。德国选择了后者。”

原有的技术学院发展成‘工业大学’，它们在法律上和质量上与大学处于相同的地位。

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众说纷纭。一方面，人们可以认为，如果工学部纳入大学，学术精神或技术培训的实践环节都会受到损害。在相同的法律和质量基础上分而设之，将迫使技术学院努力提高学术水平，推动一种健康有效的竞争。

但另一方面的观点也分量颇重。现在选择的解决办法必须增设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的教授职位，增加了避免在行业水平上进行教学的难度。当下述看法——即工程师的第一需要是获得扎实全面的科学训练——占上风时，对上述困难的感受变得更为深切。结果，在‘工业大学’中又增设了哲学甚至语文学讲座。在这方面，萨克森走得更远，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设立了专门从人文观点研讨科学的机构(Kulturwissenschaftliche Abteilung)。这样，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果把技术学院纳入大学的框架，它们的‘人文化’是否会更容易实现？”

六

正如斯普拉格尔(E. Spranger)指出的^①，尽管学部没有增加，讲座仍在增设——如宪法史讲座、国际法讲座、经济地理学讲座和教育学讲座，直到战后出现的贫困阻止其继续增设为止。自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无法提供所

^① 斯普拉格尔：《大学教育百年之演变》，莱比锡，1913年版，第16页。

需经费,部分正统的学科讲座被改设为新学科讲座。一些宝贵的马克浪费于在大学中根本就没有合适位置的学科上。例如,德国未设遗传学讲座,但一位解剖学或生物学教授可以将系科的日常工作交给助手去做,自己去发展遗传学,虽然他仍然被称作解剖学或生物学教授;或者他也可以减少与自己讲座有关的讲课内容,以便挤出时间讲授被所在学部忽视的课题。令人感到不妙的是汉堡增设了体育^① 副教授职位,同样令人怀疑的还有在夏洛滕堡出现的企业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 für Betriebssoziologie)。更站不住脚的是柏林大学新设的新闻学副教授职位,其来由十分耐人寻味。其实海德堡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设有系列论述报业史——设该讲题有足够的理由——的课程,只是不太引人注目。而在美国,新闻学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和一些州立大学提高到了一种“专业”(“Profession”)的地位,尽管它正日益变成一种商业性的活动。据称,阻碍新闻学在德国被承认一种专业的,完全是顽固和保守的大学。各教育部虽然没有自欺欺人,但它们被风暴吹弯了腰,只能牢牢抓住“中心”主干,尽量不屈从于令人痛苦懊恼的商业利益和时髦喧闹。于是,柏林大学新设了新闻学(Lehrstuhl of Zeitungswissenschaft),不久又为之成立了一个研究所——或者说一个实验室或图书馆,里面摆放了800种剪报,但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又有谁知道?讲课计划遵守常规模式,实践性课程也是一样。同时,一种哲学应运而

^① 1929年5月15日《汉堡大学报》登载了恩斯特·默勒(Ernst Möller)一封措辞强烈的抗议信,反对大学认可体育作为大学教授的一门合法学科。我认为,应该依靠所谓的“专业”引入大学时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将它们排斥在大学之外。

生。它始于“实践”（“Praxis”），对它的分析称作“研究”（“Forschung”），接着是安排精细的“讲课”（“Vorlesungen”）和旨在训练记者、音乐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等的“课程”（“Kurse”）。整个课程安排表现了“新闻”（“Journalismus”）的“本质”（“Wesen”）。“新闻”因此也和“科学”（“Wissenschaft”）一样“引起轰动”，但它对德国的新闻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如它对美国的新闻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一样。作为一种影响巨大并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新闻值得一所现代大学加以研究，但大学一旦设立新闻专业，其影响与活力就完了。维拉莫维茨说得很对：“一个持续挖掘宝藏者很快会转向去挖蚯蚓，如果找到蚯蚓令他感到愉快的话。但挖掘宝藏者如果只找到蚯蚓，则不必泄气，只要扔掉蚯蚓就是了。”

同样与大学目标无关的是一些邦国强加给大学的部分时间性质的行业教师培训任务，它要求行业教师至少进大学学习三个学期，听助教或编外讲师授课，并参加不是由大学或教师而是由职业学校主管部门（Gewerbeschulbehörde）主持的考试。当然他们的知识水平不高，如果公正地看待他们的影响——正如人们所应该做的那样——结果就是他们会降低大学的水准。也许这种做法对各行业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大学来说却是件很糟糕的事。这一培训任务主要落在年轻教师身上。这些教师虽然因此增加了一些收入，但他们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学生人数和工作任务的不断增加，大学一直面临着分裂成一系列职业专科学校（Fachschulen）的危险。的确，人们在研究所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大学变成一个教学机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把研究留给为此而成立的研究所去做。我本人并不信这种说

法,但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学任务不断增加,行政职责也不断增加,的确十分可怕。德国的局面不像美国那么危险,但大学通过降低学术水准去为社会或企业提供服务的任何做法都是可悲的。人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引人分心的事情在不断增加。大学不能通过远离社会来保护自己。惟一能够保护大学的,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大学的标准与理想,并朝着精简的方向不断努力。

有人遗憾地指出大学还存在某些其他方面的缺陷,虽然这些缺陷可能并不重要。如尽管只有新闻获得了讲座的地位,但通过聘请“练习课教师”(“Lektoren”)和“体育课教师”(“Turn- und Sportlehrer”),速记和体育也悄悄进入了课程表(Verzeichniss)。当然,它们不计入学位成绩,也尚未赢得并且决不会赢得这类课程在美国所有的那种学术认可。速记是一项有用的技能,而且让德国大学生去击剑、游泳和拳击,也总比让他们去喝啤酒要好一些。但给有关通告和工作安排贴上学术性标签则既没必要也不合适。大学本身不必提供速记课程的教学,因为这种训练很容易在大学以外的学校得到。体育馆也不必装饰得像一个研究所或实验室。正如美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小人物或辅助人物的自鸣得意是件危险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德国的危险程度虽低一些,但它也会毁损德国大学的尊严。大学完全能够在思想和行动的中心发挥作用而不必贱卖自身。

对照一下基尔大学、柏林大学或其他大学新闻学教授与文学和戏剧学教授的态度是十分有趣的。这些教授的外表都很相似,德国大学新闻学者与美国大学新闻学者一样,在努力培养新闻工作者。但戏剧学教授并不打算培养演员或剧作

家。他将戏剧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加以研究,正如他研究抒情诗一样。在他的“研究所”里,他收集了许多舞台造型和维克多唱片——但完全是为了可以展示具体的事物,一如艺术教授展示一个雕刻,或建筑学教授展示一个模型。他在自己的工作与“实践”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他不关心如何训练人们写剧本。剧作家要么具有天生的剧本写作才能,要么是在现实世界的喧闹中学会这项本领。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研究戏剧甚至创作戏剧的方式,正如人们研究其他艺术形态一样。显然这只是一项旨在扩大文学范围以便将严肃的戏剧艺术包括在内的工作——这种工作完全不同于训练作家、话剧评论家、“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剧本作家以及新闻记者的工作。它的最终目标是使文学的概念变得更加充实、更为丰富。

七

然而,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大学入学机会增长过快,入学学生的基础又差别很大,不够统一或不够扎实,大学的入学标准已明显下降。战前,大学教授面对的是三种水平相当的中学的毕业生;今天,大学教授面对的则是来自预科学校和各类“特种中学”(“Aufbauschulen”)^①的学生。因此,与以前

^① 特种中学专招中学六七年级的学生。经过培养,学生可提前进入大学。——译者注

相比,不但学生的类型明显变得比较多样化,学生的规模也更为庞大。在1907—1929年期间,大学在数量上只增加了三所——法兰克福大学、科隆大学和汉堡大学属于增加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于1919年停办。但在同一时期,学生数从45656人增加到90743人^①。低级教职的数量当然也有所增加,但教授职位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加或增加不足。在1911—1929年期间,虽然哲学部的学生人数增加不多,但医学部的学生人数则有明显增加。此外,学生的经济条件比战前更差了。大量的学生进大学时囊中羞涩,因此不得不依靠打零工补充生活开支,或选择有利于谋生的学习领域。毫无疑问,“为生计而求学的学生”(Brotstudenten)的增加,使大学出现了某些类型的热心学习的优秀学生,但同时也给大学带来一些讲求实用的学生,后者的出现有可能使大学成为一个职业学校的集合体。规模本身已表现出这一趋势。尽管不存在那些使美国大学学生人数膨胀的荒唐因素,柏林大学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学生数已达14126人,慕尼黑大学达8500人,莱比锡大学达6387人。随着教授会数量的增加,其成员在大城市中也住得越来越分散,相互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位大科学家曾对我说,一名谁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也许可以混进柏林大学参加教授会会议,并站起来发表一通演说而不会被人拒绝,因为现在教授人数是如此之多——虽然与学生人数相比还不够多——以至教授之间都互不熟悉。他认为,如果一所大学各学部、各学科的学生总数超过5000人,该大学就

^① 《德国高等教育统计》(柏林,1929—1930年),第8页。“在同一时期,工业大学的学生数从11206人增加到22650人——实际上比例相同。”第9页

将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对巨型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已经大大减少了。

即使大学降低了入学标准，也没有对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人数产生很大影响。据估计，目前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人数不超过总数的3%，以前则还要少。使大学之门向学术性水平低于传统中学的学校敞开，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以前的错误和不公正。教育政策的突然变更只能导致各大学和各专业人满为患，大学教学水平降低，并迫使各学部采取创设高级研讨班(super-seminars)之类的措施，以排除水平较低的学生。因此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在19世纪，德国大学以社会差别为代价来维护质量，这种差别现已消失，但维护质量的重要性并未消失，共和国是否有勇气和才智去维护它？德国正在为走向民主而奋斗，但民主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可能性，不只是这样一种事实，即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其能力而不是根据其他任何因素成为知识界的精英。就大学教育应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这一立场而言，德国革命促使德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否能够设计出某种将平庸无能之辈排除在大学门外的有效方法？的确，如果哪天德国的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中找不到知识界精英的身影，那么这天不仅对德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将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德国各邦国教育部都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安，同时又坚信他们最终将排除这一危险。

八

自德国革命以来,在成人教育和大学推广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不仅符合正确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也前景良好。我曾详细讨论了普及教学对美国大学造成的损害,因为“服务”性活动几乎摧毁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重要理念。英国实行的是一种虽然正确但有些保守的政策。无论如何,事实会有力地证明德国人做得最好。在民主运动几近狂热的时候,大学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斯普拉格尔曾对这种正确的态度表示赞赏,在此我冒昧将他的看法意译如下:“我不必强调一位现代大学教授不应对现代生活的社会环境麻木不仁。但如果这一思想被理解得很宽泛,如果假日和空闲时间都被用于讲授普及课程,那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就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照此状况大学必须作为一个选拔性的、贵族式的机构存在下去。大学教师必须努力向上,应该把向大众传播知识的工作留给他人去做。自然科学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还面临来自商界的同类诱惑。这样一种危险是存在的,即科学任务逐渐被视为仅仅是许多商业‘定单’,其价值将由商业因素决定。走这条道的人很快就会牺牲他的科学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的或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狂热追求‘教学’为特征的时代。每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都想赢得大学的承认。让我们想一想大学是否最适宜于实现普及教学的目的,公众是否并不希望从那些支离破碎的讲座和课

程中获得以这种方法根本得不到的结果,因为所有的基本前提都不存在。”

战前,随着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s)的人数与影响的增长,成人教育的需求也有所增长,但由于各工人协会提供的教学十分片面和肤浅,再加上脱离工人的大学教授讲课让工人听不懂,成人教育的需求只得到了极为有限的满足。目前根据魏玛宪法由帝国政府领导的成人教育运动,不仅关心科学的普及,而且关心寻找旨在实现文化目的的方法。因此,工人自己要提供经验并提出问题。这样大学推广和成人教育的活动才名副其实。在美国四外泛滥的“特殊性”荒唐活动,不仅在德国的大学中根本不存在,而且也同样远离德国的非大学运动。一些大城市办起了夜大学,有时它们也邀请教授参与教学,但决不接受他们的领导;为方便低水平的人一起学习,还出现了一些家庭学校。这类教学从不颁发文凭,完全是出于其自身的理由和需要,并且正如科尔格·哈里奇(Coleg Harlech)那儿的情况那样,这类教学确实不是获取人生成功的手段。^①

^① 讨论这一主题各种问题的大量文献已经出版。对美国大学走错路的原因感兴趣的读者,可从保罗·斯泰因梅茨(Paul Steinmetz)所著的《德国国民业余大学运动》(卡尔斯鲁厄,1929年出版)和弗兰茨·安格曼(Franz Angermann)所著的《论国民自由教育》(耶拿,1928年出版)中得到特别有用的帮助。官方文献可从柏林共和国广场6号帝国内政部国民自由教育档案室得到。

九

德国大学通常被称为“高等学校”(Hochschulen)。这两个术语并非同义词。大学一词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国家基本法中已经得到体现,但“高等学校”一词却带有美国式而不是德国式的随意性。它既可以指大学,也可以指舞蹈学校(Tanz Hochschule)、体育学校(Hochschule für Leibesübungen)或政治学与国际事务培训学院(Hochschule für Politik)^①。1879年柏林建立了一所业余大学(Volks Hochschule),而该名称本身是有矛盾的。今年初建立了文科中学夜校,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柏林创建一所夜大学的要求,以招收100名有才能、有决心的人入学。这一建议自然是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英国——的样例为基础的,并且它坦率地假定德国大学基本上已不再以研究为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建议中的夜大学是一所“职业”学校。这可是摧毁真正的大学并使之支离破碎的最好办法。如果为实用目的开设的夜校合理可行,就没有人会去反对。如果没有规模或地点的限制,夜校就会变成夜大学。对规模或地点的限制也不可能长期牢固不变。如果作一些了解,美国的经验将警告其他国家不要贬

^① 莱克西斯(Lexis)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育》(柏林,1904年版)第4卷第二部分对“特殊专业领域的高等教育”作了总的叙述。该书尽管可能被认为有些过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失为一本可靠的一般性入门书。

低大学的理念,否则,一旦这种贬低行动得以开始,大学理念本身就会很快地消失。服务工作应该有人做,但应以与大学截然不同的机构名义去做。如果大学已经受到伤害,应该让它回到原路而不是沿着错误的方向继续往前走^①。

德意志帝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自然推动了在柏林、科隆和汉堡建立商业学校与殖民地研究所。这种研究所满足了一种需求——一种极为迫切的实际需求,尤其当大学只从历史的和抽象的观点教授经济学时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它们还可以承担根本不属于大学的任务,这一点美国的经验再次于无意中提供了证明。开始时,这一观点对德国人来说是不清楚的。因此,目前的科隆大学从商学院(Handelshochschule)发展而来,目前的汉堡大学从殖民地研究所发展而来。由于这两所大学接近于正规的大学类型,科隆的商学院和汉堡的殖民地研究所逐渐被抛弃。人们还可以观察到原来两个院所的痕迹,因为这两所大学刚刚走过它们的第一个十年。但我确信,五年之后,商学院的痕迹将在科隆大学彻底消失^②。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类事物起点不同,目标也不同。大学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部不服务于实用性目的,而服务于科学的目的。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即它们可能只关心抽象概念和各种理论。依我所见,正确的态度是以科学的精神研究种种工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医学的现象——决不是远离它们,而是努力地分析它们,对它们进行分类,正确地观

① 《柏林夜大学——安·西伯曼博士教授的一项建议和奥斯卡·伊·哈克贸易法院委员会》,柏林,1920年。

② 在慕尼黑,商学院属于工业大学的组成部分。

察它们。培训商人不是大学的事；以前培养斯特莱塞曼(Stresemann)去领导一家巧克力联合会也不是大学的事。受完大学教育再去领导巧克力制造商,他可以做得更好,同时他还可以在德国困难时与来自国外的职业秘书一道守住阵地^①。

商学院的发展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学的法学部和经济学部要避免与各种现象的接触过于密切;第二,在现代商业发展和学徒制解体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为大学预科毕业生或非大学预科毕业生提供特定的商业训练。根据这种情况,完全有理由让一所独立的高等商学院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商学院所愿承担的是大学不能承担的实际任务——即为工商界培训各种人才,并且在我看来幸运的是,它是向贸易部而不是教育部负责。“商人”(Kaufleute)学完6个学期的学业可以获得商学院所颁发的商业文凭;学完8个学期,可以获得商科博士学位——这种学位是对博士学位的滥用。未受过完整的预科训练的特殊学生,也可以入学学习。来自实践领域的人员就若干行业的内容进行教学。我看没人反对这种做法。它完全不属于大学的工作,并且不会也不应导致大学负担过重。

在某种程度上,商学院的工作与大学经济学部和法学部的工作有重叠之处,但这种情况总是有的。内科诊所中的化学家角色与其他诊所及大学化学系中的化学家角色也是重叠的。的确,只有这样,知识之网才能够编织得十分紧密。但在

^① 罗克斯:“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经济学博士,斯特莱塞曼在1901年接任他在企业界的第一个职位——德国巧克力制造商联合会总裁——后必须熟悉新的实际环境。”

另一方面,处境不同,立场也不同。商学院教师感兴趣的是商业实践活动,如销售、购货、账目清算和贸易等。他们埋头做事,完成任务,培养能够做事的人。这种立场既使商学院与大学学部区分开来,又不阻碍双方的发展。哈佛商学院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机构。它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大学里。柏林商学院在我看来也有它的地位^①。它十分恰当地承担起为工商界培养人才的任务,而担任这一任务的教师善于具体思维,重视实践研究,关心眼前的需求与问题。它留给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精神去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以及为政治界、金融界和工商界培养受过广博精深的大学教育的人才。大银行、大企业和企业联合会的巨头及政府部长往往拥有大学“博士”头衔,这一事实并非毫无意义。他们中许多人本来是可以成为大学教授的,其中马上想得到的就有沙赫特(Schacht)博士、斯特莱塞曼博士、马克斯(Marx)博士、路德(Luther)博士、维尔特(Wirth)博士和卡斯特尔(Kastl)博士等。

十

英美两国对大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都已有所认识。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对这种关系的处理都并不令人满意。

^① 它的整个精神与大学医学部不同,因为尽管95%的医科毕业生成为开业医生,医学部的基础仍是研究各种疾病问题。

从研究和训练的角度看,对这种关系的处理在德国比在英美两国要好得多。尽管德国的大学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未能完全彻底地保留其独立地位,但仍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我们已经看到,在私立院校和公立院校并存的美国,政治因素、院校特性和低标准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在由两所古老大学主宰局面、各大城市寻求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大学的英国,有时以保守的面目出现、有时又以功利面目出现的邪恶也会悄悄入侵大学。从1914年的情况看,实行国家垄断、大学拥有同等条件下的合法伙伴地位的德国做得比英国或美国更好:大学的发展程度更高,自主性更强,更受尊重,影响也更广泛。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大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目前的局面本身也不能免除危险。正如我所说的,在旧体制中,德国的大学是帝国皇冠上的一颗宝石。大学从未完全屈从于宫廷,但它以微妙的方式接受宫廷的影响,思想逐渐地变得越来越保守,这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排斥工人阶级也带来一些后果。因为,既然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a Social Democrat)可以成为一名教授,那么就很少有人或几乎没有人受过全面的训练——由于孩子们被排斥在文科中学大门之外,他们就不能进入大学获得如今是本应有的教育机会——当然,这是对旧体制的一种严厉的批评。结果,在比较进步的邦国,大学被广泛认为缺乏同情心。为努力克服右倾倾向,大学有时被强行向左派倾斜。也许在这方面偶尔犯下的错误并不至于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只要它最终使各党派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学既与左派或右派无关,也与政治党派或政策无关,大学的客观性和无私利性必须得到各方的

承认。最近试图努力“超越党派利益”的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尔博士辞职一事实实在可叹,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教育部是党派的战利品。后来成为新秩序的政治牺牲品的贝克尔博士,一方面猛烈抨击旧体制的缺陷,一方面继续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大学不会忘记它的基本职能——在“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气氛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在结束严厉的批评时他仍坚持认为,“在本质上,德国大学是健康的。”^①

对大学的整体安全性和独立性的解释,部分存在于理念领域,部分存在于组织方式。大学作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理智科学)发源地的思想一经形成就得到极大的重视,因此它对德国人想像力的影响从未真正减弱过。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应用科学已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工商界人士也许已经成为初露端倪的最显赫人物。然而,“科学”(“Wissenschaft”)仍然是基础——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是技术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家经营企业的基础。随着知识总量和生活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越来越需要产生足够的思想。在表面上对大学构成威胁的那些变化,事实上增加了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重要性,在这种真正符合洪堡思想的重要机构中,师生们必须享有学习和教学的自由。

同样,大学的组织大多数是有利于维护自由的。的确,大学的经费几乎完全依赖国家拨款。除非国家提供经费,否则学科不可能得到发展;没有教育部的批准,不能设立新的讲座;国家不仅控制而且参与各种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掌管着预算——尽管在缺乏理想与传统时,这种制度可能成为

^① 贝克尔:《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想法》,莱比锡,1920年,第17页。

危险之源,但事实上它对大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因此,很显然,教育部的权力足以支配大学。安全屏障是法律、理念和传统,因为德国大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就是由这三方面来保护的。德国的教授和行政官员仍在努力从学术上讨论大学的概念,这就是说,民族也好,大学也好,都必须时刻牢记奠定大学基础的历史理念和法理理念,牢记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国家对大学发展的需要。德国人对国家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敬意,对大学也是如此。共和宪法虽作了重大修改,但并未触及大学,尽管大学存在着公认的保守倾向。这是大学得到人们尊重的一个绝佳证明^①。

十一

我已谈到过大学水准的问题,谈到过由于涌入大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加上学生类型日益混杂多样及其他原因,德国大学的水准已经下降。但也不能由此作出错误的推断,认为大学曾经达到过统一的水准。总的来看,与任何机械的方法和任何组织相比,大学的精神是高水准的更有效的保证。虽然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持有几乎完全一致的大学信念,但它也从未能够维持一种统一的办学水准。在一定范围内——依我所见这一范围比美国通常所说的范围要窄得多——一所大

^① 美国大学出现的政治动荡,在德国是难以想像的。当人们看到德国人批评德国大学时,必须时刻牢记这一根本差别。

学的学部不同,要求的严格程度也不同;同样在一个学部里,教授与教授之间个人的水平也不完全一样。如果一所大学,一个学部,或一群教授持无动于衷的态度,那么教师也好,政府也好,都难以插手维持标准之事。自尊和传统可以防止可悲的滑坡。然而当一个学生被发现不满足于在一所大学学习时,往往会被推荐到其他大学去学习——“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学位。”提交的论文和被接受的论文必须避免空洞无物。它们也许价值不大甚至毫无价值,但它们决不会涉及“我们的姑娘和她们告诉我们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德国,也值得想一想是否应推行自愿撰写论文的制度——一篇杰出的、自愿撰写的论文可以使作者获得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优等学业成绩”(“cum laude”)的优秀称号。战时,并不要求发表成果,最低限度可接受的论文也许的确质量低劣。在医学部,论文现在仅仅是形式上的要求:要不是它会给学部带来收入,它也许会被放弃^①。在一位医科学生竭尽全力完成必修学业时,怎能要求他在学业负担亦已过重的情况下“发表成果”?历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情况更为明确。在上述学科,一名教授往往指定一位研究生承担自己的课题的某部分工作,如此撰写出来的论文的价值引发了学生到底是一名技工还是一名得到充分指导的研究者的问题。在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水准一向很高,每年通过的博士学位候选人人数很少。不能说所有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

大学的水准还可能受到其他方面的损害。大学培养学者和科学家,他们中自然有多数人希望进入专业领域或商业领

^① 收入不归教授,而归入为一般性目的而设立的基金。

域生活。博士学位在理论上是学者的标志；国家考试资格则是从事一项职业的能力的标志。但如今旨在测试个人从事某项职业之能力的国家考试(the Staatsexamen)与旨在测试个人学术水平的博士学位考试(the Doctor Examen)之间的界限,已经多少有些模糊。在医学部,通过前者考试的学生理所当然地也要通过后者考试。这明显背离了合理的理论。因为如果两者是等同的,一种考试就足够了。不能否认的是,在实践中,德国大学教授常常搞不清自己对学科应负的责任与考试要求之间的区别。在19世纪初,学科处于支配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国家对训练有素的公务人员之需要的出现,国家考试的相对重要性日益明显。即使在战前,真正以科学和学术为首重的博士学位就已显得逊色。自大战以来,则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强了国家考试的重要性。斯普拉格尔在1912年断言,国家之所以容忍和鼓励研究活动,是因为没有研究活动就没有实际的进步。十年之后,贝克尔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与之相反的论点^①。

十二

战争所带来的变革既有不可估量之处,也有可估量之处。

^① “科学研究的纯学术精神仍然活跃着”。还有,“德国教授感到自己首先是研究者”。如果教学达到足够高的水平,维拉莫维茨的立场与贝克尔的立场之间并不真正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就前者而言,首先必须考虑到对由技术进步和物质丰富直接导致的实证主义精神的抵制。全体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一种新理想主义的影响。同时,经济需求迫使学生和教师去弥补他们的损失,并尽力为未来的生计而奋斗。在大战爆发之前,已经加入学生组织的德国大学生生活还是相当快乐的,但对离群索居的大学生而言,社会生活则相当冷酷。教授与那些最终有希望形成其“学派”的得意门生之间的关系确实一向令人称羨,但绝大多数学生被遗忘在这一迷人的圈子之外。自大战以来,大学对这部分学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一事实在理想主义色彩鲜明的所谓的“青年运动”(“youth movement”)中有所体现。青年运动实际上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德国为大学生建立了2500个避休所,供那些认为生活的意义超越了决斗与击剑的大学生假期周游全国时使用;大学生与普通人双方更加接近,在这方面,女大学生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大学生的国际交流引起了有益的、起促进作用的比较;大学生宿舍鼓励形成一种更富人情味和更为友善的人际关系;最后,以德累斯顿为中心的自助运动帮助了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学生在大学中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贫困状况过于严重并且长期存在下去,就可能会降低学生的士气,摧毁学生的理想主义,促使学生追求物质利益,导致学生过于看重金钱,从而使学生在学术上受到损害。此外,各种新的学生组织已纷纷涌现,其中包括能够向教授会陈述观点的“全体大学生联合会”(Studentenschaften)和各种协会。当这些组织只具有地方性质时,它们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不幸的是,地方性大学生组织进行了合并,从而政治立即以一种极为保守和令人

厌恶的方式介入其中^①。于是当局对这些组织产生了敌意。现在只有巴伐利亚和符滕堡在法律上正式承认“全体大学生联合会”。然而,尽管遭此不幸,学生组织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仍比以前更显活力。只要经济形势许可,英美两国比较健康的大学生生活——尽管这种生活也少不了有些荒唐之事——就有望在德国得到发展。

十三

我深知,人们很容易过高估计工具和组织的重要性,并且在所有的人当中,美国人最容易犯这种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确定工具和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界限。显然,它们对一个天才来说作用最小。天才是独立于其环境的。对一个学者而言,一个过时的图书馆的一个昏暗角落就能够满足其需要;对一个自然科学家而言,只要有张粗糙的工作台,加上些电线、电池、试管、化合物和简单的工具,就可以产生精确的研究结果。但组织完善、设施充足的高等学校可以使他培养后继者。没有一个天才是在原有的领域完成任务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谁能够彻底弄清楚这些新的领域及其意义?对那些处于二线的工作者来说,高等学校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从天

^① 一般认为德国的大学生和教授是十分保守的,但真实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保守的大学生建立了组织,从而变得引人注目。自1924年以来,比较自由的教授们已经付出努力,修正教授会的保守偏见。艰难的经济形势已经迫使大学生和教授都走向极端。

才那里得到各种刺激,但它依赖一般人才而存在,只有天才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要创造有利的环境与设施——它们是图书馆或实验室也好,是交往、竞争或压力也好。组织得好的高等学校——只要不是组织得过分——能够十分方便地提供这种环境。拥有良好组织的高等学校可以保护科学和学术免遭破坏与衰落。教师拥有学生,孤立的研究者如孟德尔则可能缺少学生。德国的天才——康德、格林(Grimm)兄弟、黑尔姆霍尔次(Helmholtz)、埃尔里希(Ehrich)——不会由于没有大学而一事无成,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的工作由于与大学联系在一起——即使有些情况比较复杂——而受益匪浅。但如果我们降低一个层次去看,从天才层次降到一般人才层次,那么,我认为,为了从事某一项或某一类特殊工作而创办的高等学校一方将占上风。诚然,学校中的教学对象、各种考试、学术会议和政治问题都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设施,它为相近领域的工作者提供了激励性的交往,它的优秀学生具有极高的学习热情,教授的助手志向颇高,善于合作,很快可以走上负责岗位。因此,总的来说,高等学校处于优势。建立其他机构以履行大学不能有效履行的职责,这在大学不会遇到任何阻力。情况恰恰相反,大学的健康发展将把一个民族推到大学竭尽全力所能推到的高度。正因如此,德国的研究所和学会是最为发达的。

学会是一种古老的组织。研究所是在帝国时期建立的,现在主要依靠私人捐助和一个名为“凯泽·威廉协会”(Kaiser Wilhelm Gesellschaft)的民间协会维持。该协会在柏林附近的达勒姆(Dahlem)及其他地方建有若干个实验室。大学的

组织也按照民主的方向作了修改。以前教授会的成员都是正教授,被排斥在外而没有参与权的副教授和讲师对此早就心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现已消除,低级教师现在也选代表参加教授会^①。大学中设立了其他级别——包括付薪的和不付薪的,实际的和荣誉的各种级别。正教授的独裁地位被显著削弱。代表所有级别的教学人员的种种合作性委员会的成立,有助于消除由级别不同而引起的反感^②。在收入平等方面也已取得进步。战前,正教授的薪水很高,课要收费,即使学生不听课也要交费,因为必须经过他的“证明”学生才能参加考试。正教授往往坚持讲课,课上得很有水平,然而若将大班分成若干小组,让学生在实验室或诊所里动手操作,效果本应更好,但教授们拒绝这样做,主要原因是讲课更容易,收入更多。因此,某些热门学科的教授收入极为丰厚——有时是过于丰厚了。而同时,副教授的收入相对要低得多,听课付费的人数也少得多;编外讲师则完全没有保障。这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有人甚至建议取消“收费”制,以完善薪水制度。目前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问题的处理尚不能令人满意。毫无疑问,由于收费制度给成就显著的教授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它在相当程度上使大学避免了人才外流。正教授目前的平均

① 在普鲁士——柏林除外——所有副教授都已成为教授会的正式成员。在柏林,考虑到教授会的规模已经过于庞大,副教授只选代表参加。

② 各邦国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副教授和编外讲师终于感到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大学的治理、课程的分配、考试的安排和论文的评判。副教授自然比编外讲师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后者在教授会中的代表人数仍然很少,其收入主要依靠讲课费和各种津贴。在这方面各地也有差别,例如普鲁士的做法就比萨克森更为先进。

薪水为 11000 马克,副教授为 8600 马克;随着服务年限的延长,正教授的薪水可以增加到平均 13600 马克,副教授增加到 11600 马克。大学教师每年收取的学费从零马克到将近 80000 马克不等。在目前普鲁士的 2800 名正教授中,有 120 位每年的学费收入达 10000 马克以上,此外还享有各种租房津贴和子女津贴等。因此,德国大学教授比其美国同行的收入要高得多——这清楚地反映出他所享有的声望更高,尽管他所在的国家已经比较穷困。但收费制度也有其阴暗面,因为它对那些因学科性质关系而学生很少的学者——例如梵语学者等——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幸运的是,政府部门,尤其是比较大的邦国的政府部门,拥有一些可自由处理的流动资金,用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差别。一名化学教授的收入仍比一名希伯来语教授的收入高,但如果后者的确成就显著,他就不会被忽视。总的来看,现在教授生活得都很好,虽然由于收费(“Kolleg - Gelder”)水平不同,他们的收入差距仍然太大。在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学费贬值,政府保证了教授的薪水与其他高级官员一样高。教授拥有这份薪水,加上学费的收入,生活还是相当富裕的。尽管存在着我所提及的种种奇特情况,德国赋予大学的地位仍是如此之高。的确,在有些情况下,助教的收入也非常高,以至要辞退低水平者并不容易。

有一个问题我想提请读者特别关注。我注意到,在英国,除了不支薪水的临床医学部外,一名教授与企业保持有报酬的关系,被认为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在德国,情况与美国一样,在与医学或企业关系密切的领域工作的教授从大学获取的报酬往往只占其收入的较少部分——这种情况在美国医学院实行全日制的系科中已经得到纠正,但在德国仍未受到批

评。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教授容易把大学的职位看做是次等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已经发生,随着经济压力的加大,现在这种情况比以前更为常见。

在货币膨胀的黑暗时期,需要额外的努力才能保证大学在经济上应付自如。因此,一种“临时应急组织”(“Notgemeinschaft”)便应时而生,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金被用来弥补人才的不稳定收入,维持各研究所的运转,购买和分发绝对不可缺乏的文献。“临时应急组织”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拯救德国学术的临时措施,而现在却已成为一个帝国研究部。它的组成显然是相当民主的,因为控制它的选举机构由所有大学教授会的成员组成,但实际的管理工作不可避免要落到少数人肩上。当大学自身处于困境之中,当校舍和设施逐渐陈旧之时,极为特殊的、甚至是空想出来的研究问题是否应该首先占用帝国政府能够为大学提供的资源——今年为7百万马克^①,值得怀疑。诚然,在分配帝国政府的国立大学资助经费方面存在着困难——或许是不可逾越的困难。“临时应急组织”为消除那些比较小和比较穷的邦国的困难,为这些地方的大学提供了它们所短缺的图书和设备,从而作出了一些贡献。但在另一方面,德国大学所遇到的不幸,莫过于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研究职责的萎缩。我已数次提到过的阿尔特霍夫曾经同时强调在大学中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在特殊条件下单独设立研究所的必要性,以及使大学与研究所保持密切联系的明智性。可以设想,在类似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如果由一个研究委员会选择和组织研究项目并为研

^① 1929年9月4日的《柏林人报》列出了多少有些牵强的项目名单。

究成果的出版提供资助,那么这种自然便利的交往与互动关系将会受到损害。选择、合作和组织都是必要的,但考虑到追求研究的热情,则在偶然和非正式情况下形成的选择、合作与组织的效果最佳。同时,公正地说,甚至在大战前,一些学者就已获得了各种私人捐助。工商界也为研究工作慷慨解囊,有时这是出于纯粹的科学精神,有时则出于实用的目的。自大战爆发以来,只要经济形势许可,这种合作就继续存在。企业与各企业组织以及民间个人共同为研究所、大学系科及学者和科学家个人提供资助。近些年来的经济重压几乎迫使企业开始追求回报,而一旦这种要求成为特性,企业和大学双方都将受损。

十四

大战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其对“编外讲师制度”的影响。我已说过,长期以来德国“科学界”从志愿者和众多的编外讲师那里得到充实,他们献身于教学和知识的增进,依靠学费或其他办法得以生存。在我看来,编外讲师代表的是纯粹的学术型人才,其职业选择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一种对知识和理念的专一的兴趣。因此,编外讲师制度是一种以学术潜力为中心的幸运的制度。它是大学的真正精神所在——以极为崇高的方式将学者引入极为崇高的职业。困难的确存在,因为人类的一切都不完善。但尽管存在着贫困、艰难以及过滥和过早发表研究成果的现象,编外讲师制度仍确

保了为高级学术职位提供热爱学术的优秀后备人才。当大战耗尽了中产阶级的存款的时候,它也几乎埋葬了德国学术的摇篮。年轻的编外讲师现在都急于获得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普鲁士政府目前提供了100万马克的年度拨款,以努力填补空缺,资助没有教学任务的讲师,而可由教育部自由处理的资金数目则比较少。其他邦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为学者提供少量的薪水而不给他们强加任何明确的任务。就这样,为使这一不可或缺的制度生存下去,德国正在竭尽全力。

各大学的物质条件都每况愈下。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大学用于更新实验室、扩建图书馆甚至改善研究条件的基建开支微乎其微。在这种形势下,医学、法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遭遇比语文学、艺术学或哲学等学科要好些。任何方面的工作都困难重重,而近些年来为“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en”)提供资助更是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德国大学的近代化最初还是发端于这些学科。德国大学所面临的贫困局面——包括其设备的日益陈旧和编外讲师所遭遇的困境——的确值得全世界关注。

在德国如同在整个西方世界一样,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视已经给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人们希望,贫困不会使历史上有名的德国大学生和学者所拥有的理想主义彻底枯竭。这不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文明的利益。

十五

在结束本章、因而也是结束本书之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所描绘的德国大学的图像是混乱的。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因为各大学和整个国家都是混乱的。我已经坦率地指出了各种困难、蠢事、矛盾、谬论以及人满为患、“学校膨胀”（“Schulmässigkeit”）、水准下降和向党派政治让步等现象。战前的大学并不完美，而战后的大学由于饱受贫困之苦，为新上台而尚未经受考验的领导人所左右，加上平民的呐喊为帝国所忽视，结果就注定会变得更不完美。然而，我仍然坚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目标混乱不清的问题，但资金的匮乏也许是德国大学今天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德国政府的部长们和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不仅重视教育，而且懂得教育的含义。虽然由于经济贫困、政治动荡和社会剧变，大学深受其害，但由于教授和政府官员的文化素质如此之高，大学的声望如此显赫，大学对国家的贡献如此之重要，因此即使有些问题永远得不到圆满的解决，也会出现种种调整，从而恢复甚至提高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效能。这种斗争既不会很短暂也不会很容易。美国尽管拥有近乎无限的资源，但它既未能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的价值，也不懂高等教育的含义，大学校长和教授——当然也有例外——仍处在黑暗之中。他们拥有金钱财富，这一点从美国大学美丽的校园和奢侈的宿舍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尚未学会利用财富去实现正确的目的，这一点

从以下事实也可以得到证实：美国大学决不会为使教学成为众多智力优秀、趣味高尚之士体面与合适的专业而放弃美丽的校园、罗马式运动场以及奢侈的建筑。英国正在揉眼并逐渐发现了教育青年男女与增进科学之间的差别。无人需要向德国阐释这种差别。因此，德国的过失和不足尽管可叹和荒谬，仍比我们在其他地方遇到的过失和不足要少得多，程度也轻得多。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